

第二国际 若干人物的 思想研究

•主 编 刘佩弦 马健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9000

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

主 编 刘佩弦 马健行



20012971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第二国际苦于人物的思想研究

主编 刘佩宏 马健行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39号 邮编 100872)
南京市印刷厂排版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数：394 000
印张：16
版次：1994年1月第1版
印次：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册数：1—1500
书号：ISBN7-300-01763-0/D·243
定价：10.20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的一个课题，主编由刘佩弦、马健行担任，撰稿人按本书内容顺序如下：导言——刘佩弦；第一章——费英秋；第二章——顾海良；第三章——马健行、辛仲勤、梁树发；第四章——李青崑；第五章——叶卫平、马健行；第六章——马健行。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得以出版，同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本课题立项后，由于课题组的成员多次变动，因此结稿时间一再推迟，这给人大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带来很大麻烦，对此我们深感抱歉。

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李清崑教授，他在百忙中赶写了《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展》一章，为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姚洪芳副编审，从组稿开始他就一直关心这本书的出版，在编辑过程中他为这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书最后由刘佩弦、马健行统稿。由于水平所限，一定还会存在许多不妥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1992年12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第二国际各派观点的历史概述	(19)
第一节 第二国际前期的改良主义潜流	(19)
第二节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的转轨	(23)
第二章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批判	(58)
第一节 伯恩斯坦早期思想的发展	(58)
第二节 《社会主义问题》中修正主义理论的 提出	(65)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 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	(84)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 务》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	(93)
第五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 务》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诋毁	(100)
第六节 20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进 一步扩展	(107)
第七节 伯恩斯坦理论发展的终极：向社会沙 文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转化	(129)
第三章 考茨基由马克思主义到机会主义的演变	(13)
第一节 生平	(130)
第二节 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	(133)
第三节 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	(144)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堕落	(176)
第五节	考茨基的哲学思想	(190)
第四章	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展	(228)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理论活动	(228)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242)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贡 献	(273)
第四节	普列汉诺夫理论观点上的主要错误	(290)
第五章	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与实践	(304)
第一节	生平	(304)
第二节	卢森堡的民族理论	(312)
第三节	卢森堡的社会革命思想	(327)
第四节	卢森堡在党和国家体制问题上同列宁的 争论	(343)
第五节	卢森堡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357)
第六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经济理论与 政治主张	(378)
第一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概述	(378)
第二节	用新康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	(382)
第三节	用经验批判论“给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基 础”	(392)
第四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413)
第五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民族 纲领	(471)
第六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	(481)

导 言

第二国际时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第二国际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著述，无论是正确的方面还是错误的方面，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都值得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去研究它，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本书从这些代表人物中选择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中的麦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伦纳、鲍威尔、希法亭等九个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些人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分别代表了第二国际右派、中派和左派几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都留下了大量论著，而这些论著有的在我国至今还很少有人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当然，这里没有列入第二国际左派中最坚定、最正确、最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列宁，这是由于在我国研究列宁思想的著作较多，比较为人们所熟悉，为了避免重复，所以从略。

我们知道，第二国际是在巴黎公社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欧洲各国纷纷建立起群众性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基础上，并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当时，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期斗争，“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①。因此，第二国际一开始就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并在其初期活动中极大地提高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着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有利条件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产生怀疑，并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形成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始作俑者，就是爱德华·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出生于德国柏林，原为银行的一个职员，受巴黎公社的影响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由于他作为“苏黎世三人团”成员之一宣扬投降主义纲领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尖锐批评。此后，在马恩的影响下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从1881年起，他担任了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成为当时德国党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方面颇有影响的人物。倍倍尔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表扬他“一直当之无愧地享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①。他取得了恩格斯的很大信任，被恩格斯指定为他的遗作代管人之一。

但是伯恩斯坦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逝世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特别由于他在流亡英国期间受到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的深刻影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逐渐产生了怀疑，思想上滋长了机会主义。从1886年年底起，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连续发表了总题目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继而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伯恩斯坦在他的这些著述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3页。

中，“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①。在哲学方面，他根本否定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极力鼓吹用康德主义和“进化论”去代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并不存在客观规律，因此不可能根据唯物史观来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极大扩展，信息传递和交通运输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以及灵活的现代信用制度和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已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因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他甚至根本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这个理论不过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只要从某一点开始，“这把钥匙就失灵了”。在政治方面，他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主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逐步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反对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奋斗目标，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口号。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在德国和第二国际其他成员国中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他的修正主义言论得到一些机会主义者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在德国党内对伯恩斯坦的背离马克思主义行为表示极大不满。因此，先是在德国党内，接着在第二国际范围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空前规模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是否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重大原则问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题。这场争论实际上在不同情况下，在不同问题上，贯彻于整个第二国际后期。这场争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历史局限，其影响甚至在今天的国际共运中仍然明显地感受到。

在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罗莎·卢森堡表现突出，一开始就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无论是她凌厉的发言或她富有战斗性的论文，都给修正主义以最沉重的打击。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的辩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不是革命斗争的方式问题，也不是采用某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本身的存废问题。卢森堡深刻分析了伯恩施坦所鼓吹的改良主义本质，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而只是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一些或少一些。总之，只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瘤，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她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卢森堡深刻指出伯恩施坦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把五花八门的思想体系残片拼凑起来的大杂烩；指出他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的代表，实际上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一般人类的科学、民主和道德，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的东西。

卢森堡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著名的左派领袖之一。她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在理论上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财富。她写了大量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积极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大战爆发后，她在狱中积极撰文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谴责第二国际右派分子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行为。在她的某些著作中，虽然犯有某些错误，

但是她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比较绝不能同日而语。对此列宁曾用俄国寓言中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这两句话作比喻，指出卢森堡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①。

在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的争论中，开始时考茨基也站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对伯恩施坦提出了批评。他批驳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非难，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要消灭资本主义统治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正确的结论。当时，他作为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站出来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这对于第二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了他在态度上的暧昧和在一些重大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者的让步。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说他很不情愿同他与之相处很久的亲密战友伯恩施坦争论，并表示伯恩施坦的文章促使他深思熟虑，为此应该感谢他。又如在他写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中，极力避免分析伯恩施坦在工人阶级应当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重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说什么“我们不想发誓担保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非采取阶级专政的形式不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②。由此不难看出，考茨基站出来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完全是被迫的，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很不鲜明的，实际上在其思想深处本来就有与伯恩施坦相一致的东西。这就说明，考茨基后来走上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54页。

②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44页。

但是从总体来说，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曾长期同马恩保持密切的联系，后来担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他在宣传、普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在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恩格斯逝世后，他成为第二国际最有声望的理论家，各国社会主义者都把他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向他请教，因而获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他写的许多著作，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土地问题》、《取得政权的道路》等等，曾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指出，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写的一系列著作“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还指出：“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①

然而考茨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上，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议会迷”和机会主义者。他从原则上一概排斥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认为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是绝对不必要的。他多次表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只能是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去夺取国家政权，而不是破坏原有的国家政权。不过他的机会主义通常是采取中派的、或隐蔽的形式。也就是说，他通常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实践辩护，用诡辩论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列宁说，他的这种中庸论比那些公开的机会主义更加可怕和有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公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中派的、即隐蔽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53页。

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他在《战争》、《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等文中，竭力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集团的背叛行为进行辩护。同时，他提出“超帝国主义”论，抹煞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认为会出现一个用国际金融资本的联合来代替相互之间斗争的所谓“超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这种言论就是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用所谓“超帝国主义”时代的虚假前途来安慰自己，幻想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可能实现永久的和平。

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变本加厉，疯狂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并竭力宣扬和平过渡的思想，断言世界革命不会通过专政的道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民主和人道”来实现。列宁说他是在奴颜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考茨基一直到他1938年死去之前，始终坚持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其实，他坚持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偶然的。他在晚年写的《自传》中说：“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楚了俄国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我立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反对它，不仅反对那种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还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而且是由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在同人民大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少数派不得不用武力和恐怖来压制人民大多数。”^①这充分说明，他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是根深蒂固的。

除考茨基以外，第二国际另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原为俄国民粹派的一个青年革命家，他曾参加民粹派的“叛逆者”小组和“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投身于“到民间去”的革命活动。1883年他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1页。

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从此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883年到1903年20年间，普列汉诺夫进行了大量的创造性的理论活动，他作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思想家活动在俄国和国际舞台上。他是第二国际首先起来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之一。接着他又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变种——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他是当时第二国际反对修正主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许多著作，对于捍卫和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许多理论问题，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一些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恩格斯曾为在俄国思想界中有以他为代表的一派青年“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而感到自豪。^①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许多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②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的评价尤为突出。他说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他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由于害怕党的分裂而倒向孟什维克一边。从他成为孟什维克到1914年期间，他经常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他时而向布尔什维克靠拢，时而成为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时而与孟什维克决裂，时而又重新转为孟什维克。列宁指出，从1903年到1914年，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一直极可笑地动摇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号召俄国工人“保卫祖国”，成为公开为沙皇俄国的掠夺战争进行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94页。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结束了他长达37年之久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俄国。但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表示要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同时，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之际，他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尚不成熟；而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政权强加给无产阶级，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历史灾难的道路。这说明，他这时仍然深深陷于机会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直到他于1918年逝世。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中的一种思想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麦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等人，他们都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的名义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因而引起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注意而得名。他们的著述，主要试图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边际经济学和民族问题等许多新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阐述有一定的独创性，写过一些有益的著作。例如，希法亭较早地对帝国主义进行过研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他的《金融资本》一书，列宁对其作了充分肯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时期的著作，虽然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其主流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错误观点有所发展，最后形成了修正主义的一个派别。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提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修正主义观点，但他们在主要方面有其共同性。他们在哲学上都主张用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强调经验是一种逻辑概念，它先于精神与物质的区别；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视为康德的方法论。在经济理

论上，他们鼓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成为有组织的、无害的资本主义并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宣传用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来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维护奥匈帝国的统一，分裂无产阶级队伍。在政治上，他们基本上属于第二国际的中派，主张用社会改良和和平过渡实现社会主义。但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并不一概反对暴力，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实行“防御性暴力”是必要的。希法亭甚至得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本巨头专政、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有的成为公开的沙文主义者（如伦纳），有的采取中派立场拥护考茨基的观点（如鲍威尔）。他们对十月革命基本上持反对态度，认为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鲍威尔虽然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处境表示同情，但他同时表示他不会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十月革命对奥匈帝国的工人群众和士兵是个巨大鼓舞。在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下，奥匈帝国迅速崩溃，工人和士兵纷纷成立苏维埃，哈布斯王室被迫退位。当时出现了同俄国二月革命后一样的革命形势。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没有充分利用这一革命形势，而是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鲍威尔出任外交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强调以和平过渡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在旧的国家机器保持完整、旧的军队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要和平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化，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宣扬一时的“红色维也纳”，只不过昙花一现，过不了多久也就烟消云散了。

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这场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派别，通过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

事件，如俄国的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都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站到了自己相应的位置。因此可以说，上述争论的过程一直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才算真正告一段落。

如果从这次争论的全过程来看，最初虽然存在着左、中、右三派，但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理论斗争的深入，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实际上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同流合污，二者已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这场争论在本质上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为一方，而以列宁、卢森堡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双方观点分明，形成两条路线的鲜明对立。这种对立的根本分歧可概括如下：

（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当遵循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科学的、因而也是最正确的世界观。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则认为，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应当作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先决条件。伯恩斯坦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回到康德那里去”。考茨基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对每一个愿意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人敞开大门，不管他的这种意愿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面，是唯物主义的，康德主义的，基督教的，还是什么别的。^①

（二）关于时代。正确认识所处时代的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深入研究，正确地指出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并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

^①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11页。

的最高阶段，其根本的经济特征和实质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而这种垄断必然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世界市场进行更加激烈的竞争乃至爆发战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则认为，帝国主义只不过是金融资本家“情愿采用的一种政策”。也就是说，这种政策是可以改变的。考茨基提出帝国主义将进入“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军备竞赛和战争也就不会再次发生，资本主义就会进入一个“持久和平”的“新时代”。

（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它必须在其革命政党领导下，联合广大劳动人民，经过不懈的革命斗争，最终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只要具备有利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不一定等到工人阶级占到全体居民的多数再进行这种取得政权的斗争。取得政权的手段，主要通过革命暴力，但也不放弃通过和平手段的一切有利机会。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则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工人阶级已占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他们主张通过改良主义的途径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通过任何暴力夺取政权。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必须在其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一方面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另一方面对于敌对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既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又

是新型的专政国家。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和专政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既不存在没有专政的民主，也不存在没有民主的专政。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并求得自己彻底解放的根本保证。修正主义者则认为，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已经过时，它与民主是互不相容的。他们鼓吹“纯粹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18世纪巴拉圭的一种教权统治。他们反对破坏资产阶级原有的国家机器，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他们有的人（如普列汉诺夫）虽然未公开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原理，但却向往改良主义的宪政幻想，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具体实践问题。

（五）关于战争与和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产物，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坚决反对本国的这种战争政策，使其在战争中失败，并利用有利条件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则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积极支持各国劳动人民互相厮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结束后又积极支持帝国主义的“和平”分赃会议。

（六）关于殖民主义政策与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殖民地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文明民族”有必要监护“非文明民族”。他们公开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伯恩斯坦公然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气，说什么“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像以往所宣布的那样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获得保障，那么在这一限度内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对此

表示赞同，而丝毫不必放弃自己的原则”^①。

（七）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了彻底解放而进行战斗的先锋队，因此它应当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高度觉悟的、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队伍。它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具有统一的党纲党章，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成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歪曲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主张把社会民主党建成改良主义的党、人道主义的党，使之成为资产阶级议会的附属品。他们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在物质上支持党的人都可以自己宣布为党的一员。他们甚至主张在罢工中每个工人都有自行“列名”入党的权利，即使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八）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取得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热烈拥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帝国主义矛盾的必然产物，它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政权强加给无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最大的历史灾难。他们竭力攻击十月革命，说它是一次“政变”，说十月革命所表现的是最狂暴的姿态，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

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之间的上述分歧，究竟谁是谁非呢？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历史的方向并没有按照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19页。

理论观点发展，相反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首先，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预言相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爆发并取得胜利，而且站住了脚跟。它在十月革命后仅仅用了19年的时间，即从1917年到1936年期间，其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并在没有前人任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在这期间犯过许多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原苏联工业生产水平仍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的第五位一跃而居于世界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欧洲的第一位。这就是说，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赶上和超过了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足足用了100年到200年的时间才达到的水平。正是由于苏联在经济上有了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才为后来卫国战争击败德国法西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苏联又接连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高度发展的强国，而与美国这一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相抗衡。目前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是这些历史事实，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

其次，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估计完全不同，十月革命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影响，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有别于第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回顾我国自建国以来四十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间虽然经过了一些失误和挫折，但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目前我国正卓有成效地遵循党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再次，十月革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先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从革命的俄国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翻身求解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风起云涌、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众多原殖民地摆脱了殖民主义者的枷锁纷纷宣布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随之瓦解。从此，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一道，成为当代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促进全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强大力量。这说明，世界并没有按照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意愿发展，恰好是违反了他们关于保持殖民地存在以服务于“文明民族”利益的意愿的。

最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十月革命后初期，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迅速掀起了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先后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则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浪潮。但是这一革命风暴，不久便被扼杀下去，而在这一扼杀过程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又曾一度出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但可惜昙花一现，终于没有抓住这一难逢的机会。虽然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其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毕竟是大大提高了，他们毕竟不能按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他们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统治者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采取一些改良主义措施。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无产阶级的革命形势必然到来。

总之，从20世纪初以来全部世界历史的发展，无一不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正确性，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及其政治路线的彻底破产。

但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观点的破产，并不表

明它的影响已在地球上绝迹。当它得到适当的条件，就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散布它的影响。我们知道，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就其渊源来说，正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变种。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包括：（1）他们反对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他们认为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自由。因此，他们主张兼收并蓄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使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这种貌似“自由、平等”的论调，实质上是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在阶级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任何统治的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垄断”，认为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实现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的自由竞争，才能表达各种政治势力的意愿。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并不是自封的，它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通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而确立起来的（在中国，就是鲜明例证）。所谓实行多党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就是把已经确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地位让给资产阶级政党，使其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方向。因此，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实行多党制，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3）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他们诋毁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恐怖制度。他们完全抹煞国家的阶级性质，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实际上，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里，不是这个阶级的专政，就是那个阶级的专政，因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必然肯定资产阶级专政，就是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4）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主张私有化或“混合经

济”。民主社会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些基本内容不难看出，它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观点是一脉相承，而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则是背道而驰的。

当今现实雄辩地说明，作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变种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绝非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灵丹妙药，恰好是葬送社会主义制度的断魂汤！社会主义是必然要获得彻底胜利的，但指导社会主义获得彻底胜利的理论武器，不可能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理论，也不可能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而必须是同本国具体情况密切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章 第二国际各派观点 的历史概述

第一节 第二国际前期的改良主义潜流

改良主义初露端倪 早在第二国际成立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就已经萌芽。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常法，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这对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第一个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困难的时刻，党内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危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议员的报告》中公然宣称他们“根本不想革命”，认为“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并鼓吹“自然长入社会主义”。不过这种危机主要还是由以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的活动造成的。1879年，他们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主张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成为富有仁爱精神的全面的党；要求放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取消不合法的党组织，走合法改良的议会道路。面对党内的改良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严厉地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阶级斗争、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等原理，指出“苏黎世三人团”企图以补补缀缀的改良代替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必将使运动遭到失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走。此外，马

克思恩格斯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了许多指示，批评了党内领导人对反动派所表现的“温顺”，强调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告信》和这些指示，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纠正了机会主义倾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二国际前期的改良主义倾向 第二国际前期以及这时期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其根本路线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也是第二国际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时，第二国际内部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排除无政府主义的干扰。然而，在批判无政府主义否定议会活动时，却忽视了国际内部日益滋长的改良主义的倾向，甚至有时还把一些改良主义的主张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予以肯定。

在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大会上，比利时领导人王德威尔得就曾主张社会主义者应通过议会多数来夺取政权。他在关于工人立法问题的报告中说“要派遣社会主义者进入立法机构，去夺取政权和占领议会”^①。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也表现了这种倾向，法国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在发言中，就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仅仅归结为议会行动，这实际上摒弃了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其他形式如政治性罢工等。由于当时面临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猖狂活动，再加上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广泛市场，所以国际代表大会对这种倾向实际上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在德国，随着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的废除和“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特别是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扩大和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党内又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鼓噪。这些机会主义者要求以改良主义的策略代替革命策略，放弃暴力革命。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选举前夕，公开声称“现代资本主义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党的代表格里连贝格于1891年2月在国会

^① 《国际布鲁塞尔大会记录》，转引自《第二国际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演说中声明，社会民主党不想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改良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结果，党从来没有同意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年，党的著名活动家、国会议员福尔马尔也声称，由于俾斯麦制度的垮台和“新的民主时代”的到来，必须修改党的方针，即用阶级合作来取代阶级斗争，应当“以善对善，以恶对恶”。《前进报》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以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当社会民主党通过选票的增加而掌握政权，资本主义就会变成社会主义。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妄图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梦想强加于党，使“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认为党迟早要同福尔马尔决裂。^①这时，因“苏黎世三人团”曾专程向马克思恩格斯做忏悔性解释的伯恩施坦也借机鼓吹议会道路，要党勇于冒“受议会痼毒传染”的危险，断言“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强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②。这些倾向不仅限于德国党，在其他国家的党内也存在着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幻想。

为了痛击机会主义倾向，帮助社会民主党摆正方向，恩格斯发表了马克思15年前写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即《哥达纲领批判》），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接着，恩格斯写了《“法兰西内战”导言》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导言》针对机会主义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19—120页。

② 《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4页。

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在“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机会主义的特点和危害，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强调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机会主义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其结果只能把党引入迷途。

随着机会主义的发展，改良主义的倾向也开始在农民问题上暴露出来。1894年，法国工人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对以前的土地纲领做了补充，加深了纲领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纲领提出了“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的主张，并要在农村联合包括富农和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者在内的“一切成分”。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福尔马尔制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同样强调要保护小块土地私有制。福尔马尔指出，党的纲领不仅要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还要反映富农的利益。恩格斯愤怒地把他斥为叛徒，指出，难道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难道还能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吗？

鉴于在法、德农民问题上所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恩格斯于1894年底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文章批判了机会主义的土地纲领，科学地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论证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原则。

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社会党人在选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这些成就虽然标志着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的增长，但也助长了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甚至某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倾向于过高估计议会斗争的意义，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法国的盖得，当被选进议会时向鲁贝（诺尔省）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管区的选民发表的演讲中说：“受到你们榜样鼓舞的其他地区也会投工人党的票，到那时……结束贫困和奴役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只是由于你们的意志和信念，社会解放将通过合法途径来完成……”^①这时期，机会主义思潮已从德国蔓延到西欧的其他国家。但是，还只是以个别的、零散的论点或见解表现出来，尚未构成思想体系，因而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也没有充分显示出它的危害性。

第二节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 民主主义的转轨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形成与泛滥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各国机会主义分子鼓吹改良主义的声浪变本加厉，伯恩斯坦也认为时机成熟，在恩格斯逝世的第二年，他便对马克思主义开始进行系统、全面的篡改和修正。

1896年，伯恩斯坦对《1848年法国革命史》作了一些评述，并且写了《法兰西共和国是怎样灭亡的》一文，污蔑当时的工人阶级领导人是力求建立专政的“恐怖主义者”，因而招致了资产阶级的报复，促使资产阶级转向反动。这告诉人们似乎资产阶级的六月屠杀是由无产阶级引起的，从而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一年开始，到1898年，这期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并修正马克思主义。1899年，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其修正主义的观点，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几个方面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修正”。这标志着伯恩斯坦

^①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282页。

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内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正如列宁所说的，这本书“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一出笼，就迅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起来，并立即得到了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响应。英国的海德门、麦克唐纳、法国的米勒兰、奥地利的鲍威尔、阿德勒、俄国的经济派以及美国、瑞士、保加利亚、比利时、瑞典等国的机会主义者纷纷效法，相继登台，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就从个别国家的现象变为国际现象，形成了一股修正主义者大张旗鼓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逆流。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垒与较量 (1) 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也激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帕尔乌斯、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以及远在流放地的列宁，都纷纷发表文章，抨击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其中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成为当时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战著作。该书剖析了伯恩斯坦理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指出同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不是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问题，而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从1898年—1903年，德国党连续召开代表大会，围绕着伯恩斯坦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

1898年9月，德国党召开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清醒地认识修正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因而没有把批判伯恩斯坦主义列为大会议程。可是，会上仍然展开了关于伯恩斯坦主义的辩论。修正主义者威·彼乌斯公开声明“反对”“最终目的”这一概念，断言最终目的是一般是不存在的。奥艾尔、海涅、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15页。

福尔马尔、大卫等修正主义分子也发言批评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蔡特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考茨基、舍恩兰克、施塔特哈根等马克思主义者则针锋相对批评了修正主义者的发言。卢森堡谴责伯恩斯坦主义者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放弃最终目的的观点，认为最终目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两样。她说“夺取政权始终是最终目的，而最终目的始终是斗争的灵魂”。针对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她郑重宣称“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的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①。蔡特金在发言中，批判了伯恩斯坦的“议会过渡”，指出，如果按照伯恩斯坦的意见，只要通过个别的小改良，就可以使我们东一小块、西一小块拼凑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李卜克内西也强调说，如果按照伯恩斯坦的观点去做的话，就会把我们的纲领，把我们的全部传统，把整个社会民主党埋葬掉，社会民主党将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② 斯图加特大会，并没有对修正主义做出任何决议，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正当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进行严厉斗争之际，机会主义分子把持下的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却提出停止争论，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放弃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会后，卢森堡又写文章，批判了伯恩斯坦以“批评自由”为口号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指出社会民主党当然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为了进步、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企图使党放弃最终目的的批评，不会使党向前发展，而只会使党瓦解。

1899年10月，在德国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又一次交锋。伯恩斯坦问题被正式列为大会的议程，倍倍尔在报告中逐一地批驳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观点，报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6页。

告指出，伯恩施坦的主张都是资产阶级甚至机会主义几十年来经常说的东西，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策略，他把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革命的勇气、热情和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地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卢森堡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关于不必夺取政权，只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社会改良的观点。李卜克内西揭露说，伯恩施坦观点的实际后果将会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这只会削弱工人阶级和党的战斗性。修正主义分子艾尔姆、大卫、奥艾尔、福尔马尔、埃尔哈特和沃尔特曼等，竭力为伯恩施坦辩护，指责卢森堡、蔡特金、普列汉诺夫等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人压制“意见自由”，并引起党的分裂。

最后，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了德国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改变自己的纲领、策略和名称。

1901年，伯恩施坦又做了一次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是可能的？》的演讲，公然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要求经常对它进行“批判性检验”。这个演说引起了轰动，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喝采，也引起了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慨。这时，修正主义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也遥相呼应，摇唇鼓舌，号召党不要提革命的任务，而应采取“和平”演变的发展方针，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实行社会改革。

面对伯恩施坦日益猖獗的挑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及时而严厉的回击，在德国党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决议。

1903年的德累斯顿大会，是德国党批判伯恩施坦主义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德国党把反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峰。这次大会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抹煞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对立的思想，谴责了修正主义者放弃原则、改变党的性质的企图，驳斥了修正主义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倾向。大会以288票对1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决议即德累斯顿决议。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决议，它指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严重危害，否定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观点，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不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予政权。决议首次指出修正主义已成为一种国际思潮，这就为其他各国党反对修正主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借鉴，也成为以后国际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德国党在这段时间内的斗争表明，党内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相互对立的阵营，马克思主义者占绝对优势，居主导地位，修正主义者力量微弱，尚未在党内形成大气候。这时的考茨基，在党内的代表大会上还不像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明显的中派立场，在许多场合中还基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来看，德国党尚未偏离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但是，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却表现了某种容忍和妥协。他们尽管对修正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有了较深的认识，但未能在理论上对修正主义予以有说服力的回击，特别是未能在组织上与修正主义分子决裂，因而斗争不够彻底、不够坚定。这就让修正主义者得以继续留在党内，侵蚀党的肌体，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后的发展说明，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较量及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修正主义并不是德国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整个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工人运动，工人贵族也有所增加，这就为修正主义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资本主义这时在发展中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和

平稳定时期，其统治手段已由过去的以暴力镇压为主变为以实行议会民主为主，镇压手段和和平手段交替使用。这些变化，特别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绩，使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根本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对其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的修正主义者不仅限于理论上的鼓吹，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899年6月，法国资产阶级温和派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组阁，用“约请”社会主义者加入内阁的狡猾手段来分裂工人运动，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欣然应邀，未征得党的同意，就擅自参加新的内阁，担任工商部长，而陆军部长则由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担任。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这个内阁，一方面欺骗工人阶级，许诺把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一方面又在1900年动用军队镇压马提尼克和夏龙的罢工工人。

米勒兰的入阁，引起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可能派布鲁斯为首、饶勒斯、白里安、维维安尼等人为核心的“入阁派”；一派是以盖得、瓦扬、拉法格、福尔坦、泽瓦埃斯等人组成的“反入阁派”。米勒兰入阁也引起了国际方面的广泛反响。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以及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表示反对。倍倍尔在1899年7月1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认为米勒兰入阁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李卜克内西在致法国工人党埃佩尔内代表大会的信中说：“社会主义者要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倒向敌人方面，就是使自己屈从于敌人。至少，一个成了资产阶级政府成员的社会主义者，就同我们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分离了。”^①而各国的修正主义

^① 威·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3页。

者如德国的伯恩施坦、福尔马尔，英国的海德门、凯尔·哈第，比利时的安塞尔和荷兰的万-科尔则大力支持、大加赞赏，祝贺米勒兰战斗在“部长的战斗岗位上”。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也给了米勒兰以高度的评价，这个党的中央机关报称赞米勒兰是个为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意志坚强和不知疲倦的英勇战士，他并没有背叛，而是带来了牺牲。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甚至还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一个原则性结论，即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必须依靠资产阶级的帮助实现社会民主党的过渡纲领。

米勒兰入阁问题被提交到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讨论。1900年9月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夺取社会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府联盟”这一项议程中，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大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的第一次交锋，并由此产生了左、中、右三派。以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的代表饶勒斯为首的右派十分嚣张。饶勒斯宣称，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党人应当“有勇气”改变策略。目前还仅仅在法国、在民主“较发展的”国家才有可能参加内阁，这种情况在所有其他立宪的国家也能够逐渐实现。他认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是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①。德国的改良主义者奥艾尔说：“诚然，在德国，我们还没有出现米勒兰事件。我们还没有进展到这么远！但是我希望我们会很快达到这一步！”^②比利时的工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也表现了同样的态度，认为米勒兰入阁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好处，并攻击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把社会主义简化为“招手即来”，呼吁同过去实行“决裂”，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脱离实践的宗派主义。

^① 《国际社会主义者巴黎代表大会》第21页。转引自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9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以盖得和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要求制裁米勒兰。卢森堡认为像米勒兰这种行为，不仅丝毫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相反，却会使党在工人群众面前威信扫地。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卢森堡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按照它的性质来说，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允许成为执政的党。”^①

大会出现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恩利科·费利和茹尔·盖得联合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鲜明地指出，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另一个是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在这个作为多数通过的决议案中，他采取了中派主义的调和立场。决议这样写道，“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大胆进攻的结果，而只能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方面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无产阶级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复兴的结果，只能是逐步夺取市政代议机关的代表席位的结果。”决议声称，“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始，而只能认为是与困难环境作斗争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的手段”，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声称，“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劳资斗争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当退出内阁。”^②

考茨基的决议案一方面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论述，一方面又把入阁问题看作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企图使大事化小。但是其实际效果却表明，这是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

^①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3卷，德文版第273页。

^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81页。

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主义者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这种特殊步骤。甚至当内阁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表现出不明显的偏私时，社会党人仍然可以安然地留在内阁中。显然，考茨基这个决议案以中立的方式对修正主义做了重大让步，因而赢得了修正主义者的赞同。安塞尔祝贺这一决议案开辟了改良主义实践的新阶段。左派则坚决反对。盖得指出，一些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至多不过是实现部分改革而已，根本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因而必须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强调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旦进入资产阶级内阁，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排除了同一个人既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又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每一个内阁部长都要为政府的全部政策，为战争拨款、对外政策负责。如果党要支持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就要对资产阶级内阁的全部错误、罪行负责任。瓦扬则坚定而直率地说，社会党应该始终是反对党和革命党，任何妥协、任何联盟、任何社会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都要受到谴责。他认为通过考茨基提出的这个决议是向修正主义的投降。

比利时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站在所谓“不干预”的“中立”立场上声称，这个问题对于法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只有“纯学术上”的意义。他主张“坚持原则，但策略则是各个国家的事情”；国际代表大会不是法庭，也不是为革除教籍而召开的，在这里要使两个互相敌对的派别成为缓和、调和和统一的因素。

最后，大会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对社会党人是否可以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原则问题，态度暧昧、模棱两可，使这个决议极富弹性，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释，因此被人们称为“橡胶性决议”。这一决议的通过，为以后各国修正主义者入阁提供了借口。会后，修正主义者不断地以这个决议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伯恩施坦写道，米勒兰入阁完全是正常现象，不是削弱而是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影

响。福尔马尔把这一决议说成是米勒兰的胜利。曾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积极支持入阁的饶勒斯，也公开在群众大会上扬言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一种新的行动方式”，“将来总有一天统一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也会指示它的一个或几个党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以便监督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尽最大可能反抗反动势力的诱惑，尽可能参加改良的工作”^①。

马克思主义左派则针锋相对，驳斥修正主义者对米勒兰主义的辩护。卢森堡写道，只要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存在着，作为现政府成员的社会党人就不得不执行资产阶级政策。

资产阶级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极为关注，声称巴黎大会已表明社会民主党由纯粹消极的革命政党，越来越演变为改良的政党，并宣称考茨基的决议是改良派的胜利。

米勒兰入阁，是修正主义的阶级合作、改良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必然表现，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是“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②。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曾指出米勒兰入阁的国际性后果，他说“英国的米勒兰、意大利的米勒兰、德国的米勒兰与法国的米勒兰一起，为了资本主义掠夺而唆使无产阶级互相为敌。请问，同志们，那时还有什么工人的国际团结呢！一旦米勒兰事件由个别现象发展为普遍现象，我们将只能放弃任何国际主义而变成民族主义者……”^③。我们知道，他的话却不幸被言中，以后的事实完全应验了他的这一席话。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德国党内和国际上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的态度以及中派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在伯恩

① 《米勒兰事件》，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04—1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第1卷第226页。

③ 《米勒兰事件》第13页。

施坦修正主义刚刚产生时，考茨基就有妥协倾向。虽然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甚至还出版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一书，全面分析和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但同时他又把伯恩施坦的著作称为“我们事业中的宝贵现象”，对伯恩施坦等机会主义分子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坚决反对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他说，我认为完全不需要因为他的著作而斥责他叛变以及激起反对他的普遍愤怒。在德国党的斯图加特大会上，他这样强调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①。在关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他说，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这就回避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争论，钝化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锋芒。

这种让步妥协倾向，还存在于其他党内。1899年底，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大会竟以1149票对240票通过了德莱萨尔提出的妥协性提案。这个提案一方面强调党应夺取市镇、省和全国的选票和选举职位，并最后通过革命方式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一方面又认为党可能要研究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特殊情况。这说明，中派观点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国际性的社会基础。巴黎代表大会上的中派的出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此后在国际内有关重大问题的分歧中，他们总是动摇不定，时而偏向右翼，时而偏向左翼。

巴黎代表大会以来，策略问题一直摆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机会主义者又开始大肆宣传内阁主义这一新方式，饶勒斯认为社会党人的内阁主义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新方式”，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0页。

是长期可以采用的正常手段。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掌握政府权力的过渡时期，社会党人参加政府正是这一点的体现。而这种“新方式”的实际内容不外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长期联盟，在选举议员时支持他们，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预算案等。

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决否定这种“新方式”，俄国的列宁，法国的盖得、瓦扬、意大利的费利以及德国的卢森堡、蔡特金和李卜克内西等，都对之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李卜克内西在《论新方式》一文中写道，“新方式”的炮制者放弃革命，希望用说服的方法把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争取过来，这种方法只会使工人阶级彻底瓦解。

关于策略问题的分歧和斗争，也明显体现在第二国际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并且这一议题再度成为争论的中心。根据法国社会党的提议，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累斯顿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这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基础。针对这个决议，大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盖得为首，包括瓦扬、倍倍尔、普列汉诺夫、费利、考茨基、海德门和俄国代表团，他们表示拥护这一决议；一派是以饶勒斯和王德威尔得为首，包括阿德勒、安塞尔、布兰亭、特鲁尔斯特拉等人的机会主义派。

得累斯顿决议指出：“大会无比坚决地反对那种旨在改变我们久经考验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英明策略，以向现存制度让步的政策代替夺取政权、代替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的修正主义企图。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将会使我们这个以尽早地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为宗旨的党，从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变为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党。”^①决议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社会民主党不得参加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99页。

资产阶级政府。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删掉了决议中谴责修正主义的部分。为此，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王德威尔得认为，批判修正主义是德国党所特有的概念，不应在国际范围内对修正主义进行谴责。饶勒斯也在发言中攻击了得累斯顿决议案，认为这个决议是力求采用强加于德国社会民主党身上的那种行动原则，而这只会束缚其他社会党的手脚，阻碍普遍政治自由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他认为各个国家的状况差异很大，国际大会不应制定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安塞尔在发言中指出，“如果有一些比利时社会党人宁肯在街头战斗而流血牺牲，却拒绝一切贴上政府标签的改革的话，那也是很可悲的。”还说：“一旦资产阶级某个党派要我同它一起来实现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主张时，我应不应当拒绝呢？我应不应当仍然让敌对阶级独揽政权呢？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丝毫没有权利这样做。即使他们只给我们一名阁员的职位，我们也要接受下来，并且说‘非常感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得到一个职位呢？’”^①

考茨基、倍倍尔等人强调了制定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到处都一样，因此各国社会党应有共同的立场和国际性的策略原则。修正主义也是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必须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措施。倍倍尔还谴责了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和饶勒斯对米勒兰的纵容所造成的危害。他说：“当1900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展览会时，他（即米勒兰——作者）不仅接待了沙皇，而且还接受了一枚俄国勋章；但是当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始时，他自己根本就没露面，更不用说让他说一句欢迎的话了。但是当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表示感谢和敬意来到巴黎公墓的被杀害的公社社员墙时，米勒兰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却派遣了地下的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代表：步兵、骑兵和炮兵，让警察驱散了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07页。

代表。”^①最后，大会通过了基本上体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累斯顿党代表大会决议精神的决议，该决议首次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否定了改良主义、入阁主义的新方式。在这之前，策略都是由各国党来制定，根据得累斯顿决议，必须制定社会主义策略的国际原则。这就使各国党明确了最终目标以及目前的任务。

这次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殖民地问题时，也暴露了修正主义的观点。以万-科尔、海德门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把反对殖民地冒险归结为实行一些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经济、政治措施。万-科尔在报告中甚至还提出殖民地在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要的，认为不应当简单放弃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根本没有政治上的自治习惯，让它们自行其事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和贫困，因此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予以监护。由于万-科尔未把这一内容写进决议草案中，因此大会未对此产生争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已经渗透到各种现实问题中去了。

代表大会之后，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白里安、维克安尼相继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这实际上是米勒兰事件的继续。在这期间，被选进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内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改良主义分子，当选的代表中有伯恩施坦、奥艾尔、大卫、冯·艾尔姆、福尔马尔、列金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已逐渐成为领导党的关键机构，而这些人对党的议会党团的立场则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德国党内的领导人公开支持俄国的孟什维克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党员资格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问题，强调应在党内实行自治制原则。考茨基指出，如果在列宁与马尔托夫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坚决支持马尔托夫。这时，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也在党内掀起要求自治的喧嚣。

^① 《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其他社会党也进一步向右转。法国社会党实行了新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各个组织和各个党员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取消上级对他们的行动的任何监督权，此后还通过决议取消了党对议会党团的监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消费合作社也予以肯定，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并塞进党纲。在意大利，以屠拉第、比索拉蒂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断言意大利走上了正在逐渐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述情况表明，修正主义势力正在国际范围内增强。

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国党的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更为明朗。马克思主义左派热烈欢呼俄国革命，并在本国内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修正主义分子却极力否定俄国革命的意义，把它说成是“纯俄罗斯事件”，是俄国封建落后的象征，而西方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应效仿，在“文明的”议会制国家中应当放弃革命。中派则只在口头上宣传俄国革命，却不在实际中付诸实施。

俄国1905年革命，首先是爆发了全国范围的政治大罢工，接着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又发展为12月的武装起义。概括俄国革命的经验，即武装起义与群众性政治罢工相结合。而这一点恰恰是机会主义者所竭力反对的。德国工人阶级自发地起来争取普选权，进行示威游行和罢工，他们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直接运用于实际行动中。然而，德国党的领导人却仅仅在报刊和工人集会上赞扬俄国革命的经验，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想超出和平、合法的议会活动范围，反对把群众罢工与武装起义结合起来，甚至还反对通过政治性罢工来争取普选权。认为只能用“和平的手段”来争取普选权。党的执委会还同工会委员会达成协议，其中向工会做了这样的承诺：党的中央机关不打算宣传群众性政治罢工，并将尽可能反对这种做法。

德国的工会走得更远。正当德国工人阶级掀起罢工斗争的浪

潮时，德国工会的代表大会却通过了反对罢工的决议，禁止工会为罢工工人提供罢工经费。这实际上是取消罢工。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积极宣传群众性罢工斗争，蔡特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强调罢工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蔡特金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当然不能在议会的镶花地板上实现，而只能在议会外实现。”^①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对立愈来愈尖锐。

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的斗争日益尖锐，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海陆军备的规模不断扩大。1907年秋，法、俄、英为对抗德、意、奥三国军事同盟集团，又结成三国协约军事集团。在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对峙下，世界面临着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召开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围绕着革命问题，特别是围绕着军国主义与殖民地政策问题，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这是第一次有列宁亲自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右派和中派处于绝对优势，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和各国党的左派则处于少数地位。大会针对军国主义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共收到四个提案。法国社会党人爱尔威的提案认为要反对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社会主义者应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军事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不论来自何方的任何战争”。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的代表饶勒斯—瓦扬的提案，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应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群众大罢工和起义来阻止战争；一方面又不区分战争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认为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攻，就是对国际工人阶级的进攻，因此被威胁的民

^① 1905年2月15日《莱比锡人民报》

族和工人阶级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去反对这种进攻而保卫他们的独立和自主。法国代表团少数派盖得提出的草案，反对通过罢工来制止战争，而只限于号召用减少军备、反对军事拨款等合法手段进行反战斗争。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草案成为大会论争的焦点。这个草案一方面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消灭战争，另一方面却把反战活动仅限于议会内的斗争，不主张在议会处进行群众性斗争，也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军国主义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倍倍尔犯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把未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划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战争，并由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先遭受进攻而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祖国。倍倍尔这个提案的错误被机会主义者利用，作为论证修正主义观点的论据。

福尔马尔在大会上公开扬言：“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个很好的德国人。”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拉夫说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出议会里的和平行动，英国工人拒绝挑起带有暴力性质的事件。王德威尔得在大会上强调，应承认各民族有保卫自己独立和反对外来侵略的神圣权利。这种夸大民族利益，无视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已表明第二国际内部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

列宁等左派通过分析对比这四个提案，认为爱尔威提案虽有正确的成分，但在反对军国主义时却忘记了社会主义，不顾战争的性质，一概采用总罢工来回答；饶勒斯—瓦扬草案带有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观点；盖得草案具有单纯强调合法斗争，反映了中派主义的传统观点。而倍倍尔草案尽管存在原则性错误，但是具有较好的理论分析，而且大多数代表倾向于它。于是，列宁、卢森堡和马尔托夫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以倍倍尔的草案为基础提出了修正案，删掉了原草案中的“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这种模糊战争阶级实质的划分。这个修正案正确地指出了军国主

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与战争联系起来。突出了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重大任务，指出工人阶级有责任结束战争，并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修正案把反对战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就包含了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帝国主义战争的基本思想。

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使原草案面目一新，被大会通过。这一决议确切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任务，摒弃了单纯进行议会斗争的方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重大胜利。

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斗争也相当激烈。殖民地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突出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大会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修正主义所持的观点，认为殖民政策有进步作用，殖民地应予以保留，只需做进一步的改进，这一观点为占大会多数的机会主义分子所赞同。荷兰社会党的修正主义者万-科尔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一直有殖民地，甚至提出了民主的殖民政策。他说“现在的殖民政治是帝国主义的，但它未必一定是帝国主义的，它也可以是民主的”^①。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就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观点的万-科尔，在这次大会上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在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公开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存在殖民地。他说“代表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②。修正主义者大卫把殖民思想解释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目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伯恩施坦和麦克唐纳也都尽力颂扬本国政府在殖民地中的“秩序”和“业绩”，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提供论证。伯恩施坦也叫嚣要“监护”

① 《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第156页。

② 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兴亡》，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81—82页。

“未开化”的民族，抛弃放弃殖民地的幻想。认为世界本来就有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有些民族还是小孩，需要文明民族给予看护。

机会主义观点反映在殖民政策上，并不是这时才有的。早在1896年，伯恩施坦就曾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辩护。他认为印度人民的困境，是人口过多造成的，与殖民政策无关。还认为世界上的“开化民族”统治“未开化民族”是理所当然。此外还大力美化资本输出，认为它促进了社会进步、增加了民族财富，并把野蛮民族纳入了文明制度范围内。德国机会主义者大卫、席佩尔、诺斯克以及英国的肖伯纳、韦伯等费边社分子对这一观点大力支持。甚至德国党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也在这一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竟说什么推行殖民政策本身并不是一种罪行，也许能成为传播文明的行为，问题是如何推行殖民政策。可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提出，正是以前机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观点的必然结论，并且具有一定的市场。

在大会的议题委员会中，德国的戴维、比利时的特尔瓦格纳和法国的鲁瓦特支持“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是德国的累德堡、武尔姆、白拉克和英国的劳伦斯、奎尔奇等，他们提出了少数派决议案，但议题委员会却以多数票通过了万-科尔提出的决议案即多数派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完全混淆了无产阶级援助殖民地人民与资产阶级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区别，彻底否定殖民地人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实际上站到了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一边。列宁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直接退向资产阶级政策，退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①。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745、746页。

经过辩论，特别是通过累德堡、马尔赫列夫斯基、武尔姆以及列宁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形成了少数派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对有关“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问题，做了原则性的修改，大会最后通过了这一修正案，这实际上是一个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是，从投票结果来看，只有127票赞成，20票弃权，108票反对，这说明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势力不可低估。会后，这些机会主义者无视大会的决议，公开赞同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还表示支持比利时政府兼并刚果。

此外，关于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也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修正主义者主张工会中立，否定党对工会的领导，法国社会党主张党和工会建立自由合作关系，彼此独立，互不从属。德国的列金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极力宣传工会中立，反对把“政治上的分歧带到工会中去。”关于党同工会关系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欧洲各国许多工会组织都加入了第二国际，其中参加这次大会的德国代表中就有一半是工会的代表。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大会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该决议否定了工会中立的观点，肯定了工会同党保持密切联系并接受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第二国际后期活动中的一次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决议，说明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胜利，也说明第二国际的指导思想尚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斯图加特大会后，列宁和各国左派努力贯彻大会决议，但是机会主义者却立即置国际大会的决议于不顾，继续散布机会主义的观点。饶勒斯就把英、法、俄三国协约军事集团看作是“和平的保障”。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胜利，通过了国际性的决议，但对修正主义分子却没有多少实际约束力。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统一思想、不彻底清算修正主义分子

直至从组织上与他们划清界限，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统一步骤，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可是，修正主义泛滥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国际代表大会却从未进行任何组织处理，甚至也从未提及这一问题，这就使修正主义的力量越来越膨胀，随着战争威胁日益逼近，国际面临愈来愈严峻的危机。

(3) 大战前夕的第二国际。自1905年以来，第二国际内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派别及其代表人物的立场、观点越来越明确，各国党都分化出左、中、右三派。左派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德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等以及保加利亚的紧密派和荷兰的“论坛派”。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成为左派中起重大作用的新力量，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针对伯恩斯坦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列宁指出：“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①。此外，列宁还强调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而应当批评他们的错误。

这时期，各国党内和第二国际中的右派力量在逐渐增强。修正主义这种扩散和泛滥，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其中各国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开展议会斗争是和平发展时期的一个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主要斗争形式。然而，每一次议会选举的胜利，都或多或少助长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幻想，特别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产生以来，机会主义者更是全力推崇议会道路，从议会选举的成绩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找论据。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的胜利，国会中的代表席位从57席增至81席，其实力已居第二位，仅次于天主教中央党。同时，社会民主党还控制了国内几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由于这次选举的胜利是小资产阶级帮了忙，于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沟涅、福尔马尔等要求放弃革命纲领，放弃反对君主专制的主张，使党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1907年大选失利，机会主义者认为是得罪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由此便提出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并向他们妥协的主张。1912年，德国党通过国会选举，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获得的选票和议席均居各党之首，并在国会中获得了110个议席。国会党团在德国党内的地位也日益上升，而党团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直接干预党的事务，使德国党越来越快地滑向机会主义的泥潭。

此间，虽然马克思主义左派顽强斗争，但是由于中派在重大分歧和重大理论问题面前，总是采取折中态度，阻挠斗争的进行，因而大大削弱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尤其不利的是，当面临世界大战的紧迫关头，中派分子却完全抛弃了总罢工这一反战手段。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公开否定卢森堡的实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主张。当德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了反对“三级选举制”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浪潮时，考茨基却大力反对关于政治罢工的宣传。他认为政治罢工是有害的，而主张实行“疲劳战略”。所谓“疲劳战略”，即通过和平、合法的议会道路，逐渐消耗资产阶级力量，然后慢慢地使资本主义一步步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把主张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错误的是，德国党执委莫尔肯布尔竟然建议德国党为了竞选的需要而对德国入侵摩洛哥的行径默不作声，这反映了德国党内的那

种单纯从选票角度考虑问题、选举高于一切的倾向已何等突出！

1913年德国党的耶拿代表大会，宣告了机会主义者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的确立。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政治罢工问题。由党的执委会和工会总委员会协商提出的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提案，实际上是一个遏制政治罢工、取消政治罢工的提案。提案中对政治罢工附加了种种限制性条件。提案这样写道：“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只能在工人运动各个机构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由有阶级觉悟的、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豪情满怀的并且不怕任何牺牲的群众进行。”^①会上以谢德曼为代表的执委会以及伯恩施坦、鲍威尔等人竭力为这个提案进行辩护，而卢森堡、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累德堡、贝尔滕、潘涅库克等人则针锋相对，提出了一个反提案。这个提案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消极防御、妥协退让的议会策略，鲜明地指出，党应采取进攻策略，斗争重点应放在群众行动上，强调群众性政治罢工是斗争激化和群众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按照党或工会的指令人为地进行。但是，这个反提案被大会否决。这就意味着否定了德国党过去所通过的关于政治罢工的决议，否定了政治罢工这一斗争武器。这次大会表明党的领导人已倒向机会主义一边，德国党已完全奉行机会主义策略，只走议会主义的道路，摒弃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其他形式。

从德国党内的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已无法与机会主义者相抗衡，更无法阻挡第二国际和各国党沿着斜坡下滑的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社会党中的中派具有自己的特色。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是第二国际中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维克多·阿德勒。创始人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党内的某些成员。在20世纪初，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麦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鲁道夫·希法亭、卡

^① 《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

尔·伦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阿道夫·布劳恩和古斯塔夫·埃克施坦。他们出版丛刊，创办杂志，想要按照新的历史条件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美国社会党人路易·布丁把他们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名称被他们所接受，并流传开来。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带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对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修正主义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许多地方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相类似，例如，在哲学上，主张用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否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唯心主义的体系；在政治上，抹杀民主的阶级性，鼓吹“一般民主”，鼓吹“社会力量因素论”。所谓“社会力量因素论”就是认为在民主制国家中，政治权力在各阶级的分配是由社会力量如本阶级的教育状况、地位以及数量等非暴力因素所决定。而在非民主制的国家中，权力的分配则是依靠暴力、武装部队来决定。此外，他们还鼓吹和平过渡和改良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他们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一点是承认在一定情况下，无产阶级运用暴力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领导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与政府合作，曾引起党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分化。一部分人采取了露骨的沙文主义立场，如伦纳；有些人采取中派的立场，如希法亭；而有些人则采取了激进的反战态度，如弗·阿德勒。

大战前夕，国际和各国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和斗争的焦点，这时主要集中在采取什么样的反战手段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依然出现了纷争。以累德堡、伦纳、爱尔兰工党代表格拉西尔为代表，一方面承认斯图加特大会关于采取一

切手段（其中包括总罢工）来进行反战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反对实行总罢工，认为不能把斯图加特决议中的一般规定，强加于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累德堡还特别强调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和反对武装侵略、保卫祖国问题。他把反军国主义的斗争方式归结为各国通过议会进行裁军并要依靠国际仲裁法庭。他的发言遭到了瓦扬、哈第等社会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强调议会内的斗争应以议会外的群众压力为后盾，并认为总罢工虽不是防止战争的绝对手段，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决不应放弃这一手段。

在这场辩论中，王德威尔得又站到了中派立场上。他指出，斯图加特决议包含着一切反战手段，同时它也可能给资产阶级重新实行“非常法”造成借口，因此他建议把总罢工问题移交到下次国际代表大会讨论。尽管最后大会通过了重申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但是，在决议中却写进了各民族都有自决权这一点，以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这一条就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其结果为在未来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保卫祖国”制造了口实。

合作社问题也是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之一。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合作社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合作社中的工人在某些国家有几十万人，而在德国、英国则高达上百万人。机会主义者就此夸大合作社的意义，认为可以通过合作社让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机会主义者在这次大会上鼓吹使合作社摆脱党的领导论调，认为党不能把合作社运动引向政治运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希望合作社中立。他们又弹起通过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旧调，认为消费合作社有助于准备生产和交换的民主化和社会化，是社会改革的必要因素。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条件根本不变的前提下，无论消费合作社怎样进一步发展，都不会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不能触动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列宁严正地指出，消费合作社不是同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斗争的组织

形式，相反，它会造成错觉，以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勿需进行阶级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实质上，合作社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的性质决定的。不过，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尽力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加强党同合作社的联系，通过合作社向工人传播阶级斗争思想。

虽然右派和中派在这次大会上占上风，但在列宁和革命左派的坚决斗争下，大会仍然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决议强调了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带进合作社中，不能夸大合作社的作用。特别在决议中加进了这样重要的思想：“单靠合作社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是争得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实现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战争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真实面目也愈益暴露出来。当奥地利改良主义者伦纳在答复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不反对奥地利的掠夺政策时说，党不仅反对奥地利的掠夺政策，而且也反对塞尔维亚的掠夺政策，裁军的要求不能使一国失去防御能力。这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民族侵略政策辩护。当瓦扬提出用总罢工来反对战争，并指出议会在战时将是无用的工具时，却遭到德国的中派分子累德堡的尖锐批评。他认为人们在现代国家中不能提出纯粹社会主义的建议，并借口总罢工并非到处适用，因而不能把总罢工强加于各国，来否定总罢工的意义。这次大会否决了在陆海军中搞社会主义宣传和总罢工的提议，这就放弃了工人阶级在反战中利用战争危机积极争取社会主义的有效武器。

哥本哈根大会虽然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决议，可是却没有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行动路线，仅仅把反战的活动寄托于各国议会里的社会党代表身上。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已把社会改良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与马克思主

义分庭抗礼，企图以此削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可见，国际所做的决议只有书面上的意义，对机会主义者没有多少实际效力。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后，国际局势更加紧张。1911年，德、法两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已达白热化。同年，意大利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第二年，又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国际的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的唯一的一项议程就是关于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问题。这次大会在没有发生争议的条件下，一致通过了反战的决议《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这个宣言与第二国际的其他决议、宣言相比，“恰恰是空话较少而具体内容较多”^①。它重申了斯图加特的决议，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确定了反战的指导原则，号召无产阶级实行国际团结，“用和平和人民友爱的无产阶级世界去对付剥削的屠杀群众的资本主义世界”^②。号召工人阶级不应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王朝的野心而相互残杀。《宣言》还警告资产阶级，德法战争的结果，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使俄国各族人民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巴塞尔宣言》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宣言：“这个决议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③

面对战争威胁，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停止了论战，统一在反战的旗帜下。然而，这种以《宣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形式上的统一，并不能弥合双方在理论上、路线上的根本分歧，更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17页。

② 《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第22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15页。

不可能消除左派和右派的对立以及中派的摇摆不定。这一点，可以从大会发言者的内容中看到。在大会的发言中，中派和右派都回避了关于保卫祖国这一问题，作为大会主席的瑞士的右派分子格鲁里希，用“向战争宣战”的口号概括了代表大会的主旨。而蔡特金则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不是无产者的真正祖国，更不是我们妇女的真正祖国。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建祖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我们有完全实现人性解放的先决条件。”^①哈第和瓦扬都指出用国际的革命和总罢工来制止战争。

这次大会在反战策略问题上，修正主义者避口不谈总罢工这种斗争形式，拒绝采用违反资产阶级法制的任何手段，而只是大谈和平反战，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主要限于阻止战争，相反，左派却强调了和平、反战与社会主义的联系。这次非常代表大会是自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产生以来，唯一一次左派与右派没有发生冲突的国际大会。由于日益迫近战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被暂时隐藏起来了。而战争一爆发，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就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修正主义的堕落 (1) 德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的叛卖。如果说战争爆发之前，修正主义者还要用华丽的外衣装饰一下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们就完全抛弃了这一华丽外衣，露出了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嘴脸，彻底背叛了曾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反战宣言，完全站到资产阶级一边，终于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当其冲，第一个跳到了资产阶级的“保卫祖国”的行列中。

在德国党的前几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始终占主导地位，特别是通过了反修正主义的德累斯顿决议，为国际进行反修

^① 《国际共运史文献史料选编》第3卷第215—216页。

正主义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此后，这个党却一步步陷于泥坑，出现了修正主义统治全党的现象。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党的叛卖就为这种演变划上了句号。

大战爆发前，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扩军备战，增加军事预算。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公开反对政府的军备政策，一方面党的执委大卫却又代表国会党团在国会中声明，只要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同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它的支柱。这时，德国政府提出了扩军法案和抵偿法案（即按财产多少征收国防税以抵偿巨额军费开支），这一法案立即遭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多数派却不顾群众的不满情绪，以“抵偿法案”可以把军费负担转嫁到资产者头上为借口，正式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抵偿法案”。国会党团的这种投票，代表了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就在国际范围内开了一个公开投票赞成帝国主义扩军政策的恶劣先例。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完全由修正主义者所控制，马克思主义左派受到了限制和打击。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不仅以党代表大会多数的名义，确认议会党团对德国政府的军事筹款法案所投的赞成票，而且还通过了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这个决议在总罢工问题上，充满了取消主义的精神。更有甚者，谢德曼还提出，同党内的不满分子和批评者即同左派作斗争，是党代表大会的迫切任务。如果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克姆尼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采取限制的方式，那么在耶拿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已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打击、百般排斥的地步。这时，德国当局又以各种理由，分别逮捕了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李卜克内西，再加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倍倍尔和左派代表辛格尔的逝世，使本来就势单力薄的左派，更无法改变党的发展方向。

1914年7月，德军进入紧急状态，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这紧要时刻，德国社会民主党本应全心全意从事反战运动，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委会主席艾伯特、成员布劳恩、巴泰尔斯、弥勒以及国会议员休特古姆、费舍向政府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爆发时，不打算采取包括总罢工、局部破坏等任何行动，并表示将对军事拨款案投赞成票。在这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团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在战时应放弃一切罢工，实现国内和平。社会民主党人施塔姆普费尔则公开发表文章，宣扬“保卫祖国”的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工会主席团的非常代表大会作出了禁止一切罢工、支持政府的决定。工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为战争服务，拥护政府的一切措施。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这些声明和实际行动，为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使政府可以放手进行战前的军事总动员。

8月，酝酿已久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德国增加军事预算问题，再度提上国会议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团会议上，修正主义的多数派否决了李卜克内西、哈阿兹、累德堡等少数派的反对意见，通过了达维德提出的批准军事预算案的提议。接着，德国党团的主席哈阿兹在国会中宣读了赞同军事拨款的声明。声明宣布“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资金的问题”^①。宣称，社会民主党不能在这危险关头，把祖国置之不顾。尽管李卜克内西等少数派坚决反对军事拨款，但根本无法抗拒这股修正主义的狂潮，加以受到党的纪律所约束，结果国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案。这表明，德国党已由过去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转变为与帝国主义、本国政府为伍的立场，站到了社会沙文主义、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效劳的队列中。这个第二国际最强大的、拥有一百多万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这样被葬送了。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91页。

为什么在战争爆发前，各国社会党一致表现出明显的反战倾向，而当战争爆发时却背弃了反战的巴塞尔宣言呢？从德国党的演变和堕落，我们可以发现修正主义走向社会沙文主义的必然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堕落，是其理论上错误的必然结果。修正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中，许多方面都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社会改良、自由、平等、人道和民主等观点相吻合。在面临世界大战的危机关头，他们虽然也宣传反战，但他们所宣传的反战与左派所主张的把反战与实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思想完全不同。单纯强调和平、反战，这是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也能做到的，只有把反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才是社会主义者所应遵循的原则。在战前，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大谈和平、裁军，而一旦战争爆发，所谓的和平裁军即刻变成积极参战、保卫祖国，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

修正主义者自产生以来，就一贯鼓吹维护资产阶级祖国的主张。伯恩斯坦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无祖国”，在40年代是适合的，而在现代社会中，它已丧失了大部分真理性，已经没有意义。实际上，伯恩斯坦这种观点早在他系统地提出修正主义观点之前就已经有了。1897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汉堡代表大会上，机会主义者席佩尔就提出，必须给德国军队以最优良的装备，才能在战争中可靠地保卫祖国。这一见解也得到了奥艾尔的支持。伯恩斯坦则论证了这一观点。于是，修正主义者更有恃无恐，在适当的场合，总是宣扬“保卫祖国”的主张。1907年，德国党的机会主义分子诺斯克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叫嚣，如果德国遭到进攻，社会民主党人将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中派主义者也有类似看法。考茨基认为战争一爆发，大家首先将成为爱国主义者，包括那些国际主义者。在战争时期，如果谁想阻止军

队开往国境，政府或暴怒的群众都会收拾他。甚至当开战以后，考茨基还发表文章，继续以“保卫祖国”为口实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辩护。他公开向各国工人阶级呼吁，要拿出全部力量来，使国土的独立和完整不受侵犯。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能因此责备别国社会党人。对此，列宁气愤地指出，考茨基这些言论就等于说“国际主义就是要一国的工人为了保卫祖国而向另一国的工人开枪”^①。

不仅修正主义者和中派分子禀承这一原则，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袖和左派代表对战争与祖国问题也有模糊的认识。如倍倍尔就依据进攻和防御来划分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确定战争的性质和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他不顾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生搬硬套恩格斯1891年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关于德国社会党人为反对沙皇俄国和法国的联合入侵，应进行民族自卫的主张，而把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看作是反对沙皇俄国的正义之举。倍倍尔这一失误，被机会主义者大加发挥，德国的库诺夫、大卫、连施，奥匈帝国的奥斯特利茨、伦纳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提出“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口号，根本不谈德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法、英、俄的社会民主党人如盖得、海德门、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协约国的战争是防御性的，因而是正义战争，号召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列宁曾这样分析道：“维护阶级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些无疑就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而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当前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正是在这种土壤上面生长起来的。”^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堕落，是实践发展的自然结局。早在1894年，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西德巴伐利亚邦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对政府的预算案投了赞成票，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与资产阶级公开妥协。在党的卢卑克大会上，根据倍倍尔、辛格尔、蔡特金等左派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规定社会民主党人不得对资产阶级国家预算案投赞成票。但是，这个决议却为修正主义者留下了借口，因为它容许在特殊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可以投赞成票。不久，维腾堡邦和巴登邦党团又于1907年和1908年分别对政府的预算案投了赞成票。党的纽伦堡代表大会对他们这种背离党的原则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是，巴登、巴伐利亚、黑森、维尔腾堡的代表却公然抗拒大会决议，宣布各邦议会党团有权决定批准预算案。事隔不久，巴登邦议会党团又一次在邦议会上投票赞成预算案。尽管党代表大会对其错误再次进行了谴责，并以开除出党相警告，然而修正主义者仍然置若罔闻。

正因为德国党的某些议会党团早有投票赞成预算案，违反党的决议的事实，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党的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上投票赞成政府的预算案，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2) 第二国际的破产。还在法国参战前，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就号召群众放弃革命行动，而去“保卫祖国”。法国党的书记迪布勒伊声称，社会党人的义务是保卫爱好和平的、共和制的法兰西的完整和独立。8月4日，德国首先进攻法国，德法开战。德国是侵略者、法国是被侵略者的观念一下子占据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头脑，法国社会党迅速转变了立场，由过去反战变为积极参战，抗击德军。连一向主张用总罢工的手段阻止战争并曾提出“宣战应是立即停工的信号”的工会领导人，也公开变换了调子，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拯救法兰西的民主和革命传统。当天，法国社会党就在众议院中，一致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拨款案。不仅如此，还决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建立“神圣同盟”，以抗击德国的入侵。接着，又派社会党人盖得、桑巴和托马参加政府。法

国社会党在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中声称：“如果只是通常那种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那么，我们决不会同意，但是，现在的问题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法国的生存。”号召整个民族要拿出“在我国历史上类似时刻曾经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奋起保卫自己的领土和自由”^①。就这样，这个拥有90万党员，139万选民和101名议员的法国社会党卷入了帝国主义的战火之中。

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也于战争爆发时，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案。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王德威尔得率先参加比利时国防政府。总委员会在告居民书中，公开号召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告诫社会民主党人属于工人国际与“合情合理地保卫个人和国家并不矛盾”，社会党人将以极大的热情来工作，以“保卫我国的中立和生存，使其不受野蛮的军国主义的侵犯”^②。

在英国参战以后，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党就立即发表了保卫祖国的宣言。英国工党议会党团多数派也不顾麦克唐纳等少数人的反对，通过了赞成军事预算、支持政府，反对德国侵略的决议。以新任党团主席韩德逊为书记的工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阶级支持战争，“直到目前所存在的普鲁士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被彻底消除时为止”^③。不久，韩德逊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政府。

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都纷纷表态，支持本国政府的立场。如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匈牙利和捷克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荷兰的以特鲁尔斯特拉为首的社会党等都向资产阶级政府靠拢，大多数都对军事拨款案投了赞成票。俄国的孟什维克也步其后尘，孟什维克在杜马中的党团声明说，它在俄国进行的活动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207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212页。

将不会妨碍战争，而国际局执委会主席汪德威尔得就向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建议在战争期间停止与沙皇政府进行斗争。孟什维克马上站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并把俄国说成是防御性的一方。

与这些党的叛卖相反，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党的“论坛派”以及德国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决反对这场帝国主义的大火并。例如敦克尔、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道耶尔、埃贝莱因、皮克等，没有被眼前“保卫祖国”的迷雾所诱惑，鲜明地提出了必须拒绝用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目的的任何拨款，主张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共同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这说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叛卖与第二国际的瓦解，并不等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

在德国，德国党的革命左派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公开发表声明，阐明革命左派的革命的反战立场，与机会主义者划清了界限。法国的保尔·果雷在演讲中，强调了用革命行为来制止战争。列宁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美国、奥地利、法、英、意以及北欧等国左翼也对机会主义的背叛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坚持了革命的反战立场。这说明，第二国际的破产恰恰宣告了改良的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死亡，相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仍然存在，这些经过战争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则是重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流砥柱。第二国际的破产，恰恰意味着新的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章 伯恩斯坦修正 主义理论批判

爱德华·伯恩斯坦无疑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第二国际期间，修正主义理论的提出、泛滥和伯恩斯坦的名字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剖析伯恩斯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批判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与理论主张，是理解第二国际期间马克思主义曲折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认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

第一节 伯恩斯坦早期思想的发展

青年时代：从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 伯恩斯坦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家庭。父亲雅各布·伯恩斯坦先前是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当了火车司机。父母都是犹太新教的虔诚信徒。伯恩斯坦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伯父阿伦·伯恩斯坦是犹太新教的奠基人之一，是柏林持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机关报《人民报》的创刊人和社论的执笔人，也是一个著名的自然科学普及丛书的作者。伯恩斯坦认为，他伯父对他的思想发展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但是，恩格斯晚年曾向倍倍尔谈起，伯恩斯坦“总是喜欢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越来越像他那个在《人民报》的绝顶聪明的伯父，常常使我感到就是老阿伦在我

面前”^①。

伯恩施坦最初进一所七年制的私立学校学习，毕业后转入一所九年制的完全中学继续学习。由于家境困难，他在16岁时就中途辍学，到古腾塔克兄弟银行当学徒。四年以后，转往魏玛一家银行的柏林分行当书记。1871年又转往路特希尔德银行当书记，并在这一位置上一一直工作到1878年。银行工作造就了伯恩施坦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他本人在谈到这一时期形成的“思想素质”时认为，“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综合性的思维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②这种思想方法对他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离开事物发展的整体关系，以片面的分析推断事物整体的性质，是这一思想方法的必然结果。

伯恩施坦走上社会之后，受到德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但是，他对德国和欧洲动荡的政局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并不十分关心。他自己承认，1866年普鲁士对奥国和德意志同盟的战争，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1870年普德战争爆发时，虽然有“满腔热情”，但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毫无兴趣，以致连当时震荡欧洲的巴黎公社起义消息也很少知道。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的最初了解，是从阅读拉萨尔的《巴师夏——舒尔茨——德里奇先生》（1864年）和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开始的。尽管他对拉萨尔著作中过分激烈的论战性的言词“感到厌恶”，但对拉萨尔的由国家贷款给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直到1904年，伯恩施坦在重提拉萨尔的这部著作时仍然持这样的看法。一方面，伯恩施坦对拉萨尔令人厌烦地咬文嚼字，甚至歪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0页。

^② 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页。

论敌的思想的做法，深感“厌恶”；另一方面，伯恩施坦又认为，“拉萨尔在这里显示出他是一个无论干什么事都力求洞察事物底细的人”。因而“整个说来，在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拉萨尔是如此地熟悉经济问题，给经济概念下了如此透彻的定义，分析得如此深刻而叙述得又如此清楚——这一切在经济学文献中是不易多得的”^①。

对杜林的著作，伯恩施坦更是推崇备至。伯恩施坦仔细阅读了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1872年）。伯恩施坦对杜林“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十分赞赏。伯恩施坦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只包含着“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这些论断“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杜林“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我的意”。他承认，当时“我受到杜林著作的鼓舞，把它介绍给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反应几乎都同我一样”^②。

1872年，伯恩施坦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弗·威·弗里切，了解了爱森纳赫派纲领的基本思想。这年3月，他听了倍倍尔在由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民主协会上的一次演讲。这些促使伯恩施坦脱离一个称作“乌托邦”的交谊会，转而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伯恩施坦并没放弃他先前信奉的杜林主义，仍然迷恋于杜林的理论。1873年夏，伯恩施坦去探望被监禁的倍倍尔时，还不忘带上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这时，伯恩施坦仍然认为，杜林作为一位“果断的科学家”，“力求肩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因此，“在我看来，他用

^① 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72、74页。

^② 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的发展过程》第14页。

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让人们说这是折衷主义也罢，是别的什么也罢，我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①。伯恩斯坦是作为一个杜林主义者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他是带着杜林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作为苏黎世“三人团”一员：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附和

1875年秋，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城就两派合并问题举行了预备会议。伯恩斯坦作为爱森纳赫派九名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就公布了《哥达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所宣扬的机会主义理论观点极其不满。这一年的4—5月间，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对这一纲领宣扬的机会主义理论作了深刻的批判。5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他们的批判性意见，转告给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但是，在这年5月下旬召开的两派合并大会上，还是通过了这一纲领。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领导人，极大地“宽容”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潮对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上和政治路线上的侵蚀。

1878年夏，伯恩斯坦辞去了银行中的职务，接受卡尔·赫希伯格的邀请，担任赫希伯格的文学秘书。赫希伯格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伯恩斯坦称之为“一位富有的青年社会主义私家学者”，“一位宽宏大量、品格高尚的人”。这可能是因为赫希伯格每年出资1万马克创刊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为宗旨的半月刊《未来》。但实际上，“赫希伯格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政治立场的人物，他甚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社会博爱主义者’”^②。恩格斯认为，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马克思在读了1877年10月《未来》杂志创刊号，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的发展过程》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0页。

就曾尖锐地指出：“《未来》杂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主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杂志的纲领非常可悲。它还允诺要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结构的荒诞设想。一个资产者捐资入党后的第一个结果就不妙，而这是事先就应该预料到的事情”^①。赫希伯格及《未来》杂志的这一理论倾向，对伯恩施坦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78年10月，德国帝国议会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以约翰·莫斯特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玩弄“革命”词句，鼓吹革命高潮论，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一点革命内容。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出现了以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的代表作就是由他们三人合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一期上。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阐述的中心问题，就是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任务。该文十分强调，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此，党必须把“在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者”，“争取”到党内来。该文宣称，德国的社会主义“过去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党还缺乏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该文还直言不讳地提出：“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3页。

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早先已经“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做许多年了。”其结论就是：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标，求得与德国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全面的“和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作了严肃的批判，他们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尖锐地指出：“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①

青年伯恩施坦是从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他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已显露出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背离。伯恩施坦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以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对自己青年时代思想发展和理论主张作了最生动的总结。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10年：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所作的严肃批判，对伯恩施坦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嗣后，伯恩施坦对他所参与宣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错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特别是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召开的代表大会，更促使伯恩施坦接受党的正确路线。维登代表大会对《哥达纲领》作了一些重要修改，改变了原来“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的提法，主张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党的目的，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3、384页。

而确立了党在新形势下的革命原则和策略路线。维登代表大会重建了党的机构，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周刊）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1880年12月，倍倍尔为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汇报维登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商量《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问题，去伦敦首次拜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伯恩施坦同倍倍尔一起完成了这次被后者称作“伦敦的卡诺萨之行”^①。这次伦敦之行，使伯恩施坦受到了较深刻的教育，他承认了自己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较好的影响。

1881年1月1日起，伯恩施坦由倍倍尔推荐，接替福尔马尔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临时主编。这年秋天，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邀请伯恩施坦担任该报的主编。到1890年该报停刊止，伯恩施坦一直是该报主编。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10年中，伯恩施坦为办好这份党的机关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贯彻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支持以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恩格斯对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该报终刊号上发表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曾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篇幅而且只有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

^① “卡诺萨之行”指的是悔罪之意。典出于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身穿罪衣赴意大利的卡诺萨城，向教皇格雷哥里七世表示悔过，祈求赦罪。

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笼罩着一片死寂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生动幽默”^①。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这一评价，包含了对伯恩斯坦工作成绩的肯定。

伯恩斯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同他本人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是分不开的。恩格斯认为，伯恩斯坦“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倒是真珠子”^②。当然，伯恩斯坦这一时期的工作成就，与恩格斯的指导、帮助，与党内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恩格斯曾对这10年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办报方针、理论倾向和斗争策略，甚至编辑技术和文风都提出过周详的意见。发表在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有的就是根据恩格斯的具体指示撰写的。

伯恩斯坦在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过程中显露出的组织才能和理论才能，使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乃至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博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好名声。

第二节 《社会主义问题》中修正主义理论的提出

时代的变化和伯恩斯坦内心的“竭力抗拒” 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70年代到90年代间，资本主义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飞跃。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8、89—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5页。

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过渡。这正如恩格斯晚年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3卷时所分析的那样：

“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通过对英国和德国某些生产部门卡特尔发展事实的分析，恩格斯已敏锐地指出：“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①。

面对时代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消失”的假象。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不可避免“崩溃”的理论，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资本主义相对和平时期的“合法”斗争，淡化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模糊了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必然性的认识。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也成了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运用“渐进”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却在西欧一些国家，主要如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页。

国，成了一种时髦的“新思潮”。

同时，在较长的相对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统治策略，它们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某些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蜕变为工人贵族，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这些机会主义者或者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分裂为形形色色“独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流派；或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组成一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

1888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报》被迫由苏黎世迁往伦敦。从这以后，一直到1901年初，伯恩斯坦一直生活在伦敦。移居伦敦，一方面使伯恩斯坦与晚年恩格斯保持更为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增强了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在恩格斯指定伯恩斯坦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后，更扩大了伯恩斯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伦敦的生活，也使他目睹了英国资本主义较长期经济繁荣、社会和平发展的现实，并在与英国盛极一时的“费边社”^①成员的交往中，潜移默化，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伯恩斯坦在谈到自己19世纪90年代的思想转变问题时曾认为：“我在英国居住，自然就使我有机会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发生

^① 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初。1889年底《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费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该论文集收录了肖伯纳、悉尼·韦伯、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的论文。这些论文对费边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组织”和“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他们认为，随着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的迅速发展，小规模生产已经过时，而资本集中的结果必然是生产资料、分配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资本家所有制已经创立了向人民共有制逐渐过渡的条件；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依靠选民们日益增强的压力，大多数工业将逐步地转入地方的或地区的公共机构手中；同时，选民大众也会越来越认识到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最终将导致用民主的方式摆脱土地私有制和私人资本家的羁绊，达到改变现存社会制度，通向社会主义的目的。

联系并且更深入地了解英国工人运动。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能检查一下我的那些一直是间接获得的关于英国民族精神和英国工人运动精神的观点并且根据情况加以纠正。”同时，他又认为，“说我是学英国费边主义的榜样而转向修正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毕竟已深深地印入他的思想，特别是费边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观点，在当时“使我的眼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扩展”；而费边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在他后来“看法有所改变”，即“认为这一理论的意义并不像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时”，也对他“产生印象”^①。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多方面的攻击。1890年和1892年，德国经济学家格·冯·舒尔采—格弗尼茨出版了《论社会和平》和《大企业：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进步》两部著作。1892年，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出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书。这三部著作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攻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全都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加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相反还使无产阶级的境况有了显著的改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也没有进一步激化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相反却改善了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当时，伯恩斯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虽然也对这三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作了反驳；但是，对这三部著作中所谓的一些根据新的经济统计资料作出的“经过认真检验”的观点，伯恩斯坦不愿作出正面回答。他承认，对这些观点“我宁可避而不答，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的发展过程》第25、26页。

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这就是说，90年代初，伯恩斯坦在资本主义时代变化所造成的新情况面前，对马克思理论原理的科学性发生了“怀疑”，而后几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他的这种“怀疑”。“内心的竭力抗拒”，正是伯恩斯坦在资本主义时代变化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一种真实心态。

对所谓“金科玉律”的最初修正 在“内心的竭力抗拒”这一心态下，伯恩斯坦也写了一些力图表明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文。后来，他把90年代前半期写的一些文章统称为“金科玉律”，以表明他当时“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的立场。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斯坦已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正”。这些“修正”或多或少反映了伯恩斯坦对资本主义时代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思考。但是，这些思考的结论却是片面的，是他在恩格斯逝世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前奏。

1890年4月，伯恩斯坦以《暗礁》为标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三篇论述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策略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后来统称为《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在这三篇文章中，伯恩斯坦认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应该把扩大党在帝国议会中的活动范围，作为党“必须考虑的最重大的问题。”他希望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不是那么死守教条”，而要“在适当时机提出积极要求参与立法”。诚然，党在帝国议会中的这一策略，会加强议会的影响，但“这不会使我们心感不安。”因为“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议会制度尽管有种种缺点，在今天的德国的所有国家机构中毕竟是最现代化的，任何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24页。

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①。他还把党内有人提出的警惕“议会痲毒素的传染”的意见,看作是“教条的”,看作是对党的发展的一种“危险的礁石”、“貌似革命的……空谈”等等。

在1890—1891年的《新时代》杂志上,伯恩斯坦发表了《工资铁律的问题》一文。该文主要驳斥了路约·布伦坦诺《我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中关于“工资铁律”的论点。但是,伯恩斯坦并没有指出拉萨尔主义“工资铁律”的错误性质;相反,他认为,“工资铁律”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至少是相对正确的东西”,只是由于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才证明这一“铁律”是“不合理的了”^②。他甚至断言,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马克思在对“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条件下工资变动理论的论述中,也留有“工资铁律”的某些痕迹,只是“提法”略有不同。后来,马克思在进一步论述“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时,才在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基础上,提出了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适应的工资变动规律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资铁律的问题》一文中,伯恩斯坦抛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资理论的本质内容,特别是抛弃了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中,在考察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时,阐明的资本主义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这一最根本命题。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工资铁律”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抹煞了工资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把工资看作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隔离的纯自然的永恒规律。据此,马克思认为,如果拉萨尔这一理论正确的话,“那么,我即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39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58页。

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①。

1900年，伯恩斯坦在把《工资铁律问题》一文收入他的文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时，增加了“附记：马克思主义对工资问题的讲话的若干缺点”这一节。在这一节中，伯恩斯坦重述了他对“工资铁律”问题的基本思想，即“所谓工资规律是适应大工业时代前时期的东西；在今天我仍然坚持这种思想，它至多不过在我心中变得更加巩固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就是适合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东西；而现今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马克思对旧的工资理论的原来的订正不再适合今天的情况”。据此，伯恩斯坦的结论就是：所有的工资学说，包括工资基金说、人口论和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学说，“都有现实关系作基础，它们都说明了部分真理，在阐述工资问题时在一定限度内应当引据这些部分真理，但是它们却不能详尽地说明工资问题。”但是，所有工资学说都不能囊括工资问题的“丰富内容”，它们在具体运用时，“只考虑到一个方面，或者过分强调一个方面。马克思也没有免掉这一点”^②。

以上两篇文章的理论倾向已经表明：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已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借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作“非教条的”理解；其二，借口任何理论都有其现实基础，都只具有相对真理性，提出资本主义现实基础的变化，将改变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际上，伯恩斯坦就是循着这两条思路，开始对他所称作的马克思主义“金科玉律”作出最初“修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70、74—75、79—80页。

1893年8月6日至12日，第二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即苏黎世大会。这次大会对无政府主义者作了坚决斗争，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大会决议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中，组织全国性与国际性的工会和其他联合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中，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即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彻底改造的目标下，各国应根据本国的特殊条件，自行选择和决定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但是，大会的决议避开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中的特殊性同这一基本原理自身的一般性的关系作出正面的回答，从而为第二国际内借口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的理论思潮的泛起开了方便之门。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特地提醒第二国际各党注意：“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①。

苏黎世大会之后，伯恩斯坦就发表了《国际大会的能力限度——为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代表大会而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斯坦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如果看不到有一种类似的教条主义，作为空想主义时代的遗产，以缓和的形式潜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血液里，那是蒙昧的”^②。什么是“空想主义时代”？哪些“社会主义者的血液里”潜藏着这种“蒙昧的”“空想主义时代的遗产”？伯恩斯坦并没作出正面回答。他转而对苏黎世大会论及的妥协方式和革命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发其难。他提出：“如果工人党通过妥协或联盟能够使工人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斗争中获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80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15页。

重大的有利条件，那么它放弃这种妥协或联盟是为了谁？为了原则吗？我不知道有什么完全禁止实行任何联盟和任何妥协的原则。”如果不对周围环境实行“千百次默许的妥协”，“社会的共同生活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断言，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有千百万个场合达成政治妥协将是可想象的最道德的行动和最高尚的义务。”这样，符合所谓的“道德”，追求所谓的“高尚”，就成了政治妥协的动机！恩格斯所强调的“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的思想，被伯恩斯坦完全抛弃了！

《社会主义问题》：对“传统解释”的公开“批判” 如果说恩格斯在世时，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修正”的论点尚处在收敛状态的话，那么，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开始公开地显露出来了。从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斯坦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的一组文章，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批判”的代表作。

《社会主义问题》共有六篇文章组成。这就是：《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英国农业状况的发展》、《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德国工业发展的现状》和《英国的政策和经济利益》。伯恩斯坦在谈到写作这一组文章的动机时指出：“我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并且在演说中避免使用以这一想法为来源的词句。”并打算以他的这一见解，来阐发由此而得出关于社会主义“运动进程的推论”^①。因此，这一组文章的中心论点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原理。正是为了突出这一中心论点，他在1900年编辑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28页。

《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时，删去了《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和《德国工业发展的现状》两文，增加了这一时期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另外两篇文章：《崩溃论和殖民政策》（1898年）和《英国的政党和经济利益》（1897年）。这六篇文章组成《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第二编“社会主义问题”，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提到《社会主义问题》的六篇文章。

在写于1896年的《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一文中，伯恩斯坦以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空想主义”为借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重要的“修正”。他认为，随着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贸易和交通上的长足发展，随着“社会民主运动”的“显著的进步”，社会民主党有必要检查一下我们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应该反对一种极端的“空想主义”。在他看来，这种“空想主义”的根本主张就是“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并且这一主张是以两个“历史推动力”，即“设想得很片面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为理论基础的。

为了反对所谓“空想主义”的主张和理论，伯恩斯坦首先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断作了“修正”。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就此而言，谈论现存社会“长入”社会主义问题，“并不是错误的”。

在此基础上，伯恩斯坦进一步设想：“现代的生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日益增长地对国家和地方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越强大，企业领导的原则就越会按照民主的精神加以修改。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将日益服从公共利益。把经济政策的任务放在首位，其次才注意到国库利益的企业在增加。在原有的、起初只是为财政目的而加以垄断的国家等等的企业里，经济

政策的一面也同样日益占了首位。”^①伯恩施坦由此断言：如果再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概括资本主义的“完全显而易见的正在实现着的发展”，就是“一种完全空想主义的思维过程”。

在写于1897年的《英国农业状况的发展》一文中，伯恩施坦以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英国农业发展的情况为例，提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趋势的理解相反的结论。第一，伯恩施坦认为，近20年来，英国农业已经克服了“绝大部分的危机”，将重新“站在健康的基础上”；第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仅没有被分化，反而“大体上保持下来了，并且逐渐地适应了已发生改变的市场情况”；第三，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呈上升趋势，即使在农业危机期间，农业工人的工资也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伯恩施坦认为，英国农业发展的这些现象，完全是英国的“民主政治”作用的结果。

在写于1897年的《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一文中，伯恩施坦从人们生存的空间关系的影响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各民族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演绎出他对“现代国家”的性质、职能及社会政策的看法。他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们占有空间范围的变化，以及生产分化出来的部门的数目的不断增大，“必然要形成一种作为骨骼而代表社会利益的管理机构。这样一个机构一向是、而且今天还是国家”。因此，“最近未来的社会的管理机构与当前的国家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差别。”^②在伯恩施坦看来，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发展成对空间方向的大扩展和其领土上急剧增加的居民数量进行协调的一种管理组织；这种国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管理机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换言之，依靠现代国家“组织”，完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全可以达到“长入”社会主义的目标。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最集中地反映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问题》这组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他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借口反对“崩溃论”，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实际上，对1895年普鲁士企业状况的调查，已清楚地显示出资本集中的趋势。例如，1882年5人以下的小企业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2.7%，到1895年已减少到38.44%；1882年50人以上的大企业的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8.4%，到1895年已增加到38.46%；其中，200人以上的特大企业的工人数，从占总就业人数的16.5%，增加到21.44%。而对这种显著的资本集中的趋势，伯恩施坦却认定，小型企业并没停止发展，它们只是在和大企业的“比例上逐步地后退”了；他还认定，即使这种“比例上逐步地后退”也还是不稳定的，“因为在这里各种一向属于小规模经营的企业被大型企业吞并了或者被它消灭了，在那里又根据新的技术或根据大工业所造成的那种新情况，形成新的中型企业”。这种变化，犹如“分子的集合状态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但是分子的质量并没有减少，它的分解尚未确定。”因此，他认为，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只是工业的“不断的运动”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完全是“次要的”^①。

同时，伯恩施坦又故意夸大资本主义经济中另一些机能的作用，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邮政、电报、客运和货运等交通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以及工业家组织的扩展等等，极大地影响着“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从而“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88—189页。

业危机”^①。

第二，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伯恩斯坦认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来看，这一制度“崩溃”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已使人们从“实质上”看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他所谓的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大；企业的良好民主管理的逐步发展等等。在他看来，社会只要充分行使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就能实际地使私人经营的企业向公共经营的企业转移。他由此而断言：“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②

第三，以“探求当前问题的细节”的重要性为借口，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伯恩斯坦认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中，人们对社会主义“通则”不再感兴趣，“而是去探讨当前问题的细节，去寻求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实际上也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在他看来，“依科学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严肃尝试，现在还只有极个别的实例”^③。

据此，伯恩斯坦“坦白”地承认，“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92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③ 同上书第183、191页。

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①“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说法，成了概括伯恩施坦理论观点和他思想方法的名言。伯恩施坦本人把这一说法，仅仅看作是他的“偏重分析的思想方式”的结论。

第四，借口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辩护。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殖民扩张和加速对世界领土的瓜分，成了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伯恩施坦貌似公允地认为：社会民主党反对的应该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暴行”和“欺骗性的掠夺”，而不应该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张，因为这种扩张能够把殖民地民族和国家“纳入文明化制度的范围”。伯恩施坦试图区分殖民政策的“好的”和“坏的”方面，来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

伯恩施坦进一步认为，殖民政策能给宗主国增加财富；如果工人能在一系列社会权利的保护下，从这些增加的财富中分得相应的份额，就能使工人同掠夺殖民地财富也有了某种“利害关系”。因此，“如果认为通过反对所有的和一切的殖民政策就能加速本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站不住脚的，还不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空想的。”^②

在1897年发表的《英国的政党和经济利益》一文中，伯恩施坦以反对“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为旗号，认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进行任何专门的经济上的分类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只可以找出非常一般的经济政策的倾向，而且连这种斗争也要尽量谨慎地去做”^③。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公开主张用新康德主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195页。

^② 同上书第197页。

^③ 同上书第219页。

又来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在伯恩施坦看来，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远远胜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他指出，“一切唯物主义毕竟不过是有条件的，承认这一点的人并不是更加接近唯物的思想方式，否认这一点的人却是更加接近它。因为后一种人正是以这一否认表明，对他们来说，推论、想象、虚构就是客观事实。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康德，事实上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他为感官经验的世界要求充分的权利，而且他并没有提出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以外的‘物身体’这一概念——在他之前很久，已经有人用另一些词提出了这一概念——，反而是限制了这一概念，他所划定的界限就在今天从原则上讲也还是未被驳倒的。”^① 伯恩施坦用新康德主义来改造马克思主义；他还武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建立在“利益”、“认识”和“道德意识”基础上的。这里的“利益”也仅仅被看作是“伦理上的”、“理智上的”、“道德上的”观念；从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纵然是十分唯物主义的，到底也必然带空想色彩”^②。

斯图加特大会前后伯恩施坦的“辩解” 在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中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判。对此，伯恩施坦一一作了回驳。他一再声言：“我在《新时代》上所写的东西是我的信念的表现，我不认为我有必要放弃这一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③ 为了“保卫”自己的观点，他在斯图加特大会召开之前，就从伦敦寄出了《致德国社会民主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227页。

② 同上书第245页。

③ 《伯恩施坦言论》第72页。

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一文。在该文中，伯恩斯坦对他《社会主义问题》中提出的基本论点重新作了概述。这一概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原理的“修正”展开的。

首先，伯恩斯坦抓住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资本主义制度“崩溃”问题理解上的某些片面性，断言《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时间”上的估计是“错误”的；进而推断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以及这一发展所要达到的“形态”，也是《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形式及其目标的科学论述。

其次，伯恩斯坦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也是错误的，掩饰这一点就是“愚不可及”的。他认为，资本积聚和增殖没有引起社会对立的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相反却使处于各种等级的资本家数量在增加，从而造成了数量逐步增加、性质发生变化了的“中等阶层”，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及其现实意义。

再次，伯恩斯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民主化”，巨大的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则越来越减少了。一方面，“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另一方面，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剥削运动的“社会反作用”力量，已波及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也变得无足轻重了。以此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科学性。

最后，伯恩斯坦对他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观点作了辩解。他认为，他的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因

为我坚决相信，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经济组织的活动”^①。伯恩斯坦不仅再次割裂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与手段的内在联系，取消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的，而且断然限制了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运动”中的任务，把这一任务仅仅限于工人在资产阶级国家内争取“政治权利”和“职业权利”上。

1898年10月3日到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没有按卢森堡的设想，把澄清伯恩斯坦等人错误言论作为主要议题之一；也没有对伯恩斯坦理论，特别是对他寄往大会的书面声明作出严厉批判。大会只是在讨论第一项议程“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时，对伯恩斯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观点展开了争论。尽管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倍倍尔、卢森堡和克·蔡特金，还是对伯恩斯坦的某些错误观点作了程度不同的批判。

斯图加特大会结束后不久，倍倍尔以个人名义给伯恩斯坦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倍倍尔就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倍倍尔认为，伯恩斯坦思想的蜕变和他所处的“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他坦率地告诉伯恩斯坦：“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你把你暂时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并且力图用你全部洞察力来证明这一点。”^②其次，伯恩斯坦思想的蜕变，也和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前后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倍倍尔严厉地指出，伯恩斯坦是作为爱森纳赫派的一员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曾经是一个“狂热的杜林分子”，后来又变成“赫希伯格分子”；之后，在与赫希伯格、施拉姆合

^① 《伯恩斯坦言论》第75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57—58页。

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一“可恶的文章”中，宣扬了机会主义理论。尽管有了1880年的“卡诺萨之行”，并且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谁都更加热情地关怀”；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就很快地回到了机会主义立场，而且“今天走的更远”了。最后，倍倍尔认为，在思想方法上，伯恩施坦也已陷入“极端的矛盾之中”。倍倍尔向伯恩施坦指出：“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東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①

应该说，倍倍尔对伯恩施坦机会主义理论形成根由的分析，不仅是中肯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倍倍尔拘泥于“策略”的需要，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留有余地的；在这封信中，倍倍尔对伯恩施坦理论性质的认识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在接到倍倍尔的信后，伯恩施坦很快就回了一封长信，对倍倍尔的批评逐一作了反驳。伯恩施坦认为，倍倍尔对他思想变化的评论“实在是很错误的”。伯恩施坦否定了他所处的“环境”对他思想变化的影响，相反，他声言，“我不管在形式上怎样迁就，思想上是一贯反抗环境的压力的”。他也否认他思想发展中曾经受到过杜林主义和赫希伯格机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我个人偏袒过杜林这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杜林体系。”而且“我和赫希伯格在一起时也没有变成赫希伯格分子。”同时，伯恩施坦也不认为他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才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他承认，他在1890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就已对涉及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问题，发表过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他自己的观点不是“突然”改变的，而是长期“脱毛”的结果。

在这封信中，伯恩施坦还对他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59—62页。

更清楚地提出了构成他机会主义理论的三个基本主张。^①

第一，主张《资本论》不再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伯恩斯坦认为，“《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到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马克思没能完成《资本论》的原因就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愈来愈困难了。从这方面来说，这部伟大著作的命运几乎是象征性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的“倾向性”扼杀了《资本论》的“科学性”，《资本论》只是一部“象征性”的，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过时”的著作。

第二，主张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革命的阶级。伯恩斯坦认为，“正如过去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或是一个统一的第三等级一样，现在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作为统一的阶级力量仅仅存在于“一定的对立之中和一定的压力之下”，当这种“对立”和“压力”减缓时，这个阶级成员在“行动上的差别”就日益扩大。据此，伯恩斯坦断言：在党所设想的“革命”中，“确实不可能有选择和有步骤地进行剥夺，”也“谈不上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干预”，所有的一切至多只是由“原始力量在推动”。在伯恩斯坦看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以及作为阶级的统一行动已化为乌有。

第三，主张党放弃其最高纲领和最终目的。在伯恩斯坦看来，一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理论原理失去其现实意义，一旦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存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就成了“响亮的空谈”和“迷网般的诡辩”；社会民主党应该丢掉“幻想”，以伯恩斯坦倡导的“新的理想”代替那些“过时的理想”。在伯恩斯坦看来，德国社会民

^① 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66—70页。

主党已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已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多余的赘疣。伯恩斯坦的这封信已清楚地表明，他的理论观点已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探讨”，走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完全否定；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斗争策略的异议，转向对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攻击。伯恩斯坦已公开树起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

1898年11月，伯恩斯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项《私人声明》，表示要写一部概要阐述他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观点的书，以回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他的所谓“攻击”。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出版及其主要内容 1899年1月，伯恩斯坦完成了他的书。同年夏季，该书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下简称为《前提和任务》）为题，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公开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伯恩斯坦对其理论论述的“精神”作了如下说明：“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必须同那些象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因此，《前提和任务》一书，一方面是伯恩斯坦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发展起来的机会主义理论的综合，另一方面也是他坚持机会主义立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决裂的宣言书。

《前提和任务》一书分作四章。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所谓“纯粹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的区分，认为“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①。伯恩斯坦所要“批判”的，并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应用的理论”范围内的东西，而是属于“纯粹的理论”中的“基本原理”。被伯恩斯坦列入“批判”范围的“基本原理”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学说、剩余价值学说、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学说。对这些“基本原理”的“批判”，成了伯恩斯坦这本书的最高使命。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第三章《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对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了全面的“修正”和堪称有体系的“批判”。伯恩斯坦借口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全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及其运用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四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能力》转入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德国工人阶级制定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策略的思想武器大加鞭挞。在全书的“末章”，即《最终目的和运动》中，伯恩斯坦再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兜售他的机会主义理论纲领、策略和斗争手段，试图以他的机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扭转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

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伯恩斯坦思想蜕变时期，新康德主义正盛行于西欧哲学界。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新康德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47页。

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对立思潮出现的。恩格斯曾经提到，当时德国哲学界“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①。

新康德主义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某些因素，结合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需要，极力“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拼凑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恩格斯生前就已注意到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取向，他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②。

伯恩施坦对新康德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极力主张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伯恩施坦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康德主义的早期代表弗·阿·朗格（1828—1875）。朗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朗格哲学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生理学的所谓“科学”材料与康德的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生理学唯心主义。在朗格看来，人的感官知觉的性质并不是由外界作用物所决定的，而是由感官自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进而人的全部经验也都是由心理组织决定的，即“原因概念根植于我们的机体组织”。朗格还以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世界”为摹本，建立起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又被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机能所创造的“伦理理想”。朗格还以这种“伦理理想”同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达尔文进化论混和起来，形成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人阶级的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斗争，都必须服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工人阶级只有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规律去限制人口增长，按照生物生存斗争的规律去提高工人的“适应力”，才能达到工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良的目标。马克思在评价朗格这些理论时曾指出：“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①

在《前提和任务》中，伯恩斯坦一再地引用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朗格的观点作为论据。他直言不讳地承认：“社会民主党必需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Ideologie），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②新康德主义成了伯恩斯坦心目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抗争的思想武器。

为此，伯恩斯坦不惜脱离他原来属于的“这一学派”，即他自称已“尽了忠实的义务”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完全投向他推崇的新康德主义“那一学派”。他宣称：“如果我不是必须担心被人误解的话（我当然是准备它被人错误地辩解的），我就要把‘回到康德去’这种话翻译成‘回到朗格去’。”伯恩斯坦认为，朗格的哲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光明磊落、无所畏惧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努力”，二是“具有高度的科学公正态度，随时准备承认错误和接受新的真理”^③。什么是朗格的“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努力”？伯恩斯坦并没明言。但是，从朗格的社会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72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45—246页。

③ 同上书第246页。

尔文主义的基本主张中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只是扼制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寻求资产阶级社会的“改良”的努力。什么是朗格的“高度的科学公正态度”？伯恩斯坦也没明言。但是，从朗格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中同样可以看到，这实际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与“态度”。在伯恩斯坦心目中，朗格似乎应该取代马克思，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中指导工人运动的“新的”理论家和思想家。

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用庸俗进化论取代唯物辩证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成分，也指出了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才能发现其“合理内核”。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又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主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马克思早就预言过：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伯恩斯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辩证法所表现出的“恼怒和恐怖”，真实地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在评价朗格对黑格尔方法的理解时曾指出：“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②。伯恩斯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黑格尔的理解，一点也不比他的哲学“先师”朗格高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972页。

在《前提和任务》第二章第一节《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和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中，伯恩施坦不仅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而且也完全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最致命之处”，就在于坚持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的残余”。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已经犯了“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的错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又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伯恩施坦把这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种“纯粹思辨的预测”，因而“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是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①。

显然，伯恩施坦在这里指责的并不只是《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革命进程预测上的失误，更为重要的是要借此诋毁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曾经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身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按照辩证法的这一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的理解中，必然包含对其否定的理解，必然包含对其灭亡的理解。这些理解与伯恩施坦的主张，特别是和他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这样，伯恩施坦除了否定辩证法，诋毁辩证法的本质规定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出路。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晚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机会主义和对“青年派”左倾机会主义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暧昧”的态度，其根源也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在这里，伯恩斯坦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实的歪曲来否定辩证法的主要规律。

事实上，在《非常法》废除以后，恩格斯曾经批判了“青年派”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认为，在有必要和有可能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合法斗争时，“青年派”的冒险主义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后来，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沉溺于议会道路，主张“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思潮抬头时，恩格斯又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把这种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潮，称作“旧的污秽”，它对工人运动同样是十分有害的。显然，在这里，正是由于注意到了工人运动发展特定阶段的实际，并从这一实际出发，才使恩格斯对工人运动的主要倾向做出正确判断。这不仅不能证明辩证法的“陷阱”，相反却证明了辩证法的生命力所在。

然而，伯恩斯坦却以僵化的、凝固的形而上学的偏见来看待这一切。在伯恩斯坦看来，“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Schönheiten)，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①伯恩斯坦的这一表白说明，他根本不懂辩证法以及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运动的内在规律性，他只是以形而上学的偏见来曲解和诋毁辩证法。

最后，伯恩斯坦还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作出正确推理的“陷阱”。在伯恩斯坦看来，唯物辩证法作出经济对暴力具有决定性影响推理的同时，就不能再作出暴力在经济变革中具有创造力量的推理。一方面，伯恩斯坦断言：马克思主义“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3页。

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心有余悸地提到：“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尔式的原理”^①。

可见，伯恩斯坦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对暴力的决定作用，以及暴力对经济的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之所以把这种辩证关系斥为妨碍正确推理的“陷阱”，不仅在于他的辩证法常识的贫乏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辩证法不仅包含着“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的规定性，而且还包含着另一种规定性，即“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②。这后一规定性与伯恩斯坦机会主义理论观点正相反对，革命的辩证法无情地暴露了伯恩斯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谬误。不难看出，伯恩斯坦“选择”辩证法为其“批判”对象，与他推行的机会主义理论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歪曲唯物史观，主张折衷主义的多因素决定论 伯恩斯坦意识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最重要环节”。对唯物史观的发难，成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纯粹的理论”攻击的最重要的方面。

伯恩斯坦认为，唯物史观犹如宗教的教义，“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在他看来，作为唯物主义者都必须信奉一条“教义”，即“不管从随便什么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他还通过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81、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223页。

言》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得出唯物史观只是一种“庸俗经济史观”和“历史宿命论”的结论。

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只是一种“独断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在这些表述中，“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相反，恩格斯在1890年以后对唯物史观的一些“补充”，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量作了“限制”，强化了社会制度怎样从经济发展的产物独立化为具有“自在运动的社会权力”，这些“权力”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等问题。这才形成了现今能够“应用”的、“成熟的形态”的唯物史观。由此，伯恩施坦杜撰了一种“独断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一种“受到了一些限制”的唯物史观相互对立的“神话”，杜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晚年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相互对立的“神话”。伯恩施坦煞有介事地劝告人们：“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最初的形态应用它，这就是说，他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①

在作了以上歪曲性的解释之后，伯恩施坦试图用一种折衷主义的庸俗唯物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方面，他强调，除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外的其他因素，如民族群体、生活习惯、地域的群集、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交通等因素，一旦产生就会发生“特有的反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要理解这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决不总是容易的事”。据此，伯恩施坦公开提出，要用一种“折衷精神”来重新规范唯物史观。他认为，“折衷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553页。

——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①这样，用这种“折衷精神”重新规范的“今天所见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态”，就成了伯恩斯坦心目中的“科学”；他认定，这是一种“和它的创始人起初赋予它的形态是不同的”历史观。可见，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所作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修正”，而是一种从根本性质上的彻底否定。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挑战 在《前提和任务》中，如果说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还是以对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范畴和理论观点的重新解释为基础的，那么，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中，却是以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基本范畴和理论观点的彻底否定为特征的。

在《前提和任务》的第三章《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伯恩斯坦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否定为起点，进而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大加贬斥，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失误”：

首先，伯恩斯坦断言，马克思在提出价值学说时，作了“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即抽象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了劳动的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56页。

具体形式，也抽象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最后“价值就失去了任何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①。

其次，伯恩施坦认为，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劳动价值论就已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后来，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利用这一理论来对付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又作了或多或少的展开论述。至于马克思所做的，只是在读了以上经济学文献之后，对劳动价值论作了更为系统的规范，“对于被他更为严格地、但也更为抽象地理解的劳动价值论的概念比斯密更加坚持得多”。除此之外，经济思想史上已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原则上也没有什么不同”^②。

再次，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现实可行性，因为马克思对商品及其价值的考察，缺乏“现实中”能够“衡量每个时期的总需求的尺度”。就此而言，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论证中所作的“抽象”“仅仅在一定限度内才能够生效”。伯恩施坦由此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庞巴维克、杰文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抽象”了商品的其他一切特征，使商品仅仅成为一定量的简单人类劳动的化身；“边际效用价值论”同样也“抽象”了商品的其他一切特征，不过留下的是商品的“效用”这一特征。

最后，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遗稿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缺憾的弥补，并没能奏效。他认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说明，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失误”的论述，不仅表明了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及其科学价值上的无知，更表现他对劳动价值论的偏见。如果说偏见比无知更难以接近科学的话，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那么偏见加无知就完全不可能理解科学。

实际上，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所有“论据”，都来自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学派。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完成其“边际革命”后，就开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猛烈攻击。1896年，庞巴维克发表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攻击的代表作。在这一篇幅不大的小册子中，庞巴维克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难：第一，他认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范畴时，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即马克思分析商品时，抽去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去了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责难”转换成伯恩斯坦的话就是，马克思对商品范畴的理解只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第二，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在撇开商品使用价值之后，认为商品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一种属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商品还有稀少性、作为供求的对象、被占有以及引起人们消费欲望等属性。这些属性同样可以取代劳动成为商品交换中的“共同的东西”。这一“责难”转换成伯恩斯坦的话就是：马克思“以抽象为基础而发现的原理仅仅在一定限度以内才能够生效”。可见，伯恩斯坦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宝库中，捡出一些所谓的“论据”来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的。

伯恩斯坦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为起点，进一步否定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①

伯恩斯坦还进一步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是马克思使用的、试图揭示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一把钥匙”，但是，不幸的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89页。

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而由此引出的最大的、致命的“错误”，就是用劳动价值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即以剩余价值率作为衡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率。他断言，“即使从作为整体的社会出发并且把劳动工资的总和同其他收入的总和对比，那时剩余价值率作为这一尺度也是错误的。”^①

伯恩施坦不可能忘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科学价值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功绩”。因为“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②。一旦剩余价值理论只是“一个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的攻击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发难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作了科学论证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理论。

在《资本论》第1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这一实质，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和决定资本积累量的主要因素。接着，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影响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积累中的变化。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这样，“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③过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剩的工人人口既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必然产物；反过来由过剩的工人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又绝对地隶属于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马克思引用大量的事实，深刻揭示了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的对立运动，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为了避免人们对这一规律的误解，马克思特别提到：“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①。最后，马克思从对资本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系统考察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尖锐冲突，得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科学结论。

在《前提和任务》中，伯恩施坦随意地肢解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内在统一性，以其片面的、武断的结论，完全否定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科学性。首先，伯恩施坦避开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必然性等问题，仅仅从“资本家数目”的多寡上提出问题；并且把“资本家”和股票“持有者”混为一谈，从而得出资本积累并不是减少“资本持有者”的数目，相反在极大地增加“资本持有者”的数目的“结论”。其实，这一“结论”对揭示资本主义积累趋势来说，并不具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其次，伯恩施坦进一步撇开资本主义股份企业运行的实际，闭口不谈股份企业中大资本家对股份的实际控制权，以及股份企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内在规定；而是一再地引证持有股票人数变动的资料，试图用股票持有者人数的迅速增长这一现象，证明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发展趋向不仅同马克思的预言不同，而且简直是截然相反。据此，他断然认为：“如果假定目前的发展表现出有产者人数相对地或甚至绝对地减少，即是完全错误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②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04页。

再次，伯恩斯坦撇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内在趋势，空泛地谈论剩余价值的“吸收”问题。在伯恩斯坦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剩余产品也在极大地增长；这样，即使大资本家具有十倍大的肚子，拥有多出十倍的仆人，这些人的消费的物品同国民生产产品总量相比，“仍旧像是天平上的一根羽毛”；这样，由此而形成的大量剩余产品，要么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要么由工人来“吸收”。按照伯恩斯坦的这一主观臆断，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也不存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基本矛盾。

那么，在伯恩斯坦看来，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呢？一方面，伯恩斯坦全然不顾当时出现的资本集中导向资本垄断的现实，反而以某些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生产部门为例，得出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在一整批工业部门中，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同大企业并存”^①；另一方面，伯恩斯坦又武断地认为，“事实上在许多场合，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根本没有——或者也可以说不再有——竞争”^②。因此，伯恩斯坦认为，当时大企业的“跳跃式的普及和扩展”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中小型企业在一个“有利的”条件下也在大规模地增长。他还进一步推断：“工业和商业只不过表现了比原来假定的较为缓慢的向大企业上升的运动，但农业表现出来的不是停顿，就是经营规模的直接缩小。”^③伯恩斯坦否认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进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是为了进一步否认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否认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时代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③ 同上书第118页。

特征。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修正” 伯恩斯坦不仅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特征，而且还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宣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已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

伯恩斯坦通过随意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论述，试图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的理解是贫乏的，或者是自相矛盾的。伯恩斯坦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激烈反对用消费不足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有时又把消费不足看作是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

实际上，伯恩斯坦在故意混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中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例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论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时，首先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这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当这一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就会导致经济的冲突达到“顶点”。其次，恩格斯又分析了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两个直接原因，这就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以及生产的扩张与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萎缩之间的对立。这两个直接原因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表现形式。显然，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所作的歪曲性理解中，既舍弃了关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及其性质的分析，又混淆了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直接原因之间的区别。

伯恩斯坦还抓住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解上的某些偏误，得出两个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相反的结论。第一，他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两重性质”

为借口，在信用制度的积极作用方面大做文章，认为信用制度能够自行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说，信用扬弃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它通过许多小资本家的结合把巨大的生产力转变为集体财产，那么我们不过是说出了一个在现实中屡次被证实了的事实。”据此，伯恩斯坦得出如下结论：“信用制度经受导致生产普遍瘫痪的那种收缩的情况，在今天并不比从前更多，而是更少了。因此在这一限度内来说，它作为危机形成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了”^①。

第二，伯恩斯坦断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和技术的发展，个别资本“对市场的绝对控制”的现象已被“排除”；这样，个别企业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并不足以引起其他企业出现同样的生产过剩；个别企业信用上的瘫痪，也不可能同时波及其他企业，更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类似的信用上的瘫痪。据此，伯恩斯坦又得出一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之内，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别工业中的生产过剩还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性的证据，实际上已“浮在抽象思辨的空中了”^②。

第五节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诋毁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责难 伯恩斯坦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力量》为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诋毁。这一全面的诋毁是以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责难为起点的。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32、134页。

② 同上书第133、134页。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认为，阶级是指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其中，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同，是形成阶级区别的基础，也是划分不同阶级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因此，所谓阶级，实际上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伯恩施坦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精髓，以其主观的臆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提出两个方面的责难：

第一，伯恩施坦完全避开划分阶级的基础——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问题，而是笼统地用“财产”和“无财产”的区分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从而把阶级的划分完全看作是对人们财产及其收入的划分。“这样一来，这个‘无产阶级’就是异常多种多样的分子的混合物，是一个阶层的混合物。”不难看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本质规定是大相径庭的；他由此而得出的由“阶层”取代“阶级”的结论，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第二，伯恩施坦也放弃从社会劳动组织中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上理解阶级划分的正确思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企业中劳动过程分工体系的等级来理解阶级问题。他认为，“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并不像《共产党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是同一类型的，在财产和家庭等方面同样地不受约束的群众，恰恰是在先进的工厂工业中存在着的一套完整的由分化了的工人组成的等级制度，在它的各个集团中间只有不大的团结感。”^①显然，劳动过程中分工体系的等级，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劳动的专业化性质引起的；由此而形成的等级，与社会阶级的划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50页。

里，伯恩斯坦故意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排斥对阶级划分中生产关系基础的分析。

伯恩斯坦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同时，也百般嘲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一方面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心目中是以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为典型例子的”^①，从而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宣称，随着社会“民主”（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的发展，有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践上都已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这一切都是同专政相矛盾的）的立场上。”这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与它随便什么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②。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的嘲弄，只能表明他公然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只能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彻底背叛。

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曲解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彻底背叛，必然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错误理解。

伯恩斯坦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包括第二国际的其他无产阶级政党）都主张“反对资产阶级和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他认为，这里使用“资产阶级社会”（*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一词，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一种言语上的含混”。因为这很容易使人们想起“资产阶级社会”一词的另一个含义——“市民社会”。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一用语上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49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的“缺陷”，是“导致敌人和朋友的错误解释的绝好桥梁。”因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提“用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这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不过是伯恩斯坦作了“修正”的、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一种“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在伯恩斯坦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的“宣战”中，“应该有些分寸”，因为“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而且这一点也在实践中，在社会民主党必须对其表示态度的每一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①。伯恩斯坦不仅要求党放弃反对资产阶级和消灭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纲领，而且还要求党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的“精神内容”改造党。

伯恩斯坦特别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用“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的原则”，来重新规范党的理论与实践。伯恩斯坦强调这一点，是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相信：“承认经济上的个人责任，是个人为了社会给与他的或者向他提供的服务而对社会的报偿。”^②那么，对于处在德国专制制度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应该“承认”什么样的“经济上的个人责任”？又应该怎样对社会进行“报偿”呢？伯恩斯坦并没作出明确的说明。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承诺这类“责任”，进行这类“报偿”，那么，它实际上就已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党了！

伯恩斯坦还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党”。这是因为：其一，“正像不应希望任何一个别的伟大文明民族丧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失独立一样，社会民主党对于德意志民族在国际会议上是否受到压抑，是不能漠不关心的”^①。在这里，伯恩斯坦故意把德意志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德国统治阶级在国际关系上受到“压抑”混为一谈。

其二，即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应该“像英国革命时的独立派或法国革命时的雅各宾派那样，成为民族的党，就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必须表明自己担负得起同样坚决地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以此来加强它作为领导政党或领导阶级的资格”^②。在这里，伯恩斯坦又故意混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中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界线，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原则来改造党，以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充当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原则。

其三，伯恩斯坦还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他以德国当时“租借”中国的胶州湾一事为例，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和无原则地“谴责”这一侵略行为。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瓜分中国以及使德国得到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但是使中国不致成为其他各国的掠夺物，却是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的，使中国的贸易政策不致服从某一外国或者某一外国联盟的利益——总之，使德国对于一切有关中国的问题都能参与一份决定性的意见，这是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的。”况且，“即使德国不取得胶州湾，中国也会日益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围，即使德国不取得胶州湾，俄国也会继续实行它的包围政策，并且一有机会就占据满洲的港湾。”^③在这里，伯恩斯坦俨然成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辩护士，成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15—216页。

② 同上书第216页。

③ 同上书第218页。

辩护士。

最后，伯恩斯坦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摆脱马克思留下的“脚手架”的束缚，放弃马克思理论中的“二元论”倾向。他认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马克思只要一论及“最终目的”的问题，“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从而“表明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内”，建造科学的建筑物的；一旦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科学的建筑物“不能自由发展”时，马克思“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脚手架。”这就是说，马克思为了“教义”而牺牲了科学。据此，伯恩斯坦产生的“信念”是：“不管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①。伯恩斯坦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中“二元论”的旗下，试图彻底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

对社会主义目标与特征的歪曲 伯恩斯坦认为，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描述，不是根据它们的“技术基础或经济基础”，而是根据它们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点，伯恩斯坦断定：“对社会主义的最准确的说明无论如何是同合作经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点，因为这一来就把经济的和法权的关系同时表现出来了”^②。所谓的“合作经营”就成了伯恩斯坦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目标与特征的中心命题。

伯恩斯坦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合作经营的性质及其效能问题，只作了一些“十分浮浅”的论述。他特别不满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合作社问题发表的“比较抱怀疑态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54—255页。

^② 同上书第144页。

度的意见”。他认为，由于马克思囿于“剥夺剥夺者”的“公式”，因而不可能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相反，在马克思心目中，“只有表现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最直接对立的合作社形式才中他的意。因此向工人推荐合作社，要他们热心于此，因为‘生产合作社’从根本上冲击现存经济制度”^①。显然，在伯恩斯坦心目中，合作社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直接对立面，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

在伯恩斯坦看来，利用合作经营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极大的优越性。首先，在合作经营的发展中，“工人阶级依靠它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却不必直接消灭生命，不必诉诸暴力，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暴力决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②。因此，合作经营成了伯恩斯坦企望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

其次，伯恩斯坦还设计了一条合作经营发展阶段的思路。他反对过高地估计生产合作社的地位，主张先发展消费合作社；然后，在消费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广由消费合作社供给资金的生产合作社；并认为生产合作社只有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后盾”时，才能显出强大的生命力。他还认为，这种生产合作社主要不是为职工的利润而是为一个更为广大的整体的利润而生产，职工则是这一更为广大的整体中的成员。伯恩斯坦断言：这种合作社尽管“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是它们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把自己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如果始终充分听任它们自己从事自己的组织和管理，那么它们肯定会极好地完成自己的经济任务”^③。显然，伯恩斯坦设计的这一思路，才是一种真正的充满“空想”色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174页。

③ 同上书第232页。

彩的社会主义！

再次，伯恩斯坦认定，在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中，并不需求“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他认为，“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① 伯恩斯坦十分赞成这样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前，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国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在“等待”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自由制度充分发展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在这漫长的“过渡”时期中，留给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目标。

第六节 20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 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所谓“争取自由科学的论战”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对他逐渐膨胀起来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系统论述。他的理论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第二国际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赞赏，这本书也因此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书。同时，他的理论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们的严厉批判。对于这些批判，伯恩斯坦极为恼怒，他指责这些批判是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作的“粗暴的”判决。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08—209页。

为了表明自己理论的形成不是偶然为之的，而是对多年来事态发展过程反思后获得的一种科学“信念”，伯恩斯坦在1900年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文集。该文集的第一编“金科玉律”，收集了他在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的内容，我们在本章第二节论述“对所谓‘金科玉律’的最初修正”时已经提到。该文集的第二编“社会主义问题”，收集了他在1896年到1898年的六篇论文，这就是本章第二节提到的《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最后第三编是“在社会主义中争取自由科学的论战”。收入这一编的六篇论文，都是针对考茨基的。

伯恩斯坦为什么把他与考茨基的论战称作“争取自由科学的论战”呢？伯恩斯坦尽管没作直接的说明，但是，在这一组论文中他还是多次提到，所谓“自由科学”就是他寻求的那种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建立在修正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

首先，伯恩斯坦认为，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理论家们的分歧，类似于历史上圣西门主义者与孔德及其信徒们的斗争，是一种“自由的、兼容并包的学派同教条化的教会之间的对立。”自然，他所代表的是“自由的、兼容并包的学派”，而当时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人，则被贬斥为“教条化的教会”势力。

其次，伯恩斯坦认为，正像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曾经无情地抛弃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在现实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将无情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他认定的，“历史……会抛弃一度似乎表现了铁的规律的那些学说，它会使人们认为已战败的那些学说重见光明。历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将作出什么样的最后裁决呢？今天谁也说不出来。”^①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将同历史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357页。

也会被社会主义运动所“抛弃”。

最后，伯恩斯坦断言，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来说，“不管历史把它抛弃多少，社会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仍将继续进行。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意识到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大公无私的检验”^①。伯恩斯坦认定，即使“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也将发展下去；而且一旦“抛弃”马克思主义，还会产生极大的“精神自由”。不难看出，伯恩斯坦所要“争取”的，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就是要树立那种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自由科学”。

历史是最公正的。20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相反，这一运动的前进和胜利，都是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实践也已经证明，凡是信奉伯恩斯坦的“自由科学”的，无不招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乃至重大的失败。

伯恩斯坦还对他所要“争取”的那种“自由科学”的要旨，作了如下说明：

其一，“自由科学”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的地位。伯恩斯坦喋喋不休地宣称：“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在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已不再合适的前提制定的，用它来作衡量上述许多工作的标准，就是不够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了。”^②所谓“自由科学”的这一特征，后来一直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流派所秉承。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357—358页。

^② 同上书第257页。

其二，“自由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兼容并包”，把原先被社会主义运动“排斥”的学派和理论都吸收进来。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应该同“伦理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接触”。例如，在“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就应该同洛贝尔图斯理论，甚至杜林主义“接触”，因为洛贝尔图斯等人已经“循着另一条途径得到了和马克思主义用劳动价值及剩余价值的学说所得到的完全同样的结论”^①。在伯恩斯坦看来，洛贝尔图斯等人的理论，既克服了马克思理论的“缺陷”，又说明了“剥削”的性质。

伯恩斯坦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清洗”的办法，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它会断送工人运动的前程。他主张，“正因为党把它的范围扩展到只要社会主义思想允许扩展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党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保持这种性质，要比死守一套不是过时就是多余的革命惯用语更有价值。”^②

其三，“自由科学”的核心就是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斯坦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民主观和自由观多有非难。现在，他又把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他的“自由科学”的核心内容。在他关于“民主”和“自由”连篇累牍的解说中，突出的就是以下三个观点：

一曰：“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伯恩斯坦断言，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上镇压职能的削弱，“民主”就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例如，在英国，“国家对内几乎完全失去了政治镇压机器的性质；”而且“几乎在一切西方国家里，资产阶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328页。

^② 同上书第279页。

级对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态度至多是防御的态度，而不是镇压的态度。”面对这种态势，社会民主党也要根据“气质”和“地方传统”对社会主义运动加以“变通”，以“民主”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变通”的必然选择。

二曰：“民主”就是放弃宣传和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伯恩斯坦曾认为，“民主”就是不存在阶级统治。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极力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有益的”；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只要强调“民主”就足够了，即如伯恩斯坦宣扬的：“党是作为社会民主党，由于强调了它的民主性质、作为工人的民主派而强大起来的，我认为这一点即使在今天对党的斗争来说也完全够了”^①。

三曰：“民主”就是放弃阶级斗争，转而成为“公共利益”，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自由”作贡献。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就已宣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已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了。现在，他进一步断言，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主要“靠言论、报刊、投票纸进行斗争”，“一切对民主制度要求有发言权的党派必须对公共利益作出贡献”，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自由”作出贡献。

可见，伯恩斯坦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他的“自由”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现有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自由”。但是，历史已经最雄辩地证明：在伯恩斯坦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民主”和“自由”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后来，接过这种“民主”和“自由”旗帜的人，也从来没能实现过；相反，凡是受到这种“民主”和“自由”侵蚀的，都给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第273页。

修正主义理论的扩张：从汉诺威大会到德累斯顿大会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发表，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的严重关注。从1899年10月到1903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四次代表大会，都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伯恩施坦针对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他的批判，也对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对他的许多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作了许多“补充”。这一时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而且也在第二国际范围内大肆泛滥。

在1903年9月汉诺威大会召开之际，伯恩施坦借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法译本写序，以“对我的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的回答”为题，就党的代表大会对他的批判作了反击。伯恩施坦除了重复他早先的一些理论观点外，还对以下问题作了“补充”。

伯恩施坦抓住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某些不足，夸大其辞，认为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养成了一种习惯，即“以同样的敌视态度看待对于导师的学说的任何批评，不管批评是针对这一学说的基本观念，还是仅仅针对它的派生性假说……”伯恩施坦自认为，他所怀疑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中“派生性假说”的“效用”问题。^①

其实，即使在今天看来，伯恩施坦的错误也并不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假说”（姑且沿用伯恩施坦的这一说法）所持的“怀疑”上，甚至也不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怀疑”上；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特征及其趋势的曲解上，在于他以这一曲解为基础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主张完全“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伯恩施坦所“怀疑”和

^① 参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7页。

极力主张“放弃”的，决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假说”，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伯恩施坦决不是要“发展”，而是要彻底背弃，最终葬送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在怀疑马克思主义中的“派生性假说”的同时，也极力主张用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来“补充”，或者来“折衷”马克思主义。考茨基曾指责伯恩施坦“打算通过输入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对它敌视并且是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而制定的观念”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对此，伯恩施坦并不否定。他承认：“就算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呢？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体系；它希望成为科学，而对于科学来说，问题不在于知道一种理论是在什么目的或者什么政治意图下制定的，而是在于它是否精确。”他还辩解道：“在科学的历史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假说原来是为了反驳为一种假说而制定的，结果却被认为是它的补充。”^①

根据这一设想，伯恩施坦极力主张用奥地利学派杰文斯、庞巴维克等人的边际价值论来“补充”，以至“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还极力主张“复活”蒲鲁东主义，使社会主义运动在蒲鲁东主义理论指导下得到“再生”。

不难看出，伯恩施坦实际上是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补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反对，而且还一贯主张要吸收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一切积极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种吸收既是一个分析、批判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过程。如果像伯恩施坦那样，把“补充”马克思主义当作“折衷”马克思主义的捷径，那么，其结果只能是窒息、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1901年2月，伯恩施坦离开了长期生活的英国，回到了德国。这年5月17日，伯恩施坦就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是可能的？》的演讲。这一演讲的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37、38页。

内容成了这年9月召开的卢卑克党的代表大会的争论焦点。从《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的演讲，到卢卑克大会上的两次发言，再到这年10月发表的《争论的核心——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这一问题讨论的结束语》一文，反映了伯恩斯坦继《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之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次肆意攻击。

伯恩斯坦割裂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诉诸认识，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把利益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动机。”^① 进而又认为，“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就此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的称号会使人错误地得出一种观念，似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希望或者应当成为纯粹的科学。”^②

伯恩斯坦的结论就是：“在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并不全部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要获得“科学性”，就要“放弃”成为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教义”，就要使它的原理“能够被每一个没有偏见和不受相反利益影响的非社会主义者赞成”。这就是说，“只有当社会主义学说不需要特殊的党的倾向作为基础的时候，它的科学性才在相应的程度上得到保证。”^③

伯恩斯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理解，除了表明他的强词夺理、故意曲解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现实的一种“纯粹”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正在于它是以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第362页。

② 同上书第367、368页。

③ 《伯恩斯坦言论》第282—283页。

为事实根据的，又是在指导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求得发展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公开承认它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阶级性，这一学说的科学性正是在其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过程中得到证明的。伯恩斯坦否定社会主义学说的党性和阶级性，只是他肆意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而全盘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遁词。

伯恩斯坦“纲领理论”的最后说明：《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自1899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一直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批左派理论家的抵制与批判。无疑，这些理论家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革命左派，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他们没能从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特征的高度，认清修正主义理论与纲领产生的社会根源及政治作用；没有从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新特征的高度，揭露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中浸透了的机会主义实质；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思潮的危害性，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及时地同修正主义实现彻底决裂；也没有真正地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中获得新的活力。这样，20世纪的最初10余年中，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得到了迅速蔓延。

1905年，伯恩斯坦在《今日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小册子中，仍然以党的理论家的面目，公开兜售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1908年底，伯恩斯坦在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再版时写的序言中，不无自负地提到：“自从本书写成以来，在政治、工会和合作社方面的工人斗争的实践领域内所发生的最有意义的进步，恰恰是同书中的论述十分一致的”^①。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3页。

次年4月，正值《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10年，伯恩斯坦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生社会研究同阿姆斯特丹大学生联合会法学分会共同举办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的演讲，对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阐述。这次演讲的内容既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10年间发展的一次“充分”的总结，而且伯恩斯坦对他的理论后来也没再作过类似的总结，因此，这次演讲的内容又成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最后说明。

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中，伯恩斯坦首先对“修正主义”的内涵作了解释。概括地说，他认为，“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于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这种改良主义“预见到同非社会主义政党屡次合作的理由和必要性，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依照这一点来调整自己的语言。仅就这一点来说，改良主义也就是节制的意思”^①。伯恩斯坦对“修正主义”内涵的这一解释，也许是他所有解释中最为坦率的。原先伯恩斯坦反感于人们把他的理论称作“修正主义”；后来又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但避而不谈修正主义的实质；现在，修正主义理论有了10年发展之后，他才坦然承认，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改良主义”，或者说是“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不只是就其自身的理论和政策而言的，而且更是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改良”而言的。10年前，伯恩斯坦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最初“改良”中，还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修正”为旗帜的。现在，伯恩斯坦不再忌讳人们对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他干脆按其“改良”

^① 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页。

的意图，任意地肢解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成为一个“规律”和两条“原理”。伯恩施坦根据他修正主义理论发展需要所杜撰的这一条“规律”就是：“马克思所维护的观点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变，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这个社会宁可说有自己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是一切想对这个有机体进行改良的人必须仔细研究的。”^①

与这一“规律”相联系，伯恩施坦又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简单化为以下两条“原理”：其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其二，“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②。伯恩施坦认为，他所认定的这两条“原理”，是任何修正主义者都承认的，它们“包含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并且对“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同样有着十分确定的界限”^③。

伯恩施坦在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时，绝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基石、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完全被伯恩施坦抛弃了。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肢解成一种十足庸俗的社会进化论。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还以批判“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为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理论结论，要么本来就是“错误”的，要么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伯恩施坦涉及的是

① 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12页。

③ 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第12—13页。

马克思主义的以下三方面重要理论结论：

第一，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选择的“剥夺者被剥夺”的方式和道路已行不通了。这是因为，现代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对私人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现在“必须采用根本不同的手段和方法，逐渐把它们纳入比较严格的社会监督之下，这种社会监督只有渐次地才能做到完全控制它们。”既然国有化的可能性已经消失，那么，工人用剥夺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可能性也就完全不存在了。据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工厂的工人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把工厂接收下来。如此廉价剥夺的工厂在一次革命中将是一场空欢喜。”^①

第二，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也已完全“过时”。这是因为：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简单化的态势，资本积聚和集中导致小生产者破产的局面，以及由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作用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等等都没有出现。

第三，伯恩斯坦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理论也已完全“过时”。这是因为，自1891年起，以德国为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是表现为下降的商情曲线，而是表现为一条“上升曲线”；市场的扩大和工业的卡特尔化“将使营业活动中的危机和萧条比以前更快得到克服”。这样，当“危机发展的旧公式已经站不住脚”时，那么，以这一旧公式“为根据而提出的对于未来的一切期望，首先是关于将使现代社会遭到直接毁灭和完全崩溃的经济大灾变的思想，也必定随着它一起垮台”。最后，“先前同这一危机公式相连的一切妄想，都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只能是有害的了。”^②

^① 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第17、18页。

^② 同上书第26—29页。

显然，伯恩施坦在宣布马克思主义这三个方面重要理论“过时”时，一方面是以对马克思理论本身歪曲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也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主观臆断为前提的。马克思从来不是从方式和道路是否可行上，探讨“剥夺者被剥夺”的内在必然性的。相反，马克思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这一基本矛盾的性质及作用后果的周详论证，科学地揭示“剥夺者被剥夺”这一历史趋势的。伯恩施坦避开这一根本问题，只是在具体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兜圈子，用似是而非的语言来肢解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实质。

即使按伯恩施坦的设想，现代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剥夺”的必然性，相反，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剥夺者被剥夺”的必然性更显著地表现出来。当然，实现“剥夺”的具体方式和道路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至于伯恩施坦设想的“社会监督”的方式，实际上只是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的改良主义的方式和道路。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趋势的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在提出这些理论时，抽象了一系列非本质的现象，所进行的只是“一般研究”。在这些理论原理中，“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的自身的一般类型的”^①。因此，在对马克思理论原理的理解中，必然包含这样的规定性：“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60页。

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①。

伯恩施坦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些新现象，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一一提及。面对这些新现象，如果不作任何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就武断地宣布马克思理论的“过时”，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科学方法论无知的表现，同样也是一种“教条化”或“僵化”的理论取向。伯恩施坦在大谈“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并不是用发展的眼光与科学的方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相反，他的“发展”完全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或“僵化”的理解为前提的。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僵化”基础上的所谓“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背弃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断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中，伯恩施坦对其修正主义理论所作的最后说明，成了他全面背弃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最充分的表白。

第七节 伯恩施坦理论发展的终极： 向社会沙文主义和反布尔什 维克主义的转化

向社会沙文主义的转化 1902年到1906年间，伯恩施坦连续几年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之后，1912年到1918年又再度连任国会议员。他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之一在议会中活动的。但是，从总体来看，他在议会中的活动是围绕着重实践其机会主义路线和策略展开的；他把议会的合法活动同他所主张的为“公共利益”服务，为德意志帝国利益服务联系在一起。1914年8月初，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推动伯恩施坦在议会内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公开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05页。

府立场上，成为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社会沙文主义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完成。在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中，早已隐含着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已经提到：“如果，或者说因为，英、法、俄各国的沙文主义者对符合德国的眼前或将来利益的措施产生反感，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任何必要鼓吹放弃保卫德国的利益。只要在德国方面涉及的不仅是个别集团的对国民福利无足轻重或者甚至有害的偏爱或特殊利益，只要实际上事关民族的重大利害，那么国际精神也不能成为对外国当事人的权利要求怯懦地让步的理由”^①。当时，伯恩斯坦还谨慎地声言，他的这番话“并不是出于任何沙文主义的一时冲动”而说出来的。

1900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和殖民地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提到：“每一个强大的种族和每一种强大的经济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文化都力图传播和扩张。这种渴望在任何时候都是进步的发展的强大因素。因此，如果打着社会进步旗帜的运动的代表把系统的扩张意图当作一种本身就是很坏的东西加以唾弃，那就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②。主张无产阶级政党无条件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立场上，以本国的所谓“进步”、“发展”为旗号，为经济、文化乃至领土扩张辩护，就是世纪初伯恩斯坦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主张。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的几天，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就在帝国议会上发表声明，无保留地赞同批准政府的军事拨款，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到1915年间，伯恩斯坦在题为《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17页。

^②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5页。

争》的小册子中，极力为其议会中的叛卖行为辩护，公开为帝国主义战争开脱罪责，大肆宣扬社会沙文主义理论。

伯恩施坦一开始就提出：“组织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阶级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战争呢？”按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设想，能够采取的无非是三方面的行动：一是“即使不进行有名的总罢工，也能够对和平发表重要的——即使不是决定的——意见”；二是社会民主党“将根据它的纲领主张通过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三是公开提出“保卫德国的利益”^①。现在，当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伯恩施坦既不主张举行总罢工，也不打算对和平发表意见，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所谓“保卫德国的利益”的行动。

伯恩施坦在为他选择“保卫德国的利益”这一行动辩护时指出：战争爆发时不采取群众罢工的方式反对战争是有其必然性的。他列举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战争爆发时，正值商业萧条和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因此，工人不可能用停止工作来谋求政治效果。工人组织关注的自然是利用战争机会安插和救济已经失业的工人。从伯恩施坦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来看，帝国主义战争不仅能够给德国经济的复苏带来希望，而且也能给工人的就业带来福音。据此，伯恩施坦相信，如果举行罢工不仅会“损害”工人的利益，也会“损害”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利益。

第二，战争爆发后，广大民众的民族情绪比和平倾向“更加自然地流露出来”；这时，构成无产阶级“特殊力量因素”就变成了“软弱的因素”。如果无产阶级政党选择反战罢工的行动，响应的群众可能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还可能招致军事当局的残酷镇压。据此，伯恩施坦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支持战争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的。社会沙文主义是以无产阶级政党放弃任何形式的斗争，选择投降主义路线为其主要内容的。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17页。

第三，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德国是处于战争的防御的一方，还是处于进攻的一方，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时，采取反战罢工可能意味着反对正在“合法地”抵抗侵略的一方。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唯一能够选择的的就是放弃任何反战的行动。显然，只要有起码的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清楚，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绝不是由战术上的防御或进攻决定的。何况1914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已旗帜鲜明地指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正义性质。

按伯恩施坦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他实际上也不是以防御或进攻来区分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性的。在他看来，为了“保卫德国的利益”，战争一开始就应该是进攻性的。对此，他在1899年就说得清清楚楚了。这就是：在德国受到邻国威胁时，德国“就宜于把战争尽可能快地推到敌人的国土上并且在那里进行，因为在现代国家中，在本国土地上作战就已经是一半失败了”^①。以无法辨清战争的进攻性或防御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反战行动的理由，只是伯恩施坦推行其社会沙文主义的一种遁词。

在《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这一小册子中，伯恩施坦还极力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其他政党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叛卖行为辩护。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同意增加战争拨款，对其他国家的工人中尽管产生了恶劣影响，在工人国际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但是，这一行动却是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因为“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批准了用于战争目的的50亿马克的拨款，德国人民的代表就这样向敌国显示了一条统一战线”^②。

对第二国际中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伯恩施坦统统视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威信增长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14页。

^② 《伯恩施坦言论》第366页。

的一种必然的、明智的选择。他认为，拒绝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称之为“落后的东方”的“小党”），并不见得比赞成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称之为“西方各国”的“大党”）“更勇敢”、“更坚强”。产生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根源在于这里和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的大小和影响的不同。大党或者有着巨大的议会威信的党，在表决时受到同这种威信相联系的客观责任的压力。它们不可能象小党所能做到的那样，随便地以示威为目的而决定自己的投票，这些小党的表决对于事情的进程是没有直接影响的。这就是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增长的反面。如果不想根本放弃这种增长，就必须忍受这一反面。”^① 伯恩斯坦为叛卖行为所作的这一辩护，最充分地暴露了社会沙文主义屈从于资产阶级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党的原则和党的立场的实质，最生动地勾画了“议会迷”的机会主义形象。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狂热反对者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最沉重的打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际地证明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的破产。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胜利后，伯恩斯坦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俄国，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

1918年12月，伯恩斯坦在题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演讲中认为，“使工人直截了当成为他们做工的工厂的主人，这种思想同样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我们在东方的邻国（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②。他借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伯恩斯坦称其为“卓越的社会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工人对企业的所有制，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所有

^① 《伯恩斯坦言论》第367页。

^②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页。

制“更坏的”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实行的“剥夺剥夺者”的伟大创举，贬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制基础，成为伯恩施坦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

1919年8月，伯恩施坦在再版《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时，特地增加了题为《拉萨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跋文。这一短文集中攻击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早就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现在却侈谈俄国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原理的背弃”。对此，伯恩施坦提出了以下所谓“论据”：

伯恩施坦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曲解成一种庸俗的社会进化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只有加强“普选权”，通过“民主选举”才能实现。从这种庸俗的社会进化论出发，把民主选举权“当作废物弃置一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革命，自然就成了一种“背弃”行为。

伯恩施坦进一步以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为根据，对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攻击。他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根本够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由“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而成的；“只要不及时发生转变，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十足的畸形儿”^①。

1920年，伯恩施坦在再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前提》时，再次利用增写跋文的机会，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作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一开始，伯恩施坦又重复他早先的说法，指责俄国社会发展还没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冒险事业在实际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图通过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

^① 伯恩施坦，《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第103页。

尝试”^①。

伯恩施坦还对俄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大加贬斥。他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党的专政，这个党依靠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一个顺利的时刻掌握了统治手段，借助征募来的近卫军和运用恐怖主义的措施而暴力地镇压一切别的党派……在残酷程度上往往超过沙皇专制暴行的那些镇压措施……”^②伯恩施坦还断言，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不只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和文化上的“倒退”。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事业”在“必然引起生产倒退的后果”的同时，也在“无日的地消灭生命和此外还要一般地损害人民福利”，并使文化、教育“在布尔什维克破坏性暴力政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严重的妨害。”总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的这些疯狂的诅咒，成了当时国际反动势力扼杀苏维埃政权的联合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伯恩施坦是在“发展”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是以“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进行这些攻击的。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创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伯恩施坦以及后来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所反对和攻击的正是这场伟大革命的精华，所诋毁和贬斥的正是这场革命留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寻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时，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伯恩施坦在一些重要的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一再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例如，1921年春，他在柏林大学开设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274页。

② 同上书第274—275页。

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问题”的公开讲座上，就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大肆攻击。随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成长，伯恩斯坦攻击的调门也在不断地提高。他指责布尔什维克“把暴力看成万能的东西”，它在强行“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社会发展；他还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种“愚蠢的和最粗糙的解释”，是“不断进行着拙笨的试验”；他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并认为俄国革命从马克思“剥夺者被剥夺”的名言中，演绎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格言：“打劫者被打劫”，污蔑俄国工人阶级就是“按照字面接受下来并且时常粗野地使用起来了”等等。

最后的抗辩：《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伯恩斯坦不仅成了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狂热反对者，同时他也利用一切机会，进一步宣传、传播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一方面，他曾出任1918年11月德国革命后成立的艾伯特—谢尔曼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后来，在1920年到1928年间，又被选为德意志共和国议会议员，参加议会的捐税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利用这些“合法”的身分，伯恩斯坦尽力在实践中实施他的机会主义策略。另一方面，他又作为已经蜕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深理论家，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宣扬他的修正主义理论。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里茨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就是在他的这一理论影响下形成的。

1924年，伯恩斯坦的自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正式出版。这本小册子成了他对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论和策略路线的最后一次抗辩。

在这《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部分，他借192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的基本观点，试图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结构“更为严密的”、“表达方式更为明

确”的总结。他认为，他一生的理论活动，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问题。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正式”提法呢？伯恩斯坦的回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科学的发展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的理论，多多少少都是这个学说的组成因素，但还不是它的实质”^①。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个可以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理论相分离的，可以与揭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这一中心任务相分离的学说。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基石，抽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内容后，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不难看出，伯恩斯坦所倡导的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扼杀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机会主义主张。

伯恩斯坦还对他所理解的“现代社会主义”下了定义。他沿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的说法，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对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地位的工人以及同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上的意向的精神内容的概括，以及为实现这些意向而进行的斗争”^②。伯恩斯坦所谓的“现代社会主义”只是一些“意向”，以及为实现这些“意向”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本质，被伯恩斯坦解释成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产物。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无目的的“斗争”，用伯恩斯坦的话来说，对这种社会主义来说，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可见，伯恩斯坦所认定的这种“现代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它实际上是作为与科学社会主义正相反对的一种思潮而出现的。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52—53页。

作为其一生理论活动的最后归宿，伯恩斯坦把它确定在反对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上。他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部分谈到：“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的武库里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作为学说……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这在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①盖棺论定，伯恩斯坦是以一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主义的狂热反对者的形象，了结其一生的。

^① 伯恩斯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53页。

第三章 考茨基由马克思主义 到机会主义的演变

第一节 生平

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 卡尔·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一位著名理论家。1854年10月16日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带有浓厚国际色彩的家庭。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家系就是奥地利帝国民族混杂状态的一个缩影。我是在1854年10月16日在布拉格出生的，是一个捷克人和一个德国人的儿子。我的外祖父是维也纳人，但是他的父亲则是来自匈牙利（我猜想是来自克罗地亚），娶了一位意大利女子为妻。我的外祖母是奥地利东北部人。我的祖父是捷克人，而我的祖母却是波兰血统的人。”^①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考茨基必然会具有复杂的民族感情。起初，他怀有激进的捷克民族主义，从1866年起又转向同情奥地利境内的德意志人，渴望他们能同其他国境内的德意志人统一在一个共和国内。后来在巴黎公社影响下转向了社会主义及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国际主义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奥地利，一个年轻的中学生是根本无法获得正确讲解社会主义的读物的。他当时只是从乔治·桑的社会主义小说中获得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模糊概念。他最初是从路易·勃朗的历史著作中获得关于社会主义的正面知识的。直到1874年看到奥地利社会民主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1页。

党的党刊《平等报》时才接触到了德国社会主义的读物，首先是拉萨尔的著作。

1874年秋季考茨基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由于对历史的特殊兴趣他在大学中更多地选修了有关历史的课程。在研究历史之余，还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热烈赞成达尔文主义，他自己就承认，“我的历史理论无非是要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发展”^①。大学时代的考茨基还曾从事研究社会主义，并由此而引起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此他研读了《资本论》。但是这种尝试失败了。他并没有因此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淡漠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②他的第一部著作《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是以达尔文主义为出发点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既反对马尔萨斯理论，又承认有机生物都有一种超过其食物来源而繁殖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如果社会主义消除了下层阶级的贫困，社会主义就会面临如下危险：社会主义将由于普遍的富裕繁荣而必然导致人口过剩，从而在暂时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之后又会引起新的贫困。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们赖以驳斥马尔萨斯的那些理由，如认为人口的增加会神奇地适应当时食物来源的增加，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只有在新马尔萨斯主义中才能找出解决办法”^③。

走向职业革命家 从1874年起，考茨基开始给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党报《平等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撰稿。1875年后又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撰稿，并因此而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建立了联系。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考茨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5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同上。

基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职业。他先后考虑过作律师、画家、剧作者等。所有这一切都未使他满意。正当他徬徨和极端失意的时候，法兰克福的一位富有的私家学者卡尔·赫希伯格邀请考茨基去苏黎世帮忙，并作为经常的撰稿人为他的刊物撰稿。从此使他找到了自己为之贡献一生的事业：“研究历史和经济并且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①。

1880年1月考茨基到了苏黎世。这使他感到如同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同时也获得了从前所没有的从事理论工作的优越条件，他愈来愈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感染，重新学习了《资本论》，研究了《反杜林论》。他自认为通过这段努力自己克服了以前的折衷主义，并已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之上。我们知道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折衷主义并未克服，而且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并最终使他完全滚到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去。

1881年3月考茨基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派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联系。由于马克思夫人病重，因此他很少同马克思来往。在伦敦逗留的3个月倒是与恩格斯接触较多，朝夕相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直到恩格斯逝世一直如此。考茨基这次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会见没有给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什么好印象。马克思说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是个天生的俗种”^②。恩格斯对他的印象则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③。

1882年春，一场金融灾难使赫希伯格陷入破产境地。考茨基被解雇返回维也纳。他准备自己独立创办一份杂志。在恩格斯、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211页。

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支持下，杂志于1883年1月创刊，定名为《新时代》，由迪茨出版社出版。一直到1917年考茨基均为该杂志的主编。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在斯图加特）和伯恩施坦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先在苏黎世，后迁伦敦）是直接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创办的两份杂志。前者偏重于理论，后者更侧重于政治。“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之前以及在这次革命之后不久办过杂志以来，我们所办的杂志是第一批有意识地和有系统地为宣传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研究服务的杂志。从这两个杂志开始，人们才谈得上有马克思主义学派。”^① 1885年考茨基迁居伦敦。从这时起，直到恩格斯逝世是考茨基思想发展的顶峰时期。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作品，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法”废止。迪茨建议将《新时代》改为周刊。为了把杂志办得更现实、更生动，考茨基由伦敦迁回德国斯图加特。

1891年1月恩格斯鉴于德国党内机会主义思想的抬头，写信给考茨基坚决要求他在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公开发表马克思的手稿《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由于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阻碍手稿的发表，所以恩格斯向考茨基尖锐地指出，手稿“无论如何总会刊印出来的。……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②。这样，考茨基才不得不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被搁置16年之久的《哥达纲领批判》。可是考茨基并不同意马克思的意见，他在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之后，紧接着于1891年2月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为拉萨尔辩护，表示不赞成马克思的批判，说拉萨尔“是我们最早的导师和先锋之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页。

一”，“马克思对拉萨尔所采取的立场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①。

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为了将党重新组织起来，党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并制定一个新的纲领，1891年10月考茨基与伯恩施坦联合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提交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讨论，在经过一些修改之后，为大会通过。这就是《爱尔福特纲领》。会后考茨基又受党的委托编写了《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

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1896年是考茨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时起他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动摇。在这段时间内，他一方面在倍倍尔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下写出了一些较有份量的批判伯恩施坦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对伯恩施坦的一定的同情。从这种摇摆不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完全堕落的某些兆头。

1896年秋季考茨基在他主编的杂志《新时代》上连续发表了伯恩施坦的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在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下，考茨基发表了一些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与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899年9月发表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从方法、纲领、策略三个方面对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进行了批判。列宁对这本小册子非常重视，小册子出版不久，他就在克鲁普斯卡娅协助下将它译成俄文，并对该书的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当然就在这本批判修正主义的作品中，考茨基也暴露了他的一些企图同机会主义妥协的错误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国家问题的忽视。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曾指出，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

^① 《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页。

基抹杀了！”^①

1900年9月23--27日第二国际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围绕着米勒兰入阁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坚决反对米勒兰叛变行为的左派、为米勒兰辩护的右派及采取折衷主义立场的中派三派。考茨基采取了中派立场，提出了一个折衷主义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没有谴责米勒兰的叛变行为，却宣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②。这个决议被人们叫作“橡皮性决议”。

按照恩格斯的遗愿，考茨基从1905年至1910年整理与出版了马克思的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考茨基还特别注意研究了俄国革命问题。1903至1904年冬季，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认为俄国不久将来就会爆发一场由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但是由于革命的经济条件尚不成熟，还不能建立起任何社会主义生产。1905年俄国真正爆发了革命，但很快就失败了。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正确地预料到这次革命，但是当它爆发时，我毕竟在如下这一点上弄错了：我对它的强烈程度估计过高，因而也对于它对西方所能产生的影响估计过高。这次革命的失败比我们所预料得更快些，因此它对奥德两国所起的革命性影响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小些。尽管如此，这次革命仍然给奥地利带来了平等的普选权，并且加强了普鲁士境内争取普选权的冲击力。”^③正是在俄国革命的激励下，考茨基于1909年写了《取得政权的道路》一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③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24页。

书。在这部著作中，考茨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帝国主义在加速资本主义社会一般阶级矛盾尖锐化方面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但是就是在这本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他再次完全回避了有关国家这一政治革命的核心问题。这表明他滚入机会主义泥坑决不是偶然的失误。

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考茨基以更快的速度向机会主义的错误立场滑去。1911年4月28日他发表了《战争与和平——关于五一节的感想》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极力散布关于和平主义的幻想，说由于谁都害怕担负煽动起现代战争的可恐怖的责任，从而使战争不必经过暴力的爆发就可以从世界上排除掉。第二年（1912年）五一节前夕，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剑拔弩张，火药气味弥漫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空的时候，他不是号召工人群众起来斗争以制止战争，而是重弹旧调，劝说德英首先达成限制军备的协定，并说这样一来就会带动欧洲的其他国家，使它们参加这个协定并裁减军备。这样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就会永远消除。1914年8月震撼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8月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讨论对战争拨款问题的态度。考茨基完全不顾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性质，不坚决反对战争拨款，反对战争，而是主张或是弃权，或是看政府对战争目的的保证再投票，如果政府郑重向举国上下保证，只为自己而战，其目的在于以一种没有兼并、赔款、暴行的协商媾和来尽快结束战争，党团即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列宁认为，这种态度表明，“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已经滚到机会主义方面”^①。紧接着考茨基又于8月21日发表了《战争》一文，公开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辩护，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参战“都是勉强强地被拉进去的”，“目前每一个国家都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而战”。他公开号召社会民主党员不再批判各自的政府，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1页。

“‘武器的批判’开始了”，批判的武器因此失灵”。同年9月11日他又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在该书中他把帝国主义仅仅看成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向农业地区扩张的政策，并认为，这种政策有朝一日可以被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合统治所代替，这样世界就会进入一个和平的新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考茨基的这种错误的理论完全抹杀了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是他的一切机会主义言行的理论基础。从此以后考茨基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了。

在群众的反战压力下，考茨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1915年6月19日他与伯恩斯坦、哈阿兹联名发表了题为《当务之急》的呼吁书，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采取行动争取“真正的和平”。列宁指出，考茨基由呼吁“保卫祖国”到呼吁“和平”的转变是“败类的转变”，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到群众不会再忍耐下去了，‘必须’向左转，以便继续欺骗群众”^①。

1917年11月7日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考茨基不是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诞生欢呼，而是采取了完全敌对的立场。他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攻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反击考茨基的攻击，列宁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彻底揭露了考茨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嘴脸。由于他叛徒面目的日益暴露，使得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孤立。他在1923年5月写的自传中无可奈何地承认，在战争时期“我的中间立场就几乎是完全孤立的。而在整个战争时期以及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②。考茨基生活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是在这种极端孤立的情况下渡过的。

1938年他死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106页。

②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28页。

第二节 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

宣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 考茨基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曾写过一些优秀的著作，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著作中，经济学著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在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都先后出版过《资本论》的简述本。在马克思逝世以前出版的这些小册子，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阐释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使得工人，特别是使得那些刚由农村转入城市工厂中的工人更易于接受，因而这项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资本论》第1卷刚刚出版不久，这些简述本的作者对它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而使得这些小册子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点，甚至错误。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出版一本能正确阐述《资本论》基本思想的通俗读物。恩格斯建议由考茨基来完成这一任务。考茨基接受并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它。188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考茨基为此而写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该书出版前恩格斯曾亲自校阅过。

在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分三篇（《商品、货币和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和利润》）对《资本论》第1卷的内容作了介绍。同以往出版的一些解释《资本论》的小册子比较，考茨基比较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精神实质。在解释各个原理时也不是简单地引证原文，而是把马克思揭示的各个原理通俗而准确地再现出来，有时甚至借助于艺术形象，因而书写得很生动。考茨基的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不少国家先进的工人小组和马克思主义小组中被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材研究。它对宣传、普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起了不少作用。对于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来说，这本小册子成了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应当指出的是，考茨基的这本著作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一部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著作。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朱执信就曾同戴季陶、李汉俊等合译过考茨基的这本书。列宁曾针对考茨基在这一时期的著作说：“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①。毫无疑问，这当然也包括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评价。

考茨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与发展作出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整理与出版了马克思为《资本论》第四卷所写下的篇幅浩繁的手稿。这部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是马克思于1862年间写作的。原想经过修改后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但他的这一愿望在生前没能实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要代已故战友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曾说：“这个手稿（指《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作者注）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②1885年2月，恩格斯在把《资本论》第2卷付印稿寄出后，就立即为第3卷的付印作准备。这时，恩格斯的身体日益衰弱，眼疾也加重了。他担心自己已无足够的时间来把马克思的全部遗稿都整理出版。因而选择了伯恩施坦与考茨基，一方面要他们协助自己工作，另一方面教会他们能辨认马克思十分潦草的笔迹，以便将来自己去世后能独立完成手稿的整理与出版工作。1889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说：“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作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以便必要时能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人来做这些事”。“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那时我可少用眼睛，同时又不至于忽略这项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那时，这些手稿至少对于两个人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了。”^①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考虑并非是多余的。正当他完成《资本论》第3卷的出版工作，着手为第4卷的出版做准备时，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这时德国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伯恩施坦由于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而遭到了德国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员的谴责。他已不适合担当编辑出版《剩余价值理论》的重任了。这样，这个任务便落到了考茨基一人身上。

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时曾留下遗嘱，马克思的遗稿由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保管。同年9月，爱琳娜征得姐姐同意后，把马克思遗稿的理论史部分交给考茨基，由他编辑出版。经过10年努力，考茨基终于在1905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题出版了手稿的第1、2两卷。又经5年努力，出版了第3卷。至此，这部手稿得以全部与世人见面。

把马克思的手稿整理、编辑并刊印出来供世人学习研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传播的一大贡献。马克思的手稿是十分难读的。这不仅是由于字迹潦草，而且还由于他在写作过程中大量使用缩写字，甚至用缩写的句子。并经常在德文中混杂一些法文、英文和其他文字。所有这一切都为编辑出版造成了极大困难。何况这部手稿本来就不是作为一部独立著作而写的，它显然是马克思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写的，因而带有明显的笔记的特点。篇幅庞大，各部分之间缺乏连贯性。要把这样一部手稿整理成书，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以便能正确地选择材料，进行编排，划分章节，拟定标题。至于统一文字风格与术语，改正笔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35、136页。

与注释，更要付出巨大劳动。因此能将这部手稿整理出版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受到了普遍的称赞。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希法亭等人都曾专文评论。列宁也在许多文章中引用过这部著作。它很快便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编者序中，考茨基曾宣布：他编辑出版的这部著作，“不能算是《资本论》第4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续篇，”而是“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考茨基的这一意见曾遭到苏联学者的批评，攻击他有意曲解马克思的遗著。1975年第七期《经济科学》杂志（民主德国）刊登了桑德尔的题为《〈剩余价值理论〉第一版（考茨基编）出版史》的文章。根据作者在阿姆斯特丹查寻的有关考茨基的档案证明，考茨基当时这样作的目的不是有意曲解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为了该书能不受迈斯纳出版社所拥有的《资本论》的版权限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机关——狄茨出版社出版。这样便使七、八十年的疑团得以合理解释，并为考茨基洗刷了百年冤案。

起草党的纲领，阐述无产阶级奋斗目标和革命的战略与策略

1891年，考茨基参加了爱尔福特纲领的制定。这个纲领虽然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比起哥达纲领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恩格斯在谈到考茨基负责起草的纲领理论部分时指出：“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作者注）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① 1892年，考茨基又为纲领写了深入浅出的解说，阐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认为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入门书。

纲领从经济发展阐明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指出，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80页。

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旧存在，要想单单消除它的阴暗面，那是不可能的。它还指出，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创造着促使被剥削者为反对这种私有制而进行斗争的条件，使被剥削者的人数增加，力量增大；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

纲领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是他们的生存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们是阳光和空气。它反对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指出，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纲领强调，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因此，“使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统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①。

1902年，考茨基发表了《社会革命》。在这本由两篇演讲写成的小册子中，他试图阐明这样一个思想：革命是伟大的变革，但并非一切变革都是革命，而只有其中某些变革才是革命。他还

^① 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8页。

探讨了在未来革命中，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斗争将采取什么形式？这些斗争将在什么时候到来？那时可以供无产阶级使用的将是怎样的武器？以及其他有关问题。

关于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持的是当时社会主义者相当普遍的观点，即随着条件的改变，街垒战这种斗争形式已经过时。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武装起义、街垒战争和类似的武装事件，现在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1905年俄国革命后，当时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考茨基就从莫斯科武装起义及时汲取新鲜经验，修改了绝对否定武装起义和街垒战的观点。1906年，他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中提出：“我现在已经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少数人在街垒战中同大批军队相持了一个星期……谁能够肯定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形呢？”他这种对新事物的敏锐观察和修正旧公式的坚定态度，曾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

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问题。考茨基认为，战争已经屡次表明为非常革命的因素，它可能成为加速政治发展并且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手段。他指出，有时，由另一个阶级来取代统治阶级已成为绝对必要的事，但是统治阶级却善于使这一阶级始终处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如果这种情况维持得过久，整个社会必然衰退和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往往可以完成新兴阶级所不能胜任的任务。战争很容易导致对外的失败，并由这一失败引起内部的崩溃。战争使军队瓦解，从而推翻把军队当作最主要支柱的政府。因此，在其他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战争的确表明为促进进步的有效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指出，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希望通过战争人为地加速我们的前进。战争的破坏是如此巨大，战争的恐怖是如此可怕，今天恐怕只有军国主义狂人才能鼓起可悲的勇

气，冷酷地要求战争。不仅如此，从战争中产生的革命是革命阶级软弱的标志，它常常由于战争所带来的牺牲，以及由于战争多半会造成的道德上和智力上的退化，而成为进一步衰弱的原因。因此，从战争中产生的革命比较容易失败或者会过早地失去自己的推动力。

考茨基强调，必须努力设法使党的政策不要变成冒险主义的政策，不能指望在某一天通过一次袭击把社会专政拿到手中来。革命是一个或多或少地旷日持久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在艰苦的斗争中拉长成几十年。我们要学会等待时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是不会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有长期的和深刻的斗争，这些斗争已经并将继续不断地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第三节 在反对伯恩施坦的斗争中

政治立场的动摇 考茨基早期的理论著述活动，曾使他赢得很高的声誉。在恩格斯逝世后，他被人们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和理论权威。但是，当伯恩施坦从1896年至1898年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公然叫嚷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考茨基并没有起来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而是态度暧昧，躲躲闪闪，在立场上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

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许多党员要求大会对伯恩施坦的言论表示态度，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考茨基只是在讨论结尾时，才迫不得已地作了一个发言。他说：“我很不情愿发言，因为我必须同一个我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争论”^①。

^① 《考茨基言论》第32页。

在发言中，考茨基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退让躲闪，竭力调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他视而不见二者之间的原则分歧，认为：伯恩施坦给大会寄来的坚持顽固立场的《书面声明》是“把一系列根本不存在意见分歧的观点强调成特别必要的”^①。

伯恩施坦鼓吹议会道路，攻击德国党是布朗基主义者，想拿一场武装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投机。考茨基就辩解，伯恩施坦只是在同党失去接触后，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才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我相信，没有一个党员同志是这样想的。

伯恩施坦宣扬“中间阶级扩大论”，说什么发展并不象许多人假定的那么快，因为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考茨基就回避说，凡是在没有必要的地方，我想尽可能避免论战，否则我必须详细谈论职业统计和收入统计以及类似的东西，而党代表大会不是这样的地方。

伯恩施坦攻击危机和灾变理论，叫嚷突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现在起发展能够不经过大的突变，和平地进行。考茨基虽然指出，伯恩施坦所建议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德国和欧洲到处都酝酿着大的突变，但又天真地认为，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们中间，他会是第一个谴责这一道路的人，这是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考茨基把这场斗争当作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甚至是有益的讨论。他说：伯恩施坦的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把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②

^① 《考茨基言论》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35、40页。

实际上，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一些观点的危害性不仅认识不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内心赞同的。后来回顾这一过程时，他曾写道：“在1896年秋，伯恩施坦开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开始批判我们从前的某些观点，我起先对此表示极大的同感，把他的这种作法看成是恩格斯和我已经开始作的事情的继续”^①。正因为如此，当时他曾期望侨居伦敦的伯恩施坦加强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交往，在交往中统一认识。他认为应设法避免同伯恩施坦的任何一种决裂，甚至避免在理论上的分道扬镳。

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地、全面地修正。这本带有纲领性的修正主义小册子一出版，立即遭到广大党员的批判。在这个巨大的压力下，考茨基不得不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分，起来同伯恩施坦论战。他写了一些批判伯恩施坦观点的著作，如《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阶级斗争和伦理学》、《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可疑的社会主义》等。应该指出，这些著作对批判修正主义曾起一定作用。例如，1899年，列宁就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写了书评，1900年又同克鲁普斯卡亚一起把这本书翻译成俄文。

但是，这些著作存在严重不足之处。这就是仍然避而不去批判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问题的歪曲，在这些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政治意义的问题上，向修正主义让步。

伯恩施坦攻击政治起义或非法使用暴力，考茨基则辩解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自拉萨尔以来就主张社会革命和武装起义是不同的，并只在原则上争取前者。不仅如此，政治革命和武装起义也不能看成一回事。起义或非法的使用暴力在一切大政治动乱中可

^① 考茨基：《当代国民经济学说自述》，莱比锡1924年版第135页。

以构成一段插曲，一段很重要的插曲，但是它决不是革命本身。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党，他强调所谓革命，决不是“警察心目中的即武装起义意义上的革命概念”，社会民主党人也决不是“警察心目中的革命者”，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革命者”^①。他甚至提出，“革命”一词可能造成误解，如果没有切实的理由最好不要使用它。

伯恩斯坦歪曲马克思于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这段话曲解为：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考茨基在批判中，只是含糊不清地说什么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来说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至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真正思想的粗暴歪曲，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的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他却只字不提。

伯恩斯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考茨基在反驳中竟然说：“我不想发誓担保无产阶级和阶级统治非采取阶级专政的形式不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即使在那时，我们也用不着束缚住自己的手脚”^②。对此，列宁曾十分中肯地指出，这不是反驳伯恩斯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者，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③。

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了以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方面作

^① 《考茨基言论》第46、48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出了一个极好榜样”^①。米勒兰入阁事件在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00年9月，在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即社会民主党人能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以饶勒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拥护米勒兰的行动，宣称这是逐渐改变资产阶级政权性质，从而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新策略”的样板，并要求工人政党的领导人以此为榜样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些人以后被称为“内阁派”，是法国社会党中的极右派。以盖得和费利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把米勒兰的入阁斥为叛徒行径，认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就不是社会党人了。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考茨基采取调和的立场。他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折衷主义的决议草案。一方面指出，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另一方面又说，这是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出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他主张，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这个草案经修改补充后，在大会上得到通过。因为这个决议对米勒兰和饶勒斯等人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它遭到广大党员的反对，被人们叫做“橡皮”决议。

代表大会闭幕不久，考茨基又写了一篇题为《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的文章，为自己辩解。他仍顽固地坚持，关于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什么“关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能否参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在不同时候和不同的国家能够作出不同的回答”^②。因此，如果说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含糊的、橡皮性的，那么这不能归咎于回答者的思想，而是要归咎于问题的类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页。

② 《考茨基言论》第54页。

考茨基主张，代表大会必须在原则上拒绝对个别社会党的内部的策略性争论问题作出决定，因此，它不介入法国人因为米勒兰事件的争执。他还说，如果代表大会由于处理这一问题而被迫干涉法国的²事务，那么它这样做也只是出于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一的意图。至于他本人给予决议以这样的形式，除了理论上的考虑以外还有实际的考虑，那就是使它成为敌对的兄弟借以彼此接近以便就分歧点达成协议的黄金桥梁，而不是这一兄弟可以拿来打倒另一兄弟的武器。

由此可见，考茨基是把策略问题、组织问题同理论原则分裂开来了。米勒兰的入阁，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在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影响，也决不限于法国的社会党。围绕着这一事件展开的争论，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即无产阶级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需要通过革命。所以米勒兰主义就是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而反米勒兰主义的斗争则是反伯恩斯坦主义的继续。考茨基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既不能在理论上有力地反击机会主义，又不能³在组织上和叛徒决裂。这种“中派”的态度表现出他很大的动摇，是他堕落为机会主义的重要一步。

1905年俄国革命对考茨基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政治立场一度向左转，先后发表了几篇好的著作。1909年，考茨基发表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就是代表。列宁认为，这是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①。截止写这本小册子时，他是机会主义的敌人，只是在后来1910—1911年才转向维护机会主义，而完全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是在1914—1916年。在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正确地预言革命时代已经到来。

考茨基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正积极策划世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5页。

界战争，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将引起革命。从革命主观力量来看，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如此强大，以致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因此，“我们有各种根据认为，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①。他声言：那个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日益临近，政治停滞的僵局将被打破，充满斗争喜悦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沿着夺取政权道路胜利前进将要开始。

在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强调，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革命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革命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他有力地驳斥了种种机会主义论点，指出：有人认为，业已取得的成就，例如在保护劳动、工会和合作社立法上的进展，就足以把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所占据阵地排挤出去，并且不知不觉地剥夺他们，而无须乎进行政治革命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本质。这种从经济上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不过是反动的空想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旧词新唱而已。

他还指出：有人认为不通过革命，亦即不通过国家政权的急剧移手，而只借助于同靠拢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协同行动和建立联合政府，无产阶级就能够取得政权。这种论点同样是错误的，实际上，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矛盾，使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同任何有产阶级分享国家政权。有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总是要求而且必定要求国家政权继续镇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总是要求它自己的党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利用国家政权来支持它反对资本的斗争。这种情况最后必将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政府陷于崩溃。不仅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联合政府就要为这个政府镇压无产阶级的行动负责，这将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引起无产阶级对它的蔑视。

这本小册子还明确宣称：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革命的，就因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页。

为它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它承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它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革命，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

应该指出，在早期考茨基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著作中，已经不时流露出某些观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考茨基论述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经济发展将以其自然的必然性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到来是顺乎自然，是历史运动本身的结果，而不取决于人们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过份强调社会发展的强制性，把历史的必然性仅仅看作是一种驾凌于人民和社会各种阶级之上的经济力量，而没有看到它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活动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是片面地理解了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这种片面的和单一的决定论势必导致忽视人民群众的首创性和积极性，低估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例如，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他就流露出这种消极追随“历史必然性”的倾向，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的方法才能达到，但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实行这场革命，正如同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场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实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实行革命，所以我们也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方式实现”^①。

更为严重的是，考茨基在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主题的著述中，处处回避国家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例如，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完全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社会革命》和《取得政权的道路》这些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著作中，他到处谈论夺取政权问题，甚至认为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却仍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条基本原理，即打碎资产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第61页。

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并用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之。1871年巴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的新鲜经验，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①。正由于在这个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重大问题的错误倾向，考茨基终于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

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经济理论的批判主要是在《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一书中作出的。该书的方法论部分主要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的价值论。伯恩施坦认为，所谓劳动价值论和效用论都有它的道理，问题在于它们研究的目的各不相同。针对这些言论他指出，研究价值论的目的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提供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生产中，生产不是直接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出卖。买和卖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活动，谁要想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首先理解买与卖所依据的基本规律。考茨基进一步指出，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市场的变动情况就可以看出，尽管商品的价格由于供求的变动而不断波动，但它决不是任意变动的，而是具有保持一定高度的趋势。这种一定的趋势就是价值，它在交换活动中作为交换价值表现出来。所以价值决不是“纯粹的思维的事实”，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真实的客观事物。研究价值理论的基本目的只能是揭示调节着这种交换过程的基本规律。因此，伯恩施坦那种认为对于不同的研究目的来说，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并列，并且都可以是正确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伯恩施坦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先“在马克思面前恭恭敬敬鞠一躬，又通过在庞-巴维克面前恭恭敬敬鞠一躬来抵消”^②的不折不扣的折衷主义。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2页。

② 考茨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德文版第42页。

否定资本积累理论的正确性是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点，他正是从否定资本积累的一般历史趋势出发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的。考茨基在《伯恩斯坦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二部分用很大篇幅驳斥了伯恩斯坦在这方面的攻击。他指出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趋势的理论，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劳动（这种劳动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那么，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即通过资本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劳动协作的规模不断扩大，科学被日益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更多的土地被开发，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一方面是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则是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队伍不断壮大的并且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组成政党。它们的反抗日益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成为不可避免的。考茨基认为，以上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规律或发展趋势的概括。不言而喻，对一个数百年发展过程所作的高度概括的理解，必须是有

所斟酌的。资本主义外壳的炸毁、资本主义丧钟的敲响、剥夺者的被剥夺都应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理解，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瞬间即可达到的。这种前景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但它们到来时所采取的形式和速度却是不可预料的。因此，在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程度时，不是取决于历史在走向未来时采取什么形式和以多高的速度前进，而是取决于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否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相符。伯恩斯坦否定这个理论，否认历史是按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发展，理由有三条：（1）有产者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2）小企业并未衰落；（3）暴发全面性毁灭性的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考茨基认为，在伯恩斯坦提出的这三条理由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他说：“在这三条异议中，被伯恩斯坦摆在第二位看待的，显然应居首位。如果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只能直截了当地承认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加；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就必须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尽管资本在集中，而有产者人数仍在增加。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基本的事实。财产关系的形成则是表面上的，是从前一事实派生出来的。伯恩斯坦的方法的显著特点是：在研究基本事实之前，先对表面现象下判断。而我则宁愿先研究基本事实。”^①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也就从伯恩斯坦否认的基本事实——资本集中现象的存在开始了。

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在资本集中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因为他一方面说，就发展方向来说资本是在不断集中，因而它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理论又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忽略了许多对资本集中倾向起限制作用的因素。考茨基批判说，伯恩斯坦的这种要求，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因为理论要研究的是基本现象的诸规律，这样的规律必须从一切起干扰作用的现象中抽象出来。谁忘记了这一点，而要求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同

^① 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第49页。

表面现象直接相符合，那么他就会发现这种包罗一切表面现象的理论，必然是失去主线的混乱不堪的理论，永远也不会达到对事物的明确的认识。不过，伯恩斯坦不仅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某些抵消着马克思所阐明的基本趋势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马克思所阐明的基本趋势不可能在排除了一切反作用之后胜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有必要重新作一全面的考察，以检验资本集中理论的正确程度。不过考茨基认为，要证明资本集中理论的正确，反驳伯恩斯坦的谬论，并不困难。只需借助于伯恩斯坦几年前（1896年11月）在一篇题为《当前德国工业发展的程度》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就够了。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斯坦曾经明确地认为，当前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小企业发展为大企业，手工业式的企业发展为工厂式的企业，大工厂企业发展为庞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就是资本集中。接着考茨基便利用伯恩斯坦曾引用过的德国工业调查统计的数字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理论的正确性。考茨基在证明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因而也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和生产集中的规律。

他首先根据1895年统计资料中的关于按职业类别来划分的就业人数的变动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扩大。按照这个统计，1882年业主与雇员的比例是一比二，而1895年的比例是一比三。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13年的时间内，德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雇佣工人的比例增加了许多。但这种平均数字掩盖了许多真实情况，它仅仅能说明全国居民中从事工业的人口的外部划分的情况，却不能说明工业内部的与生产范围和性质有关的全部真象。为了弄清这一真象，我们还需要工业部门内部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的资料。

考茨基为了把对德国资本集中情况的分析继续深入一步，他引用辛茨海梅尔的《关于德国大工厂企业继续形成的界限》一书

提供的资料证明，1882年大工厂工业的产值才占全德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而1895年即已占到三分之二，只要不是故意闭眼不看现实，那就不能不承认这说明资本是在迅速地集中。这种情况不仅在各类工厂的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中可以看出，他还列举了详细的数字说明，这种变化还可以从按所雇工人人数划分的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增长的情况，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以及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所雇工人人数在全国职工总数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考茨基指出，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时，还必须注意到资本集中的进行在各个行业中是不平衡的。大企业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领域，把小企业从这些领域排挤掉。但这些小企业主并不会因此而全部沦为无产者。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从这一种行业被排挤之后，将会转入另一行业中去，所以小企业存在的领域虽然越来越窄，但小企业的总数未必就减少。因此要全面而真实地反映资本和生产集中的情况，就必须作更详细的分析。如果以1882—1895年为例可以看出：德国工业资本集中最厉害，它的小企业不仅相对说少了，绝对量也更少了。在商业等行业中，资本集中的现象虽然发展得较慢，但也确实发生了集中，这主要表现在即便是在这些行业中，大企业较中、小集企业发展也快得多。考茨基在这里指出，在零售商业和饮食业中小企业增加是相当快的。甚至比人口增加得更快，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小企业具有生命力的标志。而是它衰落瓦解的产物。小商贩业，小饭店业，房间出租业等诸如此类的行业大部分成了破产者的栖身避难之所，它们除了利用丈夫的劳动之外还利用妇女的劳动力。在这种场合，这些行业更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①。另外，以上小企业增加的数字仅仅是反映了一部分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更为深刻的某些表面独立的小企业在经济上对大企业的依赖。这种依赖

^① 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第64页。

关系恰恰是在那些小企业占优势的行业中最为明显。在这里，往往是一个大资本家可以使许多小的“独立”的家庭工业企业为自己服务，在经济上依附于自己。在商业及饮食业中也有这种情况。饭馆业越来越依赖于酿造厂，它们不仅控制着饭馆啤酒的供给，而且往往还供给全部货物。啤酒馆、餐馆日益成为酿造厂的直接财产，而店主则变成了酿造厂的承租人。

通过以上分析考茨基断言，伯恩斯坦说马克思错误地片面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图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曾经有过一种理论得到了光辉地证实的话，那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德国工业统计资料确凿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

考茨基写作《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时候，正当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候。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看到了这种发展，并能比较正确地指出，新时代的某些特点。他在该书驳斥伯恩斯坦时指出，马克思的某些个别论断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对整个现代生产发展趋势的预测却得到了光辉地证实，特别是当卡特尔、托拉斯出现以后，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早在商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在商业领域里出现了靠驱逐竞争者或用囤积商品来排斥对手的垄断的企图。但是，在工业生产领域中排除竞争，即通过把一切企业组合成一个唯一的组织而实现对整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则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普遍发展起来，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意义。今天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它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支配者，“自从金融寡头产生以后，他们曾一直使政府依赖于他们——借助于国债，但是现代的金融大王则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来直接支配了全民族，使全部生产都服从他们。特别是一切大工业的基本条件——煤和铁——的生产者，他们的联合组织越来越决定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以及全部

经济生活”^①。为了对某些卡特尔进行斗争，那些依赖于这些卡特尔的工业又组成了新的卡特尔，这种斗争往往会迫使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各自联合成单一的巨型企业。如大的炼钢厂企图通过自己拥有矿山来摆脱煤炭卡特尔的控制。一方面是同一种类的企业卡特尔化或托拉斯化，另一方面是不同类的各式各样的企业集中于某一资本家或资本集团之手，这就是我们经济生活中最具有特征的现象。卡尔·考茨基说：“卡特尔和托拉斯最好地证明，马克思的集中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不是片面正确的，它提供了关于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完全如实的图景。但是，伯恩斯坦在批评集中理论时连微不足道的菜园地和最小的缝纫女工都不放过，而同时对企业主联合却噤若寒蝉，避而不谈，而企业主联合是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除了农业危机之外，经济生活中产生的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对于任何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为己任的人来说，对这一最重要现象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②

伯恩斯坦认为股份公司的发展妨碍了资本和生产过程的集中，使“有产者”人数增加的论断也是没有根据的。考茨基指出，“在这个不讲情面的世界上，股票不是赠送的，而是供出售的。股票并不仅是带来金钱，而是以有钱为前提。股份公司的成立，并没有使现有的资本分配发生任何改变。股份公司的形式只不过干了储蓄所和银行也能干的事，它使少得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小额资金变成资本。因此，股份公司的形式增加了可供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数额，这种形式或许可把那些本来没有变成资本而只作为不生利的、暂时不用的财富变成了资本，不过这种形式丝毫没有改变现有财产的既存的分配状况。”^③

股票不能改变现有财产的分配状况，它不是使无产者变成有

① 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100页。

产者的手段。因而它决不会妨碍资本的集中。相反，它会加速资本集中的过程。因为股票虽然不能使无产者变为资本家，它却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和上层无产阶级的区区积蓄引诱到资本家的口袋里去。所以说，“如果股份公司的形式是用以诱捕飞鸟和拔去羽毛的绝对手段，那末另一方面，它又是使大资本家获得新的权力手段，因为它恰恰是信贷的特殊形式。信用不仅本身是竞争中的强大武器，而且它可以凭借着无形的条条绳索把那些大量的分散在社会上的小额资金，拉进单个的或组合起来的资本家手里。它是专门用于集中资本的特殊机器。”^①考茨基指出，他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美国美孚石油托拉斯股金的额面价值总共为9725万美元，洛克菲勒共拥有4900万美元。可见他支配的资本两倍于自有资本，从而使他获得了两倍于自己经济实力的权力。所以股份制不仅不会妨碍资本的集中，反而是一种加速资本集中的手段。有了股份制，才有可能建立起单个资本无法建立的规模庞大的企业。

与对伯恩斯坦否认资本积累理论的批判相联系，考茨基还批判了他否定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考茨基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贫困化”这个字眼就象“崩溃论”、“灾变论”一样，也不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来自批评他们的那些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只是说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工人阶级“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剥削程度”在日益增长，“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如果把马克思的这种论述就叫作“贫困化理论”，那么它有三方面的含义：

首先，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可以理解为互相对立的两种趋势，一种是力图压低无产阶级的趋势；另一种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趋势。这两种趋势的对立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

^① 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02页。

级被竞争所驱使要不断压低工人的地位,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降低他们的工资;增加工人的依赖性等等;另一方面,被奴役和被压低的,但又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联合起来的工人,必然要奋起斗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由派经济学宣称无产阶级贫困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初期的暂时现象。这不对,暂时的、在一定时间内必然会消失的现象仅仅是贫困化趋势的某些后果,而不是贫困化本身,贫困化是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只能用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它消失。因为竞争和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本家要不断节省各项生产成本,其中包括劳动力的成本。可见从一种趋势的意义上来讲,关于无产阶级的贫困、奴役和奋起反抗的增长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所谓贫困化这个词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物质上的贫困,另一种是社会性质的贫困。前一种意义上的贫困是用生理上的需要来衡量的。如果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就可能站不住脚”^①。因为恰恰是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物质贫困是在减退,工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是比50年前提高了。不过这种提高是十分缓慢的,同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不适应的。如果我们不是从物质贫困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从社会意义来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贫困在不断地加剧。因为劳动生产率正在异乎寻常地迅速地提高着,工人阶级愈来愈被排挤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进步之外,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提高得比无产阶级快得多,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显然,对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应从后一种含义上来理解,因为作为社会理论的贫困概念,首先应当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在从社会意义上来考察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时候,还必须看到童工、女工增加这一方面,这是工人阶级贫困日益加甚的确凿无疑的征兆。这种现象虽然不一定表明无产阶级的物质贫困日益加剧,但它毕竟表

^① 考茨基:《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16页。

明单单用男工的工资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工人家庭的需要了。只有在男人的工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小孩的情况下，才会使妻子和孩子到工厂去做工，以帮助赚钱。而妇女和孩子参加工作又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第三，对马克思所说的贫困化不仅应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状况来进行考察，而且还应从全体人民来考察。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多和它在全体人民中的比例的上升，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奴役及其贫困的加甚，必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经济状况，引起了社会的贫困和物资匮乏。独立小企业主越来越多的沦为无产者，陷入贫困境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靠不断扩大其领域才能存在，因此这种社会贫困化的过程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时才能结束。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具有压低雇佣劳动者和其他人民生活水准的趋势。从而不断引起新的贫困。但是，贫困化的趋势也发展了力求限制这种趋势的斗争。经过斗争工人阶级有时也可获得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所以日益加剧的不是物质贫困，而是社会贫困。换句话说，每个工人获得的产品数量可能会增加，但他们所获得的产品在社会产品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却可能在减少。

联系着对伯恩施坦的“有产者”增加的理论，考茨基还谈到了所谓新的中间阶级的出现及其基本特点等问题。他指出，伯恩施坦有时实际上是把“有产者”增加的问题看作是构成中间阶层的那些居民阶层在增多。伯恩施坦如果是把这个问题仅仅理解为：中间等级不会消亡，而只会由新的中间等级代替旧的中间等级，由“知识分子”来代替独立手工业者及小商人。如果真是如此，那末，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他是正确的。这一居民阶层增加的基本原因是由于：统治和剥削阶级愈来愈多地把他们自身的职能移交给受雇佣的知识劳动者。这些人如不按计划方式（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就是按固定薪金出卖他们的劳务。起先这些人仅

仅是资本家的助手，资本家把自己职能的一部分如监工、组织劳动、购买原材料及销售产品交给他们去办理。但是，随着水平的提高，各项职能要求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日益提高，资本家已不能胜任这些工作，而股份公司的建立又使他可以完全摆脱这些具体事务，有时甚至连企业的最高领导权都可移交受雇佣的人。毫无疑问，股份制度有助于增加薪资优厚的职员的人数，从而促进了这个中间等级的形成。不过伯恩斯坦把中等收入的人的增多同有产者的增多混为一谈则是完全错了，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他认为股份公司造成了资本的分散而不是资本的集中。

考茨基认为，新的中间等级同旧的中间等级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兴起的。旧的中间等级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他们构成了私有制的坚固堡垒。新的中间等级形成的基础完全不同，他们多半没有任何私人的生产资料，他们是作为独立的劳动者，作为“脑力劳动者”而出现的，他们是雇佣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当然，如果把这些新的中间阶层干脆一概算作无产阶级也是不对的。新的中间等级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的，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同资产阶级发生着联系，其生活水平也同资产阶级不相上下。有许多知识分子担当的职业原先就是资本家自身担当的。如企业的经理和中下层领导人员。只是由于他们接替了这些职能而使资本家成了多余的人。但是，在他们接替资本家的这些职能的同时，也接受了资本家的思想和意识，接替了资本家同无产阶级的对立。不过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之间最普遍的对立在于，建立在教育特权基础上的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使他们构成了一个有特权的阶级。只有在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高级生活水准才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必然的伴随现象。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则不会把无产阶级分子提高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准。相反，它必然要把“脑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准降低到同无产者接近。所以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知

识分子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相继无产阶级化了。“知识分子”增加得越迅速，新中间等级内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也就实现的越快。

新的中间等级同旧的小资产阶级相同，他们的社会地位都具有两重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和不坚定的。他们一面对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感到气愤；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的粗鲁举动也会感到气愤。今日他们会大声疾呼保障人类尊严；明日他们会为了保障社会和平从背后袭击无产阶级。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可憎恨的，宣扬要消除阶级斗争。对他们说阶级斗争就是叛乱，他们要用社会改良使革命成为多余。所以如果要知识分子完全为无产阶级出力是不可能的和太过分的，但干脆把他们看作“有产者”，就更加谬误了。在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各种矛盾都有表现，但是，在这个小天地里，也正如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无产阶级的成分正在日益增多。考茨基说：“知识分子新中间等级的增长正如个别工人阶层的物质利益增长一样，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无论前一现象或后一现象，都与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日益加甚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学说并不矛盾。”^①考茨基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是很有创造性的。这些分析对我们理解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及阶级斗争的趋势都是有启迪的。

否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普遍倾向。其中伯恩施坦强调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形成，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因而使得它可以避免危机，而伯恩施坦的俄国追随者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则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协调机制，用否认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来否定普遍危机的可能性，只承认局部的结构性的危机。考茨基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进行了批判。但是，由于他没能完全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因而在批

^① 考茨基，《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35页。

判中也暴露出许多缺点甚至错误。

伯恩斯坦否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首先是从机械地强调危机并不总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有规律地每十年出现一次，因此他认为，周期性的危机并不存在。对此考茨基回答说，每十年一次的危机周期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仅仅是对经验事实的确认。马克思不是发明了危机的周期，而是观察和说明了危机的周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危机一定会每十年重现一次，而在于危机是否会定期重现。对后者考茨基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指出，危机的因素一开始就存在于商品经济之中，商品生产是彼此无关的生产者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体制中的调节因素是价格的波动。如果生产大于需求，价格就下降。如果生产少于需求，价格就上涨。因此不能按生产价格把商品卖出去是商品生产必然会定期发生的现象，恰恰是这种现象构成了危机的基础。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酿成真正的经济危机还需要其他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危机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把整个社会生产都越来越变成商品生产，从而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的生存都依赖于自己生产的商品毫无阻碍地得以实现。这时，由于社会分工和信用的发展使各个生产者彼此的依赖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以致任何一处商品滞销就会相应地引起别处的混乱。可是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狭小的地方市场变成了巨大的世界市场，介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的数目日益增多，生产者愈来愈无法通盘了解市场情况。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信用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了更大的伸缩性和跳跃发展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消除危机，因为需求任何较大的提高都会导致生产极迅速的扩大，以致很快便超过了需求，造成生产过剩。最后，竞争已使生产的不断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存在的条件了。但是，扩大生产的条件是市场的相应扩大，不仅物质需求扩大，而且经

济的需求，即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要相应扩大。这样就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压低工人唯一商品——劳动力的价值的趋势发生了矛盾。不断扩大市场是资本家的最大难题。此外，市场的任何扩大都会对生产起促进作用，驱使生产陷入过剩和危机。反过来，任何危机又会十分有力地促使资本家争取新市场。当市场再也不能以生产扩大的那种速度来扩大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不可救药的绝境的时刻就到来了。只要经济发展下去这种状况就会出现，因为国内外市场终究是有限的。当然这个极点，这个限度，不是僵死的，而是有伸缩性的。但是路子越走越狭窄却是必然的。世界资本主义增长的速度是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世界市场则很难长期相应地扩大。一旦市场扩大的可能性丧失殆尽，人民群众就将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

从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把危机的根源单纯归结为生产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与消费市场的有限性的矛盾。而没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说明这一问题。这当然是严重的理论缺陷。

为了批判杜冈·巴兰诺夫斯基，考茨基首先简单地概述了马克思对消费不足与危机关系的论述。这一方面是因为，杜冈完全否定消费不足与危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有另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危机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

考茨基正确地指出，消费不足是以往阶级社会中存在过的普遍现象，但是由此而造成生产过剩危机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只有在为出卖而生产的地方，才可以由生产过剩形成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由于商品生产的出现，生产过剩这个概念本身也具有了新的含义。以往，生产过剩是同生产超出已有的消费可能性相联系。现在，在商品生产产生以后，不论居民的消费是否已真正全部满足，凡生产超过占有货币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生产过剩。这种过剩是一个十分相对的概念。消费不足

不应从生理意义上理解为营养不足，而应在社会意义上理解为一个阶级的消费落后于它的生产。不仅是在生产不变或增长时限制消费会导致消费不足，而且在消费不变，甚至增长，但这种增长较生产的增长更为缓慢时，也会导致消费不足。

从罗伯特·欧文起许多经济学家都把消费不足看成是危机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消费不足只是危机的“最后原因”，而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因为周期性的危机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而群众的消费不足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对立存在时就已经存在。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剥削几乎只是为消费的目的服务，向劳动者勒索来的东西完全被挥霍掉。由社会原因产生的生产过剩在这里根本谈不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直接为了市场。在自由竞争中，在市场上获胜的是生产成本最低，售价最便宜的人。在这里技术的提高和机器的改进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工业资本家就不能将全部利润都消费掉。他们必须限制自己的消费，增加积累，增加资本，不断采用新技术，以便保持竞争能力。这就必然会导致生产资料的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被剥削者的消费不足现在不能再通过剥削者消费的相应增长而得到补偿。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生产过剩的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说考茨基以上的阐述基本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那末在以下的分析中他便走入了歧途，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浪漫主义的泥坑中了。他说：“资本家和被他们剥削的工人，随着前者的财富和后者的人数的增多，提供了一个虽然不断增长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并不象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得那样快，它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消费资料并不够用。资本主义大工业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域外。在还没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职业中寻找补充的市场。它找到了这个市场，并且也日益扩大了这个市场，但是扩大得不够迅速。因为这

个补充市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和扩张能力。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变成了发达的大工业……它就有可能这样飞跃地发展，即在短期内超过任何市场的扩大。因此，每一个随着市场的显著扩大出现的繁荣时期，从一开始就被决定是短暂的，危机是它的必然结局。”^①虽然考茨基强调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但这是完全不真实的。这是西斯蒙第的看法，而不是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国外市场，但这决不是因为商品的价值无法实现，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获取更大的利润，争取更高的利润率。考茨基的这个错误观点在当时马克思主义队伍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显然，卢森堡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错误是受到了考茨基的影响的。

杜冈的错误不在于把危机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是在于他完全否认这个矛盾的存在，他认为危机的原因不是由于消费不足，而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在于它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部门必然相互处于一定的比例当中，对这种比例的任何明显干扰都要引起停滞，造成危机。因此，普遍危机的发生并不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普遍过剩，只要有一个部门生产的发展超出比例所决定的范围，就会干扰整个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普遍的危机。考茨基认为，在杜冈的这些观点中无疑是存在着某些真理。如导致普遍危机并不需要普遍的生产过剩，只要有一个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商品（以前是纺织品，后来是钢铁工业和加工工业）生产过剩就可能诱发普遍的危机。生产各部门间的比例的破坏可以成为危机的原因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应注意的是，比例的破坏不仅会由生产过剩引起，也会由生产不足引起。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无计划性与危机的联系，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的加剧是危机的先决条件之一，有时它也能单独

^① 考茨基：《危机理论》，《新时代》杂志1902年第4期。

引起危机或会使普遍危机加剧。马克思主义者否认的是把它作为危机的唯一的原因；否认的是，他不承认消费不足是危机的最后原因。考茨基认为，杜冈否认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理论是荒谬的，是一种“怪论”。因为杜冈完全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联系，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对独立弄成了绝对的独立，弄成了完全无关。他荒谬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对商品的需求并不受社会消费的总量的影响，社会消费总量可以下降，而同时对商品的社会需求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必然要导致限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同时使对商品的社会总需求提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和在商品市场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工人与机器相比退到了次要地位。与此同时，由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所形成的需求与由工人消费形成的需求相比，前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后者退居次要地位。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机制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自为存在”的机制的形式，在这种机制中，人的消费表现为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一个简单要素。对于杜冈的这种“怪论”考茨基反驳说，生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为了人的消费而进行的。不错，直接供人消费的产品在生产在总生产中的比重在不断减少，而直接、间接向它们提供工具、机器、运输服务的生产却在不断增加。但不管这些生产部门的产品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才能最终成为人们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不管它们为人的消费服务是多么间接，但生产人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始终是它们最终目的。并且只要这个最终目的不能实现，这种生产活动最终就必然全部停滞。考茨基指出，在国际分工中，情况更复杂一些。个别的老的工业国为个人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往往扩大得很慢，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却发展得极为迅速，生产资料的生产对整个国家经济脉搏的跳动具有更大的决定性的意义。谁只是从有关国家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容易得出这样的看法：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长时期的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前者不受后者的约束。

但这是一种偏见，如果说英国纺织机的生产比纱的生产快得多，那么这必然是因为在英国以外建立起了新的纺纱厂，而这些新厂所使用的机器正是由英国供给的。如果纱的销售发生困难，就必然会影响到新厂的建立，从而影响到纺织机的生产。因此考茨基说：“生产就是供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个事实只能被分工的进步所掩盖或限制，但不能被消除。”^①

从以上可以看出，考茨基在批判杜冈的危机理论，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实现理论时，虽然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但存在着严重缺点。缺点之一在前面已经提到，即他在说明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商品实现的意义时，陷入经济浪漫主义的泥坑中；其次，考茨基在探讨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时，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为了批判杜冈否认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错误，这样作是必要的。但是，他却忽视了对危机形成的根本的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述，更没有说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及信用等发展这一矛盾的尖锐化。因此，他没能全面正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驳斥小农经济稳固论，阐述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 按照考茨基本人的说法，他很早以前就对土地问题很感兴趣，并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9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普遍关注并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使他又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并于1898年出版了《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和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概述》。19世纪90年代末，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这本重要著作，就是当时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写出来的。列宁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认为“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现在考茨基用他的巨著（共450页）填补了这个

^① 考茨基：《危机理论》，《新时代》杂志1902年第4期。

空白”^①。

在这本书中，考茨基针对着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随便从资产阶级的统计材料中拣拾一点支离破碎的材料来为其修正马克思主义作论证的错误方法指出，为了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采取那种从浩翰的各种资料中随手拈取一些事实的作法是不行的。要揭示规律，就必须占有长期积累起来的大量统计资料和描述性的资料，把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而把其中的各种经济现象作为构成整体的一个局部来加以考察。在现实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但它决不是现存的唯一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的农村中，我们一方面“还可遇到保存到现代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另一方面，在国家或公社经济的某些形态与协同组合内，已经发现新的较高的生产方式的萌芽。”^②因此，要想研究支配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就不能不作全面的研究。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看见，在农村小生产并没有很快消灭，较大的农业企业只是缓慢地占有那些小生产不得出让出的地位，便得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不适用于农业的结论，是不行的。这种理论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抓住个别现象，援引个别事例，根本不想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制度的全貌以及同资本主义农业最近的基本趋向联系起来。另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又是同工业紧密联系着的。农业虽然不是沿着象工业一样的模型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虽然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但农业的发展绝不是同工业的发展完全对立的和互不相容的。恰恰相反，它们两者是沿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它们彼此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一过程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因此要综合加以研究。总之，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农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研究资本是

^①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否掌握了农业，假如掌握了，那么是怎样掌握的。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和非资本主义农业形式在现代社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必须阐明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同纯资本主义形式的农业的相互关系。

基于以上的认识，考茨基确定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是宗法式的和封建的农业经济。因此他对农业的这些形式作了精确的说明。他指出，中世纪的农村经济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公社，它不仅生产自己消费的食物，而且会自己建筑住宅，自己制造家具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城市工商业所排挤，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革的第一步。不过这种变革遇到了农民经济的顽强抵抗。只有强大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才能迅速地排挤农民的家庭工业，使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迅速瓦解，才能用铁路邮政等发达的交通网络把极偏僻的地方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过程。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都使农民对货币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更使农民痛切感到货币的缺乏。农民用以获得货币的唯一方法，就在于把自己的产品转化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不言而喻，他能迅速找到买主的产品，并不是他的落后的手工业的制成品，特别不能是那些同样为城市工业所生产的更为精良的产品。而是城市工业所不能生产的那些农产品。所以农民起初虽然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从事手工业劳动，但他们却必然越来越变为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民对市场的依赖越陷越深，而市场比天气更难掌握和预测，更加不可靠。市场上的危机对于农民不仅带来暂时的贫乏，而且能从农民手中夺去他的生活源泉——土地，最后完全使农民和土地分离，使农民变为无产者。当然在这种分化过程中，也会有少数农民由于某些优越条件而富裕起来，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范围，雇佣工人，从而上升为农村

资产者。这是同一个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造了对雇佣劳动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促成了他们的出现。这样剥削与被剥削者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便侵入到农村，甚至侵入了农民家庭之中。从而破坏了它们之间的和谐和利益的共同性。但是，至此这个过程并未完结，它还在继续发展、继续征服新的领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自给的农民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加强农民对货币的需要，用雇佣劳动来代替家庭劳动。总之，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已使农村经济基础发生了革命的变革，使资本主义逐渐侵入农村当中。所以资本并不是把它的势力局限于城市工业。资本一旦充分加强起来，它便使农业屈服于自己。

现代农村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特征，不过在农业经济中，这些特征都具有特殊的形式。为了说明这些特殊性，考茨基“对马克思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学说作了简明通俗、然而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①。接着考茨基便考察了资本集中规律在农业中作用的特殊形式。他指出，在农业中同在工业中一样，资本集中的规律也在发挥作用，只是形式有些不同罢了。从形式上看，在农业中，小生产似乎是十分稳固的，但这绝不能说明小农业在技术上是合理的。实际上，这种“稳固”是由于小农拼命干，比雇佣工人干更多的活促成的，同时，也是他们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一般农民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造成的。如果从技术上说，那么大农业生产，如同大工业生产一样，远远优越于小农业生产。考茨基说：“农民经营能够对抗大经营，不是靠自己的高度的生产能力，而是由于自己的极低的需要。”^②但是小农的非人的营养状况，正如他的超人的勤劳一样，并不能证明小经营的优越。相反，两者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80页。

^② 考茨基：《土地问题》第125页。

都只能说明小经营的落后性和两者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农业中资本的集中不能像工业中那样发展还有另外一些原因：第一，在农业中排挤小生产者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土地面积有限；第二，购买小块土地联成大块土地非常不容易；第三，在农业集约化的条件下，农户土地面积的缩小和所得产品的增加有时是相辅而行的；第四，完全排挤小生产，对于大地主也是不利的，因为它们需要小生产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长工或短工。所以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往往以各种法令形式来扶持小农。大农场和小农户的关系愈来愈近似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因此，考茨基说：“在近代社会中大地主消灭小地产或完全排挤小地产是谈不到的。我们已经看见在土地所有权集中进行得很远的地方，就有碎分的趋势，国家和大地主自己都帮助它，如果这种趋势碰到太大困难的话。”他又说：“这里小经营从生产产品的卖者变为大经营‘生产得过多’的生产产品的买者；小经营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正是大经营所特别需要的那种生产资料——劳动力。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地方，大的农业经营和小的农业经营，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约，像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者一样，——而且小农经营者也就更加具有后者（无产者）的性质。”^①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资本集中规律的作用虽然遇到了种种阻碍，它还是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这一点最突出地反映在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上。自然经济的瓦解，农民家庭工业的破产，迫使那些不能为自己和家庭生产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农民外出谋生。因为他私有的农业经营只是在一年之中的某些时间才需要他的全部劳动力，在其余的时间内，他是以出卖剩余劳动力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货币的需要。这样的农民明显地带有两重性

^① 考茨基：《土地问题》第199页。

质。作为一个小土地所有者，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和家庭生产生活资料，他不是为市场而劳动，可是，另一方面，当他出现在劳动力商品市场上的时候，他就完全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经济、政治愈是向前发展，农民对货币的需求愈多愈迫切，他就更为重视外出谋生而忽视自己的农业。这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外出谋生的农民，多半都要寻找自己熟悉的农业劳动。可是农业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很不固定，有时候，如在收获季节，需要大量雇工。但恰恰在这些小农最容易为自己找到农业工作的时间，他自己的经营也特别需要劳动力。这就迫使他不得不越来越忽视自己的农业经营，愈来愈觉得自己的农业经营过大，不得不将它缩小。他可以很容易地为他所不需要的小块土地找到买主。不过这种小农业很难以消灭，因为这种小经济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论怎样无利益，但这毕竟是他不用去服从别人意志和避免剥削的唯一领域。所以他会像他的妻子牢牢地抓住可怜的家庭手工业不放一样，牢牢地抓住它。这样就在农村出现了一种土地愈分愈碎的趋势。

可见，农业的发展变化是极特殊的，它和工业及商业发展有许多不同。在农业方面经营集中的倾向并没有引起小经营的完全消灭，在集中发展到极度的地方，却发生着相反的倾向，集中的倾向和碎分的倾向相互交替，甚至两种倾向可以一同发生作用。小农业经营的数目虽然增加，但它们的所有者是以无产者的资格出现的，是以商品劳动力的出卖者的资格出现在商品市场上的。他们的私有土地只能在商品生产范围之外，在为家庭经济生产的

由于这些小农业经营者同时又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同工业无产阶级有着利害关系，并不会因为他是土地私有者而同无产阶级处于敌对的地位。占有土地使这些小农业经营者可以摆脱粮食商人的盘剥，但不能使他避免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剥削。在达到这种发展阶段的地方，小农业经营数量的增加，只能成为无产者家庭经济增加的一种特殊形式，此种增长是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增长并进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资本集中规律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特点。

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近代农业的基本特征，阐明了它的资本主义性质之后，便进一步论证了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短暂性。资本主义愈向前发展，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性农业所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这种困难首先来自于地租的提高。资本主义的土地租佃制，使资本家可以把购买土地的资本节省下来全部用于经营农业生产上，因而有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租佃制也有其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农业资本家最关心的当然是如何使土地在租佃期间提供更多的收入；可是他并不关心这种收入的经常性，他要在租约到期前尽量掠夺土地的肥力，从而使土地恶化，变得更为贫瘠。其次，由财产继承权而来的遗产的分配是土地所有权集中的最大障碍，它使土地所有权不断分碎。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着农业经营的合理化。第三，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也是造成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剥削表现在农村所创造的很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及利息的形式流入城市。只有很小一部分在农村被消费或积累。因为银行、信用合作社这样一些信用机构，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城市的；由于农村同城市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地主大部分地移居城市。另外货币租税的发展无疑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进步，但同时它又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求，从而使他们又落入商业资本的盘剥当中。第四，城市工业的发展不断地从农业方面将一些最强壮优秀劳动力

夺走，因而使农村感到劳动力严重不足。促成欧洲农业衰退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国、阿根廷、印度、俄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输入的大量的廉价粮食。不过农业的衰退并不是说农业会毁灭，而是说它将被一种更高级的农业形式所代替。考茨基说：“大农经营所占的极大的土地面积，大农经营的更加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租佃制与抵押制的发达，农业的工业化，这就是替农业生产社会化准备基础的诸要素。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一样，不可避免地要从无产阶级未来的统治中发生出来，它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更加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①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堕落

如果说在反伯恩斯坦斗争中考茨基的某些机会主义思想虽然已经暴露出来，但他基本上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那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则已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滚到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了。“超帝国主义论”就是他背叛理论的集中表现，同时又是他全部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掠夺农业地区的政策
考茨基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发表的《帝国主义》、《两本重新学习的书》、《再论我们的幻想》及《帝国主义战争》等著作中，完全背叛了自己在反对伯恩斯坦斗争中曾坚持过的认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是资本集中合乎规律的发展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反对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反对把它看成是，由于资本集中高度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垄断阶段；反对把帝国主义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主张帝国主义只是指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意图。他说：“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

^① 考茨基，《土地问题》第355页。

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考茨基的这个定义是错误百出的。这个定义说，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又是十分不够的。因为从政治方面来说，帝国主义不仅是力图兼并，而且是力图通过使用暴力和建立反动的统治来达到兼并的目的。这个定义的经济方面就更加错误。首先，考茨基把帝国主义完全看作是工业资本发展的产物就是不对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正是金融资本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列强从19世纪80年代起特别加紧了对殖民地的兼并。其次，把帝国主义仅仅归结为对农业地区的兼并也是不对的。因为帝国主义不仅要兼并农业区，也要兼并那些工业发达的地区。如德国兼并比利时，法国争夺洛林。因为当世界即将被列强瓜分完了的时候，为了扩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另外，争夺土地不仅是为了自己扩大地盘，而且也是为了削弱对方，摧毁对方的霸权地位。

考茨基是从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入手来论证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不过他不是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出发，而是从各生产部门的比例着眼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为了使社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保持适当比例。考茨基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意见无疑是对的，但是，为了加深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比例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为了加深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是如何一再达到平衡的规律性的认识，就必须根据产品的物质特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作进一步的区分。他认为，除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分之外，还要加上工业和农业的区分。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业活动同农业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工业活动是农业活动的一部分，单个的经济机体既是工业性的又是农业性的。当然，这时机体的各个成员之间可能已有分工，一批人主要照料牲畜，另一批人耕作，第三批人纺织，还

^① 考茨基：《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页。

有一批把木材、金属加工成工具。只是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的优越性日益显露出来的时候，工业和农业才逐渐完全分开。但是，就在这时，要保证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能够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也需要农业对食品和原材料等的不间断的供应。所以“农业（林业包括在内）永远是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工业活动有可能进行以前，农业必须先提供必需的食品和很大一部分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完全可以（至少是在原始条件下）在一个时期内不需要工业，但是工业却永远少不了农业。即使是在工具和农业劳动者的服装不更新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过程也可以按照向来的方式很好地继续一个时期。相反，一旦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哪怕只是暂时停止，工业生产过程就要停顿下来”^①。为了使工业生产者能够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源源不断地取得原料和食品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但是，这种比例却经常有被突破的危险。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乡村人口外流，夺取了农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城市中集中了科学技术力量，从而使工业生产力易于提高。工业产品有比农产品增长更快的趋势，因而造成了工农业脱节的可能。但是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由于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缓慢，所以这种脱节的可能还很少成为现实的危险。

工农业脱节的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方成为现实的危险。具体讲来，造成这种危险加剧的原因是：

第一，随着资本家总利润的增长，资本积累也相应增长起来，然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在农业中远没有在工业中那么大。这不是说农业资本家和大地主聚集资本的可能性比工业资本家小，而是指，由于一系列的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使得即使是由农业资本家积累起来的资本也不一定完全用于农业。它可以以股票的形式投入工业和运输业。

^① 考茨基：《帝国主义》第5页。

第二，农业从事的是活的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不能像工业那样，可以通过增加投入的劳动来随心所欲地扩大，而工业，只要有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能不断扩大。

第三，在农业经营中，要增加工人的数目比在工业经营中困难得多，因为工业摆脱土地束缚的程度比农业大得多。在经营方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在扩大个别农业经营的规模的同时，增加经营农场的数目，增加整个农业工人的数目是根本不可能的。反之，在工业中，即使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工厂的平均规模、工厂的数目以及被雇佣的工人的总数完全可以同时增长。

第四，技术的发展对工业的影响同对农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工业中，技术的提高所引起的工人人数的减少，是相对的，而在农业中，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农业工人人数的减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

最后，农业的大宗产品远较工业为少，品种也远没有工业那样多，因此，竞争对于生产的促进和技术提高的作用对农业比对工业要小得多。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比农业中资本积累快得多。资本越积累，农业越落后于工业；而工业的发展，工业人口的增多要求更多的粮食和原料。情况的发展对工业越来越不利。工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相应地增加自己的产品和人口，要求农业人口购买和消费更多的工业品。但这种情况怎样才是可能的呢？因此，一个城市、一个工业区或者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如果仅仅局限于在它当初萌芽时的那个地区活动的话，那么资本积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和规模非常狭小的。只有当为工业服务的那一农业区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工业中的资本积累才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资本主义才可能得到自由地发展。所谓帝国主义就是这种由于工业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不断扩大为自己服务的农业区域的意图。

考茨基以英国同其所属的殖民地的关系来说明帝国主义的产生，他指出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工业在世界上居绝对优势。大不列颠是世界工场，而其他各国则成了购买英国工业品并向英国供应食品和原料的农业区。参与这一交换的所有国家同英国自由贸易，大家都有利可图，因而各农业区一直是按照英国工业发展规模来发展。事实上，当时向英国输出农产品的那些国家的大地主，同英国工业家一样，也是顽固的自由贸易派。但是这种美梦般的协调很快就结束了。这是因为工业地区通常是胜过并统治农业地区的。一个农业国在政治、经济上都会逐渐衰退，在这两方面都将丧失独立。因此，保持和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图必将在这些农业国度发展起来。外国工业产品在农业国销售的增长本身就瓦解着这些国家的前资本主义工业，破坏了自然经济，解放出许多劳动力，从而造成了本国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西欧各国和北美东部各州发展成了可与英国相抗衡的工业国。他们以保护关税对抗英国的自由贸易，力图占领那些无力抵抗的农业地区，以对农业地区的瓜分政策代替英国所追求的那种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国际分工。英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帝国主义就这样产生了。

向农业国输出资本更加促进了帝国主义政策的发展。上一世纪70年代后，工业发展如此迅速，使得采用原来的方法同农业地区进行交易已远远不能满足各工业国对农产品的需要了，铁路成了开发农业区增加农产品进口的必需。工业民族输出资本，在农业地区修筑铁路，这一方面增加了工业国铁路材料的输出，另外也开发了新的农产品供给地。修路需要有一个政权给予必要的保障，而由资本家自己的国家担当这一角色当然最为合适。所以，随着工业国向农业地区输出资本的欲望的增长，使这些地区服从他们国家政权的意图也加强了。此外，向农业地区输出资本促进了农业国工业的发展。那些拥有足够力量维护自己独立的农业

国，往往不仅利用输入的资本修筑铁路，还利用这些资本发展了本国工业，美国和俄国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输出资本的国家虽然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但很快就会遇到一个新的强大的竞争对手。对抗竞争的愿望加强了资本主义工业国把农业区作为殖民地或者间接地作为势力范围来加以统治的动机，以便迫使它们只限于发展农业。

这样帝国主义便最终代替自由贸易成为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交换的主要形式。但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并不是解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业比例失调的最后办法。和平的“超帝国主义”代替帝国主义侵略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超帝国主义”取代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为了给自己的“超帝国主义”作论证，考茨基考察了历史上出现过的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工农业比例关系的各种形式。他通过这种考察得出结论说，从历史看帝国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为了解决工农业比例失调问题除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外，还存在自由贸易这种形式。他认为将来一种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即各帝国主义强国联合共同剥削全世界的政策将会代替帝国主义政策。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农业国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增加原料和粮食生产以满足资本主义生存之必需，为此他们就要统治农业地区，把那里的居民变为无权的奴隶。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如果不想自杀，就决不会放弃这种作法。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只有通过该地区的居民和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强大到可以粉碎资本主义枷锁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帝国主义还有另一面，占领和奴役农业地区的要求，引起了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促使陆海军军备竞赛，使早就被预言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成为现实。他认为，

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决不是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所必需的，它决不是只有随着资本主义消灭才能被消灭，大战结束以后，至少对大多数资本家来说，已不存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必要性了。相反，军备竞赛和战争严重地威胁着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发达的农业地区内，因战争而日益发展起来的民族革命力量日益增强，这不仅威胁着某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威胁着它的全体；工业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和对新税等额外负担日益增长的反抗也使战争和军备竞赛难以继续下去；再加上，由于军备竞赛和战争费用的增长已使资本积累及资本输出停滞，从而使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身受到威胁。帝国主义就这样为自己挖掘坟墓。它从发展资本主义的手段变成了障碍资本主义的手段。帝国主义政策已不能长期继续下去了。不过考茨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已到了穷途末路。相反，他认为，从纯经济观点看来，它能够继续发展，只要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的工业还有可能促成农业生产的相应扩展；当然，这种扩展会随着世界工业每年增长幅度的日益提高和尚未开发的农业地区的不断缩小而越来越困难，帝国主义政策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他认为这种出路就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或者讲，就在于“超帝国主义”。他认为，大企业、大银行的亿万富翁的疯狂竞争使吞并了小财阀的那些大财阀产生了卡特尔思想。因此，从现在进行的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种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所以他说：“可见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①考茨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很可能导致“超帝国主义”的产生。因为战争持续越久，一切参战国越是筋疲力竭并且对武装交锋的迅速重演感到畏惧，世界也就越接近超帝国主义。

^① 考茨基，《帝国主义》第17页。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集中力量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认为，考茨基为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根本要不得。因为它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问题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把帝国主义仅仅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民族掠夺落后的农业民族则太片面了，它完全无助于揭露帝国主义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因而也无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这是考茨基定义的政治方面的核心内容。这是对的，但又是极不充分的。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它们无休止地进行军备竞赛，扩充陆、海、空军，对外实行炮舰政策，吞并弱小国家，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过，列宁认为，考茨基定义的更为严重的错误还在它的经济方面。他把帝国主义归结为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极力推行的一种吞并农业区域的政策，可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恰恰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的统治。恰好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以后，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发展起来之后，各国才加紧推行起殖民政策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另外，帝国主义的特点，也不仅仅是力图兼并农业地区，甚至还要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地区，一旦条件成熟它就要这样作。德国对比利时的兼并、法国对洛林的野心都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期，世界领土已经分割完毕，在重新分割的时候，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有可能夺取到手的土地，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世界霸权，即争夺领土，这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削弱对方，为了摧毁对方的霸权。

考茨基坚决反对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阶段，反对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东西。认为，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如果把卡特尔、保护关税

政策、金融资本家的统治、殖民政策等等都说成是帝国主义经济现象和特点，帝国主义自然就成为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了，不过这也是“最平板无味”的同义语反复。他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并用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政策同它相对立。考茨基企图贬低殖民政策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和粮食，只要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生产的一般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农产品的供应。考茨基完全忘记了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了，垄断性的辛迪加、托拉斯在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生产条件则意味着降低利润率。考茨基实际上是把帝国主义政策同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完全割裂开来了。列宁指出，按照考茨基的这种说法，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的说法，在金融资本时代由于世界领土已经分割完毕，世界最大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对世界领土的重新分割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掩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根本的矛盾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无产阶级只需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需去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这种理论完全是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列宁把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叫做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理论。他认为，如果把所谓的“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是“纯粹”抽象的概念，那么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进一步将要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这又是毫无内容的，是“超等废话”。他又说，如果不依据实际的发展，脱离实际的发展去随意地幻想，那么，“毫无疑问，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

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①。由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列宁认为，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主要错误是，这种理论完全是脱离20世纪初期的那种激烈动荡国际环境所进行的空洞的推理，因而“超帝国主义”是一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会将世界人民引入对一种没有可能实现的虚幻前途的冥想之中，并因此而助长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帝国主义辩护士的声势，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列宁认为“超帝国主义论”之所以错误，之所以对工人运动十分有害还在于，它掩盖了帝国主义分割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质。在帝国主义制度之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的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依据以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依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现实中，不管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联盟采取何种形式，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和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考茨基把一条链子上的两个环，即把今天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分开，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战争时期的联系，而把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145页。

一个僵死的抽象概念——“超帝国主义”献给工人阶级，这只能麻痹他们的斗志。列宁说：“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市侩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像‘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药片生产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转为非和平分割、再由非和平分割转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业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改变着的（通过完全非和平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分割世界吗？”^①和平和战争是垄断资本家斗争的两种形式。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斗争的形式可以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而变化，而且经常在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分割世界）在金融资本依然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取得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进行的，实力又是随着经济和政治发展而变更的，所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被考茨基称作“超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家联盟只能是两次战争的间歇，决不可能成为永久的和平。

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 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口头上虽然也谈辩证法，但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他们从来没有把辩证法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特别是不懂得把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于革命实践。1917年俄国爆发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15页。

了十月革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革命的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在十月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前，考茨基首先以在掌握消息方面还存在缺点，持等待观望的态度，继而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1918）、《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等。后来，考茨基在《自传》中回顾说：“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楚了俄国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我立即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反对它，不仅反对那种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而且也反对这种妄想：可以用几次强暴的打击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而且是由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在同人民大多数相对抗的情况下来建设社会主义。”^①

考茨基攻击十月革命，认为俄国当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他说，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很不同的阶段。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实力问题。但是，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在俄国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现在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②。

这种“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论，实际上是一堆糊涂和混乱的思想；是打着“经济分析”的幌子，歪曲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这种谬论时指出：“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31页。

^② 《考茨基言论》第294页。

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①。

考茨基还说，在俄国，革命不仅重新唤醒了原始的思想方法，而且也使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流血的、粗暴的形式能够出现。用暴力促使早产而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现在一些自称进过马克思学校的医生，正在将这一种助产术施之于那个可怜的母亲——俄国。”^②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辩争，而是无耻的诅咒，以熟知马克思著作闻名的考茨基，竟然以这种态度对待暴力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可见他已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考茨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罪在于它用专政政体取代了民主，而专政只有在作为一个个人或一个紧密团结的小组织的不受限制的暴力统治时才有意义；专政固然能制止拦路抢劫，或者阻止大规模的屠杀，但是最厉害的不安定是从专政本身产生的，是从国家政权的完全独断独行和无法律状态产生的。他恶毒地攻击说，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强有力和不受约束方面远远超过了沙皇制度。

这里，考茨基把专政和民主根本对立起来了，认为，实行专政，就是消灭了民主；而发展民主，专政就不能存在。这个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个人专制或小组织的暴力统治，而是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需要实行专政，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了使反动派恐惧，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这个专政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世界上第一次能享受充分的民主，是大多数人民的国家政权。考茨基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专政和民主之间的统一，因此，他把当时俄国解散立宪会议和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作为民主的破坏和消灭。

考茨基在这里标榜“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实际上是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2页。

② 《考茨基言论》第365—366页。

抽去了民主的阶级内容，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了。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民主，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在批判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标榜一时的“纯粹民主”时，曾深刻指出：这种“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也就愈明显，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表现得愈‘纯粹’”^①。这个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考茨基还说，能够把人民群众导向更高级的生活方式的，不是专政的手段，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对于工业起了“瘫痪作用”，只要专政没有垮台，俄国将继续衰败下去。^②这更说明他的无知。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要采用坚决和无情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③只有依靠这种政权，依靠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力量，经过长期的坚忍不拔的斗争，才能克服巨大的习惯势力，从根本上改造生活的一切方面，从而把人民群众导向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考茨基还竭力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他胡说什么共产党“仅仅是一个宗派”^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设法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而不是要在已有的各个派别中增加一个马克思宗派。显而易见，这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的歪曲，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721页。

② 参见《考茨基言论》第39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④ 《考茨基言论》第355页。

学说格格不入的。

考茨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和污蔑由来已久。早在建党之初，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发生分歧时，他就偏袒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但当时他在表面上掩盖这种偏袒的倾向，声称自己一贯是不偏不倚的。随着孟什维克一天天走向破产，考茨基的“中派”机会主义真实面目也愈来愈暴露。他公然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也置之不顾了。

考茨基在十月革命后，大肆攻击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裂并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要求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停滞不前，它就会失去活力。列宁的伟大贡献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并根据新的经验，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考茨基，在这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变关头，却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边，恶毒地攻击十月革命的道路，把这个伟大的创举说成是狂热和幻想。这是对革命的辩证法的嘲弄，因而不能不受到惩罚，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

第五节 考茨基的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的贫乏，是“第二国际（1889—1914）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上的通病。考茨基这位被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人物，自己承认，他在哲学上“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者”。考茨基一生著作丰厚，但其中真正属于哲学的却寥寥无几。如果说他有自己的哲学的话，这哲学就是他详加论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他自己又往往不把它看作为哲

学。他的辩证法思想贯穿于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中，缺乏系统性、深刻性，并且总是同折衷主义搅在一起。达尔文主义和折衷主义是考茨基的哲学思想的两大根本缺陷。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 考茨基一生写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不同形式，却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著作。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构成了他的特定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不包含它自己的哲学内容，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却引起过较大的争论。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弱点，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则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从哲学向科学发展进步的标志。这种理论家中就包括考茨基。

1908年，在苏黎世的一位名叫本迪阿尼泽的俄国工人给考茨基写信，请他就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等人的争论发表看法。考茨基答应这位工人的要求，写了“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信中考茨基就本迪阿尼泽所提出的“马赫是马克思主义者吗？”这样一个问题做了答复。他说：“这要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怎样理解。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一社会观固然同唯心主义哲学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在信中，他还认为马克思有的只是他的经济学和历史观，而不是哲学。他说：“马克思没有宣布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①在他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历史意义》一书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看法。在他

^① 奥地利《斗争》杂志第2卷（1908—1909）第10期第451—452页，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看来，随着唯心主义和二元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最后一个隐匿处”赶走的同时，哲学也被赶走了，因为哲学“努力确立思维在世界进程中的统一，这是科学所不能证实的一种统一”^①。

考茨基及其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包含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的旧哲学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讲过的“消灭哲学”的话的真正含义。首先，他们不了解马克思在创立其新哲学之初所讲的“消灭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讲过的“宣告一切哲学的终结”，指的不是消灭哲学这一特殊意识形态，而是指消灭一切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的。其次，他们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看作资本主义现实的一部分，所谓“哲学的批判”和“消灭哲学”都是一种改变资本主义现实的活动。第三，他们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谓“消灭哲学”的过程本身就渗透着哲学。“消灭哲学”不是不要哲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讲过他们并不想构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和建立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体系，但是按其理论活动的实质及其最终结果来说，他们是要建立和实际建立了一种无产阶级的自己的哲学。他们所谓不想建立自己的另一种哲学的声明，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他们不想以那种传统的脱离实际的和充满学究气的方式建立一种经院式的哲学。他们要在对旧哲学的改造中建立一种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理论。

所以，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消灭哲学”或“宣告一切哲学的终结”的表述中就得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或者得出马克思主义没有它自己的哲学的结论是简单、武断的。它缺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思想体系的具体的辩证的理解。

^①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及其历史意义》，莫斯科1923年版第12—13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哲学是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而从其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而且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哲学。

考茨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把马克思主义宣布为一门经验科学，这不是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而是否定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即宣布马克思主义像一切经验科学一样，是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是严守科学中立性的。考茨基历来把科学与意识形态、科学与价值观对立起来。他认为，“科学只与认识必然性有关”，与伦理学无关。“科学高于伦理学”，高于价值观。他甚至认为，“当道德理想认为自身是为科学指明目标时，它就会成为科学中谬误的根源。”^①考茨基的科学主义倾向在理论界是公认的。加拿大学者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就曾明确指出过考茨基的这种倾向，指出：“考茨基试图把马克思的理论严格地划分为科学的和伦理的、政治的两个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必须同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包括理论活动和科学活动）区分开来。”他并且指出，这种把考茨基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即以辩证理论的概念为基础的方法论）分割开来的影响现在仍然可以感觉到。^②

应该承认，在正确揭示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高于任何具体的经验科学的一般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科学即经验科学的关系，不是代替具体科学，而是对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而仅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具

^① 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史观》，芝加哥1918年版第202—206页。

^② 参见〔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体科学，就否认或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科学的指导意义或功能。而具体科学的发展离开这种世界观、方法论的一般指导，必然要走更多曲折的路。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各种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科学的辩证关系，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考茨基的科学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意义的否定性理解上，即他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甚至唯物主义历史观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他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是嵌在他们的方法之中的”^①。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他总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方法来谈，而很少当作世界观来谈。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赫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他说：“在这里，我们只是就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有关这一点来谈哲学”^②。这表明他是不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哲学来看的。在《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他对唯物主义方法也作了实证主义的解释，指出，唯物主义方法是“以经验为根据、以研究我们的经验中的各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为根据的方法”^③。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观察问题和指导人们行为的根本方法，但是必须承认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否认方法的哲学世界观前提或离开世界观孤立地谈论方法，就是把作为哲学的方法或方法论，降低为实证科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一种破碎的、拘泥于对个别事实的有效性而缺乏总体性观点的方法，同样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经验科学的科学主义倾向。

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运用于伦理和宗教分析 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接受的是达尔文主义，并且受朗格的社会观点和穆勒的经济学观点的强烈影响。1880年他被邀前往苏黎世，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34年版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8页。

开始了社会民主党作家的生涯后，在经济和历史方面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过是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伦理学和基督教的起源问题是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后所研究的首批问题。这形成了《伦理学与唯物史观》和《基督教之基础》两部著作。

《伦理学与唯物史观》的写作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有关。用考茨基的话说，就是“为了反对那种硬把康德的伦理学同马克思主义拉扯在一起的企图而写的”^①。

书中，考茨基阐述了他对无产阶级道德理想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前景是“从冷静的经济思考”中获得的，亦即从对经济必然性和作为社会主义解放根源的工业生产力的必然增长的思想中获得的。他正确地指出，对于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的实现来说，“经济条件归根到底是既定的”，从唯物史观看，这种道德理想首先被看作是经济发展即阶级消灭的必然结果。关于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的前提的经济发展，考茨基特别谈到三个方面：第一，“消灭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完全排斥人民大众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而造成的一切社会差别和对抗”。第二，分工的发展。他指出，经济发展，特别是一切社会差别和对抗的消灭，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分工的消灭。他认为，分工的发展是推动道德进步的。第三，世界贸易的发展。它密切了国际经济的联系，以致“为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克服民族对抗、结束战争和军备竞赛以及为国家之间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奠定了基础”^②。能够从所应消灭造成一切社会差别和对抗的经济条件中区分出分工的发展，从社会差别中区分出职业差别，从国际经济联系和国家间的和平前景中考察实现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的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23页。

^② 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史观》第202—203页。

条件，这是考茨基思想的深刻之处。

在道德起源问题上，考茨基从唯物史观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出发，阐述了一种“非个人主义”观点。他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生产工具，承认“人的整个自身存在依存于社会，社会统治着人，只有在了解社会的特征之后，才能了解人的特征”^①。考茨基承认在动物世界已经存在着道德基础，社会本能和道德的总和。但他认为，这种已经潜存于动物世界中的“社会本能”是只有在一种“新的原因”的作用下才能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出现劳动的共同体、进行共同的斗争”。他的这种思想在《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又得到了较为明确和详细的发挥。他谈到，在基督教发生的时代，人们的“新思想方式的一种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个人主义”。但是，“个人主义也许永不会含有个人完全脱离他的各种社会关系而独立的意义；个人完全脱离其各种社会关系而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个人只能生存于社会中和藉赖社会而生存。”他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也可以使个人所藉以生长的社会束缚失却它的能力，因而使个人力求脱离他前从前的社会关系。但是，个人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只有和其他具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和必要条件的个人联合起来以组成新的社会组织才能办到。^②

在马克思主义史上较有影响的，是考茨基在《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中所阐述的他关于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思想。他把科学与伦理学对立起来，抬高科学，而贬低伦理学，提出“科学高于伦理学”，道德理想不应干预科学的主张，他把这看作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后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考茨基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

^① 转引自〔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② 参见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12页。

立过程，对上述思想又作了系统发挥，并批判了比利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亨利·德·曼的“伦理社会主义”。

考茨基的上述思想表明，他能够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包括他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精神方面）的社会性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运用于道德和宗教起源问题的考察，他的考察、分析中的“非个人主义”倾向，是对他早期的在人与动物、人与人关系问题上的自然主义的一定超越。

《基督教之基础》是考茨基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社会问题的又一代表性著作。这一著作和《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一书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方面都曾得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肯定。作者在该书引言中表示，他自己对该书满意的地方是能够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把他“所认为最重要的几方面——基督教的几个方面——解释明白”^①。当然，他写作该书的目的还不仅在于此。他是企图通过考察基督教的这个人类社会的特殊精神现象的“历史程序”，而观察和认识整个社会在已往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进化经过”，从而“使无产者有一种社会的知识，有一种自觉和一种政治的成长性”。考茨基认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研究历史。^②所以，他不仅选择了基督教这一特殊精神现象，而且从考察它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入手。

考茨基认为，基督教由犹太教发生。作为犹太教的基督教原是一种最复杂的贫穷阶级的运动，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宗教，带有革命的和原始共产主义的性质。当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它就逐渐变成一种异端或异邦的基督教，并且也由无产阶级的宗教而转变为世界统治者的宗教，由一种共产主义的组织而转变到为掠夺一切阶级而形成的组织。考茨基从基督教的这种起源和历史变化过程的考察中，揭示了一种特殊精神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这

^①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0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10页。

既是对唯物史观的自觉的运用，又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它的论证和一定发挥。

考茨基指出，传统的历史观只把各种政治运动看作力求实现某些政治制度——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的斗争，而这些制度又被看作是各种特殊的道德见解和希望的结果。按照这个逻辑，对社会的观察当然不可能超出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他认为，唯物史观则能防避历史循环论的危险。因为它不满足于研究各种历史观念，而是力求找出它们的原因，即隐伏在社会基础之下的原因。他说，唯物史观坚持从一定生产方式特别是技术进步水平出发考察社会发展过程。遵循着这种方法，即我们一旦从事考察古代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就会超越那种“同一的悲喜剧永远重复表演于世界舞台中”的见解。我们这时就会明白，同一的名词在时代的迁移中已经改变了它们的含义，外表上互相类似的概念和制度实含有一种不同的内容，为不同阶级的需要和不同的形势所引起的不同的内容。由此可见，考茨基不仅强调了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且正确地阐述了这一历史观的发展的观点。考茨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还谈到科学应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考茨基认为，科学的职责在于揭示事物的真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反对用现在的标准去伪造历史。科学对于事物真相的叙述，不只在提供一幅关于事物的忠实的照片，从而使观察者可以构成一个相同的影像，而且实际在于在所接收的一大堆印象和现象中找出其一般的、主要的因素，从而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可以在实况的迷途中找到我们的方向的导线。考茨基的上述见解表明他已接触到辩证历史观的本质和规律范畴。

考茨基不仅把观念的、政治的现象看作是一个有其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现象，而且把其看作社会的产物。他尤其这样来看

待宗教。对于基督教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是否承认和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从本质上来说，取决于历史家的宗教观。他说，假如世俗的历史学家本着基督教是一个人的作品的见解，那么他们就不会去考察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史料，不去探究基督教的起源，而是任由神学家们独占着宗教小说的整个领域。然而，如果历史学家们不把一种世界宗教看作为一种超人的产品，而把它看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则他们的态度就一定会截然不同。他们就会依赖对基督教的历史文献的研究而较为准确地断定原始基督教的社会特性。

考茨基反对某些基督教史学家以一种快乐的田园诗般的形式描述基督教的历史。他认为，基督教教会渊源时代是以犹太人的原始基督教被罗马人的基督教代替、犹太人被罗马人战胜为背景的。这是一段残酷的历史。不仅耶路撒冷全城为罗马人所焚，而且差不多每一寸土地都躺有犹太人的尸体。所以，基督时代，犹太人的历史正是一幅充满残杀和流血的可怕图画。此外，在是否为犹太国而战的人们中间也是存在着明确的阶级分野的。真正为犹太国而战的正是耶路撒冷的小手工业者、店员和无产阶级，而不是那些祭司、士子、商人们。早在罗马人围攻之前，后者中的大部分都找到了其安全之所。考茨基批评《耶稣传》的作者黎南（Renan）把基督教会渊源时代的背景描写成“那么可笑的图画”。他指出，在基督教的起源问题上，黎南的错误在于他的结论不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境，而是只根据近代加利利游客所提供的图画一样的印象。在这里，考茨基所直接谈到的虽然只是对社会情境的思考对于基督教起源的考察的意义，但是他的上述思想却具有一般的并且实质是正确的世界观意义。

考茨基在关于基督教这一特殊精神现象的考察中，从“社会情境”概念中区分出了“物质条件”概念。如果说他的“社会情境”概念还是一个相对笼统、抽象的概念的话，那么，“物质条

件”概念则明确得多了。他所说的“物质条件”主要是指经济条件。他不同意那种过于重视历史中的地理因素这一物质条件的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影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地理因素，常常要取决于该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社会情形所达到的程度，它往往是“一切经济条件的总结果”^①。这一看法同样适应于对国家性质的考察。不过他所说的国家性质，则是宗教统治意义上的，而不是阶级统治意义上的。考茨基把经济条件与生产方式看作是同一的。他曾经考察过基督教起源时代的社会结构。他的最后的一般结论是，“生产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往往是各种社会构造的决定的分子。”^②“决定社会关系性质的最后分析不在于分配和消费的方式，而在于生产的方式。”^③他的这一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是一致的。

考茨基在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和基础的研究中，还正确地坚持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基督教会是一种宗教组织，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团体、一种阶级组织。他揭示了犹太（基督）教和异邦基督教的阶级基础，把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转变看作是由早期无产阶级的宗教向统治阶级的宗教的转变；把基督教会的使徒们中的最蓬勃的热情不是看作为民族的憎恨，而是看作为阶级的憎恨。他还认为，当着我们不是把基督教只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而是也把它当作某种阶级利益的“沉淀物”的时候，基督教才是可理解的。在考茨基看来，阶级利益的实质在于经济利益。基督教会的阶级性质的变化首先在于其经济关系的性质的变化。

考茨基能够从基督教会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原始基督教性质变化的阶级实质和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并把这称为在其社

①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417页。

③ 同上书第459页。

会内完成了的“内在的辩证法”^①，表明考茨基已经能够比较正确地把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一些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又必须指出，考茨基在分析中虽然正确地坚持了关于“经济决定”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使用了“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并且通过“经济基础”“私有制度”概念而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但是，在这里他始终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这是他在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上的根本缺陷之一。在基督教的起源、基础的分析中他虽然正确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但在对国家性质的说明上，他则又抛弃了这个方法，即离开了阶级国家的观点。他不是把国家看作一种阶级统治，而是看作一种宗教统治。他在其后期的理论中坚持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不能不说与其早期在国家问题上的理论混乱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系统阐述 考茨基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②，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不理解它，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全部社会主义，也无法理解现代工人运动的本质。因此他用了很大力量研究它，并在晚年写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部巨著。

考茨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的着重点有着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认识。他认为，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个科学的历史观的重点，“不是人们何以有思想和行为”，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为何会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他说，当着人们这样去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实际去研究社会的精神现象时，他们就会发现，“观念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必须在人类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去寻找

①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474页。

②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第1页。

的”^①。考茨基认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在于，按照这种观点一种特殊的观念或制度与作为它的基础的经济因素之间的结合总是经常的直接的和明显的。以为不这样看，这种历史观就不是那么“唯物主义”的。考茨基指出，这种见解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始终坚持的观点只是：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主导的。各种中间环节和相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这种联系大大地掩蔽起来。”^②

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叫做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什么别的历史观，当然不只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名称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对这个历史观如何理解的问题。一方面，它关系到承认不承认经济是历史发展中的最后的决定因素这个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与是否承认这个原则是一个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观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考茨基既不同意把这个历史观表述为“经济的历史观”，也不同意把这个历史观表述为“经济的唯物主义”，而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提法。考茨基还认为，即便是仅就这个历史观的名称而言，“经济的历史观”的提法也是含混不清的。它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出经济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从这一点出发，如果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前面加上“经济的”这样一个限定词的话，那么，像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那样把它叫做“经济的决定论”也比叫做“经济的历史观”倒更好些。因为前者总还比较清楚地表达了经济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当然，它也不是一种十分确切的表达，因为它“毕竟没有指出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讲的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经济生活领域内一定的行为和目的选择。

在考茨基看来，“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提法也是不能接受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第5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的。因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中，一方面，它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好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发现了经济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以后他们才成为唯物主义者的错觉。事实则是，“这种历史观是从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里产生出来的。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唯物主义者，并不是由于他们发现了经济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①他们“在发展他们的历史观以前，已经在哲学上达到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另一方面，在逻辑上，“经济唯物主义”的提法有可能降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世界观地位，即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学观点。考茨基指出，人们总是按习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愿意比照着这个说法来讲“经济唯物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应用到经济上的、而不是应用到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这实际是缩小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应用范围和它的实际地位。

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和表述问题上，考茨基针对拥护和批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中间对这种历史观的误解和贬斥，把理论的重心放在了阐明这个历史观本身的世界观意义和它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上。他针对有些人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纯粹通过经验而从考察经济和历史得来的”观点，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的‘总的结果’”^②。考茨基不否认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初是一个以历史的和经济的研究工作为基础的假设，它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要在应用中得到验证。但是，他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也并没有始终是一个通过经验、通过对事实的单纯观察而得来的孤立假设，而是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了，它是与这个世界观同命运、共存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第19—20页。

② 同上书第20—21页。

亡的”^①。考茨基的上述思想，表明他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上对其长期存在的方法论的实证主义的一定的克服。

考茨基指出，部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生误解或持批评态度的人，都是按照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理解模式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为了澄清这种误解和回答少数人的批评，考茨基特别强调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前提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用他的话说，一是“原理必须遵从事实”的方法；二是辩证方法和发生学方法，即：“不要把我们以外的事物一个一个孤立地起来当作不动的、不变的东西来考察，而要从它们的运动变化、生成消灭中，从它们的总联系中来研究它们”^②。考茨基认为，无论是对一件东西的认识，还是对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的认识，这两种方法都是缺一不可的。他们的关系是，二者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二种方法是以第一种方法为前提的。而在第二种方法中，考茨基又认为发生学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也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它们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个东西为基础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于这种方法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③。

考茨基承认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述和论证其意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要完成其实践上的各种任务，就有必要使群众通晓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这种历史观是取得社会主义成果的“一个重要实践条件”^④，认为它为进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最有成效的方法。

考茨基首先比较正确地阐述了意识、观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解和阐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24页。

④ 同上书第10页。

述，首先表现在他正确地回答了人们的意识、观念与物质的外界条件的关系。考茨基认为，历史的或社会的过程总是表现为思维的个体与外界之间的对立和相互作用。人们正是在这种对立和相互作用中创造着自己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产，创造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他指出：“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我们可以把思维的个体同外界之间的对立称为精神或观念同物质之间的对立。”^①考茨基还谈到人们的意识、意志、欲望、观念、认识及其他一切非经济的、伦理的、审美的和科学的等各种意识形式的来源及变化的条件问题。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意识（无论就其形式而言，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一致，首先可以通过他们身体组织的一致，其次可以通过他们的环境的共同性来说明。他说，各个团体和各个个人环境的各式各样，决定了他们的意识也是各式各样的。人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意识的内容也不同，反之亦然。总之，人们的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的各意识形式都来源于人们的外部条件。它们是一定的外界条件的反映。

考茨基特别谈到与个人的私欲相对应的社会欲这一特殊社会意识。他首先谈到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关系。他所理解的社会意识概念，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讲的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和作为它的反映的社会意识，而是一种建立在个人意识的共同性基础上的意识，即共同的个人意识。他认为，只有个人才具有意识和意志，而社会则没有。因此，我们要想说明社会意识或社会意志的话，就必须从个人的意识或意志出发。但是，他并不认为个人意识完全是偶然的，无根据的，而也是从一定个人所处的一定环境出发的。关于个人意识能否达到社会意识和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则要看他们是否处于共同的环境中。在考茨基看来，社会欲本身是一种价值选择，它或表现为善，或表现为恶。而人们的社会欲是倾向于善还是倾向于恶，则都以其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为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转移。

考茨基从对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观念的发生根据的说明又进到对其变化和发展的根据的说明。他说：“归根到底，欲产生于有机体的生活条件，它们是能随同这些条件发生变化的。”^①关于观念中的新事物，他认为，“不过是变化了的外界给予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推动的反映而已”^②。而新的技术思想和社会思想，则来源于新的外界。这个外界由于新的需要而给思想以推动，凭新经验和新辅助手段又创造出由新途径来满足新需要的新的可能性。

考茨基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的基本观点也做了辩证的理解。

他指出，使我们的历史观能够成为唯物主义的，是那种认为对辩证的发展过程发生影响的不仅是观念，而且还有思维的人与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考茨基在这里并不是用“思维的人与其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思想来取代关于存在（外界）与意识（思维的个人）关系问题上的决定论，而是强调人对外界的改造，人作为认识和活动的主体的能动性。考茨基承认人与其周围的自然的对立永远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对立又是不断地迫使人们创造和利用人工器官去改造自然。

他正确地坚持了从一定的生产方式认识一定的历史时代的观点。但是，他又主张从一定时代的人的需要、能力和性格特点的一切方面去研究他们的特殊本性，认为只有在既了解人的外界，又了解人在跨入一定的历史时代时所具有的特性的时候，人们才会全面掌握那个历史时代。^③

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的“物质条件”，考茨基也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1页。

②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203页。

③ 参见司上书第355页。

做了辩证的理解。他把物质条件与物质生产力看作是同一的。他认为，对物质条件概念不应做过分粗疏的“唯物的”理解，即认为它“只是指某些有机的和无机的精神和劳动工具”。它其实还包含人所具有的某些心理能力。他以为，考虑社会的物质条件或生产力，都不能离开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人才能把其他的生产力（由一定的材料和工具所构成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使它们开动起来，并且有目的地加以利用。而只要考虑人的因素，就不能否认一定种类的劳动纪律、组织、知识等的物质生产力的性质。考茨基把物质条件或物质生产力中的材料和工具等“硬件”因素以外的部分统称为“心理能力”并不确切，但是，他把人们的生产过程中的合理的组织管理、技术知识（智力）纳入物质生产力范畴这一思想则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认为，在物质生产过程或物质生产力的范围之外来谈论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就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社会存在。这就不仅有个在什么意义上把“心理能力”包括在物质条件概念之内的问题，而且也有个在多大程度上把所谓“心理能力”包括在物质条件之内的问题。如果把“心理能力”的内容过分放大，并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物质条件概念，很可能引起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混乱。考茨基的下述观点是不可取的，他说：“我们还依然认为，思维的人的社会联系以及精神联系，也属于我们在这里称为物质的每个人的外界”^①。把作为人的社会联系形式之一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精神联系”也说成是人们的物质的外界，是一种思想混乱的表现。

第二，在该书中，考茨基还考察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他通过“人工器官”“自觉的适应”等生物学的语言和概念说明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考茨基指出，人在其自然器官之外创造出不同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349页。

于自然器官的人工器官，从而引出了自然发展史之外的具有“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特点”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力学”就建立在这一创造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的人工器官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它与人的自然器官的联系性，即它只能辅助和增强人的自然器官，而不能绝对地代替人的这种器官；另一方面，是它的独立性，即它是同时存在于人体之外，离开人而独立的，它构成和发展为人的外在世界。“人通过人工器官来解决外界问题，人工器官是属于与人分开的，向人提出问题的外在世界。”^①人工器官，就其结构而言，可以是一部新的机器、一种新的工作方法，一种人的新组织方式，也可以是一项新的社会制度。总之，它是“人的技术设施和社会设施”，是人的社会的外在世界。

人采用一定的人工器官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这种器官发挥其作用的程度，均取决于人对其活动的条件和对这种尚未产生的“辅助手段”的认识是否正确。但是，人也并不总能完全预料到它的社会后果。事情往往是，人创造了人的器官，并使之成为人周围的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制造了人强制自己的环境。这也是人工器官的社会功能的二重性：它“一部分有助于人”，“一部分限制着人，在任何场合都强制人为它们做准备”，即强制人再创造新的器官。这就是说，人工器官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了人对自然外界和社会外界“自觉的适应”的特征和能力，表明了人的能动性，但是，也表明人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也是受制约的。

考茨基充分肯定了人工器官产生的社会意义。他认为，技术的、从而也是经济的以及整个社会的发端如果也像各种机体的转变一样似乎也是一种“偶然的自然变化”，那么，属于这种自然变化的，不仅有自然界本身的各种变化，而且也有自然界在性质不变的条件下对人发生的变化。从而引起了人的自然外界的变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337页。

化。那么，人在其中生活的自然界的變化，一是引起人体的许多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使之能够成为适应现象，二是通过人工器官的创造产生某种自觉的适应，从而使人类一开始就与动物区分开来。人在其中生活的自然界的變化作为人的社会生活的第一推动，从此便开始了如下的循环：新的技术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劳动（包括方法、组织和制度），从而造成一个人的新的外界，这个外界又向人提出新的问题，驱使人利用新的手段去解决所提出的问题，于是又要创造新的器官和组织，接着新的器官和组织本身又成为社会外界的一部分，并使社会外界具有新的形式。这样，久而久之，作为人的外界的人的技术设施和社会设施“便取得对人来说比人的自然外界几乎更重要的意义”。这种人工外界使世代相传的社会关系发生显著而且日益强烈的变化。“并通过其本身的更新而改进人的整个精神本质”^①。这表明，由自然外界的变化引起的从一种最简单的人工器官到由此而进一步引发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均取得了独立于自然外界的地位，“并且达到一定高度时，本身的内部也具有前进的动力了”^②。

考茨基在肯定人工外界对人的作用比自然外界为大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的历史比自然界中的各种机体的历史更有其独特的特征。并认为社会自行成为一个领域，并有其特殊的规律，认为社会的规律只有靠着对社会的研究才能得到。他反对把对于自然是正确的规律应用到社会，反对用自然规律去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他指出，像战争、犯罪、利己主义，等等，这决不是普遍的自然现象，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对这些现象不可以简单地用分开来的人类个体的自我保存欲来说明，而只可以用人类社会的本质来说明。他认为，对于人的特性的了解，也只有从人类社会的本质出发。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343页。

^② 同上。

就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当时已经达到的实际水平来说，考茨基的上述思想实际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人工器官”概念并不使马克思在表述其历史观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产力等概念更为具体和更为明确、科学。从他的“人工器官”是外在于自然器官和自然外界的这一观点来看，这个概念也决无“人化自然”的含义。所以，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反映人的实践性、能动性。他的关于人对外界的“自觉的适应”的思想虽然反映了人的实践性、能动性特征，但这一概念正如“人工器官”等概念一样，带有明显的生物学的痕迹。还应指出的是，尽管考茨基在谈到人工外界的社会意义时提到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但也仅此而已。他关于人的自然外界与人工外界的关系的全部论述（除了个别举例之外）都是脱离一定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条件的。而这就不能不使他的这种议论显得过于抽象。他把社会关系并没有放在人的人工外界范畴之内，也没有放在人的整个外界之内，这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他在其中所谈到的“共同劳动的组织、制度”也只具有技术性意义。所以，他使用一系列生物学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思想的表述，比起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表述来，不是更清晰、更准确了，而是相反。

当然，还应肯定，考茨基把人的生活的外在世界区分为自然外界和人工外界即社会外界、并且肯定了人工外界“对人来说”的意义超过了人的自然外界；他的关于自然外界的变化给予社会发展过程于“自然的动力”的思想虽然不值得给予过多的重视，但是，他的这一思想还是反对了上帝造人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理念”的外化的神秘主义或唯心主义；他的人的对于外界环境的“自觉的适应”的思想虽然带有达尔文主义的遗迹，但毕竟还是肯定人的能动性。而且他关于人在与外界的关系中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论述也是深刻的。

第三，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考茨基在对技术发明

史的考察中，还坚持了一种与实践观点、群众观点一致的历史观点。他反对技术发明问题上的天才观。他说：“凡是已知其历史的发明，没有一种可以归之于个别的偶然机会，它们都是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果。”^①在谈到最初的发明的时候，他强调这种发明不是来源于个别卓越人物自己树立目标并为此采取手段和方法，而是来源于千百万人的日常实践。而这种实践则必须是在这千百万人使自己的行为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考茨基指出，今天的技术进步虽然与原始时代的技术进步大不相同了，但是，引起这种进步的“基本因素”则仍然是相属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技术发明乃至一般的历史进步问题上，坚持实践的观点和强调环境或外界变化的意义即“自然必然性”，就是坚持了群众的观点。考茨基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坚持的仍然是这种观点。

考茨基承认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个性的差别，并承认这种差别主要是由社会差别造成的。他指出，优越的社会地位会使一个人得到特权地位，得到使自己能比他人获得更多知识、支配他人的力量和由此增大自己力量的机会，以及得到使自己比他人受到更好保护和更加敢作敢为的地位。特权地位有可能使一定的个人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但是，他认为，就个人的历史作用而言，人的共同的东西，比他与别人不同的东西更重要。因为个人的东西只有成为共同的东西，才具有历史的或社会的意义。考茨基认为，“只有这种共同的东西（不是纯个人的东西）能发生社会的作用，促使社会发展。”^②那么，什么是“共同的东西”呢？考茨基首先把它与群众联系起来。他认为，就一定个人的思想动机来说，所谓“共同的东西”就是“群众一致接受的东西”。在他看来，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一定个人，总是首先通过

^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180页。

^②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358页。

其思想影响别人进而影响社会和历史的。所以，他认为，思想虽然永远只是发自个人，但是，要使个人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意义，它就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就应该是群众的，社会的。他说：“当思想不止于个别的人的思想，而被群众一致接受时，就成为历史的动力。”^①关于这种“共同的东西”，考茨基还谈到关于社会及其发展的科学中的“一般的东西（即普遍的东西）”，就一种思想、改革或发明的扩展来说，就是社会中的“大量现象”。

既然个人总是首先以其思想影响历史，所以，在谈到个人作用问题时，就不得不引入社会认识论问题。考茨基谈到个人与外界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知道，个人的新思想要具有历史的意义，就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还是外界条件。不难理解，作为主要外界条件的社会条件从认识主体——一个人的地位和从认识客体（对象）两方面规定了人的思想的性质和内容，从而也决定这一思想是否能够具有历史意义。而对于能够使新的思想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外界来说，在考茨基看来，则必然正是“群众早就在寻找的东西”。这就是说，就对个人思想的性质及其价值的规定来说，群众的作用与“新的外界”条件是一致的。他说：“群众作为认识和愿望表现出来的东西，不外是共同和相互劳动的多数个人的认识和愿望经汇合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总和。这不外是个人之间在自然素质、历史过程、传统以及当时的生活条件上达到的一致。这种一致，又由此带来了群众运动以历史的力量产生的各个人的认识和愿望的一致。”^②

考茨基的上述思想，对个人历史作用的客观性和条件性应该说作了较好的发挥，虽然就其对个人的思想、作用与历史、群众的一致性的根据的说明还显粗糙。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对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358页。

^② 同上书第360—361页。

群众的历史作用他并未做出明确的结论。他在能够而且应该做出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结论的地方停步不前了。这表明，无论是就特殊的社会认识论意义来说，还是就一般历史观意义来说，他关于群众一主体的思想是不明确的。此外，他的“共同的东西”、“大量现象”等概念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它把个人思想与群众意愿的一致看成了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而这些概念是很难揭示群众意志和行为与历史的一致。在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论述上，他的论述比起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的角度的说明要肤浅得多。

第四，考茨基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系统阐述中还谈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历来重视这一问题，并把它看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他力图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同当时的工人运动实际结合起来。

考茨基关于阶级的理论说明，按其本质来说是正确的。他肯定阶级是一种经济的范畴，认为“阶级的问题，乃是关于掌握生产资料、并从而掌握其所制造的产品的问题”^①。他反复强调，阶级分化和对立的基础在于经济的因素而不在于政治的因素。一方生产资料过剩，另一方生产资料缺乏，即特定的所有权关系，形成了阶级分化的基础。仅仅是掌握生产资料和缺乏生产资料之间的对立，才造成了阶级的对立。考茨基反对把阶级对立的基础理解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指挥者和被指挥的生产者群众之间的某种对立。他认为，生产指挥者与被指挥的生产者群众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职业分工。他论述了阶级与职业、等级概念之间的区分。他认为，职业之间的对立并“不同于阶级的对立”^②。他把阶级消灭与职业区分的消灭的不同社会意义看作阶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34年版第16—17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级与职业之间必须作出严格区分的一种原因，认为，就阶级方面而言，情况往往是，如果使一个阶级消灭的那些历史条件业已存在，那么，这个阶级的消灭就很可能实现，而对社会并无任何损害，甚至还大有益处。而在职业方面，情形则完全不是这样。各种职业是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程度愈高，社会变得愈复杂，职业的数目也就愈繁多。消灭职业区分，即意味着要取消社会已经获得的一切知识和技能。这是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希望的企图。甚至减少职业的数目的企图也可能是反动的和枉然的。在考茨基看来，“等级概念与阶级概念和职业概念相近而不相同。”^①等级是指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具有一种特定的权力和利益。每一种等级，可能代表一种僵化的职业，也可能代表一个僵化的阶级。一定的而且是少数的职业可能会被赋予等级的性质，但它只可能是接近于某一阶级（即具有特权的一定阶级）的地位，而其本身并不就属于该特权阶级。“我们可以把这类等级中每一个也都叫做阶级。但是，反过来，并非每一阶级都是等级。等级只不过是某些阶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②

在谈到阶级问题时，考茨基特别注意考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他在1889年写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对立》和1899年写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这两部著作中，曾把知识分子解释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则承认，进一步的研究使他认识到“那样的理解是不精确的”^③。他认为，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和特殊的阶级意识、独特的思想方式。知识分子只形成一种特殊的职业，并不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把知识分子看作“新中间等级”。考茨基还谈到，我们驳斥知识分子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第41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8页。

（就其整体而言）阶级性的观点，自然并不证明他们可以否认他们的社会作用和个别成员的阶级倾向性。他认为，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或一个特殊的阶级，另一些人则可能变成某个阶级的组成部分。有一些知识分子阶层，就其工作条件而论，而且往往还可以就其生活水平而论，他们和雇佣工人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们认识到他们与无产阶级有着共同性，并且意识到他们的得救全在于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不在于强调他们自己的统治职能时，他们就有了阶级意识，但不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知识分子里面也有另外一些人，在他们身上，统治职能发展到了较高程度，比起他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接触点”，显得更加突出得多。由于统治职能逐渐成了主导的方面，他们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阶级意识——一种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很多工厂经理、枢密顾问、法官之类的人，就是如此。考茨基承认，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中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它的出现“不是作为物质利益的代表人，而是作为单纯原则、纯粹观念的代表人，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实行家’的‘理论家’”^①。考茨基对现代社会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在正在增长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一些对战斗的无产阶级说来重要的而且有趣的问题。将它完全当作无产阶级，固然失之过当，但是将它简单划归有产者一边，则更加错误。我们发现，在这个狭小的阶层里存在着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一切对立因素。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个微观世界中如同在社会总体中一样，有着不断进展的无产阶级成分。”^②考茨基还指出，知识分子在其发展中还从工业无产阶级对现代阶级斗争所具有的最高意义中获得自己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第187页。

^② 考茨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对立》，德文版第135页。

的充分历史意义，其前提当然是知识分子和工业无产阶级的结合。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考茨基谈到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观点。但他特别强调和详加论述的则是“不是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观点。他首先通过“最初的阶级斗争”来说明如何一切政治斗争并不都是阶级斗争。他指出，“国家形成的初期，社会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级。这些阶级有普通自由民、低级贵族和高级贵族，在他们之上是君主及其廷臣的氏族。其次还有教士、官僚商人、钱商（高利贷者和银行家），在所有上述阶级或阶层之下，是劳动群众，他们又分为奴隶、隶农、自由的农民、自由手工业者、艺术家等等。他说，这些人群都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与别的人群处于友好或敌视的关系中。这些关系决不是完全由阶级利益引起的。所以，他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冲突，只在最狭隘的范围内表现出来。而这种对立和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不是一般经济关系的结果，而是特殊的个人性格的结果。表现得很鲜明的东西，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反对个人邪恶的道义上的斗争……”^①考茨基又通过“古代东方”所谓“阶级斗争的不可能”来证明他的“不是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观点。他认为，“在古代东方，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能够胜利的唯一因素，是被剥削者比剥削者的人数大得多。可是他们并不能使这一因素发挥作用，因为各个村庄依然是孤立的，奋起反对领主的绝不会是国内全体农民，而始终仅仅是个别村庄，他们没有准备、没有武器、没有领导，而领主为数虽少，但武器好，有组织，有领导，经常准备投入战斗。因此农民暴动总是照例被血腥镇压下去。农民暴动证明了剧烈的阶级对立，但也证明了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不可能，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提高被压迫者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第338页。

地位的“不可能。”^①他说，古代东方国家的上述农民反抗领主的斗争，如果算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话，它也不能被称作一种“正规的阶级斗争”。而所谓“正规的阶级斗争”则只是就古代、纪元前最后两千年中出现的与东方文化古国接壤的那一部分沿海城市国家的政治斗争而言的。

阶级斗争中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理论家们颇感兴趣的问题。考茨基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说明。他认为，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并不依存于它的爱好和意愿，而是依存于它的经济条件。这种条件给予一个阶级以按其经济力量来看是较大的政治力量”^②。所以，在阶级斗争中，每一个在经济上强有力的阶级，在政治上常常也是强有力的。但是，他又指出，一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并不是常常相吻合的。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形成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治对立的作用远远胜过经济对立的作用。“经济环节只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因素，却并不是显露于事件表面的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③

对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阶级斗争的组织的作用，考茨基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他更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重视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政治行动的作用。他认为，没有工会，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向上发展，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是仅仅有工会，还不能使阶级斗争成为解放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成为解放斗争的，只有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特殊的政党以后所展开的政治行动。应该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和现实的工人运动策略问题上，考茨基并没有把他的这一思想贯彻到底。例如，他在其早期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4分册第338—339页。

② 《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51页。

③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第205页。

的著作（《关于革命的杂论》、《社会革命》和《取得政权的道路》）中，都肯定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作用，并承认工人阶级已经进入了革命时期，但是，在其1910年后的文章和著作（例如《一个新战略》）中则宣称为了给群众以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就没有任何东西比“可以看得见的成果”更加迫切需要了和“显而易见地向群众表明我们正在增长的力量”。而这种所谓“可以看得见的成果”就是选举的胜利和夺得新的议席一类的东西，而不是他以前所极力颂扬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对他的这种前后矛盾，即实质上的理论和实践的脱离，卢森堡曾作过形象而深刻的揭露，指出“当问题从理论像老鹰那样悠然盘旋的高空中，第一次落到普鲁士选举运动这块平地上的时候，突然间，不知所措和一筹莫展的普鲁士政府变成了铜墙铁壁，像《取得政权的道路》所描述的为社会革命（‘乌拉！前进，前进！’）做好了准备的德国突然变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国家，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想象’，国家雇用的车间工人和工厂职员，无论是年青的或者是年老的，都参加示威游行，而‘正在兴起的革命时期’则变成了对帝国国会选举的辛勤准备”^①。

考茨基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重大缺陷或错误，是他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背叛。不能正确处理战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另一重大缺陷。他坚持在和平中，要在每个国家的国内进行阶级斗争，对外讲国际团结；在战争中，国内要讲阶级团结，对外要进行各国工人之间的斗争的矛盾的观点，使他在政治实践中跌进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泥潭。

第五，在该书中，考茨基还就自然科学的发展动力问题进行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了探讨。在当代科学哲学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科学内部的纯粹逻辑的方面；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科学外部的社会条件。这个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个一般历史观问题。它超出了科学哲学的范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茨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能够比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

考茨基首先谈到人对自然的认识（他认为，对自然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成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他指出，在人类的“最初的、天赋的生产力”中，有一部分是个人的才能，有一部分是人类周围的自然力。他说，人类在必要的情况下，究竟能够把自己的才能和外界的力量运用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究竟能够使它们有多少转化为生产力要以人类对自己的本质和环境的本质的认识程度为转移，也就是以他们认识自然的水平为转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得出结论说：“‘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质上只不过是自然的知识的发展的另一个说法而已”^①。

考茨基承认，关于自然科学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来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它都能作出正确的回答。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至少说其中的一部分，不是以一般的社会发展为转移的，而且是遵循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进行的。考茨基分别谈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康拉德·施密特和巴克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阿德勒把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思想的相互依赖性”，即把自然科学的发展仅看作是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施密特则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依照科学自身的“内在的逻辑规律性”进行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424页。

的；巴克斯则把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对外界自然情况的观察”^①。考茨基批驳了阿德勒等人的错误见解。他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适应，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即一方面，要有具有一定器官或思想的个体；另一方面，要有这些器官或思想不足以应付，而必须去适应的环境。但是，阿德勒和施密特的所谓逻辑的规律性或思想的相互依赖性的观点则相反，它完全局限于主体个人的范围。他们虽然都没有否定环境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能回答在个人的认识能力不变，其环境不变，因而其逻辑的规律性也不会改变的情况下，思想运动是从哪里产生的问题，亦即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的变化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问题。

考茨基以为，只要我们考虑到我们的思想常常需要去适应的那些客观情况并不是外界环境的所有情况，而只是外界环境中使我们意识到的那些情况，那么，上面的困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是说，与社会相比较，自然界虽然是不变化的，但是我们关于自然界的认识的范围总是有所变化的、有所扩展的。而能够把进入我们意识的外界情况的范围扩展开来的东西，即使是最严密和最精细的逻辑规律性和最大的思想相互依赖性也办不到，它一点也不可能把我们过去一无所知的新情况送到我们的意识中来。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考茨基认为，只能是技术。^②一切技术革新都负有解决某一实际问题的任务。但是，它除了完成这种任务外，还会带来革新者本人不曾意料到的而且不可能意料到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最重要的就有技术革新向我们揭露的过去我们所不了解的外界的情况。因此，技术并不仅仅是向人类提供一个对外界发生作用的新器官。它也往往成为直接或间接促使人类从自己的外界取得新的感性认识的器官。

考茨基指出，早在他1896年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唯物主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425—427、430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429页。

《历史观想要做什么和可能做什么》的文章中就曾表达了上述见解。文中，他驳斥了巴克斯的关于哲学体系的萌芽“是从对外界自然和人类精神的具体情况的观察中产生的，是从对认识以及一般意识的条件的分析中产生的”观点。考茨基认为，巴克斯的观点的错误，首先在于，在哲学的对象中，他只举出了自然和精神，而没有举出社会来。而各个时期的关于社会的哲学观念，的确是当时的社会状态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考茨基特别指出，把自然科学仅仅归结于“对外界自然情况的观察”也是不正确的。他说，只是观察，人类是无法进步的。只有当观察自然变成征服自然的时候，观察自然才能成为研究。单凭观察，只能告诉我们自然现象是怎样进行的，而对自然的哲学的研究则开始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在人类能够想到对自然进行哲学的研究以前，他们也必须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切断那条把他们同自然联结起来的纽带，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征服自然和摆脱自然的束缚。就是说，只有当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力量扩大的时候，只有当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才会扩大。假若没有望远镜和显微镜、度量衡、实验室和观察台等技术条件，哲学家先生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就无法进行他们的“思想革命”。

考茨基在阐述了技术决定自然科学的观点之后，又谈到经济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外界自然的范围，并不只是依靠技术和依靠发明征服外界的手段来扩大的。经济以及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相互结合的关系的形成，也起同样的作用。所以他说：“我们不应该到逻辑的推理中去寻求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应该到向我们提供新的自然情况的条件中去寻求这种动力。这种条件就是技术和经济。”^①当然，他也表示“我们不应该用幼稚的和粗暴的方式，认为既然自然科学同生产条件具有极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册第434页。

密切的关系，新的自然观点就是新的经济关系的反映。实际上，新的技术和经济是通过如下的方式对自然科学发生变革作用的，即：它向自然科学提供自然领域内的新情况，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和经济，这些情况就不会进入人们的意识。^①

考茨基关于自然科学发展动力及其规律的上述见解的正确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个问题在现代科学哲学乃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可以看见考茨基的思想的敏感性。考茨基所系统发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力的基本思想，对于今天我们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特别是科学革命的规律，对于深入探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方法论问题 考茨基一贯比较重视方法论问题，并自觉地意识到他的方法论的折衷主义的老毛病和力图克服它。他甚至把方法看得高于世界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嵌在它的方法中的。他诉诸“辩证的思想方法”。在谈到革命问题时，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稍微用点这种方法，就能揭示它的全部真理。

考茨基的最突出的方法论思想是历史主义和总体性。

考茨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习惯于采取历史的形式。对于所要认识和应该认识的任何事物的关系，他总首先考虑“它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②，甚至认为研究“怎样发生”或者其“进化经过”，是了解现象的“唯一方法”和“最有效的方法”^③。他承认任何已经知道其历史的发明，没有一种可以被归于个别的偶然机会，它们都是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果。^④对于概念，特别是社会主义观念问题的研究必须采取“辩证方法或发生学方法”，认为只有应用这种方法才能使我们得到深刻的见解。“概念及其定义

①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434页。

②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7—8页。

③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7、19页。

④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180页。

本身是在这种方法的应用过程中逐渐明瞭起来的。”^①

对问题的研究缺乏总体性观点，只是从孤立的事实出发的“个人主义”或实证主义，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的方法论特征。从其方法论思想的总的水平或特征来说，还不能认为考茨基已经完全克服了这种方法。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他力图采取总体性方法。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应用的唯物主义方法里，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把我们以外的事物一个一个孤立起来当作不动的、不变的东西来考察，而要从它们的运动变化、生成消灭中，从它们的总联系中来研究它们。”^②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社会主义观念问题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为了取得对一定事物和现象的确切的认识，那种最初把每一件事物“单独分开、孤立起来、从静止状态中加以研究”的方法虽然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联系的方法，即总体性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人们要善于发现现象的普遍联系，并且“无论如何必须把自己所研究的全部知识纳入一个普遍的联系”之中。他说：“这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个东西为基础的方法。他们借助于这种方法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③他认为，无论是对自然的研究，还是对人的研究，总体性方法的有效性具有普遍性意义。关于对自然界的认识，他说：“如果我们不把自然界了解成一个包括一切存在着和发生着的事物的整体，而把它了解成一个能够产生或创造某种事物的因素，那么，自然就不过是神的别名”^④。关于对个人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他首先肯定了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客观性。但是，他又认为，问题不在于肯定个人在历史上具有一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29页。

④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2分册第85页。

定地位和作用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价个人的地位和作用。考茨基主张使用总体性方法。这种方法的意义是，“如果我们将这些人物放到若干世纪的历史总关联里来看，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具有什么重要性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总结局不会引起丝毫改变的一段插曲而已。”^①

考茨基也主张对事物的研究采取联系的（总体性的）、历史的方法的同时，也采取具体的方法。例如，对一定的自然条件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他说，一定的自然条件是促进还是妨碍经济和其他社会的发展，这只能根据一定的时间地点来确定。^②对于人的认识，他认为同一个外界从来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响于两个人，所以，当认识到人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研究每一个人的个性。^③

考茨基的方法论思想中的总的特征也是最大的弱点是折衷主义。“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是他的理论分析的最后结局。方法论上的折衷主义是理论的不彻底、理论立场的不坚定性的表现，在真理问题上，往往表现为相对主义真理观。考茨基的折衷主义在对马赫主义的认识上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观上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他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不管这种历史观把自己称为唯物主义的，或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宁愿采用实在论或一元论、实证主义或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等名称，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他就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④。我们知道，感觉主义

①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6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6页。

②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第111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358页。

④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第30页。

和经验主义可能是唯心主义的，也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这要看哲学家们如何说明感觉和经验的来源。正如列宁所说：“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①而经验批判主义或马赫主义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为了批判这种哲学，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无条件地与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更不能与经验批判主义或马赫主义结合在一起。考茨基的上述思想，不仅表明他根本不了解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也表明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一整块钢铁”。历史唯物主义只能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而不能与任何别的哲学结合。

考茨基的折衷主义或相对主义表现在一般马克思主义观上，就是主张一种“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即“多变量的马克思主义”。他在1913年写的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的文章中讲道：“今天我们走得如此之远，乃至在马克思主义学派内能够划分出各种派别……可以断定，完全符合唯物史观，每个国家都具有创造马克思主义特殊形式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说有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荷兰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两种特殊的形式，一种是教授的形式，另一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形式。”^②马克思主义是一科学的整体。对马克思主义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各个国家和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可能出现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这不能被解释为各有各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而谁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只能由实践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25页。

^② 转引自〔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第183页。

检验。

考茨基如果说有他自己的哲学的话，这个哲学的性质是唯物主义的。考茨基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也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理解和表述他的（他自认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又不是一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哲学唯物主义缺乏彻底性；他的方法带有浓厚的折衷主义。因此，对考茨基的哲学不能评价过高。虽然在个别观点上他有过较为深刻的阐释，但从总体上说，他并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还使这种哲学的水平有所下降。

考茨基哲学思想的重大缺陷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割裂，他不了解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了解世界观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意义。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不仅过于肤浅和缺乏系统性，而且缺乏坚定性和一贯性。由于不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理解作为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关系，因此，相对主义、折衷主义成为他的方法论思想的一大特点。考茨基的哲学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相对主义、折衷主义方法论的奇怪结合。

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和阐述具有浓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他自称他是通过生物学而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点，始终影响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及其表达方式，决定了他对20世纪初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在相应的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选择上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陷入宿命论。

考茨基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理解中，基本上没有涉及社会形态概念。他关于经济形式、生产方式的理解也主要是着眼于它们的技术性方面。他又把技术与生产力概念等同起来，从而在逻辑上有可能抽掉生产力概念中包含的能动的即人一主体的方面。尽管他也使用社会关系、经济形式乃至所有制概

念，但他极少提及和使用生产关系概念，而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来说，没有生产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就等于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

考茨基的历史观上的机械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是他在重大政治实践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折衷主义的哲学根源。

第四章 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展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曾经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传播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后来却离开了革命道路，演变成为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第二国际的领袖中，他是较早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家，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①，然而后来却又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之后尘，和它同流合污。他在政治上的复杂多变和理论上的诸多贡献，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复杂性，使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议颇多。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理论活动

政治上复杂多变的一生 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出生在俄国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的一个世袭贵族家庭里。他在家乡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868年，刚满12岁的普列汉诺夫离开了古达洛夫卡村，进入沃罗涅什陆军中学二年级学习。那时，他十分向往军官的生涯，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甚至幻想将来成为统帅。中学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显露了他的聪慧天资，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被同学们称作“活的百科全书”。在沃罗涅什陆军中学的5年，为他掌握广阔的知识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兴趣广泛，酷爱文学，曾阅读过许多革命民主主义作品，这对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沃罗涅什陆军中学毕业后，普列汉诺夫于1873年8月被送入首都彼得堡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校深造。由于他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加之对枯燥严格的军校生活和军官阶层的日益不满，不久便借故离校。

1874年9月，18岁的普列汉诺夫考入了彼得堡矿业学院。大学生活把他带入了一个新天地。他除了攻读自然科学外，还广泛地研读哲学、文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发展进程影响极大，正如他后来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所说的：“我自己的思想发展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极大影响下完成的”^①。

1875年，当普列汉诺夫还是矿业学院的一名学生时，就参加了民粹派的活动。1876年，他已经成为民粹派的中坚分子并领导和组织了彼得堡第一次工人政治示威。1877年和1878年，他因参加民粹派的革命活动，反对沙皇反动统治，而两次被捕。1880年1月为逃避沙皇军警的搜捕，他与民粹派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逃亡国外，从此便在西欧开始了长期的侨居生活。

1883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完成了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此后，他便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上。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对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33页。

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同民粹主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特别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写了一系列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博大精深，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同列宁一起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工作。在1903年召开的标志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和列宁共同主持与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闭幕之前，当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历史证明，他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自1883年至1903年这整整20年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期。但是，1903年之后，他便从自己的光辉时期的峰顶跌落了下来，开始了向机会主义者演变的历程。

从1903年到1914年，是普列汉诺夫向机会主义者演变的时期。在这期间，他虽然反反复复地动摇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间，但总的趋向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机会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终于堕落成为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成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他支持俄国反动政权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①。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返回了自己的祖国。1918年5月30日病逝，以悲剧性的结局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政治、理论活动的四个阶段 从1876年参加民粹派起到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13页。

1918年逝世，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民粹主义时期（1876—1883年）。

民粹派是俄国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个有很大影响的派别，其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早期的民粹派代表小生产的利益和要求，曾为反抗沙皇专制统治进行过英勇斗争。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一直是错误的。它否认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通过农村公社进入社会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在历史观方面则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极力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极少数英雄人物视为社会历史的主宰力量。

普列汉诺夫1876年参加民粹派之后，便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1876年初，作为民粹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经常深入工厂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使他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同年12月，他领导并参加了彼得堡工人在喀上教堂广场举行的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示威，发表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演说，高呼“土地和自由万岁”，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是普列汉诺夫一生政治生活的光辉起点。示威遭到了沙皇军警的镇压。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普列汉诺夫摆脱了军警的追捕，第一次逃亡国外。1877年夏，他又秘密回到俄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878年，他担任了民粹派机关刊物《土地与自由》的编辑，并在这个杂志的1879年1、2月号上发表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该文虽未脱离民粹派传统观点的窠臼，但却提出了应当充分估计到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企图突破民粹派忽视和否认工人阶级革命作用错误观点的意愿。

1879年夏天，民粹派发生分裂。一派为“民意党”，被恐怖

主义者把持：一派为“土地平分社”，主张继续坚持到农民中进行革命活动。普列汉诺夫被推举为“土地平分社”首领。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虽对民粹派的某些观点有所怀疑，然而他仍然是一个正统的民粹主义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在70年代末，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粹派”。

1880年，“民意党”人的个人恐怖活动加剧了沙皇政权对民粹派的镇压。“土地平分社”的印刷厂被沙皇军警捣毁。为了躲避沙皇军警的搜捕，普列汉诺夫和“土地平分社”的其他领导人再次逃往国外。从此开始了在西欧侨居长达37年之久的生活。长期的侨居生活，固然使他脱离了国内革命斗争实践，这对他日后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建树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是，当时的西欧毕竟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那里集聚着一批最早而且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使他获得了直接接触西欧最新思潮和广泛了解工人运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会。

1882年至1883年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具有关键性的一年，即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一年。1882年，他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并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指出：“《宣言》及其作者们的其他著作开辟了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文献史上的新时代——无情地批判现时劳资关系以及与任何乌托邦不同的、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的时代。”^①为了清算民粹派的错误理论，探寻俄国革命的道路，普列汉诺夫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得愈多，理解得愈深刻，就愈能使他认清民粹派在理论上和立场上的错误，促进了他同民粹派的彻底决裂。普列汉诺夫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形时写道：“没有同我们一起经历那个时期的人很难设想，我们多么贪婪地攻读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其中德国伟大理论家的作品自然占着首要地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7页。

位。我们读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越多，我们就越清楚我们以前观点的弱点，我们自身的革命经验在我们的眼里就变得越加正确。”^①他还回忆说：马克思的理论像“引路之线”那样，把他从民粹派和巴枯宁的理论的迷宫“引导了出来”^②。由此可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于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1903年）。

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问世，到1903年参加创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这整整20年间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期，也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他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始终奋战在两个战线上。

作为革命活动家，普列汉诺夫创建和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曙光杂志》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对于劳动解放社的活动，恩格斯给予很高评价。他在1885年4月23日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③。列宁则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01页

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①他把劳动解放社社员誉为先进战士，认为他们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主义、马赫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写了一系列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发表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年)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论著，系统而又深刻地清算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很好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论著不仅对于俄国革命者从民粹主义错误理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要的发挥和发展。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著作有很高的评价。他把《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②。把《我们的意见分歧》称作俄国“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③。对《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列宁更是倍加赞赏，认为这部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说它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5年2月8日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认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在俄国的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④。

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中第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他先后发表了《伯恩斯坦与唯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7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3页。

主义》(1898年)、《我们为什么感谢他? (给卡尔·考茨基的公开信)》(1898年)、《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8年)、《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年)、《再论唯物主义》(1899年)等论文,集中揭露与批判了伯恩斯坦、施米特等人的哲学修正主义,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论文的发表,对于推动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列宁在1899年6月27日写给尼·亚·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说,他非常满意地一再阅读了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斯坦和施米特的论文,并且明确表示,他坚决地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他认为,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做得完全正确”^①。

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还同俄国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如“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进行了斗争,特别是批判了被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唯物史观的折衷主义“因素论”和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经济机械决定论。其主要著作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替经济唯物主义说几句话》(1896年)、《论“因素论”》(1897年)等。

此外,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优秀论著,如《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1891年)、《唯物主义史论从》(1893年)、《论唯物主义历史观》(1897年)、《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1900年)和《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年)等。

总之,这20年间,普列汉诺夫对于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黄金时代。列宁曾称他为“最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党人”^②,认为他的功绩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153页。

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①。列宁甚至还把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誉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②，认为这些著作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3）孟什维主义时期（1903—1914年）。

这是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颠来倒去、动摇不定的时期，情况比较复杂。列宁在《论冒险主义》一文中，曾具体生动地描述了普列汉诺夫这一时期动摇不定、复杂多变的情况。他指出：“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主张‘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③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阶级的表现，大体上可概括为：建党时期的调和主义、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动时期的护党主义。

所谓建党时期的调和主义，是指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大搞调和，抹煞它们之间的原则斗争。本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普列汉诺夫是站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边的，所以列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9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92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95页。

说他“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然而，代表大会之后，他被党内的分裂吓坏了。他极力鼓吹保持党内的无原则团结，要求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让步。他不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劝告，在《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硬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很不重要的”，完全值不得为这些分歧而“争吵不休”，甚至公然指责布尔什维克坚持同孟什维克的原则斗争是“固执己见”。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调和主义立场。列宁把他的这篇文章视为他向机会主义演变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称它为“划时代的文章”。此后，他便在政治上同列宁分道扬镳，从他一生政治活动与理论活动的光辉峰顶跌落了下来。不久，普列汉诺夫又进一步从一个孟什维克的同情者变为一地地道道的孟什维克。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坚持原则斗争是搞“分裂活动”，同时却把孟什维克美化为“正统地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立场。所以列宁说他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

所谓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指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革命采取了右的立场。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他从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出发，错误地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要求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并肩行进”，实际上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他不了解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是农民革命，低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如果不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同农民结成联盟，就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声势减弱。在对待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他错误地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和平宣传工作和工会工作，主张把工作重点放在培养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和取得胜利的心理条件上，反对所谓过早地举行武装起义。当武装起义失败后，他竟公然指责布尔什维克，说起义的失败证明了“武装起义游戏的全部冒险

性”，“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斥责了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论调，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

所谓反动时期的护党主义，是指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革命恐怖时期普列汉诺夫站在护党的立场上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1905年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反革命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形势下，孟什维克领导人竟然主张取消党的秘密工作，把全力放在争取党的合法存在上。这无疑是要取消党。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得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护党派”的支持。普列汉诺夫首先退出了“取消派”控制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接着便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和批判“取消派”的文章，指出“取消派”按其本质来说是同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对立的；或者是拥护“取消派”，或者是同它作斗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予以肯定，称他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的援兵，并且指出：在1910年的整整一年中，真正同心协力一起进行党的工作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然而，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是不彻底的。1912年以后，他就不再把斗争矛头指向“取消派”了，而是一面反对“取消派”，一面攻击布尔什维克，而到了1914年，又终于和“取消派”同流。所以列宁说他“1914年又重新转变为取消派”。

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经常动摇于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他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

尽管普列汉诺夫这一时期经常摇摆不定，而且总的倾向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但他仍然继续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著作，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1907年）、《战斗唯物主义》（1908—1910年）、《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1909年）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年）等。

这一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理论和实践、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之间，既有相一致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列宁说，自1903年至1914年“最近十年来”，“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激进主义、在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的时期”，并称他作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这些论断都如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他在理论和实践、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之间相矛盾的一面。

（4）社会沙文主义时期（1914—1918年）。

这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不光彩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公然站在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积极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蜕变为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就纷纷撕毁了第二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巴塞尔宣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普列汉诺夫也不例外。他极力为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辩护，公然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沙皇政府的军事拨款，甚至在国防大臣创办的《俄罗斯意志报》上发表文章鼓吹沙文主义。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在其《论战争》（1914年）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列宁说，这一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已经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人物。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普列汉诺夫回到了阔别达37年之久的祖国。他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怀抱，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扬“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鼓吹支持临时政府将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极力反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和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在十月革命

胜利后的第三天，他在《统一报》上发表了《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污蔑十月革命把俄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清楚地说明，这一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已经堕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发表了许多鼓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论著。除了上面提到的《论战争》外，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演说后来被流亡在国外的孟什维克分子辑录在《在祖国的一年》里。在这一阶段，普列汉诺夫仍然做了一些有益的学术研究工作，《俄国社会思想史》便是他未完成的一部社会思想史巨著。

一生中的两个重大转变 从普列汉诺夫政治、理论活动的以上四个阶段来看，他的一生经历了两个重大转变，即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和从马克思主义者向机会主义者的转变。

他从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有二：一是1883年他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问世。这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同民粹派的彻底决裂，同时也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该书是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而又深入地清算民粹主义错误理论的著作。列宁对它有极高的评价，他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已经确立了一个从那时起就成了一种起码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的幼年时期，才算是阶级的运动。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1883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证实这个真理适用于俄国，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会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于这部著

作的发表，普列汉诺夫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他在1883年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的创立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民粹派的彻底决裂。普列汉诺夫是“劳动解放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在为“劳动解放社”起草的成立宣言《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通告》中宣布：“土地平分社的旧同人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就是要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组织成一‘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通告》指出，“劳动解放社”有两项任务：“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适合不同修养程度的读者的原著译成俄文，用这种办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二、批判在我们革命者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并且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居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解释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劳动解放社”作为普列汉诺夫创建和领导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民粹派的彻底决裂，而且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重大转变即从马克思主义者向机会主义者的转变，是以他1903年在《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不应该这么办》这篇文章为起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这时起他就“一刀切”式地一下子变成了机会主义者，事实上，他向机会主义者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总的倾向是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但又具有反反复复、摇摆不定的特点。列宁曾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被人戏称为‘泥潭派’。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一方。这些倒戈分子中的第一个是普列汉诺夫公民”^①。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最大的摇摆表现在对待1905年革命和“取消派”的态度上。如果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755页。

说前者是明显地向右转，表现了其对待1905年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那么反对“取消派”则是明显地向左转，表现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布尔什维克的靠拢。而到了1914年，当他由反对“取消派”转向同“取消派”合流时，就又向右转了。在1903—1914年间，普列汉诺夫从布尔什维克转向孟什维克，甚至充当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故称这一阶段是他的“孟什维主义时期”。但就在这一时期，他又有多次脱离了孟什维主义。列宁曾详细地列举了他好多次脱离孟什维主义的具体表现，如：在1903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过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以后在主编《火星报》第46—51号期间也反对过孟什维克；1905年春天曾经脱离了孟什维克；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解散后采取了根本不是“孟什维克的立场”；在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则反对过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掌握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向机会主义者转变的上述特点，对于了解他的一生，正确评价他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普列汉诺夫演变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在1914年。此后，他便进入了自己一生中最为灰暗的时期。

第二节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是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称于世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最突出、影响最为久远的是唯物史观、美学和哲学史这三个领域。

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头一个重要贡献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发挥和发展。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他的重要理论著作几乎没有不是论述唯物史观的。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社会结构学说、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学说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学说以及社会意识学说的研究和阐发。他在上述几个方面，不仅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而且提出了许多独到而又精辟的见解。

第一，他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具体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创立既是对以往历史理论合理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历史观领域中的革命变革，是继承性和变革性的辩证统一。他的论述不仅颇具特色，而且无论就其系统性和深刻性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一再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实际上是以往历史观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①。因此，为了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应当记住，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②。他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理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所作的深入研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考察是环绕着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问题展开的。他充分肯定了以往的历史哲学在探究历史动因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从法国唯物主义者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也都提出了一些给人以启迪的见解。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提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命题，不仅是他们革新要求的理论基础，而且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他十分重视爱尔维修试图用人的肉体需要解释社会发展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6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76页。

努力，认为尽管这个尝试未能获得成功，但它却“宛如一个给那些愿意继续法国唯物主义者事业的下世纪的思想家们的遗嘱”^①，提示他们应当到人的观念、意见之外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因。他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解给以肯定，认为他们关于“阶级斗争在西欧社会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投射了极其明亮的光芒，从而为科学地说明社会现象作了准备”^②。他们的这些观点后来成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材料”。他对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关于财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的思想十分重视，认为它已经接近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他对黑格尔之所以重视财产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剖析颇为精采。他指出，当黑格尔用“绝对观念”去说明历史而不可避免地碰壁时，便不得不乞援于财产关系，用财产关系去说明问题，这样，他便“常常不得不从朦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峰顶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地基上来”^③，而每当他乞援于财产关系时，财产关系也就确实确实地把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的暗礁处脱离开来。在此情形下，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便“暗中向我们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④而成为他无意中和不自觉地送给唯物主义的贡物。

在肯定以往历史理论在探讨历史动因问题上所提出的合理思想的同时，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辈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只能当作搜集材料的一种准备工作，虽然这些材料是很丰富而且宝贵的，但还不是系统化了的，还没有被一种普遍的思想所阐明”^⑤。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运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7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0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9页。

④ 同上书第482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34页。

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前人提供的思想材料进行批判的考察，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用一种同前人不同的方法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和客观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最伟大的发现”，由于这个发现，唯物主义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彻底的世界观，从而使人类第一次得到了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历史观领域中的划时代的革命变革。

为了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就应当知道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得出了哪些积极结果，提出过什么任务，解决了哪些问题，暴露了什么矛盾，是在何处失足而又是怎样失足的。只有通过以上的考察，才能真正认识到：以往的历史理论所达到的终点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所研究的起点；以往历史理论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致力于解决并且已经科学地解决了的矛盾；以往的历史理论所无法逾越的界限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突破了，在以往的哲学家所无法进入的真理宫殿的面前，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们提供了打开真理宝库大门的钥匙。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伟大意义。否则，对它的理解将是抽象的，空洞的，肤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深入探究显示出了它的重要理论价值。

第二，普列汉诺夫深入具体地阐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作出了新的发挥和发展。

普氏的地理环境理论着重论述了以下四个问题：（1）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阐明的观点；（2）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以生产力为中介而实现的，这是其地理环境理论的核心观点；（3）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一个“可变的量”，它的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

力的发展变化，这是它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
(4)人类社会有自己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它的发展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取决于周围的地理环境。

普氏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发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上述四个问题的第二、三这两个方面。

普氏强调地理环境通过对生产力的制约影响社会发展，这就不仅肯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一个贡献。他指出，是否承认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作用，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标志。在他看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错误不在于它用变化缓慢的地理环境作为解释变化较快的社会历史的原因，而在于它“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①。马克思的地理环境学说则完全不同，“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头一项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②。他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必须以生产力为“中介”，而“这就是科学研究关于自然界对‘社会人’的影响问题时所得到的结论”^③。

普氏在强调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作用的同时，还特别指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8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293页。

数”，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数”，其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另一个贡献。他认为，“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他的发展中的每一进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①又说，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界的能力增强了，因而也就使社会同周围地理环境之间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这里，普列汉诺夫表达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必然受周围地理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制约着地理环境的作用而使其不断发生变化。这就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是僵死的、凝固不变的，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这就告诉我们，决不可用形而上学静止的、僵死的观点看待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必须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和水平出发，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观点从更高的层次上回答了为什么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它之所以不起决定作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比社会历史的变化缓慢得多，因而不能作为变化较快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原因；而在于地理环境作用变化的本身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否定。

第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也作出了十分引人注目的发挥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来的。他的那一大段论述，被人们誉为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70页。

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认为它“包含着可以称为‘将作为科学出现的各门未来社会学的导论’的东西”^①。在他看来，不论《序言》多么简短，还是应该称它作“科学社会学的导论”，而这个导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的基本思想，普氏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②。他认为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它对于社会结构中的各项基本因素都给了一个相当的位置。

普氏的“五项因素公式”贯穿着以下两个基本思想：其一，它强调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则。公式的前两项说明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物质经济基础，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方面；后三项是社会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属于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也就是说，整个公式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唯物主义原则。其二，它强调社会结构就其整体来说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其内部的各种因素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也不是偶然、任意的堆积，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3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

普氏的公式是对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的具体化，它从多方面对后者作了发挥和发展。（1）它把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从马克思“经典公式”的三个方面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具体化为五个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并且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层次关系，建立了一个由下至上的“等级序列”。（2）它把社会意识具体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首次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层次的思想，这就把社会意识这一范畴具体化了。（3）它在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社会心理的同时，还指出社会政治关系对于社会心理也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通过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普氏的公式还提出了一些同马克思的“经典公式”不尽一致但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的公式却不无益处的见解。例如，它使用了“基础”这一概念，实际上认为“经济基础”可作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就狭义而言它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就广义而言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又如，它把社会政治制度看作介于经济关系和社会心理之间基本因素，实际上认为它具有二重性：相对于经济关系来说，它是政治上层建筑，其性质和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相对于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社会存在的性质，它同经济关系一起，决定人们的社会心理并进而对思想体系起决定作用。

同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相比，普氏的公式也有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公式对于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考察，是同论证社会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普氏的公式则大为逊色，它只着眼于考察社会结构各项因素之间的关系，而未能把这一考察同论证社会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紧密结合起来。就此

而言，他的“五项因素公式”和马克思的公式相比，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这后退的一面，正是普氏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这一致命弱点的具体表现。

第四，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贡献是对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学说的发挥和发展。

普氏认为，人的意志自由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乃是历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意志自由不仅不排斥历史必然性，而且相反，它是以历史必然性为自己的坚实基础的。“如果在自由的人的活动基础上没有安置着为活动者所理解的必然性时，那么任何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可能性就等于零。”^①他指出，那种把个人意志自由同历史必然性绝对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唯心主义者“在理论上”愈是给自由以更多的地位，则在“实践领域中愈是将自由归之于无”，因为正是在这里“他们不能掌握那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武装起来的偶然性”^②。换言之，唯心主义把意志自由推崇为绝对，就必然抹煞历史必然性，而一旦抹煞了历史必然性，人们在实践中就会使自己处于无数偶然性因素的支配之下，这样一来也就谈不到什么意志自由了。

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必然性与人的意志自由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和主体作用的倾向。他说：“乍一看来，如果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必然性，那末，历史中似乎就没有人类活动的地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硬说马克思强调历史必然性就意味着承认人类屈服于这种必然性。普列汉诺夫驳斥了这一观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30页。

② 同上。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页。

他指出，没有比这类指责更荒谬的了，“在庸人们看来，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势必把人类变成自动机械，可是事实上，现代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开辟了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①。他坚决反对把历史必然性曲解为历史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实质。他说，事实上，唯物史观坚持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不仅不会否定人的意志自由而使人们在历史运动面前无所作为，相反，“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给人类指出了从必然性的领域引向自由的领域的道路”^②。在人类认识史上，那种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和主体作用的唯物主义无疑是存在的，但那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是旧唯物主义。

同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问题相联系，普氏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精辟的阐述。他的论述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始终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自由与必然、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两对重要范畴紧密结合在一起考察，并以此作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钥匙。这就使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众不同，具有新的理论高度。其二，他对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解剖。他认为，要使杰出人物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杰出人物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更高，并且应更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能使杰出人物有“用武之地”，而不是妨碍其本领的施展。显然，这些特点使得他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尤富光彩。

第五，普列汉诺夫对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论述颇有深度，也颇有特色。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又都是按照这些到处都起作用共同规律发展的，这就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43页。

② 同上书第205页。

使历史具有共同性亦即统一性。可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沿着共同规律发展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却有很大的差别性而表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使人类历史具有多样性。普列汉诺夫考察了形成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的原因。他指出，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不同，另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处的“国际社会环境”的不同。但二者相比，“国际间的关系对这种发展也许有更大的影响”^①。由于这两个原因，使按照共同规律发展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各具自己的特点而呈现出了差别性和多样性。

同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相联系，普列汉诺夫还对历史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区分为“一般原因”、“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并且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联系和各自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因”，是指决定历史运动的“生产力发展情形”，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水平与状况，这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和最一般的原因，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决定的”。所谓“特殊原因”，是指“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亦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所谓“个别原因”，则是指“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它影响历史的“个别外貌”。这三种原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一般原因”支配“特殊原因”，二者结合起来决定着历史的趋势和方向；“个别原因”不仅不能根本改变“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作用，相反，它自身的作用以及它所影响的范围和方向是由“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所制约的，尽管如此，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影响历史的那些个别原因已被别种个别原因所代替，那么这个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04页。

史无疑是会具有另一种外貌的”^①。普氏的上述分析，对于进一步探讨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第六，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贡献也非常突出。

恩格斯在晚年，为了反对把唯物主义原则当作“标签”和“套语”和把唯物史观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曾高度重视社会意识问题的研究。他指出这是一个十分薄弱然而又是无限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②。在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对社会意识问题的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努力，成绩卓著。

普氏认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解释意识形态”。他写道：“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奋勉地慎重地来研究在一切领域内和一切地方的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谁要是想证明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谁就不能只是简单地重复这句话：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的，他应当竭力弄清楚，这种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是怎样发生的”^③。在他看来，这是一项“最有趣和诱人的”任务。^④

普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主要贡献是：（1）他对社会意识的结构、层次作了深入考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意识两种形式说。他不仅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这两个层次，而且对它们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2）他对社会心理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不仅把社会心理列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且指出了社会心理在思想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③ 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

④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54页。

体系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中介”、“桥梁”作用，一方面论证了在社会意识范围内，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对社会心理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社会意识的根源。（3）他从多方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意识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深入论证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他强调，只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还不是全部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补充一句：意识一经存在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就反过来促进存在的进一步发展”^①。显然，他是把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当作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普氏特别重视革命理论的伟大作用，他在1883年完成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②这一著名论断。19年后，即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几乎逐字逐句的重复了普氏的这一名言，他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系统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梅林和拉法格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无论就著述之多、思想之深刻和影响之久远来说，普列汉诺夫都超过了他们。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曾经造就了一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等苏联早期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受过普氏美学思想的直接影响。许多国家的进步的 and 革命的文艺理论家在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艺术观的过程中，大都曾得益于普氏的美学论著。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4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普氏的美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开拓，主要有：

第一，他在建立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研究艺术观与历史观的关系，并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美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把美学和艺术学奠定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使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普氏认为，艺术观从来都是从属于一定历史观的，任何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不管他们是否自觉，他们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总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观支配和制约的。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人们在研究文学艺术及其演进时，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使社会发展的潜伏力量”^①。只要人们一旦认识到艺术史和社会环境史是密切结合的，并且认识到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每一重大变化都会引起人们观念的相应变化，“社会立刻承认，必须首先辨明那些造成人的关系中的重大变化的原因，然后才能正确地建立艺术演进的规律”^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美学发展史上，一些杰出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虽曾提出过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对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恰恰由于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谬误，使他们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美学体系。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是这样，康德、黑格尔是这样，19世纪法的丹纳也莫不如此。

普氏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美学思想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必须把“历史的美学”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上面。这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唯物史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77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观。正如他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美学科学的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向前迈进。”^① 美学、艺术理论演进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它们愈是接近唯物史观，就愈能获得牢固的理论基础，从而也就愈具有理论的生命力。

普氏的“五项因素公式”既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也是他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的总纲。他运用这一公式的基本思想解决了美学和艺术理论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艺术发展的最终原因和影响艺术发展的多种因素问题。他在《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中指出：“文学、艺术、哲学等等表现着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是由构成该社会的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决定的。这些关系归根到底依存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引起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因而也引起社会心理的改变。社会心理所发生的变化，一定也多少鲜明地既影响到文学，也影响到艺术，又影响到哲学等等。”^② 这里，他着重论述了艺术演进的最终原因，即社会生产力，同时也指出了艺术发展与其最终原因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社会心理、社会政治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等等。在谈到影响艺术发展的多种因素问题时，他写道：“社会关系的改变使各种不同的‘因素’行动起来，而哪一个因素当时对文学、艺术等等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决定于许多同社会经济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原因。经济对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一般是极少看得出来的。最常发生影响的是其他因素，即政治、哲学等等。有时候其中一种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③。

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释艺术时，普氏着重批评了当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4页。

② 同上书第24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245页。

时颇有影响的三种观点，即艺术观中的生物学观点、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人性论观点。

他针对19世纪下半叶一些学者纷纷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研究艺术这类现象时指出，唯物史观所研究的领域，恰恰开始于达尔文主义者研究领域的终结。所以，艺术的研究必须“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上来，只有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才能科学回答艺术的起源及其规律。针对艺术观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普氏强调，自然环境不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地理环境只是间接地影响艺术的发展的”，决定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和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针对艺术观中的人性论特别是人种论观点，他指出，人性、人种对于艺术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它不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有石器时代的艺术和铁器时代的艺术；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白种人、黄种人等不同种族的艺术”^①。

普氏一再强调：“我毫不含糊地说，我对于艺术，就象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②这是贯穿普氏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研究始终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贡献。正是这个特点，使他在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中，沿着马克思指出的方向大大地超过了他的前辈。

第二，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个系统而又深入地阐明了艺术与审美的起源，这是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美学和艺术理论最有成就的一个方面。

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证了艺术与审美起源于劳动的观点。（1）人类最初从事艺术活动的冲动产生于劳动。他指出，游戏作为艺术的萌芽，最初往往产生于原始人想把狩猎活动中引起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09页。

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因此，总是先有狩猎活动，人同动物先发生一定的关系，然后才会产生描绘这些动物的形象和动作的舞蹈与绘画。（2）劳动不仅在时间上先于艺术的生产，而且决定着原始艺术的内容和性质。他认为，狩猎民族的绘画所表现的主题不外两种：一是对狩猎活动场面和过程的简单描述，一是对动物的形象和动作的模仿，而且往往是对那些与原始民族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几种动物的模仿。这些民族生活在鲜花遍地的地方，但在其原始艺术中却从不见有关于植物的描绘。这正说明原始狩猎活动决定着狩猎部落原始艺术的内容。（3）原始人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和审美感是在生产劳动中培养、锻炼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需要是很好的教师”，原始狩猎民族的艺术需要有“忠实地描绘自然的才能”，要求有对动物形态和动作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模仿这些动作与形态的“手的灵巧”，而原始狩猎活动正是培养和锻炼了猎手们从事艺术活动的感官和能力。^①（4）人们从实用活动向审美活动的过渡，其根本原因也应到生产劳动中去寻找。他认为，有用物品的生产先于艺术生产，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模仿快感故然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为什么描绘动物和狩猎活动的快感只有原始狩猎民族才能强烈地感受到，而在原始农业民族那里却表现的很少呢？这只能从生产活动的差别上去解释。因此，从根本上说，从有用物品的生产向艺术活动的转让的契机只能到生产劳动中去寻找，而不能单纯从快感中去寻找。同时，他还指出，艺术的最后形成和它对生产活动的直接依赖性的消失，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促成社会分工的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

普氏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艺术产生的终极原因。他从不否认促使艺术产生的其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0页。

他原因；相反，他认为在艺术的起源中，原始战争、性爱，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以及实用性因素等，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他在列举了大量事例说明原始战争、性爱、图腾崇拜以及实用性因素对艺术起源的作用之后，接着就指出，研究艺术的起源，既要考察原始战争、性爱、图腾崇拜及实用性因素的作用，又要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是怎样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为生产劳动所制约的，要透过这些因素进而揭示艺术归根到底起源于生产劳动。普氏的上述论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論的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

第三，普氏关于美感的特征也有许多精采的论述。其基本观点是：（1）从人与对象的关系来看，审美特征是主观的非功利性与客观的功利性的统一；（2）从人的心理过程来看，审美的特点是直觉性与非直觉性的统一。

康德对美感的特征曾作过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审美快感不同于感官快感和道德上的赞许引起的快感，其特点在于它不涉及利害关系，是唯一的一种不计较利害关系的自由快感。普氏反对康德把审美判断的无功利性无限夸大和绝对化以至否定审美对象与人之间存在着客观功利性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康德的定义（美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而喜爱的东西）——是不正确的”^①。但是，他又指出，从人对审美对象的主观态度上说，审美判断确实是非功利的，“兴味判断毫无疑问是以作为这种判断的个人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为前提”，就此而言，他又认为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无利害”的观点是不错的，应该为之“留下一席之地”^②。

有人曾批评普氏的上述意见表明他同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没有划清界限，这种批评是难以成立的。在他看来，审美的非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13页。

② 同上书第409页。

功利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审美的功利性。他认为，对于审美来说，“功利性毕竟是存在的”，“它是审美享受的基础”，如果没有功利，“对象也就不见其美了”^①。按照他的理解，审美的非功利性只是指人们在审美时主观上没有有意识的功利观念，即不“以有意识的实用观点来看待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对象对人不存在客观的功利关系，只是人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功利性罢了。普氏指出，不是任何有用的东西在人看来都是美的，“但毫无疑问，只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在他们向自然界或别的社会的人进行的生存斗争中具有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才是美的”^②。这正是普氏区别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论之关键所在。不难看出，在美感问题上，普氏既不是一个庸俗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超功利主义者，而是一个坚持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统一论者。他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美感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统一，这恰恰是普氏思想的深刻之处。

普氏对审美活动的直觉性与非直觉性的统一的论述也颇有深度。如果说他把主观上的非功利性与客观上的功利性的统一看作是美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区别于非审美感的特点，那么在他看来，直觉性则是美感在人的主观心理方面区别于非审美感的特点。

普氏对审美的直觉性特点概括为：（1）它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思维的能力；（2）它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性”；（3）它还具有非自觉、无意识的特点，因而属于“本能”的领域。

普氏强调审美具有直觉性的特点，决不意味着他赞同审美的非理性主义，把审美的直观等同于动物的感性直观，而是在肯定审美的属人性、社会性的前提下来探讨审美活动区别于一般认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97页。

② 同上。

和理智活动的心理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人在审美活动中采取直观的形式，理性不脱离感性并直接融合于感性之中。

普氏对审美特点的探讨极有价值，其突出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引入美感问题的研究，从而找到了美感的主观上的非功利性与客观上的功利性相统一、直觉性与非直觉性相统一的基础，并从理论上对在美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康德关于审美特征的学说作了深入的批判性的考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第四，普氏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艺术的本质与特征作了深入探讨，他的许多论述至今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仍有重要的价值。

普氏对艺术本质的看法，凝结在他关于艺术的定义里。他写道：“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不用说，在极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作，目的是在于把他反复思索和反复感觉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①

这里，普氏首先强调了“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與人之间精神交往的一种手段”^②。因此，对艺术的本质与规律的探索就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仅就艺术本身去进行。

那么，艺术是一种什么社会现象呢？普氏认为，从社会结构来看，它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普氏还进一步指出，艺术不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高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社会意识形态有两个层次，其中法权、政治、道德观点是“第一级的意识形态”；而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08页。

^② 同上书第837页。

术、哲学等则属于“高级的意识形态”^①。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与经济基础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后者则同经济基础距离较远，它们同经济基础的联系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

普氏认为，在“高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艺术又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他在关于艺术的定义中至少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艺术所表现的是作家和艺术家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与思想。在他看来，仅仅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艺术所表现的是作者的思想与感情，即内心生活。其二，在表现人的感情与思想的方式上，艺术既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宗教。哲学家是以“三段论法”、“逻辑证明”的方法进行思考和论证自己的思想的；宗教是以“虚幻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的；而艺术家则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即“以形象”来思索和体现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因此，普氏认为，凡是舍弃了形象而用抽象的形式来表现思想、情感的地方，就没有艺术创作的痕迹。

普氏的艺术定义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其优点在于：（1）它不同于那种把艺术仅仅看作是自我心灵表现的唯心主义表现论的观点，因为它把艺术家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看作是周围现实生活影响的结果，从本质上说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2）它也不同于那种简单的反映论，因为它指出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通过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和由此而激起的情感的折射，应该说艺术既是生活的再现，也是艺术家思想情感的表现；（3）它强调了艺术既要表现情感，也要表现思想，强调了情感与思想的统一和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显示了其全面性。

第五，普氏在探索艺术及其演进规律时十分重视研究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他的有关论述是其美学理论中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在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着重强调了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20页。

会心理是艺术的直接来源，艺术则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这里所说的“根源关系”和“反映关系”，不是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根源关系”与“反映关系”，而是指在社会意识范围内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普氏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其一，社会心理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诚然，文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都是个性化的，然而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是“因为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或者至少是整个社会阶层的心理”的反映。^①普氏赞扬巴尔扎克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者，说他的作品是研究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普时期法国社会心理不可缺少的史料。其二，文艺作品题材的选择，也受特定时代、代定阶级或阶层社会心理的强烈制约。他通过对17、18世纪法国戏剧和绘画题材上的变化与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深刻分析，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心理对文艺题材选择方面的强烈制约作用。其三，社会心理对于艺术的时代风格之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以法国路易十四、十五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心理的演变，具体说明了这一时期法国艺术风格的演变过程，从而揭示了艺术风格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普氏实际上把文学艺术反映社会心理看作是艺术的一个普遍规律，并且强调研究文学艺术必须重视对社会心理的深入考察。但是，他在强调文学艺术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时又特别指出，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化，不应认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都是自觉地去迎合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或者其作品都能赢得它所反映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全部理解和同情；实际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在他看来，一定阶级和“表现这一阶级的志向和趣味的思想家间的不和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②。例如，法国浪漫主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18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6页。

义文学运动是19世纪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然而它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同情”，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并不理解他们的作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努力，而法国浪漫主义者本身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在许多方面却对“愚钝的有产者”表示了某种愤慨和不满，有时甚至还公开加以抨击。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普氏首次对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明。他一方面指明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强调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社会心理这一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具体途径，从而大大丰富了对艺术演进规律的研究。

此外，普氏对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艺术发展中的继承性、文学艺术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阶级斗争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和文艺批评等问题，也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他的论述对于艺术和美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和美学理论的建设，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

对哲学史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不仅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作出了重要的发挥和发展，而且是哲学史方面的一位成绩卓著的大师。他在哲学史领域中的突出贡献，是熟练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这就使得他的一系列哲学史论著高屋建瓴，气势非凡。他特别致力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许多论述，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给人以启迪。

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方法论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他十分强调坚持和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坚持用人类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史去说明哲学史，而不是相反。

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中写道：“从我本人荣幸地置身的那个学派的立场看来，‘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如果愿意从这个立场上去研究观念的历史，就必须下一番工夫去说明一个时代的观念是怎样以及以何种方式为它的经济关系所造成的。”他认为，“作出这样一个说明，是一种巨大而有意义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使观念的形态焕然一新。”^①他一贯重视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普氏批评了那种把哲学思想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哲学家的“主观逻辑”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按照这种观点，有些人总认为费希特哲学只是遵照“逻辑的方式”从康德哲学中产生出来的，谢林哲学也只是遵照“逻辑的方式”从费希特哲学中产生出来的，而黑格尔哲学则只是遵照“逻辑的方式”从谢林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普氏指出，这种观点无法对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科学解释，它完全没有说明，从一种哲学体系过渡到另一种哲学体系为什么“有时是很快地完成的，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有时却需要一个世纪。”这种情形，归根到底还应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求答案。^②

普氏还批评了折衷主义哲学史观。这种哲学史观只看到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经济因素影响思想因素，思想因素也影响经济因素，等等，而完全忽视了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是“不等量的交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相互作用”^③。普氏指出，这种只看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没有根基的，悬在半空中的”，它不过是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页。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3页。

掩盖各种因素起源的“完全煮不烂也完全不能消化的折衷主义大杂烩”，不是接近真理，“而是窒息真理”^①。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去考察哲学史，完全忽略了哲学发展的最终根源，是难以对哲学史作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

普氏在坚持用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哲学史时，坚决反对把这一原则和方法简单化。他一再强调，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经济因素的**决定意义**，只是在“最后意义上”即“**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决不可用经济发展史去“**剪裁**”哲学史。

第二，在哲学史研究中，他坚持用历史去说明人性而不是用人性去说明历史和哲学史的原则与方法。

在马克思以前，许多哲学史著作中的说明常常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以“人性”为“最高准绳”，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据，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②。这就“**排斥了对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中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③。哈，其历史观更是彻头彻尾的人性去解释历史，“很好”地主张“**在人性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普氏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无非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抽象**”。既然如此，那么在他的哲学中“**观念**”的逻辑特性、“**理性**”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一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85页。

③ 同上书第786页。

她，便无异于从前门赶出了“人的本性”，而又“从后门放进了旧日法国启蒙派的女伴，即人的本性，不过她穿着适合于肃穆端庄老成持重的德国哲学界的服装”^①。这说明，黑格尔虽然力图摒弃用人性去解释历史的观点，但实际上，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却使他转弯抹角地接近甚至重复了这个观点。

普氏认为，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方法从相反的方面去说明问题。他不是把人性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把它视为永远发展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不管是人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于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他找到了历史的动因，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不是用人性去说明历史的变迁，而是指出，事情完全相反，正是“历史运动使人的本性具有这种或那种形态”^②。这样，马克思就“结束了这一切迷惘，这一切虚构，这一切矛盾”^③。

普氏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极为重视，并把它当作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他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哲学思想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体系的研究，都力图运用和贯彻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上述哲学思想中的人性论历史观进行了具体而又深入的剖析。

第三，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中一贯重视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他总是把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充分肯定其贡献，又指出其局限性，

①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21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83页。

甚至还深入剖析了那些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错误和失足的教训。一般地说，他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某一哲学体系，从不苛求于前人。例如，他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时指出：这派唯物主义者 and 当时的官方思想家进行了热烈的争辩，驳斥了其关于人的观念具有先天性的错误论断，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某些论点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还有错误，然而他们却有“不可争辩的宝贵的功绩，即他们是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观点上彻底思考了的，而这是能够和应该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①。

他十分欣赏黑格尔提出的不要把先天的虚构硬加到历史上的原则，认为这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他指出，黑格尔强调“应当如实地来考察历史”而不要对历史作“先天的虚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遗憾的是黑格尔本人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这一原则和方法。这是因为黑格尔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动因，因此，每当经验材料不适合他的哲学虚构时，他便扮演“削足适履”的角色，即“为了理论而曲解事实”^②。

普氏非常重视对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作历史的比较，在广泛的比较中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揭示哲学思想演进的历史线索。例如，他既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放到俄国思想史的长河中同以往的哲学作比较，又拿它同马克思的思想作比较。通过前一比较肯定了车氏的贡献，从而把他誉为俄国启蒙运动的“始祖”；通过后一比较指出车氏虽然同马克思一样都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然而他却始终保持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成为其“忠实信徒”，马克思则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通过上述比较，普氏得出结论：现在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可以对车氏的思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7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789页。

想和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指责，但对于车氏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国家来说，他的观点，甚至就连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那些观点，“也终究是极其重要和有益的，因为它们激发了俄国的思想，并且把俄国思想推上了它在前个时期尚未能走上的道路。”他的名字“标志着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整整一个时代”^①。

第四，重视阶级分析方法是普列汉诺夫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普氏历来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必须弄清楚“社会生活机制”，而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这种机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只有考察了这个推动力，只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它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才能稍微满意地弄清楚文明社会的‘精神的’历史”^②。这是因为，“‘社会思想的进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和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③在他看来，在没有阶级划分的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活动直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是依照各个阶级的地位、需要、意图，以及各阶级的相互斗争的行程而改变的”^④。因此，要想真正了解阶级社会的哲学发展史，就应当首先弄清楚阶级斗争的历史及其对哲学发展的具体影响。

普氏虽很重视阶级斗争对哲学发展的影响，但又指出这种影响的表现并非在任何时期都是一样的，它有时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时则表现得不够明显。一般地说，当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激烈时，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就较为明显，较为突出；反之，则不够

① 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③ 同上。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89页。

明显，不够突出。在笛卡儿所处的时代，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还未完全过时，特别是由于经过16世纪的宗教战争，法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相对缓和了下来，在这种情形下，笛卡儿认为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加自然科学知识，以增进人们支配自然的能力，这就使得他的哲学带有对发展生产力的极大兴趣。同是法国，一百年以后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形。这时，旧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这一斗争对法国哲学产生了强烈影响，使它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成为哲学史上著名的战斗唯物主义。所以普列汉诺夫说：“如果笛卡儿哲学出自社会和平的要求，那末18世纪的唯物主义则是新的社会动荡的预报者。”^①

在考察阶级斗争同哲学的关系时，普氏反对那种把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尤其反对那种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强加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的错误做法。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总是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看作在任何时候都会自觉地迎合本阶级的利益。普氏驳斥了这种意见，他指出：“当马克思说，特定的理论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时，他绝不想如此说：在这个时期内统治着的阶级的思想代表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去迎合自己的多少富裕和多少宽大的恩人的利益”^②。

第五，普氏十分重视对哲学同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并把它作为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氏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探究哲学思想及其演变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学说，而且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要想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9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23页。

了解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和其他思想发展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地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的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①

关于哲学和社会心理的关系，普氏着重强调了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社会意识范围内，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哲学思想则是对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

这一思想是在他的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中提出来的。他把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个层次，并且指出，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思想体系都是一定的社会心理特性的反映。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②。又说：“‘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起来的一切意识形态。”^③这里所说的“一切意识形态”或“一切思想体系”，无疑包括哲学在内。正因为他认为社会心理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体系的根源，所以他在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视考察哲学思想的演进同社会心理之间的联系，认为这是深入了解各个时代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他在剖析笛卡儿哲学的特点时，特别考察了它同当时法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笛卡儿哲学之所以一方面要求增加自然科学知识以增进人们支配自然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向宗教妥协，甚至还努力论证天主教的某些教条，这是因为，“他的哲学很清楚地表现出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273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34页。

法国人的情感”^①，即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所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16世纪的法兰西，经过了于格诺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长期流血的“宗教战争”之后，人们普遍对战争、动荡产生了恐惧情绪，而强烈地要求和平、秩序，向往平静和安宁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心理，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同情君主制度，反映在思想上则表现为同宗教唯心主义的妥协，当时，法兰西人唯恐同宗教的争论会破坏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使昔日令人痛苦不堪的“宗教战争”重演。普列汉诺夫指出，笛卡儿哲学的二元论性质，特别是对宗教唯心主义所采取的容忍、妥协态度，正是反映了当时法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上述社会心理。在谈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特点同当时法国第三等级社会心理的关系时，普氏认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所以是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同当时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法国第三等级迫切要求推翻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从宗教的统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它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在哲学上的表现。所以普列汉诺夫说：“请您回想一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您就会明白全部法国哲学，在它的一切细节方面，受到当时反对僧侣和贵族的第三等级的心理的多大影响。”^②

必须指出，普氏是在社会意识的范围内强调社会心理对哲学思想具有根源性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把社会心理说成是哲学思想的根源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过去，苏联的一些哲学家之所以指责普氏强调社会心理是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陷入了二元论”，“开辟了通向唯心主义的道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普氏的这一前提。在这个问题上，普氏是否陷入二元论和通向唯心主义，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承认社会心理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思想体系的根源，而在于他对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91页。

② 同上书第299页。

会心理的根源作怎样的解释。如果他只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而否定社会心理源于社会存在，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如果他不是在否定而是在肯定社会心理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承认在社会意识范围内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那就从原则上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普氏关于社会心理的大量论述证明，他所坚持的乃是后者而决非前者。

其二，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

普氏一方面强调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强调它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他指出，社会心理是社会关系的结果，更确切地说，社会心理“必然地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们获得食料的方式。社会心理永远服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①。作为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介的社会心理，其中介作用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对哲学思想的决定作用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二是哲学思想反映社会存在要以社会心理为桥梁；三是哲学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来实现。

既然社会心理是哲学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间环节，那么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就必须把它放到视野之内，而不容忽视。要善于通过社会心理把握哲学和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否则就难以对哲学思想演进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见解，对哲学史研究工作极为重要，可惜长期以来人们未曾给以应有的重视。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5页。

别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民粹主义、经济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宣传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阐释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针对俄国民粹派否认政治斗争、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错误观点，着重阐明和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思想，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适合于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大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只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团结人民群众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就能推翻沙皇政权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对《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极为赞赏，曾把它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

为了深入论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政治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实现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首先揭露了俄国民粹派否认政治斗争错误主张的理论渊源。

普列汉诺夫抓住民粹派否认政治斗争这个要害问题，深刻剖析了其思想体系，指出俄国民粹派否认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崇拜群众的自发性，无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并不是他们的新创造，而是继承了其前辈的衣钵，其理论渊源乃是蒲鲁东、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写道，俄国民粹派把社会主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不相容的，这一错误观念的理论根据，首先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国家学说；无论是蒲鲁东或巴枯宁，都把“不干涉政治”视为自己实际活动的基本信条^①，他们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9页。

的观点对俄国民粹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尽管民粹派中的不同派别如“前进派”（拉甫罗夫的信徒）和“巴枯宁派”（巴枯宁的信徒）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但它们“在对待政治持消极态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①。同时，俄国民粹派否认政治斗争的错误观念也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消极地看待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他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看作是对他们所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新福音”的不信任。普列汉诺夫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政治”的这一消极态度传给了俄国民粹派，于是便在他们那里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除了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依靠极少数人进行阴谋主义的个人恐怖活动之外，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不适宜的。

接着，普列汉诺夫便着重论证了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普氏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只要经济发展过程已经引起社会中阶级的分化，这些阶级的利害冲突就必然使得它们为争夺政治支配权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中，而且也发生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在古代东方诸国家，我们看见战士与僧侣之间的斗争；古代世界史的全部戏剧性就是贵族与庶民，望族与平民的斗争；中世纪产生了城市人，他们尽力在自己公社的范围里夺取政治的统治地位；最后，现代的工人阶级同在现代国家内达到了完全统治的有产阶级进行斗争。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权力总是一个杠杆，借助于它，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实现为它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②

普氏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的原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但政治因素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当社会历史发展到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时期，政治因素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变得更加突出了。他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上，有许多转折点，如果用A、B、C、D等字母来标志这些转折点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从A点发展到B点，从B点发展到C点，如此类推，一直发展到S点，这种发展，“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平面上进行的”。为了从A点过渡到B点，再从B点过渡到C点，“每次都必须上升到‘上层建筑’并在那里进行一番改造。只有当完成了这种改造之后，才可能达到预期的点。从一个转折点到另一个转折点的道路，总是要通过‘上层建筑’。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关于它永远不能说：自然而然的‘活动’。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①。这清楚地说明，人类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过渡，决不是社会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必须通过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这就从人类社会发
展一般规律的高度深刻地论证了政治斗争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以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斗争的历史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具体地论证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有完全确定的经济意图，但这一斗争必然走上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治权力的道路。新兴资产阶级有时拿起武器，有时通过和平的协定，有时为了自己各城市共和政体的独立，在几个世纪的时期内同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进行了不断的顽强的斗争，终于使自在社会中达到了完全的统治。它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已经达到的经济进步和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通过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总是巧妙地利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37页。

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成果进而在经济领域中去获得新的胜利。他指出，当资产阶级走到自己的历史尽头和无产阶级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唯一代表的时候，同样可以看到与上述情形相类似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正在走上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它越是自觉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就越要形成自己的政党，为夺取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斗争。当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初期它还是社会进步理想的代表时，它所创立的社会制度曾经满足过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也就完结了，它从社会进步的代表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敌人。这时，它将更加利用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政治权力便成了它手中最有力量的反动工具。为了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只要国家机器还掌握在旧秩序的代表者手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被压迫阶级如果企图从敌人手里夺取国家政权并把它转向自己的敌人，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最后才全面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地位，也才真正理解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同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时，它便不再向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机关申诉剥削阶级对自己的压迫了。它认识到国家机器是保卫剥削阶级的“要塞”、“屏障和防御物”，为了彻底摆脱压迫和剥削，就必须占领这个“要塞”。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的逻辑本身必然推动着无产阶级走上政治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因此，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说：“所谓革命只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长剧中的最后一幕，这一斗争之将成为自觉的，只是因为它成为政治的斗争”^①。他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乃是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5页。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他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忽视和否认政治斗争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者们”如果阻挠工人过问政治，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就会剥夺了工人们所赖以进行斗争的据点，使他们没有可能来集中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打击对准他们的剥削者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①。这样，工人们就只得同个别的剥削者们，或者，最多同这些剥削者们的个别集团进行游击战，而国家的有组织的力量则始终是站在资产阶级那一方面。所以普列汉诺夫说，实际上，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就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间接支持”。如果社会主义者的纲领正是在需要对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作出政治总结的那个“关键地方”把它截断，就无疑于在工人的眼里缩小了这些纲领的实际意义，因为工人阶级已经知道对个别剥削者进行散漫的斗争是毫无结果的。他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凡是不愿意听到政治斗争的人，他因之也就会拒绝参加任何阶级斗争。”^②他说，如同当年蒲鲁东由否认政治斗争进而走向阶级妥协一样，事实上，俄国民粹派后来也由否认政治斗争进而转向与沙皇专制制度的妥协。

普列汉诺夫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是一场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将一直进行到底，就象当年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消灭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当时应当掌握政权；为了埋葬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样也应当掌握政权。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任务是由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本身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一些抽象的议论所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只有从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5页。

②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46页。

克思时代起，社会主义才立足于阶级斗争基础之上，因而也才从空想变成科学。因此，社会主义者如果拒绝理解和掌握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就等于使自己失去了有力的武器。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对俄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指出坚持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乃是能够使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道路。这是对民粹派等否认政治斗争错误主张的有力驳斥，同时也给俄国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然而，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后来他放弃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者演变为机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者。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对马克思以前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这对人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有一定价值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早在马克思以前，一些思想家就已经对阶级斗争现象予以重视并进行了探讨，人们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19世纪2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对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明确的程度，以致于只有《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才超过了他们。

在考察马克思以前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线索时，普氏着重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杰出代表圣西门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圣西门在西欧历史的研究中对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极为重视，认为工厂厂主同封建贵族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充满了15世纪以来的全部西欧历史，并且决定着西欧历史的进程。圣西门在1802年出版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里论述了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关系，并用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去解释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普列汉诺夫说，如果说这一观点在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里还处于萌芽状态，那末在其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完整得多了。他“对于阶级

斗争在西欧社会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投射了极其明亮的光芒，从而为科学地说明社会现象作了准备”^①。然而，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他们虽然看到了无产者同资产者之间的对抗，却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首创作用。普氏指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便一视同仁地向现代社会的一切阶级呼吁，他们在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时不是把这些阶级分开，而是尽可能地把他们联合起来；不是以历史的客观进程为依据，不是诉诸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斗争，而是诉诸人性，诉诸人们的“善良感情”。这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陷于“空想”的关键所在，也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的突出表现。

普列汉诺夫指出，圣西门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对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无论是基佐、米涅，还是梯叶里，对于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都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他们看来，欧洲社会中最主要的社会力量是封建贵族和第三等级，它们之间的斗争决定着欧洲历史的发展。第三等级的力量越壮大，它们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越发展，封建制度就越接近崩溃，革命的时代也就越将临近。他们还试图进一步揭示阶级斗争同相互斗争着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关系。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被梯叶里当作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来描写的；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也是被米涅当作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来描写的。普列汉诺夫指出：“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比他的其他著作更清楚地表明，他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有多么明确的认识。他清楚地了解到革命时期各种政党的斗争只是表现了各种阶级利益的矛盾。”^②法国历史学家注意探究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利益的关系，这在阶级斗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3页。

学说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

普列汉诺夫对基佐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给以很高的评价。基佐和米涅、梯叶里一样，也把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史“描写成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①。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革命的起源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在英国，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开始对封建阶级的暴政感到不能容忍，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迫切需要对暴政加以限制，于是便开始了对封建阶级的革命斗争。尽管这一斗争的进程是曲折复杂的，但最终的结局是资产阶级获得全胜。在法国，旧的秩序和新的法兰西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任何想使它们调和的意图都是幻想，这一斗争实际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表指责基佐宣传阶级斗争煽起了社会的“邪恶情绪”时，基佐回答说，他不过是概述法国的历史而已。他指出，法国的历史充满着阶级斗争，或者说法国的历史是由阶级斗争所构成的；阶级斗争既不是一种理论，又不是一种假定，而是一种简单的事实，看到这种事实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否认它则是令人可笑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基佐在考察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时，还十分重视阶级斗争“对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对‘社会阶层’中逐渐形成的思潮的影响”^②。他以基佐关于阶级斗争对于法国文学发展史的重大影响的论述为例，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社会关系和思想潮流之间的因果关系”深有了解。例如，基佐认为，戏剧的命运反映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在他看来，在古希腊社会事务由全体人民掌管，戏剧便成为反映一切社会成员的习惯和爱好的“全民娱乐”；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社会成了各种不同阶级复杂的结合体，戏剧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上等阶级”的娱乐品，这种情况使戏剧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上等阶级”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625页。

② 同上，第526页。

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往往竭力设法把自己同社会其他部分的人们隔离开来和疏远起来，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人民所固有的纯朴的习惯和素质而充满矫柔造作的习气，因此艺术创作领域也就逐渐变得狭窄和贫乏了；英国贵族由于鄙视人民，因而也鄙视莎士比亚，把莎士比亚视为缺乏教养的人；法国悲剧则是“上等阶级”创造出来的，因此，随着法国旧制度的崩溃，它的时代也就过去了，革命为新的戏剧体系开辟了道路。普列汉诺夫指出，对于基佐的上述意见，尽管在一些“个别的细节”方面可以提出异议，但是却不能不承认他所指出的研究社会关系与思想潮流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事实上，后来法国文学界中最有才华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为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文明人类的思想史准备了很好的基础”^①。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虽然看到了阶级斗争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作用，但他们毕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米涅始终是“‘中等阶级’的一个自觉的、公开的、彻底的代表者”^②。基佐的政治活动则“更明显地暴露了他的阶级观点”，他自己就公开申明他始终不渝的政治意图是“巩固‘中等阶级’的统治”^③。这一切都说明，法国历史学家毫无例外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描述阶级斗争的，他们的理想是资产阶级获得社会的政治统治。所以普列汉诺夫说，当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贵族的革命斗争时，法国历史学家都自觉地、热烈地颂扬其光辉业绩，甚至热情歌颂过它的暴力行动；但是，一旦当无产阶级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时，他们便成了无产阶级的敌人，这时，他们便由宣传阶级斗争转而宣传“社会和平”了。普列汉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7页。

② 同上书第524页。

③ 同上书第527页。

夫指出，尽管法国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发生了上述变化，但他们不仅对阶级斗争现象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对阶级斗争历史重要性的信念是那樣的强烈，以致于当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恐惧过去之后，就又用以前的语言来说话了，例如基佐在185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就又重申了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这说明，法国历史学家的“科学良心胜过了对于‘新战士’的恐惧”^①。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法国历史学家对阶级斗争的态度，比那些从来不敢提阶级斗争的学者们对于科学真理的尊敬是多得不可比拟的。

这里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以前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作了描绘，提出了一些颇为深刻的见解，然而他在阐述它们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时却过分地强调了二者之间的思想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

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论证 当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曾经对伯恩施坦等人反对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保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

他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中写道：“伯恩施坦先生认为，在现代的民主国家内，工人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必要使用暴力。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②他指出，伯恩施坦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之所以会有此种“过于乐观的看法”，是由于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断关怀的结果”，是由于他“害怕惊吓了他们。”普氏列举大量的事实批驳了伯恩施坦的这种机会主义论调。他说，现在法国拥有民主宪法，但是凡是熟悉这个国家内部生活的人，谁也不能担保这个国家的无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② 同上书第563页。

阶级将来不会被迫公开以暴力反抗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美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在那里只有经过内战才能使黑人得到解放，因而也不能担保美国无产阶级在为自己的解放扫清道路时不需要采取暴力。伯恩斯坦曾宣扬：“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际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可能而且必须使现代社会制度不经历抽搐性的动荡而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去的形式和条件。”普氏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确实希望不经过动荡而完成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过渡，但这完全不是否认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究竟是否通过暴力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选择并不决定于他们自己，而是决定于环境。“正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预见到工人阶级在争取自己的统治权时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所以它在原则上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手段。它应该铭记着那些金科玉律：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①

恩格斯逝世以后，机会主义者们极力歪曲他在1895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硬说恩格斯晚年改变了对暴力革命的态度，主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避免暴力行动。普列汉诺夫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在那篇导言里确实曾建议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利用合法手段进行和平斗争，但是并未改变对暴力革命的态度。他认为，恩格斯的建议是根据以下三个理由提出的：（1）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是工人群众觉悟的高度发展，而这需要时间；（2）德国的保守派正在竭力设法引诱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起义，企图粉碎它，从而使它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途夭折；（3）由于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街头起义的任何尝试都是没有希望的。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恩格斯的前两条理由“并不是一般地指责暴力行动，而只是指责过早的暴力行动，因此，这和那些无论怎样也要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4页。

‘和平发展’的卫道者们的论据是毫无共同之处的”^①。至于第三条理由，“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它的意思就并不完全像乍看起来的样子了”^②。他说，恩格斯在发挥这条理由时指出，1848年以前巷战往往使武装起义者取得胜利的原因说明，武装起义者只有在他们能够动摇军队精神上的坚韧性的地方和时候才能取得胜利，但现在并不具备这个条件。这是因为，起义不能象1848年那样依靠所有阶层人民的同情，起义者难以得到适当的武器，同时自1848年起各大城市都增加了许多新的街区，这对起义者建筑街垒十分不便。所以，恩格斯问道：“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他接着说：“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③普列汉诺夫指出，恩格斯在这里讲得如此明确，它表明机会主义者硬说他改变了对暴力革命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普氏还特别强调，乍一看来，恩格斯的意见似乎带有一般的性质，其实它是完全根据德国的特殊情况得出来的，只“具有独特的、局部的意义”^④。

普列汉诺夫在全面阐明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之后指出，假如把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和《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论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在晚年对公开起义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部分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宣言》认为公开起义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恩格斯在晚年则承认在一定形势下合法的斗争方式也可以获胜。他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完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95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6—607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6页。

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是却不能把它同《宣言》的思想对立起来，因为它同工人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并不发生任何矛盾”，他“只不过说明了为使这种行动获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①。

反动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马萨利克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面目出现，攻击恩格斯的导言“完全放弃了革命。”普列汉诺夫批驳道：恩格斯在说暴力行动的方法不适当时，“只是指现代德国而言，而根本未赋予自己的论据和结论以‘批评家’所强加给它的那种一般的意义。”他又说，不久前巴黎《社会党人》杂志所发表的恩格斯给拉法格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信发表以后，“所有关于恩格斯暮年‘变得聪明’和‘不再做革命家’的高谈阔论，都失去了任何意义”^②。普氏所指的是恩格斯1894年3月6日和1895年4月3日给拉法格的两封信。在前一封信中，他批评了李卜克内西未经他的同意就在《前进报》的社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他那篇导言中的话。他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很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③可见，普列汉诺夫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问题的论述是完全附合恩格斯本人的原意的。

关于社会主义者是否应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积极和坚决，就必须逐步将无产阶级同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8页。

② 同上书第7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

产阶级的利益根本相对立的意思愈来愈多地灌输给无产阶级。一切能够说明这种意识的，都应被认为是革命的工具，社会主义者就可以采纳；而一切足以蒙蔽这种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则必须谴责和否定。他说，“这就是我们全部策略所根据的主要原则”。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可能害多利少，因为参加的结果，将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①。但他又指出，一切原则都有例外，一切原则如果绝对化都要变成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让自己的代表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权并不属于某个党员，而应当属于党。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速瓦解这一直接而明确的目标下，“才可以决定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②。

“强力和暴力完全不是一回事”^③。这是普列汉诺夫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很欣赏米涅的一句话：只有强力才能使自己的权力得到承认，除了强力之外再也没有最高的统治者。他认为，在第三等级与贵族阶级斗争的时代，再没有比米涅这种说法更正确的了。即便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代，事情也仍然是如此。在他看来，如果企图使工人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强力已不具有它在“旧制度”下的那种意义，那就对他们讲了“显然是惊人的谎话”，这只能延长和增加“分娩的痛苦”。他认为，各个阶级的势力“总是决定于它的强力。”但是，强力并不等于暴力；暴力只是强力的表现形式之一。无产阶级为了使他的势力得到承认，“并不一定总是需要暴力”，“暴力的作用有时缩小，有时扩大，这要以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为转移”^④。他一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502页。

④ 同上书第503页。

再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表现自己革命强力的形式的选择不是取决于它的善良的意愿而是取决于环境。能更可靠和更快地导向对敌人胜利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而假若‘暴力革命’在某一国和一定情形下竟是最便利的行动方式，那末，谁要是提出在原则上反对它的意见，正如伯恩斯坦先生提出的‘低级的文化’、‘政治上的返祖现象’等等那样，谁就是可怜的教条主义者，假如不是叛徒的话。”^①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意见从原则上说是对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特别是暴力革命思想的阐发。然而，当他演变为机会主义者之后，他就极力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则，在无产阶级最需要拿起武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公然宣扬新社会的“产婆”是“实力”而不是“暴力”，公然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也驳斥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谬论。

伯恩斯坦在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时，把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一种“政治遗传”，说什么在文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现时已不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一种“空谈”。普列汉诺夫批驳了这一论调，他指出，某一阶级的专政，就是该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可以使它支配社会上组织起来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镇压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它的利益的各种活动，凡是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地方，相互斗争着的阶级都必然力求取得对敌人的完全胜利和彻底统治。当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时候，当它相信无论多么激烈的暴风雨也不会打沉它的航船的时候，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并不反对阶级专政，而是力图以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阶级的专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42页。

政。然而，每当无产阶级明显而有力地表露出这种意图时，他们便喋喋不休地借口所谓道德、正义而加以责难和反对。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自卫”的一种本能罢了。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也不应当去赞扬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所呼吁的那种所谓的道德和正义。他指出：“达到政治统治地位的革命阶级只有当它用国家政权这一有力的武器打击反动势力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保持得住这一统治，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比较安全地避免反动势力的打击。”^①“谁擒住魔鬼，谁就不会放它。”普列汉诺夫借用歌德《浮士德》的这句话来说明无产阶级建立自己专政政权的必要性。

普列汉诺夫还进一步揭露了伯恩斯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要害。他说，如果伯恩斯坦抛弃唯物主义，宣扬回到康德去，只是因为康德主义为宗教迷信留有余地，如果伯恩斯坦反对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的学说只是因为它会妨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接近，那么，他不喜欢无产阶级专政则仅仅是由于它连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听起来都“非常刺耳”。伯恩斯坦“最关心的是如何不吓坏民主的资产阶级”^②。只有象他这样的“完全丧失了‘最终目的’的任何概念，而只想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方面‘运动’的人，才会认为工人们指出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一句空话”^③。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国家问题上就存在着错误的倾向。列宁在评价他发表于1894年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时，一方面肯定了其贡献，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其错误，特别是批评了他“对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10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60页。

③ 同上书第561页。

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①这正是他后来堕入机会主义泥沼的思想理论根源之一。当他演变为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之后，就公开投入资产阶级怀抱，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理论上到实践上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四节 普列汉诺夫理论观点 上的主要错误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理论观点上就表现出了某些不彻底性。随着他在政治上向机会主义的演变，其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原则性错误也逐渐暴露出来，甚至恶性膨胀，尤其是在那些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较为密切的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他在理论观点上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旧唯物主义倾向 主要表现在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所强调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原则区别的话，那么在他转向机会主义之后，就逐渐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倒退。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原本十分重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的批评，认为这些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就是在他开始向机会主义演变的头几年，也还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这时，他一方面强调“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直接来自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发生出来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但另一方面又指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对费尔巴哈认识论的“天才修正”，并且强调，马克思的这个天才修正由“时代精神”所提示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1915年完成的长篇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0页。

论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中写道：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其实，“从费尔巴哈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思想。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唯心主义的基本缺点在于：‘它仅仅从理论的观点来考察世界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问题，而世界之成为论断的对象，只因为它起初成了愿望的对象’”^①。普列汉诺夫指出，费尔巴哈写这段话的时间虽然在马克思的上述论断20年之后，但时间的先后未必有什么意义，“因为关于哲学理论脱离实践活动对哲学理论有致命影响的思想是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整个精神完全符合的”^②。他唯恐人们弄不懂他的意思，还特地为这段话加了一个注解：“我认为我有义务指出：在我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并不是完全这样来叙述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上述方法论问题上的关系，我想，现在我把这种关系阐述得比较正确了”^③。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注释极为重要，他以十分鲜明的语言告诉人们：7年前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曾说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点是不懂得实践，马克思在《提纲》中对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而7年之后，他认为这样的认识则应该修正了。怎样修正呢？他斩钉截铁地说：必须承认，在实践问题上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具有同样的思想”，只有这样来认识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关系才是“比较正确的”^④。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转变。

正是基于这个重大转变，普列汉诺夫对他原来认为马克思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7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完全正确”的批评才提出了反驳。他说：“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①。这里，他完全抹煞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同费尔巴哈实践观之间的原则区别。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实践活动是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物质性活动，它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自身也会发生变化。而在费尔巴哈看来，实践不过是感性的直观，他既不了解实践的社会性，也不了解实践的历史性，尽管有时他也表达了一些较为深刻的见解，但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和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费尔巴哈则始终未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他的实践观是同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相脱离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上述批评，清楚地表明，当从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演变为机会主义者之后，在实践观上发生了一个大倒退，即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倒退为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实践观。

机械论错误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虽然在历史观领域的某些方面表现出了机械论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必然性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上，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坚持了辩证法。但是，当他在政治上转向机会主义以后，其机械论倾向便愈来愈突出，愈来愈严重了。

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关系问题上，他日益陷入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最后终于重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蹈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所宣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①的覆辙。正是这一错误理论观点，构成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理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深刻地暴露了帝国主义世界的尖锐矛盾。战争给帝国主义带来了政治、经济危机，使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列宁深刻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帮助了革命，开辟了革命的新纪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制定了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反。他所抛出的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路线，其主要理论基础就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们所宣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十分落后，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看来，当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促进社会生产力亦即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为无产阶级在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曾把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宣布为自己的终生奋斗目标，并且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不仅未能摆脱第二国际“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的羁绊，而是把这一理论奉为信条，实际上却把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看作是遥远的未来的虚无飘渺的事情。他在大战期间所写的《论战争》中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直认为经济归根到底始终比政治强大有力”，从这个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82页。

观点出发，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得到迅速发展，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失败，则只能大大地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会大大地推迟俄国政治解放时刻的到来。”因此，他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积极支持政府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也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这就不仅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看得十分遥远而渺茫，而且把这个遥远而渺茫的希望寄托在沙皇帝国侵略战争的胜利上。

“二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二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正确地分析了俄国的革命形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及时提出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针。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这个方针，其理论依据仍然是“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他在《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一文中污蔑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提出的实现革命转变的正确主张为“梦话”、“空想”，而把他自己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主张说成是正确方针。为了给自己的错误主张作辩护，他在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句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的名言之后，接着就说：马克思的话意味着“远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抽象地看，普氏的上述意见似乎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当一种生产方式还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生产方式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然而，普氏所坚持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正确原则，而是以“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对马克思的正确原则作了曲解。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以尖锐的语言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情形如何？我们

有没有根据断言，我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它达到了这样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完全不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相反，而是阻碍它的发展呢？”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他写道：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是“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在俄国“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他断言，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只是为“遥远的未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夺取政权，是荒谬的”^①。

普氏的上述观点与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虽然比英、美、德、法等国落后，但它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其经济、政治制度已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如此，当时的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沙皇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和俄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当时的俄国成了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下的薄弱环节。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而又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所出现的新情况和俄国面临的种种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原理，并选择俄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庸俗化了的所谓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24页。

‘生产力论’”的破产。然而，普氏对自己的失败并不甘心。就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他依然顽固地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对这场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大肆攻击，其理论根据还是“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发表文告，用“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歪曲恩格斯的思想，进而攻击十月革命。他把伟大的十月革命说成是“令人痛心的事变”，说这一事变使他想起了恩格斯的话：工人阶级最大的历史灾难莫过于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那么，“俄国工人阶级是否已准备好现在就建立自己的专政了呢”？他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接着就回答说：“凡是稍微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以坚决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①他认为，只有当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居民中“占多数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占多数，就要高度发展生产力，这就必须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他看来，经济落后的俄国，当工人阶级在全体居民中“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时，“无产阶级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在此情形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把政权“强加给了俄国工人阶级”，“这不仅意味着把它推上了最大历史灾难的道路”，而且也“把整个俄国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②。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观点，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已经完全背离了原来所坚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的原则，而深深地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泥潭之中。正是形而上学机械论，牵引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机会主义深渊。

阶级调和论错误 当普列汉诺夫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积极护拥者和热情宣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54页。

^② 同上。

传者。然而，当他开始向机会主义者演变之后，就逐渐离开以至最终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成为阶级调和论的鼓吹者。

普列汉诺夫的阶级调和论观点，最初表现在鼓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无原则调和上。他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斗争，主张向孟什维克作无原则的让步。他借口所谓“灵活性”，公然宣扬不要永远仇视修正主义，说否则就要犯“形而上学”、“直线性”的错误。他的调和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受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但是，他非但没有接受批评，反而一方面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原则斗争是“抓住小节不放”，表现了“排他性的宗派精神”^①，另一方面又极力为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作辩护，把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美化为“地地道道的马克思主义者”^②。这些观点就其形式而言虽是调和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党内两个派别之间的原则斗争，但实质上却带有阶级调和论的性质。

第二国际时期当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论战时，考茨基曾以“中派”的面目出现，打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旗号，实则掩护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至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危险，而考茨基本人也终于堕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曾几何时，当年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考茨基的调和主义、折衷主义进行过斗争的普列汉诺夫，而今却步考茨基之后尘，扮演了同样的极不光彩的角色。如果说当年考茨基曾经历了一条从“中派”进而演变为右派的道路的话，那么普列汉诺夫后来所走的也正是同一条错误的路。

普氏阶级调和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05年民主革命时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在1905年俄国民主革命时期所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页。

^② 同上。

提出的“分开走，一起打”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以对俄国社会阶级状况的错误认识和阶级调和论观点为理论基础的。他从俄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出发，得出了俄国资产阶级是革命主要动力的结论。他主张，在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应当把政治斗争的领导重担那怕是部分地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肩上；否则，“就会违反革命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①。从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错误认识出发，普氏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同资产阶级“互相亲善”、“并肩行进”^②的错误结论。那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领导谁呢？谁跟谁走呢？他回答说：如果要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那就等于给社会民主党人签署了“死刑判决书”；如果要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则无异于“向壁清谈”，“在荒漠上发出呼声”，是毫无意义的。既然无产阶级不能跟着资产阶级走，而资产阶级也不愿意跟着无产阶级走，那么二者就应“分开走，一起打”。也就是说，它们应平起平坐，平行领导，各走各的路，在这个前提下联合起来一起打击沙皇制度。普氏这一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片面地强调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搞阶级投降主义。

普列汉诺夫不仅提出了上述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由于他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作系统的理论论证，这就使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披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因而更有理论气势，也更有欺骗性，其危害性也就更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简而言之，说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给俄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危害，要比当年伯恩斯坦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危害大百倍。

普列汉诺夫的阶级调和论错误，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展到了顶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上）第148--149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点。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普氏回到了俄国。他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极力鼓吹实行阶级合作，支持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代表所组成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将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呼吁国内各阶级“互相让步”，“实行联合”，并且宣称各阶级的联合和合作是头等重要的革命行动。他甚至还劝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提出“显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本性所不能接受的条件”；否则，“就意味着预先有意识地排斥同它达成协议，破坏联合。他极力宣扬，“俄国得救之道不在于国内战争，而在于两大阶级达成自觉的、全面考虑的、有计划的和诚恳的协议。”这无异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当作包治俄国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为了实行阶级合作，他公然提出无产阶级应坚决放弃夺取政权的企图，说什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现在对这个阶级来说是最大的不幸。”他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更加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调和论观点。他一方面呼吁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而不要同它“散伙”，另一方面又劝说资产阶级“广泛地改革社会政治制度，把工人阶级从迄今所处的使它自己感到痛苦也使整个俄国蒙受耻辱的那种穷苦奴隶的可怜地位解脱出来”，以便“广泛地发展生产力”^①。这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痛苦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寄托在资产阶级的“天良发现”和“开明恩赐”上。

普氏鼓吹阶级合作论是同他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其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一，而他的阶级调和论观点又是同他以“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为主要内容的机械论观点密切相联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俄国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摆在俄国社会各阶级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390—392、303—304、324—325、329—329页。

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力。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利益，就应该同资产阶级寻求“经济上和政治上达成协议途径”，实行“政治的、经济的全面合作”；倘若无产阶级想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它就会因此而使整个国家以及它自己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学会“象蛇一样灵巧”，并运用这种“灵巧”去指挥自己的“一切行为”，“竭力去同工商业阶级的代表达成协议”，“团结起来”；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将会完蛋”，全国也都“将会完蛋”^①。

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拼命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论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他已彻底背弃了自己曾经信奉并维护过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 普列汉诺夫对待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如前所述，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已初见端倪。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睬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②果然，后来普列汉诺夫正是在国家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机会主义泥潭。

如果说他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他政治上转向机会主义之前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他政治上转向机会主义之后就越来越突出了，甚至发展成为一整套机会主义观点。他步伯恩斯坦、考茨基之后尘，极力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公然用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普列汉诺夫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首先在对待沙皇政府的代议机构——国家杜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在俄国第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328—32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1页。

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沙皇政府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对付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它一方面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实行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则用召开国家杜马的手段玩弄欺骗伎俩，企图以和平民主的骗局引诱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脱离革命斗争。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识破了沙皇统治者的骗局，揭穿了国家杜马是沙皇政权主要统治工具之一的阶级实质，实行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则积极支持国家杜马，企图使群众相信仿佛不必经过武装起义，不必经过革命斗争，就能建立人民所需要的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个重要时刻，普列汉诺夫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连续发表文章，美化国家杜马，散布立宪幻想，实际上起了瓦解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作用。他一方面把作为沙皇政权统治工具的国家杜马说成是以大多数人民代表的信任为依据并受到人民欢迎的“人民代表机关”，号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马”，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说什么“不要点起阴谋家起义的篝火”，应在“文火”上把官僚制度慢慢地“烤熟”^①。列宁对普氏的上述错误给以有力的揭露和批评，他指出，普列汉诺夫完全陷入了立宪幻想，他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正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而迁就自由派不彻底、不明白的任务。

普氏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如前所述，二月革命后所成立的临时政府乃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它对内镇压人民群众，对外维护其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然而普列汉诺夫却极力掩盖其阶级实质，把它说成“不是某一个社会阶级的政府”，而是“反映民主派意图和要求的政府。”他顽固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一切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把人民群众反对临时政

^①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下）第23页。

府的斗争污蔑为“无政府主义”，甚至呼吁人们支持临时政府同“无政府主义势力”作斗争，只给自己保留“批评政府某些个别错误的权利。”他特别反对人民群众起来打倒临时政府，说什么用“打倒”的口号反对临时政府，企图把它推翻，无异于“点起内战的火焰”^①。正如列宁所说，此时的普列汉诺夫已完全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充当了“资本的奴仆”。

反对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普列汉诺夫的阶级调和论和对待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曾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话，那么当他转变为机会主义者之后就完全站在这一学说的对立面了。他一再散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是有害的”谬论，极力鼓吹为了“避免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俄国社会各阶级必须组织“联合政府”，并把他的上述机会主义观点自诩为“真理”^②。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俄国工人阶级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之后，普列汉诺夫竟把它说成是“非常悲惨的后果”，并为之感到痛心。他甚至说：“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不坚决果断地反对由一个阶级或者——比这更糟的是——由一个政党夺取政权的政策，后果将更加悲惨。”^③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此时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已充当了资产阶级尾巴，堕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普列汉诺夫理论观点上的上述错误，是同他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密切相关，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他的错误理论观点构成了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

①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202—206页。

② 同上书第71—75页。

③ 同上书第466页。

思想理论根源；另一方面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又对其理论观点上的错误产生重要影响并促使它进一步恶性发展。弄清普列汉诺夫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如同弄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一样，无论对于正确评价他这样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赫赫有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章 罗莎·卢森堡的 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生平

投身波兰和德国的工人运动 罗莎·卢森堡1871年3月5日生于波兰的扎莫什奇城，父亲是一个犹太木材商人。1887年6月她中学毕业，第二年就参加了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下属的一个小组的地下活动。不久，警察发现了这个组织，开始了大逮捕，卢森堡藏在农民的草车里，流亡瑞士苏黎世城。

1890年卢森堡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最初学习自然科学，不久就改学社会科学，对政治经济学尤感兴趣。在此期间，她结识了许多流亡在苏黎世的俄国和波兰的革命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893年7月，卢森堡同约吉希斯、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人创办《工人事业》杂志，同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展开了斗争。1893年8月第二国际在苏黎世召开代表大会，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人代表流亡在苏黎世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组团参加，卢森堡还以《工人事业》编辑部的名义起草了给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然而，她们遭到了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代表团的排斥，甚至被他们诬蔑是警察奸细，致使卢森堡代表资格被这次代表大会取消。

1894年3月她与约吉希斯等人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当时波兰王国东北部地区的工人组织也加入了这个党，因此

它又改称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896年卢森堡代表该党参加了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会后，卢森堡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两篇表明她的观点的论文，认为使波兰脱离俄国独立是反动的要求，只能意味着人为地阻止波兰与俄国不可避免的经济融合过程。她的观点受到了考茨基的批评。考茨基在《波兰完了么？》这篇文章中指出，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危险性，就在于由于害怕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去冒更大的危险，去关心俄国沙皇制度和波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卢森堡在深入地研究了波兰的历史和经济发展后，完成了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1897年她正式从苏黎世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卢森堡为了加强德属波兰的工人与德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以便把他们组织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决定移居德国。1898年4月她同流亡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吕贝尔的儿子在巴塞尔假结婚，取得了德国国籍。

卢森堡移居德国后，就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1898年9月21日至28日她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第1组论文，对伯恩施坦1896年至1897年在《新时代》上连载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修正主义论文进行了批判。1898年10月卢森堡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纲领。1899年4月4日至8日她针对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第2组论文，进一步揭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质就是力图把德国工人运动推上英国资产阶级工联主义的道路，推上用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来取消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这两组论文1899年4月底被收集起来，出版了单行本。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省级党报转载了这些论文，表示完全同意她对伯恩施坦的批判。

1899年7月卢森堡发表《一个策略问题》的文章，指出米勒兰主义实际上是伯恩施坦主义在法国的变种。1902年她又同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王德威尔得进行论战，批判他对比利时总罢工的压制实际上是驱使工人群众效忠于资产阶级法制。

在五个国家的革命斗争中艰苦探索 当时波兰分别属于俄国、德国、奥国3个宗主国的状况，使卢森堡的革命足迹涉及了德国、波兰、俄国、奥国以及立陶宛这5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她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领导人，又是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又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在许多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接近。可是，由于这5个国家的情况和工人运动的任务各不相同，卢森堡要同时为这些国家的革命斗争服务，不能不是一场艰苦的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

1903年她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组织问题发生的争论，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于同年7月发表在孟什维克把持的《火星报》和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批评列宁的组织观点是“极端集中主义”。

1904年卢森堡由于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讲演而被德国当局加以“侮辱皇帝罪”判处3个月的监禁，不久又因“褻渎国王罪”被判监禁茨威考3个月，这时恰巧碰上萨克森的新国王登基举行大赦，但卢森堡拒绝接受国王的“恩惠”，她是被强行赶出监狱的。

不久，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卢森堡异常兴奋，到德国各地为俄国革命呐喊助威。同年9月，她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做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但是，与卢森堡忽视民族自决权的缺陷相适应，她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也重视不够。她批评了列宁的工

农民主专政思想，认为列宁没有看见俄国农民阶级内部发生的分化。同时，她也不同意孟什维克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来掌握的立场，称这次革命是由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形式，是世界革命迈入新时期的象征。

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爆发，华沙的革命运动在它的影响下也迅速高涨。卢森堡不顾个人安危，用在柏林的一位女同志安娜·马契克的护照，作为平民混上既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照明灯的军用列车来到华沙领导波兰的革命运动。1906年3月她在华沙被捕。当时，卢森堡的亲戚朋友打算用她的德国国籍来请求德国总理布洛夫出面交涉，但她坚决反对这么做。3月2日她在给考茨基夫妇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们坚决要求我给维特打电报，同时在这里给德国领事写信。我决不这样干！这些老爷想让我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去请求他们保护，那就让他们去等着吧。”^①再次表现出她决不向统治阶级屈膝弯腰的铮铮铁骨。1906年6月底，她根据医生出具的证明，在交纳3千卢布的保证金后获释。9月她回到德国，12月2日因宣传罢工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

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丰富了卢森堡的思想，她写了许多满腔热情的论著来介绍、总结和宣传这个经验，讴歌这次革命使国际阶级斗争超出了狭窄的议会斗争道路，标志着革命浪潮正在从西方涌向东方。1907年春天，卢森堡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她在会上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斗争精神，尖刻地嘲笑了孟什维克把工人阶级局限于议会斗争之中的做法。尽管她对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不甚了解，但她在会上的发言表明她并不反对由党来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

俄国1905年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着群众罢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卢森

^① 转引自叶夫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堡等左派要求党承认和采纳群众罢工这一斗争手段，但遭到了党和工会中的右翼官僚的极力反对。1910年以后，德国不断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取消限制工人选举权的3级选举制，德国党内斗争进一步激化。卢森堡起初想通过党中央报刊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考茨基以她的主张可能使党遭到意外危险为理由，要求卢森堡删掉文章中关于建立共和国的内容。由于卢森堡不同意，结果无论是《前进报》还是《新时代》都把她的文章拒之门外。卢森堡没有气馁，她到柏林、基尔、布勒斯劳等地发表演说，并在一些地方党报上阐述自己关于通过群众性政治罢工来争取普选权的观点。考茨基这时不但参加了右派们反对她的论战，而且千方百计地拖延发表她的答辩。因为卢森堡在答辩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考茨基所谓的用议会内斗争的办法来逐步消耗敌人力量的“疲劳战略”，实质上是议会至上主义。她坚决要求利用议会外的斗争特别是群众性罢工和建立共和国的斗争，来帮助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冲击的准备。这场论战导致她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分子的决裂。

1907年8月，卢森堡出席了第二国际德国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会上她和列宁联合，对倍倍尔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多次耐心的长谈，倍倍尔终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删掉了有关“防御”和“进攻”的段落；提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强调了一旦战争爆发，各国工人政党就要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去唤醒人民群众，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卢森堡根据列宁的材料和建议，在大会上做了关于这个草案的修改发言。最后，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正的倍倍尔决议案，使它成为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文献。这次大会加强了卢森堡同列宁的战斗友谊。1912年8月她写成《资本积累论（从经济上说明帝国主义）》一书，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

1911年9月卢森堡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在摩洛哥危机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1912年11月她出席第二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同列宁等各国左派一起促使大会通过了著名的题为《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巴塞尔宣言。

卢森堡的革命立场引起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恐慌。1913年9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上，他们千方百计地否决了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案。12月又将她和梅林一起排挤出了《新时代》与《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但是，卢森堡没有屈服，她和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人创办了《社会民主党通讯》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个刊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创办的第一家独立刊物。

卢森堡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活动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抓住她1914年2月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演讲，判处她1年监禁，只是慑于群众抗议，才改为缓期执行。1914年6月普鲁士法院在迫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同时，传讯了卢森堡，指控她同年3月在夫赖堡的演讲侮辱了德国军队；7月又指控她6月14日在柏林讨论群众性罢工的会议上煽动阶级仇恨。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支持德国对俄、法、英集团宣战。当时，卡尔·李卜克内西迫于议会党团的纪律也投了赞成票。当晚，卢森堡在寓所同马尔赫列夫斯基、约吉希斯、梅林等人议决，向全国左派拍发组织反战斗争的电报。9月，她同卡尔·李卜克内西赴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城市进行反战宣传，使一些地方党组织成为左派中心。12月2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卢森堡的支持下，第一次在议会里投了反对军事拨款的票。1914年年底，卢森堡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印发第一批秘密的反战传单和小册子，并计划创办《国际》杂志，以重建四分五裂

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可惜，卢森堡和蔡特金1915年2月奔赴荷兰筹备国际妇女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时，突然被捕，并被送往柏林巴尔尼姆妇女监狱服刑。在狱中卢森堡渡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1917年4月，柏林30万工人罢工，成立了由大企业工人代表组成的“革命工长”委员会，宣布声援俄国革命，莱比锡甚至出现了工人苏维埃。由于德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反动当局下令更加严密地监禁卢森堡，1916年9月把她关在警察总部的单人牢房内，10月又把她转移到波兹南省边远地区的伏龙克要塞，1917年7月再度把她转移到看管更为严格的布勒斯劳监狱。但她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在狱中为斯巴达克派写了许多传单。她还在《斯巴达克书信》中呼吁国际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从背后掩护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使它免遭巴黎公社式的失败。她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赞扬它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而且永远不会磨灭的大事。由于她当时未能摆脱那种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西方革命的援助，就一定会失败的传统观点，因此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向德帝国主义投降，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革命运动的沉重的精神打击。同时，她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负主要责任，因为它没有及时通过号召德国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来支援俄国革命这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方。由于编辑部不同意她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抨击，她为《斯巴达克书信》所写的一批文章，只有《俄国的悲剧》一文发表，编辑部还加了按语，对她的观点表示了某些保留。

德国共产党的创立者 1918年11月9日卢森堡出狱后，立即投入布勒斯劳的革命运动，直到10日凌晨3时才返回柏林。在柏林召开的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会议上，决定将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由于同盟没有自己的中央局和各部门书记处，表明德国左派向创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卢森堡、蔡特金、约吉希斯等人也否决了各地方组织的代表要求独立建党的主张，反对立即退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然而，随着俄国革命经验的清新之风的不断吹来和德国革命之火越烧越旺，卢森堡的理论观点也迅速发生了变化。11月17日她为斯巴达克联盟的《红旗》报撰写了两篇文章，抨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口号，实质上是要把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里，无产阶级如果不坚决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些昨天支持过专制制度、今天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右派，明天就会倒向反革命。她指出，革命的出路就在于全部政权归劳动群众，归工人士兵苏维埃。这表明，卢森堡已经在实践中改变了自己原来在狱中对俄国革命的看法。

从11月底开始，德国反动军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府的支持下，利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性，开始实行反扑。12月6日反动军队举行示威，宣布右派领袖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捣毁了《红旗报》编辑部，企图逮捕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人，甚至想解散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此同时，会场外却爆发了响应斯巴达克同盟革命口号的大罢工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强烈的反差使卢森堡更加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12月29日，全德斯巴达克同盟代表会议在柏林开幕，出席会议的有46个同盟的地方组织以及红色士兵同盟、青年代表和来宾。预备会通过了立即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成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卢森堡和约吉希斯曾提议把这个党命名为社会主义党，但代表会议决定使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的名称，以彻底划清自己同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界限。30日代表会议改为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卢森堡在会上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情况》的报告。大会决定出版卢森堡的这一报告，并一致通过了以卢森堡写的《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为基础的德国共产党

党纲，并给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去了致敬电。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为了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全德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决心乘德国共产党立足未稳而把它扼杀。1919年1月4日右派政府在完成了军事部署后，宣布免除在群众中颇有声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人士爱赫霍恩的柏林警察局长的职务，以激起柏林工人过早地举行起义。1月6日柏林50万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部分工人还从警察局获得了武器，占领了报馆区。虽然卢森堡和大多数德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看到起义尚未成熟，年轻的德共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领导群众夺取政权，但是她们缺乏及时阻止群众这次不成熟的发动的必要组织和经验。她们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以使已经爆发了的斗争的损失小一些，胜利大一点。她们严厉谴责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右派政府妥协的叛卖活动，指示李卜克内西和皮克退出白中派分子把持的革命委员会。1月8日，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反革命势力悬赏10万马克捉拿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由于德共没有建立足够安全的地下机关，1月15日晚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维尔迈尔村被捕，深夜即被骑兵近卫师的反动军官杀害。李卜克内西的遗体抛在街头，卢森堡的遗体则被缠上重物投入运河。1月25日柏林工人在为一月起义烈士举行葬礼时，将卢森堡以空棺同李卜克内西等几十名烈士同时安葬。5月31日，卢森堡的遗体浮出水面。6月13日柏林工人再次聚集在弗里德里西墓地为她举行葬礼，把她安葬在李卜克内西的墓旁。

第二节 卢森堡的民族理论

同波兰“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论战 波兰是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国家，1772年、1793年、1795年3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所瓜分。1892年秋天，由侨居国外的波兰民族社会主义协

会、“起床号”集团等组织构成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在巴黎发起召开了波兰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波兰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决议。1893年春天，波兰工人协会和“第二无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波兰社会党。不久，它的华沙组织同它的国外组织发生了分裂。1894年春天，它的华沙组织在卢森堡等人参与下，建立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主要分歧正是在民族理论问题上。波兰社会党的右翼领袖皮尔苏茨基认为，争取波兰独立的唯一道路是本民族的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因此主张同波兰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实行政治思想上的妥协，以便在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中联合行动。卢森堡等人则认为，资本主义不但在俄国、德国、奥国，而且也在波兰境内迅速地发展起来。随着波兰社会经济发展同宗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也日益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了起来，以共同对付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阶级斗争已经超越民族斗争，从而使全波兰反抗异族压迫者的暴动成为小贵族革命者的幻想。在这种新形势下，波兰的无产阶级必须制订出能够保证自己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统一行动的政治经济纲领。因此，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了企图使波兰无产阶级脱离俄国革命的倾向，主张波、俄无产阶级实行最广泛的合作，共同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而未来的俄国民主宪法，则必须给予包括波兰在内的各省以广泛的地方自治。

1893年8月，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民族理论。她的报告在概述了波兰无产阶级4年来的英勇斗争后指出：缺乏任何历史传统的波兰资产阶级，只知道拼命地追求利润。他们为了争取沙皇政府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为了俄国

的市场能使他们从波兰工人那里掠夺来的剩余价值变为现金，已经寡廉鲜耻地放弃了一切爱国主义和政治独立的意图。波兰的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反对波兰资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结成的政治联盟，渴望通过波兰独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由于他们和大工业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也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可是，不自觉地代表着波兰小资产阶级幻想的知识分子，却企图把波兰无产阶级引上爱国的歧途，试图把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要求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合题。这只能是空想，因为：（1）从前的波兰王国的3个部分的社会经济历史，已经使这3个部分同3个宗主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每一个部分都具有了特殊的意图和政治利益。例如，俄属波兰的大工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它依靠着自己同俄国的政治共存和经济联系。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则努力使波兰的资产阶级俄罗斯化。（2）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纲领也不适应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不同情况：在普属波兰，无产阶级已经享有相对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普选权；在奥属波兰，无产阶级虽然享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权利，但普选权尚有待于争取；在俄属波兰，无产阶级则完全处于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由于工人政党的政治活动必然要与现存的政治形式相适应，因此波兰这3个部分的工人阶级连制订共同的最低纲领也是做不到的。我们认为，今天对于加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同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共同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对于波森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的行动；对于俄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奋力推翻沙皇专制制度。（3）波兰“民族社会主义”的纲领把希望寄托在发生一场欧洲战争的偶然性上，但是，要实现以推翻沙皇殖民制度为最近政治任务的纲领，是不能指望欧洲政治中的偶然性事件的，况且，这

个纲领也不是依靠个别人物和没落阶级的愿望与理想而能够存在的。^①

1894年3月，波兰社会党在华沙出版的刊物《工作者》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答所谓社会民主党和所谓〈工人事业〉》，同卢森堡论战。卢森堡随即又发表了《波兰的社会沙文主义》等文章予以反驳。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上发表论文《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潮流》，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论点。她写道：为了争取波兰的独立，波兰无产阶级不但必须击败欧洲3个最强大的政府的暴力，而且自己也必须强大到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足以战胜它们的资产阶级。可是，一旦波兰无产阶级强大到能够战胜3个宗主国政府和波兰资产阶级，实现波兰的重建，那么他们也就能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完成前一项任务所要求的力量和阶级觉悟对于完成后一项任务来说，无疑是足够的。何况，在后一种情况下所需要的仅仅是利用经济的发展，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却必须打断这一发展。波兰社会党人经常引用恩格斯关于重建波兰是欧洲民主派反对沙皇侵略的一道防线的论述来批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反驳说：随着欧洲各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恩格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上述说法，他1893年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认为，由于俄国军事力量的衰落和经济、财政的混乱，它不但无法像1848年时那样侵略欧洲，甚至连进行一场防御战争的能力也没有了。不仅俄国已经不是尼古拉一世时的俄国，波兰也不是1848年的波兰，它的农奴制已经被废除，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发展，资产阶级取代了1848年的贵族成为第一小提琴手。“而且在那里演奏的不是民族歌曲《波兰还没有灭亡》，而是俄国的赞歌《上帝保佑我们的沙皇》”^②。

^① 参见《卢森堡文选》上卷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1896年7月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开幕后，卢森堡在会上继续同波兰社会党人论战。波兰社会党人要求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的独立，但这个要求被否决。而卢森堡关于波兰无产阶级应该放弃波兰独立的要求，同俄国、德国和奥国的无产阶级一起开展阶级斗争的主张，也没有得到大会的肯定。考茨基起来反对卢森堡的观点，他认为在民族压迫存在的情况下决不能忽视民族解放，因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者要求波兰独立是合理的。这次大会虽然没有通过任何关于波兰问题的专门决议，但也明确指出：“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①。

无疑，波兰社会党的民族独立纲领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其结果必然是以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卢森堡对它的批判同列宁是很接近的。列宁1903年说过：“波兰社会党枉费心机地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它同德国或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权，否认要求建立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的权利。并非如此，是他们忘掉了阶级观点，用沙文主义掩盖阶级观点，破坏当前政治斗争的统一，——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不出波兰社会党是真正的工人社会民主党。”^②但是，卢森堡否认民族自决权，看不到民族独立运动对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主张波兰无产阶级把现在的国家界限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既成事实，彻底抛弃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波兰国家的空想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此，列宁后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5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24页。

来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大量论述中，既对波兰社会党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对卢森堡否定民族自决权的主张提出了批评。

列宁对卢森堡民族理论的批评 1902年列宁主持《火星报》期间，起草了第2个党纲草案，与1895年至1896年间起草的党纲草案相比，该草案在民族问题方面增加了一个条文：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1903年2月，列宁在《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一文中，对这一新增条文作了说明，提出：社会民主党始终如一地反对任何通过暴力或者其他任何非正义的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种类的民族自决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真正的主要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社会民主党为了经常地和无条件地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和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的主张，或者支持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统一来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要求。

列宁的这一说明，引起了波兰社会党的强烈不满。1903年3月该党在《黎明》上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主问题的态度》一文进行反驳，要求列宁无条件地承认和支持一切民族自决权，说：“我们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行动来削弱沙皇制度，而推翻沙皇制度应该是俄罗斯同志的事。”同年7月列宁写了《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进行反批评。列宁援引了考茨基1896年写的《波兰完了吗？》一文提出的关于“民族独立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不是完全密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的观点，援引了梅林1902年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自由波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波兰恢复独立”的结论，指出：“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

斗争的利益。这个条件正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之所在”^①。而波兰社会党的主张则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民族独立的见解而牺牲无产阶级最迫切的利益，它所追求的是俄国的四分五裂，而这种主张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目前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四分五裂。

但是，列宁对波兰社会党的批评，并没有像卢森堡那样走向对民族自决权的否定。列宁认为，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坚决主张波兰独立，因为当时波兰是反对沙皇俄国的前沿阵地，波兰的独立运动是同整个欧洲的民主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现在波兰问题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同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同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万古不变的；虽然现在阶级对抗已经使民族问题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了，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肯定说某一个民族问题将来不会暂时地居于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否则就有陷入学理主义的危险；虽然现在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崩溃之前，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说没有可能，甚至也不能说波兰资产阶级在某种情况下不会站到主张波兰独立的阵营中来。所以，“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把**所有的可能性**，甚至凡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估计到了。这个纲领丝毫不排斥波兰无产阶级把建立自由独立的波兰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尽管这在社会主义以前极少有实现的可能。这个纲领只是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要掩盖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来诱惑工人阶级，不要破坏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统一”^②。列宁的这一辩证观点使他同卢森堡等人的分歧不可避免。并因此导致了波兰与立陶宛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223—224页。

国社会民主党退出了1903年7月底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争论。马尔赫列夫斯基等人支持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卢森堡一度也犹豫不决。1903年9月该党刊物《社会民主党评论》转载了列宁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卢森堡为它写了注释；1905年列宁的这篇文章又被收入《波兰问题和社会运动》文集，卢森堡在《民族主义与俄国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列宁这篇文章的国际主义精神。1906年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组织。然而，卢森堡同列宁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一方面是压迫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甚嚣尘上；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的浪潮迅速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狭隘民族主义的逆流。为了反击这股逆流，卢森堡1909年发表了《民族问题和自治》一文，但她在猛烈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却把它同民族自决权原则混为一谈。而卢森堡的这些错误观点，又被其他的机会主义者所利用，这就促使列宁出来同她商榷。

第一，卢森堡虽然同意民族国家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但她认为这种“最好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从理论上加以发挥和维护倒很容易，却不符合实际。因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日益强大，使小民族的自决权成为幻影。她质问说：对那些形式上独立的门得内哥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来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瑞士人来说，能够谈得上真正自决吗？他们的所谓独立不就是“欧洲音乐会”上政治斗争和外交把戏的产物吗？！列宁认为卢森堡这一说法的错误在于把民族的经济独立自主问题同民族自决问题混为一谈了。“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

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①。就欧美来说，不仅是小国，就是俄国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也完全依赖着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势力；不仅巴尔干的几个小国，就连19世纪的美国在经济上也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再从亚洲看，虽然大部分国家不是处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就是极不独立和备受民族压迫，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国家是否来得及在资本主义列强崩溃之前就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唤醒了亚洲，在那里到处激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拿巴尔干半岛来说，那里的实例也推翻了卢森堡的观点。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正是随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才为巴尔干半岛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尽管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但是，“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②。

第二，卢森堡在反对波兰独立的口号时，引用了她的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中的材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中的纯经济因素已经在促使俄国同波兰融为一体中占了优势。同时，她在论证波兰应该享有自治权时，却也不否认俄国具有构成“亚洲式的专制制度”这一概念的全部特征。列宁就此分析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中纯属宗法制的特征即前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占优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阶级分化极不明显，那么这个国家的制度就会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反之，如果在这个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和按民族划分的区域，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愈迅速，它同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厉害，这个先进区域脱离整体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为联结这个区域和整体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而是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26页。

② 同上书第228页。

“亚洲式的专制制度”的关系。

第三，卢森堡认为奥地利同俄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远得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应该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学习。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这个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国家中进行活动并且认为民族问题对自己具有头等意义的党的纲领中，却没有包含着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列宁分析说：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848年开始，1867年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在民族关系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1871年被排斥于德意志国家之外，而匈牙利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尝试也在1849年遭到沙俄军队的扼杀，为了避免自己被那些更残暴更强悍的邻国吃掉，匈牙利同奥地利形成了二元帝国。而俄国的特点同奥匈帝国则不相同：（1）俄国占人口57%的少数民族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2）俄国的少数民族所遭受的压迫要比在邻国厉害得多；（3）这些居住在俄国边疆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往往有自己的同族人住在国界的另一边，他们在那边享有较多的民族独立；（4）俄国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俄国的中部地区；（5）毗邻的亚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开始，并逐渐蔓延到了俄国境内的那些同血统的民族之中。何况，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提民族自决权问题也是与事实不符的。只要打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9年布隆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民族纲领时的记录，就可以看到乌克兰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已经把他们本民族争取民族统一、自由和独立的愿望，列入他们的要求之内了。“可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纲领里直接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是它完全容许党的某些部分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事实上这当然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237页。

第四，卢森堡认为支持民族分离权，就是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列宁指出，这里要注意划清两种不同倾向：一是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时，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因为我们在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的同时，也不同意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二是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的统治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加以支持，而且要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决。如果我们不支持和宣传民族分离权，那就不但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还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阶级。卢森堡因为害怕帮助波兰民族的资产阶级而否定了民族分离原则，实际上是帮助了大俄罗斯黑帮；卢森堡醉心于反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却忘记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在目前恰恰是最可怕的，恰恰是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内容，我们无条件地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而不是他们谋求自己特权的趋向，例如波兰资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等等。我们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着眼来评价一切民族分离的要求。列宁说：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一心一意地同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作斗争，因此特别喜欢、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些地喜欢“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像卢森堡那样试图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必须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才犯了错误。

第五，卢森堡说，如果把民族自决权理解为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那么党纲上就不需要专门列上这一条，因为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不平等是不言而喻的。列宁认为她的这种看

法实质上是在回避承认民族平等就必须承认民族分离权。她害怕用民族分离自由来反对民族压迫，会助长分立主义，列宁指出这种害怕是不必要的，因为指责提倡民族分离自由就是鼓励分立主义，就如同指责拥护离婚自由就是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森堡的民族理论 1915年2月卢森堡因所谓的叛国罪被捕后，在监狱里完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这本书在德国秘密出版，署名尤尼乌斯，拉丁文的意思是“幼者”。这本书对民族自决权的看法比以前前进了一步，站到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立场上，主张通过它来解放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她写道：殖民地民族也是民族，社会主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利，都有独立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国际社会主义承认自由、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权利，只有它才能建立这样的民族，只有它才能实行民族自决权。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也和其他一切口号一样，不是为现存的东西辩护，而是指出道路，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积极政策的实现。她还痛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德国殖民者处死一个在世界大战爆发时准备起义的喀麦隆土著领袖这个事件默不作声，指出这是他们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一系列重大罪过之一。列宁读了这本书后，评论说：尤尼乌斯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所持的错误立场的正确看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宣布实行民族自决权原则。这时，卢森堡原来的拥护民族自决权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她把俄属各国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仅仅视为民族分离主义的表现，认为它们将瓦解非俄罗斯族的劳动群众的革命性，削弱十月革命，从而阻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1918年3月3日，苏俄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其中规定：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一部脱离俄国；红军

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撤出；苏俄承认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国等签订的条约，并同拉达签订和约，划定俄乌边界。卢森堡对此予以激烈地批评：

第一，她认为，民族自决权即俄罗斯帝国各民族有权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实行国家分离，不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十月革命的特殊策略口号，而且是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政策的轴心，是他们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整个纲领，因此，苏俄由对德国的“军事上的失败转变成俄国的崩溃和瓦解，布尔什维克对此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①。

第二，她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原来显然指望，实行民族自决权将会使芬兰、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等等统统成为俄国革命的忠实同盟者，结果适得其反，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利用新送给他们的自决权，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革命，并且在德帝国主义的保护下把反革命的旗帜打到俄国本土上来了。这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民族的每一个阶级都力求按不同的方式‘实行自决’，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族自由的观点已完全退居阶级统治的观点之后。芬兰的资产阶级同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宁可要德国的暴力统治，而不要民族自由。”^②

第三，她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提倡的民族自决权已经在社会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并且动摇了俄国边疆各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当芬兰的无产阶级还是作为团结一致的俄国革命阵营的一部分进行斗争时，他们已经在议会和军队中占据多数，已经使资产阶级陷于完全无力的状态，已经控制了本国的局

①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76页。

势；乌克兰早在1902年至1904年就曾经是俄国革命的堡垒；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从1905年以来是俄国最强大和最可靠的革命策源地。可是，反革命怎么会突然在所有这些国家取得胜利呢？原因在于民族主义运动使无产阶级脱离了俄国，使无产阶级运动陷于瘫痪而听任边疆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摆布。布尔什维克不是警告俄国边疆各国的无产者不要陷入分离主义的资产阶级陷阱，不是在分离主义意向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用铁腕扼杀它，反而用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使一切边疆国家的群众发生迷惑并且任其受资产阶级蛊惑宣传的支配。“布尔什维克通过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导致了和准备了俄国本身的瓦解，从而把刀子送到自己的敌人手里，好让他们用它来扎进俄国革命的心脏”^①。

第四，虽然她承认如果没有德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乌克兰、芬兰、波罗的海各国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上台的，但她认为民族分离主义在其中起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民族自决权则为德帝国主义的进军提供了伪装。她说：这点最好的证明就是乌克兰。乌克兰人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民族或者建立一个国家，而“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却用他们关于‘民族自决权直到’等等的教条主义宣传，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教授和大学学生的这一可笑的装腔作势的姿态人为地夸大成一个政治因素。起初这只是一种滑稽剧，他们却赋予它以某种重要意义”，“德国的刺刀在布列斯特就是从这这个臭蛋孵化出来的”^②。

最后，她断言：“政府派社会党人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却被注定用‘民族自决权’的词句给反革命的磨盘注水，从而不但为扼杀俄国革命本身，而且为计划中的用反革命方式结束整个世界

①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77页。

② 同上卷第78—79页。

大战提供了一种思想体系。我们有一切理由从这一方面十分彻底地考察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民族自决权’同威尔逊恩赐的国际联盟和裁军加在一起，成了一个战斗口号，即将发生的国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清算就将在这一口号下进行。显然，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词句和目前成为对国际社会主义最大威胁的整个民族运动正是由于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谈判而特别加强了”^①。

卢森堡的上述批评有的是因为不了解当时扑朔迷离的局势而发的，有的则是由于对列宁的误解。列宁始终坚持和强调的民族自决权，并不像卢森堡所理解的那样是在提倡民族分离主义，也不是在要求多民族国家的各少数民族不管情况如何都去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列宁反复说过，不要把承认民族自决权同实行分离混为一谈，一个民族是否实行分离应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利益来决定。但是，十月革命的情况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原来制订的民族区域自治计划无法付诸实施。我们知道，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的大国沙文主义衣钵，激起了原来就遭受大俄罗斯族统治和压迫的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一些民族的资产阶级就建立起了本民族的政权机构。这种局面表明，当时俄国事实上已经处于四分五裂和各地区的相对隔绝的状态之中，很难再建立一个集中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只有通过联邦制这种国家结构形式，才能把处于分裂状态之中的俄国各民族重新联合起来。因此，列宁在他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宣告：“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①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79页。

第三节 卢森堡的社会革命思想

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 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最早站出来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之一。1898年6月至9月，她针对伯恩施坦在《新时代》刊登的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论文，完成了长达107页的论战手稿，9月21日至28日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总标题在《莱比锡人民报》上连载。她以犀利的笔调揭露说：

第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前提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适应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因为按照伯恩施坦的看法，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崩溃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据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越来越大的适应性。于是，他断言：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方针不再是去掌握国家政权，而是去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状况；不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去夺取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和贯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卢森堡指出：这些说法都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化，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出发点；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阶级觉悟，使他们必定会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来掌握政权。伯恩施坦就不但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本身；不但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且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成为了空想，而实际上恰恰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提出了错误的分析和结论。

第二，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的最重要依据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扩展和企业家联合组织形成。的确，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限度，造成使生产不

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而当生产过剩出现时，它又会疯狂地把自己呼唤出来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消灭掉，并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信用制度不但向资本家提供了支配别人资本的手段，而且刺激资本家肆无忌惮地进行投机活动。信用制度还把整个交换变成一个十分复杂和人为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属货币作为现实的基础。因而一个小小的刺激就会引起危机。“可见，信用根本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哪怕减轻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①。至于卡特尔、托拉斯，也并不像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对生产的调整来结束生产无政府主义状况，从而防止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它们使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使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以最尖锐的方式加剧起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同时，它们为了在国内市场达到提高利润率的目的，经常把国内闲置的资本转移到国外去，从而使世界市场出现更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因此，整个说来，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资本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结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②。

第三，伯恩斯坦所宣扬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是工会、社会改良和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理论，实际上是来自于德国修正主义经济学家康拉德·施米特的。康拉德·施米特说：为社会改良而进行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将带来对生产条件的日益加强的“社会监督”，从而一步步地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权力，把他们降到管理者的地位。最后，资本家看到自己的财产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就会放弃领导和管理生产的职务，从而使社会主义企业最终建立起来。因此，他每谈及国家的劳动保护立法时，总是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83—84页。

使用“社会监督”一词，从而巧妙地把国家变成了社会，把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劳动保护立法变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措施。伯恩施坦也称工厂立法是一部分的“社会监督”，既然是一部分的“社会监督”，那么也就有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然而，它们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限制，而是对它的保护；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它的调节和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①

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建立在庸俗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以资本主义适应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它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但它自己却恰恰是空想。卢森堡讽刺说：“付立叶想用他的法伦斯泰尔制度把地上的海水一下子变成柠檬汁，真是异想天开。但是，伯恩施坦想在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中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②她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但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③。

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召开。10月2日卢森堡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这次代表大会讨论由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攻击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她强调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

说：“无论何时，在连续不断的、时常束缚人们眼光的日常斗争中，始终是我们整个革命世界观的牢固基础在为我们提供令人生气勃勃的养料，使我们擦亮眼睛，振奋精神。这一次重新探讨我们纲领的基础，也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①果然不出卢森堡所料，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等左派同奥艾尔、海涅、福尔马尔等修正主义分子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只是由于党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在会上大和稀泥，而倍倍尔对修正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坚持到底，而使这次大会的争论未能达到卢森堡所期待的结果。

1899年2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代表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再度掀起轩然大波。卢森堡奋起应战，写了一组论战文章在1899年4月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连载，从而最终完成了自己批判修正主义的不朽著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企图用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发展来证明资产阶级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以否定马克思揭示的资本集中规律。但是，股票业务的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方面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向前发展了，不仅大生产社会化了，中等生产甚至小生产也社会化了。这种现象不仅不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反而是这一理论可以想象到的最辉煌的证明。伯恩施坦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抽象，因此必须用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的理论来加以修正。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马克思的抽象并不是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商品经济之中；它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对价值规律的科学分析，就难以揭示整个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页。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卢森堡指出：马克思有一把具有魔力的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有发现的问题。这把钥匙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向后看，还要向前看，尤其是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正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高度，所以他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立场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所以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

卢森堡轻蔑地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不过是所谓的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这个计划企图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一是合作社，二是工会。他想通过前者抓工业利润，通过后者抓商业利润。然而，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就必须有自己的消费组合，这就决定了生产合作社不可能向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最重要部门发展。这种状况反过来又使“生产合作社即使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也必然要下降为消费组合的单纯的附属品，而消费合作社则因此成了站在前面充当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这样一来，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分枝的斗争”^①。伯恩施坦还认为，工会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向工业利润率发起进攻，逐步把它溶解到工资率之中来。但他忘记了，工会斗争不过是劳动力对资本利润的攻击所实行的防御手段，是减缓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趋势，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21页。

而不是改变这种趋势。马克思主义提出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分配，而伯恩施坦则想通过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作斗争来创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空想。

卢森堡进一步分析说：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是伯恩施坦理论的经济支柱，那么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建立内在的绝对的联系”^①。虽然民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它把分散的小国结成现代的资本主义大国，促进了对封建或半封建国家机器的改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民主制度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直接障碍。“世界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尖锐化和普遍化，使作为世界政策工具的陆海军军国主义，在大国的对外对内生活方面都成了决定性因素”^②。所以，今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反倒成了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的生命力不是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增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③。

卢森堡指出，尽管民主制的命运是同工人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是民主制的发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变为多余的事情。然而，伯恩施坦却像商店秤桂皮和胡椒那样，悠然自得地秤着改良与革命的利弊，认为改良是理智作用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25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③ 同上书第128页。

的结果，革命则是感情作用的结果；改良是缓慢的工作，革命是急速的方法；改良是有计划的工作，革命则是自发的暴力。他把千百年来一直是人类历史的轴承和动力的东西诅咒为布朗基主义的暴力论，然而，“自从阶级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以来，夺取政权一直是一切上升阶级的目的，又是每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①。改良和革命并不像历史的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盘一样，是可以任人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作为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不同要素，“既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②。所谓的改良是放宽了范围的革命，而革命只是压窄了范围的改良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完全违背历史的。革命与改良的区别不是时间长短的不同，而是本质上的不同。革命的全部秘密在于由单纯的量变转化为新质，从一个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向另一个历史时期和社会制度过渡。所以，伯恩施坦要用改良来取代革命，那他在客观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与缓慢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另一目的，也就是说他不再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量的变动。“所以，从伯恩施坦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是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说，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③。

卢森堡进一步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和渊源。她写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敌视。他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3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31页。

然后把这个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其必然趋势就是把工人运动推上资产阶级的轨道，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麻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提不出任何稍微经得住批评的积极理论，因为它的思想渊源也就是历史上的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它的内容中没有哪个思想不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过、蹂躏过、嘲笑过、摧毁过的！当然，在马克思以前，也有过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体系。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摆脱了这些理论并且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谈不上是返回无产阶级的伟大幼儿学校，而是意味着回到资产阶级已经穿破了的小便鞋中去了！

1899年4月18日卢森堡把两组论文合为一书出版时，又为该书写了引言，进一步指出：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他说过的一句话：“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也就是要工人阶级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变成目的，用它来取代社会革命。显然，修正主义的这一实质是同一般机会主义相同的，但是，修正主义又是一种更加精致的机会主义。它懂得，要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站得住脚，首先就要适应它所遇到的形式，说已经说过的语言，然后再慢慢地脱去旧外壳而公开采用自己的形式和语言。所以，指望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明确和彻底地表达出自己的本质，指望他们会马上公开和自率地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那就意味着低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谁今天还算作社会主义者而又同时想向本世纪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宣战，那他首先必须不自觉地尊敬它，他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一学说的拥护者，在马克思学说中寻找攻击它的支撑点，并且宣称这种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核心，而这恰

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①。

卢森堡还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资产阶级折衷主义。她指出：在伯恩斯坦那里，雄伟、对称和奇美的马克思主义建筑物，变成了一个各种思想体系碎片的大垃圾堆，一切大小思想家的片断思想都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了公墓。马克思和蒲鲁东、列奥·冯·布赫和弗兰茨·奥本海默、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和康德、普罗柯波维奇和利特尔·冯·纽包威尔、赫尔克和舒尔采—格弗尼茨、拉萨尔和尤利乌斯·沃尔弗，所有这些人都在伯恩斯坦的体系里都找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伯恩斯坦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某个片断的东西。伯恩斯坦这个把一切现存的思想体系的残片毫无原则地混杂在一起的理论，乍一看，似乎是毫无偏见、不偏不斜的，其实却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大杂烩。他想要在阶级社会中代表抽象的科学、抽象的民主、抽象的道德，只不过是甜蜜蜜的幻想和自我欺骗，这种一般的人类思想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和道德。他摒弃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效忠于布伦坦诺、柏姆——杰文斯、萨伊、尤利乌斯——沃尔弗的学说，这时，他除了用资产阶级的辩护词来冒充无产阶级的解放的科学基础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抽去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和历史内容，除了反过来把资产阶级当作全人类利益的代表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在攻击唯物史观“把物质因素抬高到无所不能的地位”，鼓吹抽象的理想主义而竭力反对复活无产阶级精神的唯一泉源——革命阶级斗争的时候，他除了向工人阶级宣传资产阶级道德的真髓，宣传与现存制度妥协，让工人把解放的希望带到来世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当他把利箭对准了辩证法，玩弄“一方面，另一方面”、“固然，但是”、“虽然，不过”、“或多或少”这些折衷主义的跷跷板时，他除了向资产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诡辩论屈膝投降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毫不奇怪！他抛弃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72页。

了阶级观点，就失去了政治罗盘，他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把个别事实在一个彻底的世界观中结成有机整体的精神上的结晶轴”^①。

当然，卢森堡在猛烈地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同修正主义者实行组织决裂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的缺点。她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曾经呼吁说：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应该团结一致地行动的战斗组织，谁要修正马克思主义，那他就应该走开，去另立自己的党，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如果能把修正主义者赶出我们的队伍，它就会成为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民主党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她还驳斥修正主义者所谓的批评自由的论调说：我们能够容许的只是一种自由，即做或者不做我们党员的自由。但到大会召开时，她显然在考茨基等人影响下改变了主意，没有再提把修正主义者开除出党的问题。后来，她解释自己的这种立场说：一个严密的大党不可能由于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分裂，因此不需要把修正主义者从党内推出去，可以通过同他们的思想斗争来谋求党的统一。

对米勒兰主义实质的揭露 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的犹太籍青年军官A.德雷福斯被诬为间谍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后，被诬陷者和进步人士一再呼吁重新审理这桩冤案。1898年1月埃米尔·左拉发表了一篇激奋人心的文章《我控诉》，揭露了法国总参谋部和各种反犹太主义集团对重新审理此案施加的种种阻挠，激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法国议会的社会主义党团中以A.米勒兰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支持重新审理此案，害怕1898年5月议会选举时小资产阶级会由于反犹情绪而不投他们的票。10月随着总参谋部军国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组织和教权主义组织的挑衅活动不断加强，法国已处于阶级战争的边缘。在法国工人党的倡议下，法国工人党（盖得派）、社会革命党（布朗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40页。

基派)、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共产主义同盟、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者联盟(可能派)的代表在巴黎建立了警戒委员会,以对付反动势力的挑战。1899年在10万群众示威游行的压力下,法国镇压群众的政府被议会推翻,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内阁危机,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然而,米勒兰等人不但不去推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反而于该年7月22日同资产阶级政客瓦尔德——卢梭一起组成新内阁,任工商部部长,而当年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在这个内阁中任军事部部长。这个事件不但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发了新的争论。修正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伯恩斯坦主义的验证,以卢森堡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可耻叛卖,她认为:

第一,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德雷福斯案件。从表面上看,这个案件似乎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其实不然,因为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教权主义已经使这个案件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要求无产阶级在涉及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一切地方采取行动,包括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一切冲突。既然我们不幻想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植入社会主义社会,那我们对这个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推翻自己的手段就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当需要我们运用当前的活生生的事件而不是用抽象的陈词滥调去揭露他们的时候,我们却不投入和这些敌人的战斗,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①

第二,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修正派”对这个事件的不同关心。资产阶级“修正派”只打算纠正一场合法的谋杀,而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则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资产阶级“修正派”想通过对总参谋部采取行动来医治军国主义的脓肿,使它能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25页。

够活下去，而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则必须同没落的军国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坚决的斗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军和人民武装的要求。“我们认为，德雷福斯案件对无产阶级的真正政治意义在于，它提供了把一场震撼全国的大规模政治活动变成阶级斗争的题目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种办法，使我们有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传播更多的社会主义意识，超过运用抽象宣传我们的原则的方法时许多年才能达到的程度”^①。

第三，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揭露米勒兰入阁事件。我们能够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是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并且容许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切事件。因此，社会党人在干预德雷福斯案件的阶级斗争中去参加资产阶级政权是不能许可的，因为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排除了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不取决于它的成员的个人特点，而是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决定的。一个社会党人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后，阶级统治依然存在，它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政府，倒是那个社会党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部长。人们可以说，一个对工人友好的部长能够实行社会改良，但是，这种改良本身不会包含丝毫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当改良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的时候，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人说，我们曾经在议会和市参议会里为工人阶级争得了有益的改良，现在为什么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却不行呢？这是因为我们在议会和参议会中是通过同资产阶级政府作斗争来争得有关的改良的，而担任内阁部长后却只有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同样的改良。一个部长的社会改良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只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因为这个部长由于自己所担任的职位，他是把他的这些改良同他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其他职能、同他对军国主义所承担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23页。

阶级政府并不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是社会党人局部地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局部地征服了社会党”^①。

卢森堡从米勒兰事件中进一步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国际性质，说：“如果法国米勒兰入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策略在我们这里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得到机会主义的拥护者最热烈的同情，那么，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情况也使得米勒兰事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②。她这段话的意思有两个：1. 米勒兰入阁实质上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策略的实践，反映了它的所有基本特点。2. 从法国统治阶级拉米勒兰入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统治手段在调整，而这种调整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时期正在来临。她预示说：这个新时代将取代数10年来社会主义只限于宣传、议会活动、组织工会和地方自治的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已经面临着一场为统一行动而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重大任务，已经面临着一场将是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战争！

对比利时事件的分析 1902年4月，比利时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曾经号召举行总罢工。罢工开始后，资产阶级张惶失措，让自由党以比利时工人党的同盟者身份出面要求工人党“无条件地遵守法律制度”。这时，工人党的领导人便强行决定中止总罢工。卢森堡就此发表了《比利时的试验》一文，批评比利时工人党无原则地做了自由党人的尾巴。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艾·王德威尔得看后发表《再论比利时试验》，为自己辩护。卢森堡紧追不舍，于1902年5月又发表了《三论比利时的试验》一文，在批驳王德威尔得的诡辩中，论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形式问题。

第一，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把议会内的斗争同议会外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只能陷入议会主义的泥坑。既然自由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28页。

^② 同上书第349页。

党人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一开始就背叛了工人党，那么很清楚，在议会内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只有通过议会外的上街行动才能有所成就。

第二，卢森堡说：对总罢工这一斗争形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无政府主义者推崇总罢工来一概否定这种斗争形式，我们则要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把民族的总罢工同国际的总罢工区别开来，把政治的总罢工同工会的总罢工区别开来，把由于一时一事所引起的总罢工同出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总计划而实行的总罢工区别开来。社会民主党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不同形式的总罢工。

第三，卢森堡指出，不能把政治总罢工这一斗争形式同议会斗争形式对立起来。机会主义者硬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这是无的放矢。因为政治总罢工与议会斗争等鼓动方式和斗争手段一样是政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目前它甚至是作为一个工具直接为无产阶级的议会斗争服务的。

第四，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要科学地把合法斗争与暴力革命结合起来。机会主义者反复地侈谈暴力革命已经成为“旧式的革命手段”，已经根本失去了效用。人们在机会主义者的影响下，慢慢地也习惯于把对工人群众进行日常的组织教育工作同革命手段即街头暴力革命对立起来。但是，这是错误的。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历史都向我们证明，人民的暴力行动绝不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所宣称的那样，是革命党及其领袖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暴力革命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性质，因此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社会民主党决心反对暴力革命的话，那么只能使它由阶级斗争的领导者变为阶级斗争的尾巴，甚至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软弱无力的挡路石。

第五，卢森堡进一步揭示说，机会主义者崇拜合法性而反对暴力革命，可是，资产阶级合法性本身就是以暴力作为基础和后

盾的。资产阶级合法性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暴力，而这个暴力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必须遵守的准则，于是它也就在资产阶级法学家的头脑里，同样也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的头脑里颠倒地反映出来，好像法律是“正义”的独立自主的创造物，而国家的强制性暴力仅仅是法律的制裁手段。事情恰好相反，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本身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力统治机器的一种社会表现形式。我们应该据此来衡量机会主义者的合法主义的虚幻性：统治阶级在他们的全部活动中完全依靠暴力，而无产阶级却被规定在阶级斗争中应该自始至终地拒绝使用暴力。“如果说，我们合法的议会活动没有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工人阶级的暴力为后盾，那么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就会变成一种比方说同用竹篮打水一样聪明的消遣了”^①。

卢森堡警告说：一旦统治阶级发现，我们的议会主义者没有以在一定的情况下准备采取暴力行动的人民群众为后盾，那么我们作为合法斗争的基地的议会活动本身和全部合法性迟早会被剥夺掉。德国如此频繁地受到威胁的普选权之所以没有被消灭掉，不是因为德国有自由党人，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害怕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是敢于动真格的。革命暴力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手段，是至高无上的阶级斗争规律，这一规律时而潜在地发挥作用，时而积极地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现在像通过其他活动那样通过议会活动来使人们的头脑革命化，那么这正是为了使他们最终把头脑中的革命化变为拳头上的革命。况且，一旦我们把矛头指向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发生暴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把议会斗争看作是工人阶级得救的唯一手段，是空想的，而且归根到底是反动的。自然，暴力革命在今天的状况下是一件非常难以使用的双刃武器，但是这个武器无论是在阶级斗争的个别事件中还是在最终夺取政权的战斗中都是不可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3页。

缺少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使我们和平与合法的斗争发挥出本来应有的力量 and 作用。反之，“一旦社会民主党真的要像机会主义者向它建议的那样始终拒绝使用暴力，并且使工人群众一味相信资产阶级的合法性，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议会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斗争本身迟早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且给反动派不受限制的暴力统治让出阵地”^①。

1910年德国也爆发了改革普鲁士选举制度的斗争，并很快蔓延到其他日耳曼邦国，成为全德政治活动的中心问题。一时间，罢工斗争风起云涌，柏林工人甚至同警察发生了街头冲突。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的机会主义者就像当年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一样，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卢森堡提出要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就必须加强议会外的斗争，并克服党和工会的上层人物施加的阻力。起初，她想通过党中央报刊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但考茨基对她说，这些文章要想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发表，首先就必须删去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那部分内容。卢森堡拒绝了他的要求，改在《多特蒙特工人报》和弗劳兹拉夫的《人民哨兵》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到1910年3月底，全国有14家地方报纸转载了她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却招来了机会主义者的围攻，其中就有考茨基。卢森堡坦率地对考茨基说：“您要是成了阻力，我们就不需要您了！”她撰写了《疲劳还是斗争？》一文同考茨基论战，指出考茨基所谓的用国会内的斗争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然后在1911年的选举中震撼现行制度的根基的“疲劳战略”，实质上是在寻找借口来压制议会外的群众斗争，这表明他已经走上企图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机会主义道路上去了。她号召德国工人阶级踢开绊脚石，坚定不移地通过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容克统治，反对把德国普鲁士化，反对海上霸权，反对殖民政策，反对世界扩张政治的斗争，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98页。

来实现民主共和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第四节 卢森堡在党和国家体制 问题上同列宁的争论

极端集中制还是民主集中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列宁鉴于当时俄国毫无政治自由和工人运动一盘散沙的状况，在表述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时使用了“集中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从而引起了卢森堡的误解。她应孟什维克把持的新《火星报》之约，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1904年7月13日先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时代》上，23日又在《火星报》第69号上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卢森堡认为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这本书详尽而透彻地表达的观点正是无情的集中主义”^①。这种集中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方面把态度明确和活跃的革命家所构成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却是积极革命的群众完全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机关对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固定的干预。中央委员会既有权组织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也有权确定各地方委员会的人员、规章制度，是否解散与建立，还有权运用这种方式间接地影响党的代表大会的组成。于是，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中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而“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②。

卢森堡承认：毫无疑问，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般说来是社会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1页。

^② 同上书第504页。

民主党所固有的。社会民主党是在倾向于集中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斗争是在巨大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因此，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任何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主义应该是先锋队意志的强制性综合，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实行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建立这种自我集中制的条件是：(1)拥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在政治斗争中受过训练的无产者阶层；(2)他们有对公开召集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报刊直接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在俄国，头一个条件尚处于产生过程之中，第二个条件只有当俄国享有政治自由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列宁却相信俄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广大的、极端集中化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他称赞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说工厂本身使无产阶级成熟到可以实行高度的组织和纪律，“这再一次表明他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上有许多十分机械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如果认为觉悟的工人在党组织内部还没有实现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可以‘暂时’由党的中央机关‘受委托行使的’单独统治来代替，工人群众还没有做到的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和行为的公开监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活动实行的监督来代替，那就是错误的”^①。

卢森堡认为：在制定策略时，党的领导的自觉首创性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种现象不但在德国可以看到，而且到处可见。例如，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896年彼得堡的自发大罢工，第二阶段也完全自发地开始于1901年3月的彼得堡学生运动。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群众的自发行动总是先行一步，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首创性和自觉的领导的作用则是微乎其微的。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对于它所应起的作用缺乏准备，更不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缺少一个像列宁所设计的掌握大权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5—506页。

的中央机关。相反，这样一个机关只会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不坚定性有增无减，并且加深奋起进攻的群众和踌躇不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为了保证各级党组织能够充分地利用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首创精神，就需要让它们各自自由行动。她断言：“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①

卢森堡写道：“一般说来，在革命的工人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运动还处于摸索过程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类似俄国目前所处的条件下，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喜爱的组织倾向恰恰是严格的**专制的集中制**”。“在以后的阶段，在有了议会制度和拥有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党的情况下，**地方分权制**就会成为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相应的倾向。”^②例如，在19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了**极端集中制**，而爱森纳赫派实行的则是**自治制**。所以，在工人运动的开始阶段，最容易使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组织形式是严格的**集中制**而不是**地方分权制**。

② 卢森堡还认为党章仅仅是党内革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用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形式上的手段。如果这样的大多数尚未形成，那么任何严格的党章条文都不可能成为防止机会主义的武器。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俄国的工人运动还很年青，工人运动发展的政治条件还很不正常，机会主义暂时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策略所进行的必不可免的摸索与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这种纸上的手段来防止机会主义，事实上受害的不是机会主义，而是社会民主党自己，因为它削弱了社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8页。

② 同上书第513页。

会民主党在反对机会主义潮流和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中的抵抗力。承担工人运动舵手职责的不应该是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皇帝陛下”，而应该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的我。它坚决要求应当给它犯错误的权利，给它自己向历史辩证法学习的权利，而“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 error，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①。

列宁读了卢森堡的文章后，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由于这篇答复是寄给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的，而考茨基是支持孟什维克的，因此这篇答复正像列宁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的‘辩护词’写得简短扼要，而且仅限于纠正一些重要的失实之处，并用事实的陈述同对我们党的嘲笑相对照”^②。后来，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列宁的这篇答复份量还不如卢森堡的批评文章重，这实际上是他们忽视了列宁写这篇答复时的历史背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列宁在同卢森堡心平气和的商榷中，也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情况和理论观点。

列宁认为，卢森堡的文章在许多地方误解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原意，以致于“我必须指出，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这本书，而是别的什么东西”^③。列宁针对卢森堡的批评答辩说：

第一，卢森堡说：根据列宁的意见，中央委员会有权组织党的各个地方委员会。然而，这个提法不是我而是孟什维克加进去的。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由我提出来的党组织的章程草案来确凿地证明。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中央委员会有组织地方委员会的权利，后来是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章起草委员会把这个权利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1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405页注20。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35页。

列入草案的，而党代表大会批准了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党章。在这个起草委员会中，除了两位布尔什维克外，其余 3 人都是孟什维克。显然，卢森堡把两个不同的事实混为一谈了：（1）她把我的章程草案同起草委员会的修正草案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混为一谈了；（2）她把坚持党章的某一条文的某项要求，同坚持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在下届代表大会对它进行修改之前一直有效这一论点混为一谈了。

第二，卢森堡说：在列宁看来，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唯一积极的核心。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正是孟什维克在党代表大会上责备我，说我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不够，让中央委员会过多地服从于设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的总委员会。后来，我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回答了这个指责，指出当党内多数派在党的总委员会占优势的时候，从来不曾限制过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可是当党的总委员会成为少数派手中的斗争工具以后，这样的情况却立即发生了。卢森堡则误解了我上述对孟什维克的反驳。

第三，卢森堡说：列宁认为俄国已经具备了组织一个庞大的、极端集中的工人政党的一切先决条件。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提出的论点所表述的一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强调的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公认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可以用个别小组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的时期早已经过去。我举出了一些证据，说明我们党内有些学者表现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把自己的无纪律行为加之于俄国的无产者。俄国工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表示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四，卢森堡说：列宁赞扬工厂在教育无产阶级接受集中制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不是我，而是我的论敌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我狠狠地嘲笑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他把工厂纪律的两

个不同的方面混为一谈。可惜，卢森堡同志竟也这样做了。

第五，卢森堡说：列宁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说成是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有联系的雅各宾分子。这也不是事实。是阿克雪里罗得最先把我们党内的各派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派。我只是指出，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这种比较，即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划分。卢森堡在这里把18世纪和20世纪的两个革命派别之间的可比性和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同一性混为一谈了。

列宁还认为卢森堡对他的批评经常陷于泛泛而谈而没有去研究双方争论的真正根源。我们只要看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实际情况，“每个人就会清楚地看到，具体事实与卢森堡同志的泛泛之谈和公式化的抽象概念之间有多么大的矛盾”^①。列宁回顾了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指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被破坏以后，整个党不过是各个地方委员会的无定形的堆积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唯一的联系是思想上的联系。由于这种思想联系缺乏组织上的物质联系做保证，因此很快就被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潮流给冲垮了，党陷入了分歧、动摇和分裂的时期。事情越来越明显，各地方委员会之间只有纯思想上的联系是不够的，形势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真正统一的党。1903年秋天，我们终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这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另一方面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现在，党的正常工作已无人过问，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士气极端低下。其原因就在于孟什维克根本无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选举结果，并且极力反对我们通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解决党的统一问题的主张。可是，卢森堡却认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对建立统一的党的必要性不存在着任何分歧，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整个争论的中心只是集中程度大小的问题。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40页。

卢森堡还慷慨激昂地反对什么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什么奴隶般的顺从，什么盲目服从，但是她是否能够容许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拒不接受选举的结果，是否在其他任何政党看到过也有这种现象？“读者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党内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就会很容易认识到，罗莎·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①。

列宁的这篇答复寄到《新时代》编辑部后，由于考茨基拒绝刊登而未能发表，卢森堡一直没有看到它，因此这场争论也没有继续下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森堡坚定地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事实，似乎可以为她同列宁的这场争论的孰是孰非问题划下一个句号了。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尽管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使用的是集中制的概念，但实际上也已经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了，即必须把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必须有统一的党章；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必须有统一的纪律，任何领导人都不享有不服从多数人意志的自由，等等。因此，列宁对卢森堡的批评作出答复后不到一年，当俄国1905年革命浪潮迫使沙皇宣布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列宁即于1905年11月10日发表《论党的改组》一文，要求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的组织形式。列宁指出：在俄国人民已经争得部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即整个组织根据普遍选举制原则自下而上地建立，按党员人数来选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党内的一切事务由全体党员直接处理或者通过代表来解决；党的所有领导成员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45页。

机构都由选举产生，都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接受监督，并可以撤换；对于不是立即行动的问题，在党内可以进行广泛和自由的讨论。同年12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党的改组》决议，其中明确指出：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1906年这个概念又被正式写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其中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是，尽管如此，孟什维克还不时抓住列宁过去使用过的“集中制”概念来攻击他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列宁1907年回答他们说：目前同我当时写的那些著作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些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①。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列宁对当初关于极端集中制还是民主集中制的争论的一个总结。

议会制还是苏维埃制？ 1918年1月6日，由于全俄立宪会议拒绝讨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讨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先后宣布退出立宪会议。同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解散了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决议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只有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才能保证工农十月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月，全俄第三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同全俄第二次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合并举行，讨论并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规定俄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时被监禁在布勒斯劳监狱中的卢森堡，从官方和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获悉这一情况后，深表不满。她在后来被加以《论俄国革命》的标题的手稿中写道：1918年1月著名的解散立宪会议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93页。

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一措施对于他们后来的对国家体制的立场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策略的转折点。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反对这个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对这个政府进行激烈的攻击提供了口实。可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本来是应当成为通向这个会议的入口的，有什么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她不否认俄国立宪会议的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和代表候选人的构成是不合理的，但她认为：“既然立宪会议早在决定性转折点即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就已选出，并且就其组成来说反映了已经过时的旧状态，而不是新的形势，那就自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正是要宣布过了时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是死胎的立宪会议已经无效，并且立即举行新的制宪议会的选举”。这就是说应当“立即召开一个从已经更新、已经前进的俄国产生的会议来代替它”^①，而不是将它解散了之。

卢森堡还批评苏俄的普选制是自相矛盾的，说：“让我们再举一个惊人的例子，即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选举权。这一选举权具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意义，不十分清楚。从托洛茨基和列宁对民主机构的批判可以看出，他们原则上否定根据普遍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只想依靠苏维埃。那么究竟为什么又要规定普选权，这的确不清楚”^②。按照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所作的解释，苏维埃政权只给予那些靠劳动为生的人以选举权，而不把它给予其他任何人。但是，在苏俄经济残破的情况下，一种把普遍的劳动义务当作经济前提的政治选举权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措施。例如，一

^①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方面，苏维埃政府屡次认为必须用所谓租让的办法把国有工业交给从前的资本家业主，1918年4月又同资产阶级消费合作社实行妥协，后来又表示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中有愈来愈多的阶层作为赤卫队等等由国家用公费来养活。对于这些人，经济机构是没有任何办法要求他们履行劳动义务的。因此，“如果用一种选举权宣布普遍剥夺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权利，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社会之外，而在经济上却没有能力在这一社会本身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位置，而这种剥夺权利的做法并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而是作为普遍的规定持久发生影响的，那么这种做法就不是专政所必需的，而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东西”^①。

卢森堡认为与上述两者相关的是布尔什维克“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②。她写道：尽管苏维埃政权剥夺的是自己敌人的这些自由和权利，但是，“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恰恰是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昭著、无可辩驳的事实”^③。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而对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活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卢森堡还断言：列宁同考茨基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了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

^①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③ 同上。

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社会主义的专政应该“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①。

最后，卢森堡用缓和一些的口气说：俄国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它的出发点和终点是：德国无产阶级没有举行起义和德国军队对俄国的占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打算期待列宁和同志们用魔法召唤出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就是对他们提出了超人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被迫采取的行动当做自愿做的好事，后来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②。如果布尔什维克不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他们完全是会保留立宪会议体制的，是会在在此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

这就说明，卢森堡不明白苏维埃制度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俄国形式，而这正是她上述对列宁提出的各种非难的症结所在。因此，她茫然地写道：“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

^①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①。

事实上，当时戒备森严的布勒斯劳监狱使卢森堡只能看到大多是资产阶级文人对苏维埃制度的歪曲和污蔑，看不到苏维埃制度下火热的无产阶级民主生活，看不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看不到他们选举和监督自己的代表的生动场面。苏俄的确是剥夺了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但这正是资产阶级疯狂地反抗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结果，这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从没有预先说要剥夺剥夺者的选举权。卢森堡认为苏维埃制度使普选权名存实亡，更是不合事实的。例如，从1917年10月25日至1918年7月4日苏俄一共召开过4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只分别占全体代表的51%，61%，64%和66%。

所以，当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把卢森堡从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解放出来，使她能够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并把它们同德国革命的紧迫任务加以对照后，她的看法立即改变了。因此，她

^①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90页。

坚决反对召开德国的立宪会议——国民会议，力主用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它，她向人民疾呼：“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已经过时的遗产，是没有内容的空壳，是关于‘团结一致的民族’、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时代的必需品。今天，谁抓住国民会议不放，谁就是有意无意地将革命拖回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谁就是伪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一个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①。她告诫人民：“要么是国民会议，要么是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苏维埃，要么放弃社会主义，要么就全力以赴地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殊死的阶级搏斗：这就是应作的抉择。”^②

这时，“罗莎不再想把她原有的批评公之于众。她打算写一篇新的较长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论文”^③，从而使《论俄国革命》永远成为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同时，卢森堡也用自己的亲身体来说服斯巴达克派的其他领导人，促使他们汲取和运用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来为德国革命而奋斗，12月初她在给阿道夫·瓦尔斯基的信中写道：你对布尔什维克党解释立宪会议所持有的那些保留和疑虑，我也都有过，但是在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我已经放弃了这些看法，同时，在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的某些方面，我走得没有你那么远，不像你那么激烈地持批评的态度。^④因此，她劝瓦尔斯基认真地研究一下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用它们来指导德国革命。现在，这只革命之鹰重又高高飞起，她以搏

① 卢森堡：《国民会议》，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② 卢森堡：《是国民会议还是工人士兵苏维埃？》，转引自同上书。

③ 克拉拉·察特金：《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90页。

④ 参见阿道夫·瓦尔斯基：《罗莎·卢森堡对革命策略问题的态度》，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第190页。

雷云霄的气魄，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告：“以夺取全部政权来武装坚强的劳动人民群众去实现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是真正的民主。只是在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以铁拳夺得全部政权，并且象雷神挥动他的锤子那样使用政权迎头痛击统治集团的地方，而不是在雇佣奴隶在虚假平等的情况下在议会中坐在资本家旁边、农村无产者坐在容克地主旁边辩论他们的切身问题的地方，民主才不是对人民的骗局”^①。

卢森堡不幸牺牲后，《论俄国革命》手稿由她的女友和私人秘书玛蒂尔达·雅科布保管。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雅科布请人为手稿抄写了副本，并把原件藏了起来，后来遗失了。1921年4月德共原中央领导人保尔·列维被开除出党后，一方面申请返回德国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则把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这份未完成的手稿的一份不完整的抄件印成小册子出版。卡尔·考茨基看后立即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杂志上发表了《罗莎·卢森堡和布尔什维主义》一文，其中写道：卢森堡书中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赞扬已经失去了意义，唯一剩下的还有意义的部分是“她对民主的热烈而又尖锐的辩护，这种辩护使这位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崇拜者的这本书变成了对他们的严厉的控告书”^②。他的儿子贝奈狄克特·考茨基写的《卢森堡传略》，也大肆渲染这份手稿的意义在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理论的否定”^③。所以列宁在《政论家的短评》中评论说：“保尔·列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过错误的著作。我们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这一

① 卢森堡：《关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代表大会的报告》，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192—193页。

② 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52—53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点：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卢森堡的亲密战友克拉拉·蔡特金和阿道夫·瓦爾斯基也先后发表声明和撰写文章，以卢森堡出狱后的言行来证明她已经改变了原来对俄国革命的看法。

第五节 卢森堡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产生根源的分析 卢森堡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主要发表在《资本积累论》一书。1912年1月卢森堡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今年1月国会选举之后，我打算再着手马克思的经济学通俗化，至少可以将原理部分完成；但是，当时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要想在具体的情况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以及分析它的客观历史限界，我感到没有什么把握。等到进行了精密地考察之后，我就抱着这样一种见解：即此处不仅存在着说明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理论上牵涉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以及有关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经济根源的问题。倘若我能成功地把这些问题给以科学的正确的处理，那么这本著述将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兴趣，而且在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中，也将具有一些意义吧！”^①那么，卢森堡在对问题“进行了精密地考察之后”，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她是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呢？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是没有完成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由于方法论上的错误，在考察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时，抽象掉了不应该抽象掉的因素——非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因此没能说明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卢森堡认为，这个问题正是解决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关键，也是揭示帝国主义本质及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页。

其经济根源的关键。

卢森堡是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利润动机来支配的，生产只有在能给资本家带来“纯收益”时才有意义。不仅如此，资本家还要得到不断增长的利润。为此，他们就要从自己获得的利润中尽可能多地拿出一部分，使之变为资本，以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说，要不断进行积累。作到这一点，光靠资本家的意愿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其次有足够的销售市场。第一个条件一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资本通过自己的正常运行就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力。第二个条件则不同，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这个条件是无法满足的。从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积累所依赖的社会需要，似乎就是资本积累本身。因为对某一个资本家来说，其他资本家生产的扩大，正是他本身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如果一个资本家生产的是供工人用的生活资料，那么，其他资本家生产越扩大，雇佣的工人越多，这个资本家就可以更多地出售自己的货物，赚取更多的利润，积累更多的资本，其他各类资本家也都是如此。因此，资本积累得越多就越能积累，不过仅仅从单个资本家来看才是如此。如果从整个社会看，即把资本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资本，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总产品不外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在再生产过程中，必须有一部分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社会产品用于更新已在前一个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毫无疑问，这部分产品在资本家间的交换过程中就可以得到实现。另外，还必须有一部分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社会产品用于满足工人及其家属生活需要，以便再生产出供资本家驱使的劳动力，这部分社会产品是通过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在这一交换过程结束后，工人获得了生活所必需的衣服、粮食等物品。而资本家则收回了他们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在购买工人劳动力时所支付的货币，

不多也不少。此外还有一部分以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形式存在的社会产品是满足资本家及其仆从生活需要的。这部分产品当然也可以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为了积累，社会总产品在扣除了以上三部分之后，还必须有剩余，以便使之资本化。从整个社会来看，谁需要这部分剩余的产品并能够购买它们呢？卢森堡认为，这才是积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这部分产品的实现不能指望工人，因为工人的消费受到他的工资的限制。从理论上说，工人的工资仅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根据前提，这部分商品也不能指望由资本家的购买来实现，因为他们如果穷奢极欲地将这部分产品挥霍掉，那也就谈不到积累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除资本家和工人之外，当然还存在着公务员、军人、牧师、学者和艺术家等。他们能不能成为这部分商品的主顾呢？如果从单个资本家看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从整个社会来看，这又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阶层的收入，或者来源于工人阶级，或者来源于资本家，他们钱包里的货币没有任何独立的来源，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卢森堡说，也许可以设想资本家可以相互成为这部分剩余产品的顾客，不过，他们不是把这些商品胡乱浪费掉，而是用它们来扩大生产。毫无疑问，卢森堡的这个设想已接近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但正在这时，她又立即离开了正确轨道，随即反驳说，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刻推到下一个时刻。因为即使用这种办法解决了当年的问题，并使生产得到扩大，那末，第二年，当增大了的产品重新投向市场的时候，同样的问题立刻摆到了我们面前，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些数量更多的商品的市场呢？如果我们用同样方法解决这一困难，于是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完全相反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因此他认为，必须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去寻找剩余产品的买主。换句话说，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外的“第三者”的存在，是实现资

本积累绝对必须的。这也是资本主义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不断向外扩张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资本主义出现在世界上的那一天开始，政治暴力这把铁斧就成了克服那些单纯用商品炮弹无法克服的非资本主义疆界的主要手段。参加寻求实现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未对资本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一连串的经济和政治的灾害，世界危机、战争、革命便接踵而至。卢森堡认为，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是最后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被消灭。但是，在实践上在达到这一点之前资本主义就会灭亡。因为在向这一前途发展过程中，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必将因经济矛盾激化而不断高涨起来，以致在资本主义经济到达它的发展极限以前，就会被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吞噬。

卢森堡正是从他的这种积累理论来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产生根源的。他说：资本积累“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问题是同我们时代最突出的事实：帝国主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的典型外部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获得殖民地、势力范围、投资机会而进行的竞争，国际贷款制度，军国主义，关税壁垒以及金融资本和托拉斯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作用，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他又说：“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因为，根据经济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①

来自第二国际内部的批评 卢森堡的这部著作——《资本积累论》一出版立即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论。鲍威尔、潘涅库克和埃克什坦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梅林、卡爾斯基（朱里安·马什留斯基）则是支持卢森堡的。只是由于当时把持德国社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59页。译文略有改动。

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考茨基等“中派”分子的阻挠，后者才没有能将自己的见解公开发表。后来，在第三国际成立时，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坚持以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为基点考察国际形势，这就引起布哈林发表《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一文，再次对卢森堡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批判。

我们先看一下鲍威尔是如何批评卢森堡的。

鲍威尔在一篇题为《资本积累》的文章中指出，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积累和消费力的关系问题。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老问题，把资本无限扩大的趋势同社会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说成是一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克服的矛盾，是西斯蒙第提出并成为他批评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这种意见为马尔萨斯及洛贝尔图斯所继承。在这些人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能够销售自己的全部商品必须要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第三者存在。另一种意见是李嘉图、麦克库洛赫、萨伊等人的意见。他们从根本上否认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出发，否认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认为危机只可能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局部性的危机。鲍威尔认为，由于马克思正确地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和科学地阐明了商品的价值乃是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的，他才真正地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鲍威尔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阐述的这些原理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平衡公式对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俄国当时正在进行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激烈争论，俄国的未来是会像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认为的那样，必然也要采取西欧和中欧所已经采取的那种经济制度，还是会像民粹派及其继承者社会革命党那样，认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就能够建立起农民的社会主义公社。在这场斗争中，民粹派实际上采用了西斯蒙第等人的理论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而俄国马克思

主义者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则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的公式指出，资本可以继续扩大，生产设备可以大大增加，资本家不至于因此而缺乏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因为通过资本主义机制总是不断地建立起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之间的平衡。”^① 鲍威尔的这段话表明，他既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理，也没有正确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他实际上是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成了“均衡论”者，或者讲，他是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当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在这一矛盾的斗争和解决过程中不断发展。正是由于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所以鲍威尔在正确指出卢森堡否认在纯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可能性是错误的同时，并没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

鲍威尔虽然从根本上否定了卢森堡的积累理论，但他没有否定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而是利用了她理论上的失误来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辩解。鲍威尔认为，在卢森堡对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的“不正确的解释里含有合理的内核”^②。这种合理内核就在于，卢森堡所说的资本积累是有界限的这是对的；说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为扩大这一界限服务的，也是对的。鲍威尔解释说，首先，积累受工人人口增长的限制。积累需要大批地增加被迫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群众，为此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地区的古老的生产方式，从而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或移居资本主义地区，或者就在本国为投资在那里的资本服役。因为在资本的既定的有机构成下，积累量取决于可供使用的工人人口的增长，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使积累的界限扩张的一种手段。除了人口增长以外，有

^① 鲍威尔：《资本积累》，《新时代》杂志1913年第23期第853页。

^② 鲍威尔：《资本积累》，《新时代》杂志1913年第24期第273页。

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积累量的增加，也都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起了促进作用。因为帝国主义可以使在本国以外投入生产的物质要素受本国资本支配，从而大大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帝国主义可以迅速扩大销售市场，使过剩商品投放到新的销售领域中去，可以帮助资本家较容易的克服危机。因此鲍威尔实际上是同意了（至少是部分同意了）卢森堡对帝国主义根源的分析，他说：“如果说帝国主义不是使积累成为可能的一种手段，那也是广泛扩张积累的界限和使周期性地由积累过剩引起的危机容易克服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个奋斗目标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根源，但不是唯一的根源”^①。

鲍威尔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分析，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同卢森堡却是根本对立的。卢森堡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反帝战士。在她看来，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同资本主义的本质相联系的，因而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一项不容辞的义务。而鲍威尔则不一样，他同考茨基一样，实际上是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认为，“资本主义不进行扩张也是可能的”^②。这种论调同被列宁斥之为“超等废话”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完全合拍的。

第二国际的著名左派理论家安·潘涅库克也表示反对卢森堡的观点。他在一篇题为《关于危机原因的理论》的文章中，谈到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公式时得出了下述结论，即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产品都可以找到销路，并且下一年生产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就在这时他说：“卢森堡同志在她的新发表的著作《资本积累论》中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她认为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马克思没有解决而

① 鲍威尔：《资本积累》，《新时代》杂志1913年第24期第874页。

② 同上。

留下的问题，即扩大再生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包含在以下问题中：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的买者在那里？我们认为她的观点是错误的，再生产图式表明，这里不存在任何问题和任何疑难问题。”^①

不过，潘涅库克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显得更为幼稚，他实际上把全部问题的解决都归结到“资本家开展新业务时并不害怕等待”。他认为，由谁来购买包含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的商品的问题，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这当中的矛盾，也是表面上的矛盾。他说：“就像考茨基的著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33页上所描写的：鞋匠、裁缝、面包师拿着互相需要的商品相互对立着，必须有货币加入，才能冲破魔圈，只要这个流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在这里资本家Ⅰ和Ⅱ也终究还是互相需要彼此没有售出的商品。实际上资本家在开展新业务时并不害怕等待，直到他们售出全部存货并握有成为货币的剩余价值为止。当剩余价值以商品形式存在时，他们就把它看成为已有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商品会售出，他们也有一定的货币储藏，以便作为预付，而且他们自己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当需要时也把它作为预付，也许他们个人已经把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储备出售给某个商人，因此某个资本家Ⅰ在资本家Ⅱ还需要购买这个储备之前就已经有货币。新的企业建立起来，货币部分受银行支配，在资本家Ⅰ那里购买机器，他们当获得货币即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时，就把它们存入银行以便更新补充他们的货币储备，这样他们基本上把它们现在实现的剩余价值投入了购买他们的产品的工厂。因为一个相当大的资本储备，通常是银行资本，它的活动场所是这样的地方，从那里不断获得新的投资，而实现的剩余价值不断地流入那里，所以在实践中，在正常的情况下，商品运动不可能有障碍，就是在这种积累的情况下所有产品也都找得到销

^① 潘涅库克：《关于危机原因的理论》，《新时代》杂志1913年第22期第784页。

路。”^①从以上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潘涅库克实际上否认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内在矛盾。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了一个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同的结论：

“只要存在正确的比例，即使在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中销路也不会有困难。但是，这种比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的比率而各不相同”^②。

埃克什泰因对卢森堡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方法论方面。他认为，生产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是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一项最复杂的经济问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它的正确解决需以价值规律知识为基础。马克思的最卓越的功绩之一就是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埃克什泰因指出，在《资本论》的这一部分，马克思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孤立法”（埃克什泰因把通常所说的“抽象法”叫作“孤立法”）对生产和需求的依赖关系进行了正确而详尽的分析。马克思首先按产品的用途把繁纷复杂的整个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两大部类；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把商品价值区别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这样就使马克思可以在最简单的基础上说明了全社会被生产出来的价值和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著名的关于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公式便是对这一研究成果的科学概括。埃克什泰因认为，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花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极其罕见的例外，但这却是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唯一科学的道路。因为科学只有首先把这种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它们的最简单的基础，然后加以深入地研究。在彻底搞清了这些简单关系之后，才能考察起初有意不去注意的各种因素。

^① 潘涅库克，《关于危机原因的理论》，《新时代》杂志1913年第22期第784—785页。

^② 同上书第783页。

在对简单再生产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态，因此分析的进展已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不过在这里马克思同样是运用了“孤立法”，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也是在最纯粹最简单的情况下来剖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来揭示积累过程中的各个生产部门间的错综复杂的流通关系的。所以这里的分析并不能直接同资本主义的现实完全相符。但是，这种研究对认识现实有巨大的意义，是认识现实的基础。卢森堡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及公式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错误理解上的。她攻击马克思没能看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扩大基础的不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埃克什泰因认为这种攻击显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资本论》第2卷第3篇恰恰是要揭示各种不同价值群和产品群之间的这种交换得以进行的、生产和消费得以平衡的规律。卢森堡虽然对马克思的分析进行各种嘲讽式的评论，实际上错的是她自己，因为她之所以会认为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是由于她在分析中实际上是忘掉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卢森堡还攻击马克思的图式没能揭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真正目的，似乎他们都是在为扩大再生产而扩大生产。埃克什泰因认为这更是没有道理的。追求利润支配着资本家一切行为，因此也同样支配着他扩大再生产，马克思的公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所阐述的两大部类的交换过程，不仅表明商品的生产者是谁，而且表明各种商品的购买者是谁。商品的这种交换过程不仅仅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过程，而且也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利润恰恰是来自马克思公式所代表的过程。

最后，埃克什泰因指出，卢森堡不满意马克思的分析，认为马克思没能解决资本积累问题。她企图另辟溪径。她企图从同非资本主义的第三者的交换来说明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但是她并没能达到目的。贪婪的资本家把商品运到殖民地是为了掠夺这些民族，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更多的是以物易物，只有少数差额才以黄金结算。因此，卢森堡并没有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她只是把问题由一国推向国际，而对解决问题来说却没有前进一步。

列宁对卢森堡的批判 列宁看到《资本积累论》一书较晚。起初他是从读潘涅库克发表在《不莱梅市民报》上的评论文章得知该书的消息的。1913年1月上半月他在写给潘涅库克的信中说：“我非常高兴，您在主要之点上得出了与我在14年前在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及‘民粹派’的辩论中所得出的同样的结论，即在‘纯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剩余价值也是可能的。我还未见到罗·卢森堡所写的书，但从理论上来说，您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只觉得，您没有充分强调马克思学说中极其重要的一点（《资本论》第2卷第442页），即马克思所说的，在分析年生产物资时，绝不应包括对外贸易（我引自俄译本）。我觉得，卢森堡的‘辩证法’是折中主义（从《莱比锡人民报》上的文章也能看出）。”^① 列宁密切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他很快读到了卢森堡的著作。1913年3月29日前他在一封《致列·波·加米涅夫》的信中讲：“罗莎的新著《资本积累论》读过了。胡说八道！歪曲马克思。我非常高兴，潘涅库克、埃克施泰因和奥·鲍威尔异口同声地谴责这本书，而且他们对这本书的批判，说的就是我在1899年反对民粹派时说过的话。我准备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写篇文章谈谈罗莎这本书。”^②

为了准备自己的文章，列宁仔细地阅读了《资本积累论》，作了25 000余字的摘录，并逐段加了评语。列宁甚至已制定了文章的提纲和供文章使用的“表明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总产品结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27—228页。

^② 同上书第232页。

变化的图表”。可能是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这篇文章没有写成。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为了集中批判当时对革命危害最大的考茨基主义，也没有提到卢森堡的这本著作。

在列宁看来，卢森堡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错误发生在第三篇，也就是发生在她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中。列宁认为卢森堡攻击《资本论》第2卷同第3卷有矛盾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在卢森堡攻击马克思的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同马克思的理论相矛盾的地方加“！！”符号，并批上了“漂亮的空话”^①五个字。在卢森堡论述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既不能由资本家消费得到实现，也不能由工人的消费得到实现，它只有通过同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相交换才能实现的地方，列宁批判这个观点等于瓦·沃，即民粹派的理论家沃龙佐夫的观点。^②对卢森堡强调，“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各部类间的内部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关系”，列宁批注：“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实质）胡说”^③。当卢森堡企图利用美国向埃及殖民的历史来说明这是利用鞭子来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开拓更为广阔的领域的时候，列宁在书旁空白处作了一个长的评注。他指出，“‘只是由于利用了皮鞭’，正是这样！罗·卢森堡自己打自己！不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方便剥削（‘皮鞭’、无偿劳动，等等）资本转入野蛮国家。利息更多！如此而已”^④。列宁的这个批注是非常精辟的，它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观点，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并不是因为宗主国的资本已绝对过剩，而是因为在这些落后国家里的利润更高。

从列宁所草拟的提纲来看，他原本打算联系着俄国社会民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9卷第407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414页。

③ 同上书第420页。

④ 同上书第424页。

党人同民粹派及“合法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史来揭示卢森堡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各种错误；驳斥她对马克思的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攻击；最后阐述帝国主义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完成，我们只能由提纲得知一个概貌。

布哈林对卢森堡的批判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产生根源的分析虽然遭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理论家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意见本身就有许多不妥之处；列宁虽然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因文章没有写成更谈不到公开发表了，因而这一错误理论的影响一直没能消除，所以直至第三国际成立，制定共产国际纲领时，德国共产党的许多代表仍坚持卢森堡的理论。这就使布哈林不得不于1925年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以《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为题的长篇论文，再次对卢森堡进行了批判。

与鲍威尔等对卢森堡的批判不同，布哈林是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判卢森堡的。布哈林对卢森堡攻击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及其实现公式的错误言论是完全否定的。他着重指出，马克思的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表明，随着生产的增长。市场也在扩大，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同时，消费需要也在增长，因为在生产扩大的情况下，不论是资本家消费的绝对数字，还是工人消费的绝对数字都增加了，这就既使社会总生产各部分之间有可能实现平衡，也使生产同消费之间有可能实现平衡。同时布哈林还指出，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两大部类间的比例关系时，撇开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因素，因而分析是处于最抽象阶段。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会得出否定资本主义矛盾的结论，就会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把危机、生产过剩、群众的贫困等等‘以科学语言漫骂掉’”^①。虽然如此，这种在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最抽象阶段的分析却是十分必要的前提。因为如果在这种最抽象阶段资本的积累，以及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都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当把一些更为具体的因素，如货币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就更加不可能了。卢森堡否认这种抽象分析的可能性，说明她不了解马克思的方法。

布哈林在指出卢森堡的方法论上的错误之后，便沿着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途径对她在扩大再生产理论上错误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总之，罗莎·卢森堡的主要错误在于，她把集合资本家看成是单个资本家；她把这种集合资本家认作是独立存在的。因此，她不理解，实现的过程是逐级完成的过程；因此，她把资本的积累看成是货币资本的积累。……实际上，如果总体资本家必须被看成是一个资本家，那么，不言而喻，他就不能向自己出卖；如果追加的黄金数量在价值上必须同追加的商品量等值，那么……这种金只能来自国外；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必须一下子……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那么，他们就需要‘第三者’，等等。”^①

布哈林对卢森堡的批评同鲍威尔的批评是完全不同的。他不仅指出了卢森堡否认在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实现的可能性是错误的，还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他指出卢森堡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公式的指责，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观点同杜冈·巴兰诺夫斯基的观点混为一谈了。马克思在研究扩大再生产问题时，批判了亚当·斯密忽视不变资本的教条，阐明了原有的不变资本的补偿和新的追加不变资本的存在是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不仅对解决扩大再生产问题，而且对解决市场问题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一点表明，除了消费市场之外，还有生产资料市场存在，并且后者还会随着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第299页。

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以更快的速度扩大。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他完全忽视了这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认为生产不受消费市场的影响。他甚至将这种错误理论发展到它的极限，认为即使由于机器的大量使用，全部工人都被机器所代替，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工人开动全部机器，资本主义生产也不会发生困难。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生产虽然由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而成为独立的东西，可是它最终还是要通过许多中间环节而同消费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并且不能不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必然要产生矛盾，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克服的困难。在这里，生产是无法调节的，积累的刺激是追求越来越多的利润，追求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这就必然会使生产超出应有的比例限界，从而同社会消费发生冲突。布哈林指出，卢森堡在批评马克思时说，如果在纯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也是可能的，那么生产力就必定会不受阻碍地增长。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在矛盾中进行的。虽然没有连续的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存在长期而连续的商品的无法实现性，但周期性的实现困难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无法在自身内部彻底解决，但暂时延缓矛盾，因而使矛盾相对地得到解决的办法还是存在的。所以资本主义虽然可以发展，但无阻碍地发展却是不可能的。矛盾虽然可以周期地被消除，但又不断地在更大规模上被再生产出来，并以更大的力量周期性的爆发出来，矛盾在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卢森堡虽然批评了杜冈·巴兰诺夫斯基否认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的错误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她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因为批评可以来自各个方面。杜冈的错误，不在于他认为实现是可能的，而在于他割裂了生产和消费的必然联系，在于他否认资本主

义再生产的内在矛盾。卢森堡的错误不在于她坚持这种联系，而在于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联系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在于她认为积累的剩余产品是无法实现的。

布哈林针对卢森堡的错误，首先从两个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一般原因，并进一步阐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真正的原因寓于困难之中，这些困难不是产生于绝对的经常的生产过剩，而是产生于危机及其全部后果”^①。他说这一点不用作更多的解释，因为当发生周期性的危机的时候，追求客观存在着的“新的市场”便是很自然的了。第二个原因，也是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为永久的原因，是从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因为在同非资本主义的较为落后贫穷的国家交换中，“比较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得到额外利润。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点曾作过详细说明。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的地位远远优越于那些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效率高，因而使得它的商品即使以远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的低价出售，售价仍然可能大大高于价值，因而使得实际利润可以大大高于这些商品在本国出售时的利润率。在这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是作为质量较高的复杂劳动被支付报酬的，因而可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实现也是实现，不过这不是一般利润的实现，而是超额利润的实现，这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密切联系着的现象。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资本主义扩张的真正原因，而像卢森堡那样，是无法解释资本为什么早在它发展的最初阶段，在它身边的“第三者”——小农、小手工业者还是要多少有多少，足够它实现剩余生产物之用的时候，它就已经疯狂地向外扩张，推行殖民政策了。

布哈林认为，以上谈的还仅仅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扩张问题。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38页。

因此还需要更为具体地谈谈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问题。在这方面，卢森堡同样存在着许多错误，她曾希望自己的著作《资本积累论》能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具有某些意义，然而她的著作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她仅仅从积累资本的实现问题来揭示帝国主义的根源，因而使帝国主义这一“在历史上有明确界限的特殊时代的特殊性质淹没在关于一般资本扩张的泛泛讨论之中了”^①。

卢森堡在自己的著作中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他说：“帝国主义乃是一个政治术语，它用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残余的竞争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②。布哈林认为这个定义是有许多严重错误的。首先，这个定义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把帝国主义同资本作为金融资本这样一个具体特点联系起来。在这个定义中，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消失了，可是不了解这种特殊性，不了解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殊形式，又如何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呢？其次，定义说帝国主义要争夺非资本主义的“残余”，照此推论，争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区域的地方，如法国人占领鲁尔地区，就不是帝国主义了。按照这个定义，争夺已经被别人侵占的地方的斗争也不是帝国主义了。卢森堡为什么在自己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单单把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突出出来呢？这一点是同他的错误的积累理论相联系的。正因为他错误地把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作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作为积累的根本条件。把帝国主义又仅仅看作是解决积累问题，因而才给帝国主义下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定义，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超额利润”。资本的扩张是由于利润的运动规律确定的。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48页。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29页。

利润率的高低除了取决于销售条件（实现条件）以外，还取决于购买条件和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因此，这里决不仅仅是一个销售市场问题，还有原料和劳动力市场问题，新的投资范围问题。当然，从资本主义诞生那天起，就存在对销售市场，原料和劳动力市场及新的投资场所的争夺。这种斗争之所以采取了近代帝国主义争夺的形式首先是同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结构相联系的；其次，争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意义加强了；再次，市场问题本身也不同于从前了，它已不像从前那样是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和控制的巨大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因此，扩张的形式变了，斗争更尖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与从前那种资本扩张的区别在于它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着新的历史类型的生产关系，即金融资本关系，帝国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的特征就在于此，卢森堡根本不了解这一点。

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一文的最后，布哈林对罗莎·卢森堡由积累理论所作出的政治结论以及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的“客观极限”问题进行了批判，布哈林认为卢森堡的理论是极为简单和明白的，它可以概括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可能正在于它是‘非纯粹的’，在于除资本主义生产核心之外还存在着‘第三者’这个外因。‘第三者’构成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的前提，因而也构成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但是，按其趋势来说，资本的运动是一种向‘纯粹’资本主义的运动，这种‘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发展上的数学极限。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与其实现过程之间的矛盾现在是靠‘第三者’来解决的话，那么以后永远这样来解决这一矛盾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者将会相对地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作为一定的、历史上有局限性的生产方式，其客观经济极限就在这里，资本主义将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这一历史的经济的必然性将在

工人革命中为自己开辟道路”^①。卢森堡的这个理论看起来是充分体现了“经济决定论”并且充满了“革命的”性质。但它仍然是错误的。首先布哈林指出，当时世界上约有17亿人口，其中半数以上即9亿人是生活在亚洲，在这里，农民、小手工业者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使在欧洲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农业人口。这就是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卢森堡的“第三者”的范畴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崩溃一定要等到“第三者”的消灭，或者讲等到它们完全资本主义化。那么，革命事业的处境将是很不美妙的。可是实际上，卢森堡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极其尖锐、极其紧张、极富有灾难性和爆炸性。事实上资本主义已开始垮台，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便在苏联建立起来。卢森堡由于在自己的研究中几乎完全抛开了利润运动的问题，抛开了超额利润的特殊形式问题，这就使他看不到帝国主义的本性及其矛盾所在，虽然他极想作出革命的结论，但结果却恰恰完全相反。

其次，布哈林认为，卢森堡错误的根源还在于他不懂得社会矛盾的辩证性质，不懂得社会整体及其运动规律的辩证性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扩大再生产过程就是这些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过程。既然是这样，那么显然这些矛盾终究有一天会把全部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炸为齑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极限。”^②至于这个矛盾紧张到什么程度才能使资本主义爆炸，则应当到劳动力的再生产条件中去寻找答案，当资本主义矛盾的爆炸引起经济破坏和生产力下降时，当某一天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不可能的时候，社会生产结构就会发生爆炸，对立的阶级就会兵戎相见。

布哈林批评了卢森堡在资本积累及帝国主义问题上的错误，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54页。

② 同上书第330页。

不过他并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他在文章的最后，对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问题时的功过得失作了一分为二的概括，他说：“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最大的理论功绩在于：她提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她也仅限于提出这些问题而已，对关系到这一重大问题的一些具体问题（关于交换的性质、构成的差别、价值规律的形态变化、超额利润，靠‘第三者’来加速积累等等问题）罗莎·卢森堡同志却都不声不响地避开了（或几乎避开了）。但是毫无疑问，单单提出这个一般性问题本身就值得给予极大的注意。罗莎·卢森堡的功绩还在于：她把关于再生产问题提到了首位。……但是，罗莎·卢森堡同志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所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倘若她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就不会为资本主义的‘客观极限’问题而苦恼了。……最后，罗莎·卢森堡同志的最大的理论功绩还在于：她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无法摆脱的，必然具有的‘内在’现象。诚然，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她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作为最新时期的特殊问题来理解，她没有从必然要追逐更多的垄断利润，从金融资本必然沿着这条路线运动来寻找帝国主义的根据，而是从资本主义没有‘第三者’就绝对不能生存去寻找。尽管如此，她还是提出了帝国主义必然性的问题，而且，总的来说，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用来论证她的答案的理论是错误的。与两派改良主义者即公开的修正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可悲的谬论相比，罗·卢森堡的著作远远高于它们，因为这部著作是一个大胆的理论尝试，是光辉的革命智慧的产物，至于本书的历史部分对资本的殖民征服史的描述迄今还无人能与之比美，那就更不必说了”^①。

^① 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33—334页。

由《资本积累论》引起的这场争论已过去近80年了。历史证明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正确解决的是以列宁为首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一批同志，而不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卢森堡。这一点再次告诉我们，在今天，如果想要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作出正确的认识也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之上，而不是背弃这些原理，才有可能。

第六章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思想、经济 理论与政治主张

第一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概述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19世纪90年代，奥地利多民族国家在迅速瓦解，封建教权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已逐渐平息，资产阶级基督教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兴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在反对没落的封建残余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的。它主要代表了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而从农村转入城市的新一代工人群众的要求。由于民主运动的兴起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赢得了大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的支持。当时正在第二国际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战强烈地震撼着奥地利向往社会主义的大学生们的思想，促进了他们思考与探索，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1903年，麦克斯·阿德勒、伦纳和希法亭创办了一所工人学校，名为“未来俱乐部”。1904年麦·阿德勒和希法亭创办了《马克思研究》丛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伦纳的《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麦克斯·阿德勒的《科学争论中的因果论和目的论》，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以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都是发表在这份杂志上的。他们的这些理论活动和著作在国际工

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结果在维也纳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生中诞生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它的主要成员有麦克斯·阿德勒、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古斯塔夫·埃克什泰因、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以及奥托·鲍威尔等。他们大多数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先后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逐渐成为职业革命家。最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鲍丁把这一批活跃于维也纳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称之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①，以后便被延用下来了。其中麦·阿德勒和弗·阿德勒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家，希法亭是他们的经济学家，鲍威尔和伦纳则是他们的政治学和法学家。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来说，是信奉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鲍威尔在他的一篇论述麦·阿德勒的文章中就承认：“他同样接受并信奉新康德主义，他一直无法割断自己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的纽带”^②。在经济理论方面他们则声称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来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作出科学解释，并且在某些问题上也的确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由于他们哲学基础的错误和其他一些原因，使得他们的经济理论也不能不带有许多错误。在政治方面他们虽然也批判修正主义，但总的说来他们是采取“中派”立场。力图通过和平地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化。伦纳采取了露骨的沙文主义立场，他同德国公开的沙文主义者库诺等人站在一起，积极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鲍威尔被征入伍，不久即被俄国俘虏，直至战后才被释放。战争爆

^① 鲍威尔：《麦克斯·阿德勒，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鲍威尔著作集》第9卷，德文版第753页。

^② 同上书第757页。

发时希法亭在德国，他采取了中派立场，支持考茨基的理论与活动。弗·阿德勒则采取了激烈的反战立场，为反对党内多教派的护国主义立场而辞去了党的书记职务，组织了“卡尔·马克思俱乐部”。1916年10月因刺杀奥国总理斯图克伯爵被捕入狱。麦·阿德勒也参加了“卡尔·马克思俱乐部”。但其基本理论观点则是中派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成员之间的理论观点与政治立场又趋于一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路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条路线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指导路线，并对后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成员一般说来都既是理论家，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奥托·鲍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之一，从1907年起担任该党议会党团秘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直到1934年都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公认的领袖。1918年至1919年任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兼“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卡尔·伦纳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政治思潮的主要代表。1907年当选国会议员，1918年任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19年任第二届联合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1930年当选下议院议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理，同年12月当选总统。希法亭则主要是在德国活动，长期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工作。1923年和1928年两次担任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一学派的其他一些成员也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活动。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要寻找适合奥地利的具体情况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实际上，它的全部活动充满了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利用执政的机会，采取了许多直接有益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政策，努力解决工作时间、工作

条件、工资待遇、工人健康，教育及住房等问题，使工人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维也纳成了展示社会民主主义的场所，一度被誉为“红色维也纳”。但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下的维也纳的工人阶级在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从未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相反地他们只是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的积极作用，即“通过改良的革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最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不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与考茨基的观点仍有某些差别。他们在俄国革命爆发的初期虽然表示坚决反对这种旨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但后来在苏俄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影响下他们的观点有了一些改变。特别是鲍威尔在其后期著作中，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分析了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导致人民生活的改善，从而使得恐怖专政不再必要，苏维埃政权将民主化。当法西斯势力掘起之后，他对苏联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地改变，认为苏联实行的制度虽然缺少民主，但是，它却构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并对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的斗争给予了必要的支持。这时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仍坚持认为欧美社会主义革命应走与苏联不同的议会民主的和平过渡道路。但并不排除议会外的斗争方法，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暴力。为此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保卫同盟”。在1926年于林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认为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有时可能被迫诉诸暴力，即“防御性暴力”，以便保卫它在共和国中以民主手段获得的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1927年到1934年间由于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对奥地利施加的各种压力，武装暴力斗争问题已迫在眉睫。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奥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派，从而使得奥地利革命力量更加单薄。1934年2月以多尔福斯为总理的奥地利反动政府对革命采取了行动，内

战终于强加给了奥国工人阶级。内战是在对工人阶级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总罢工失败，保卫同盟被解散，很多社会主义领导人被逮捕。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从此走向下坡路。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这时奥国社会民主党内虽然还有部分人坚持成立了地下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反法西斯斗争，鲍威尔、弗·阿德勒也曾从国外支援过他们，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基本结束。

第二节 用新康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

麦克斯·阿德勒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两位哲学家。他们两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理论，缺乏哲学基础。他们都企图给马克思主义以哲学的“补充”。这是二人的共同点。他们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新康德主义”，企图以认识批判论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哲学基础；后者则更强调马赫主义，企图以马赫的经验批判论为马克思主义作哲学的论证。这种状况正象鲍威尔在1927年写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文所说的，“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黑格尔来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唯物主义者而来的，那么，年青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部分来自康德，部分来自马赫。”^① 鲍威尔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渊源。

麦克斯·阿德勒的生平 我们首先研究麦克斯·阿德勒的哲学思想。麦·阿德勒1873年1月15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读于维也纳法兰茨·约瑟夫中学，毕业后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学习。189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登记为律师。不过他并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该项工作。因为早

^① 鲍威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1970年版第49页。

在学生时代(1893年)他就参加了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并被选为维也纳“社会主义学生自由同盟”的第一任主席。在同盟中结识了卡尔·伦纳。所以大学毕业后他便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革命活动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之中。1903年他和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共同创建了“未来俱乐部”这是一座为在维也纳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开设的工人学校。1904年又同希法亭一道编辑与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丛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多数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以伦纳为代表的一部分上层领导人物认为,德、奥两国的工人阶级同两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还同轴心国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采取了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的立场。党的报刊则以“保卫祖国”为幌子,极力挑动各国工人阶级自相残杀。麦·阿德勒坚决反对德奥党内的这些机会主义领导者,并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批判了借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理论为日尔曼民族侵略扩张和企图独霸世界作辩护的谬论。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一致的,社会民主党更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挑起的世界大战。因此,他与弗·阿德勒等组织领导了“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在其周围团结了一批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革命战士。他们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地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奥匈帝国崩溃后,麦·阿德勒曾表示拥护工人苏维埃,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表示赞赏,不过他并不认为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应当效法俄国工人。他主张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探寻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和方法。麦·阿德勒与德国斯巴达克派关系很好,与罗莎·卢森堡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麦·阿德勒被捕。放出后,他重新返回维也纳大学教书。1937年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有:《思想家马克思》(1903年)、《马克思主义问题》(1913年)、《马克思主

义的国家观》（1923年）、《唯物史观读本》（1930年），

给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基础 在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层，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学说和历史观，它缺乏哲学基础。考茨基在一封致俄国工人迪阿尼泽的信中就曾经明确表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济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①在他们看来，对于个别党员来说，哲学信仰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对于党的原则性和思想统一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根本不理解当时在俄国党内所进行的反对马赫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甚至对此表示遗憾。在上述那封信中考茨基说：“不过我不得不说，我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马赫的全部争论感到遗憾。弄清马赫的认识批判论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同我们党的任务的关系，并不比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的争论问题或者原子理论是否能成立这一问题同我们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这一问题成为党的问题并从而使本来就已经四分五裂得很厉害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更进一步分裂，这是完全错误的。”^②麦·阿德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考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还在青年学生时代，他就在一篇题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的文章中说：“唯物史观并不必然是要同唯物主义携手并进的。因而，唯物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也完全不存在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物史观毫无共同之处。前者是本体论的世界观，是假设。而后者则是同生理学或者化学一样的科学”^③。后来他在《康德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真理分为两大类：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从其

① 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马赫的信》，《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② 同上书第252页。

③ 麦·阿德勒：《唯物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德文版第3页。

他领域来寻找社会事件的因果关系，正如任何科学在自己的专门领域以内所作的一样。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属于科学真理。这种真理仅仅是一种时代真理，它是在已经获得的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形成的理论概念有极大的时间性，一旦事实的某些方面有所变化，这种真理就会失去效用。这种真理在对待精神的本质以及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上，即在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中立的。哲学真理则相反，它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必定要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种真理不管它多么古老，都不会丧失其精神的生命力。麦·阿德勒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哲学，反对把它看作是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体系毫无关系。唯物主义回答的是关于世界本质问题，它主张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这样的理论已超越了人们的经验，纯粹是形而上学。而马克思主义回答的是有关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问題，是一门较为具体的科学，它与哲学不属于同一层次上的。因此他主张重新给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基础；他同爱·伯恩斯坦及康德拉·施米特一样，要求“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去！”以康德的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一次他在维也纳社会主义自学协会举办的演讲会上说：“康德的实践哲学是道道地地的行动哲学。它的生命力也就表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威力的哲学现象即社会主义原则与康德结合在一起”^①。

应当指出，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中间，麦·阿德勒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回到康德去！”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却最完整，最系统地表现了新德主义的倾向。从1904年在《马克思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为科学而斗争的因果性和目的论》起，直至1930年出版《唯物史观读本》，他一贯是以康德的理性批判理论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

^① 麦·阿德勒：《纪念伊曼努尔·康德》，《现代社会主义和哲学的物理学》，德文版第36页。

以新康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 康德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三个特点就是先验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康德承认在人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它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是一切认识的源泉。这是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又认为“自在之物”是不能认识的。康德把人的认识过程分成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从而引起感觉。不过他认为，这种感觉材料还不能构成认识，要成为认识，这些感觉材料还必须经过先验的认识形式的整理。时间和空间就是用于整理感性材料的先验认识形式。所谓感性认识就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同空间、时间这种先验的认识形式的结合。康德不是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看作先验的认识形式，看作是感性认识的先决条件。这是康德哲学的先验论或唯心主义的表现。康德认为，在认识的感性阶段，感觉材料虽然经过了时空的整理，但依然是零散的，缺少普遍性。要想使认识带有普遍性，感性的认识就必须进一步经过单一性、众多性、普遍性、实在性、否定性、制限性、实体和偶性、原因和结果、相互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存在与非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十二组先验的知性范畴的综合整理。只有经过这些先天知性范畴的综合整理，感性的材料才能成为科学知识。这样这些范畴便成了构成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又是构成知识对象的先决条件。康德认为，由于经过知性范畴综合整理加工过的知识更加远离了“自在之物”，人的认识也就只能停留在现象世界，因此，对“自在之物”的真正认识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康德哲学的先验性质和不可知论的特点。康德哲学虽然从总体来说是一种二元论的先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但它却包含有不少合理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人类认识史的经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新康德主义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修改康德哲学，他们极

力否定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要把“自在之物”从康德哲学中清洗出去。马堡学派的首脑、新康德主义者柯亨就曾公然歪曲历史，歪曲康德的理论，公开宣称，经过一百年之后，那种认为康德虽然把认识限制在经验对象的范围之内，然而毕竟保留了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的错误说法，终于应当结束了。按照柯亨的说法，康德的“自在之物”仅仅只是一个观念。可以把“自在之物”看作是一个问号，看作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无限课题。柯亨在他的著作《康德的经验理论》中说，前人谁也没有真正理解康德的学说，因此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消除对康德哲学的一切误解的任务。但是，真正误解、歪曲康德理论的正是他自己。正是他不仅从康德哲学中驱逐了、清洗了“自在之物”，而且也完全抛弃了关于认识要经过感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反对感觉论是新康主义的重要特点。柯亨在他的主要著作《纯粹认识的逻辑》中说：“我们不承认关于感性的学说先于逻辑。我们是从思维开始的。思维除了自身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原因。”^①

麦·阿德勒承袭了柯亨的上述基本观点，并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靠康德，超越康德！”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社会化意识”这一概念，并把从19世纪开始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歪曲为由康德开始的“社会化意识”这个概念形成的统一过程。阿德勒所谓超越康德就是企图通过“社会化意识”将康德哲学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以他的先验的社会化意识的理论重新解释唯物史观。

阿德勒认为他提出的“社会化意识”这个概念是一个客观性的概念，它不具有任何伦理的或心理的意义。他还强调，他的这一概念与把人理解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或者象亚里斯多德那样把人理解为是政治动物不同，社会化概念只应当理解为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阿德勒把社会化理解为人與人之间

^① 柯亨：《纯粹认识的逻辑》，柏林版第12页。

的联系，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本质上是精神。这就是说，有思维意志，价值和判断的人并非一个孤立的人而是社会化的人，因此“社会化概念”是一个客观概念，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是，阿德勒同时又把这种社会化解释为一种精神现象，因而也就把“社会存在”精神化了。“社会存在”即“社会精神”，存在即精神。两者变成了一个完全统一的东西。这显然是一个折衷主义的调和概念。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些看法符合马克思主义，阿德勒引证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如下一段话：“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马克思引用这个例子本来是为了说明人类的自觉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区别，说明人与动物不同，人类劳动是一种有理性的能动性的活动，动物则不然，它们的活动是本能的。阿德勒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意，他企图以这个例证说明马克思也认为意识有先天社会化的特性。

不过，麦·阿德勒认为马克思虽然提出了“社会化”这一概念，但因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实证科学，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因而它并没有为这一概念奠定理论（哲学）基础。他认为能为这一概念奠定理论基础的是康德的“认识批判”理论。唯有“认识批判”论才能把“社会化”这一概念从对它的传统习俗和偏见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对社会化，或者说对社会联系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停留于经验阶段，因为经验总是个人的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必然会把另外一些人看作自我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对象，这就必然缺乏双方意识沟通的桥梁。按照这种观点，人们的共同意识会成为纯粹偶然的現象，成为偶尔出现的奇迹，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就无法说明科学认识的普遍性。阿德勒认为，这一困难只有借助康德的**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才能解决。社会化概念是一个认识批判论的概念，它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只能到人类认识中去寻找。批判哲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是从个体着手的，是脱离不开个体的。但是，结果却是超越个体的。这是因为它把个体看作是处于相互的精神共性中的，处于精神的普遍联系之中处于与自身本质相同的其他个体的普遍联系之中的。因此，认识最初虽然都是呈现为个人的“自我意识”，但是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不可能是个人的意识。从认识的本质来说，个人意识要成为可能，必然是已经同和我一致的其他自我相联系。自我是意识的经验形式，意识也仅仅是就其形式来说表现为自我意识。个人的单个意识就其本质来说，就其内容而言，始终是众人的意识，是超越自我的。自我意识同众人意识必然相互联结就是意识的先验社会化，这种意识即先验的“社会化意识”。他认为，社会科学之成为科学，就在于它是众人的意识，是先验的社会化意识。阿德勒就是这样以他的意识的先验社会化理论“超越”了康德，“实现”了对康德与马克思的“综合”。

麦·阿德勒的先验“社会化意识论”，把康德的先验的意识理论同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理论完全混同了。实际上，康德的先验意识论是认识论的一个纯形式的、超历史的和超经验的范畴，这个范畴先天就具有把自己的规律强加于现实的功能。阿德勒不加批判的借用康德的这一范畴，完全颠倒了认识与存在，范畴与客观事物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他只能生活于社会之中，只有在彼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才能征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变换，才能生存繁衍，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共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才能认识自然和社会，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阿德勒和所谓先验的“社会化意识”理论同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康德的先验的认识论同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不能调和的。

麦·阿德勒不仅企图调和康德的认识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而且还要以康德的先验的唯心史观来篡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世纪30年代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唯物史观读本》的书。但是，这是一本完全名不符实的书。它不是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以康德的唯心主义篡改它。在这本书中，阿德勒从哲学的基本问题谈起。他认为，关于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物质与观念的关系问题，只有以康德的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才能给予正确的解决。他按照康德的观点把物质与观念完全割裂开来和绝对地对立起来，说心理的东西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产生出来。他说：

“心理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产生出来，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赖更是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因此，事实上除了心理——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肯定别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对心理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①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完全割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切联系的观点，阿德勒把由人所参与的各种社会过程都看作是人为的东西，因而也都是精神过程，而决不是什么物质过程和关系。在阿德勒看来，构成人类社会全部基础的经济关系也不例外。他认为，经济关系也是人之间的关系，它永远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目的，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精神关系。他反对把经济关系看作是物质关系的理论，说按照这种理论，历史的发展成了与人们精神完全无关的物质过程，历史完全成了纯机械的过程，人的行动则成了客观的物质力量的齿轮。他攻击说，按照这种理论，人们完全不需要具有什么理想及奋斗目标。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不必经过人们的奋斗，就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脱胎出来。无产阶级只要静静地等待和观望就

^① 麦·阿德勒，《马克思主义问题》，斯图加特1913年版第3页。

可以了。这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成了一种宿命论的理论，把被马克思颠倒过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再次颠倒了过去。

阿德勒的先验的社会化意识论是把精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作为第一性的。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是社会的人，之所以具有社会性，并不是人不能脱离社会，只能生活于社会之中，并不是由于人只有首先彼此结成一定的关系，才能共同征服自然，才能创建人自身生活的物质基础。相反，在阿德勒看来，人之所以能生活于社会之中，是由于他们早已在自我意识中发生了关系，因而直接社会化了。在阿德勒看来，甚至生产力也成了精神的东西，因为生产力也是不能离开人存在的，也不是在人之外或超越人之上的自然力量。它是人为了自身的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自觉地利用自然力。这也就是说，自然力只有当被人们有目的的使用时才成其为生产力。否则它就是单纯的自然力。可见，生产力只有被纳入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它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力；可见生产力并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物质因素，而是人自身的力量，是人自觉的活动，是精神的力量。

这样，麦·阿德勒就在事实上取消了他在论述一开始提出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取消了物质与观念的关系问题，把它完全变成了精神关系问题。同时，这也就等于取消了唯物史观，或者讲，把唯物史观变成了唯心史观。可能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这种观点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唯物史观太远了，需要加以掩饰，因而他又为自己辩解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来用唯物史观这个概念是为了反对唯灵论，实际上，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实证论者。可见，在使马克思主义康德化方面，或者讲，在向康德哲学回归方面，麦·阿德勒走得最远。

麦·阿德勒的政治观点同他的哲学观点比较起来，可取之处要多一些。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1922年）和《政治民

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年)两书中,坚持要把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区分开来,他认为政治民主永远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形式,政治民主永远是同专政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无非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的专政。只要有阶级存在,国家政权就只能是专政的一种形式。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完全的民主,即社会民主。政治民主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它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的。把民主与专政对立起来,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观。1926年,阿德勒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极力主张在党的纲领中写上,任何政治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因此党的任务应当是必须使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保卫共和国,而且要有能力建立自己的阶级政权,也就是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阿德勒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阶级的专政,所不同的是,它是多数人的专政。因为在任何一个“非团结一致的社会”,议会多数通过的决议同样也需要依靠暴力来强制贯彻。麦克斯·阿德勒的上述观点既使他同右翼修正主义观点完全区别开来,又使与中派的考茨基存在重大区别。他较他们更接近于真理,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可是这样一种观点并未导致他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随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苏维埃的充分肯定,并未使他做出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结论。他仍然认为奥地利无产阶级应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

第三节 用经验批判论“给马克思主义以哲学基础”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生平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维克多·

阿德勒之子。1879年9月生于维也纳。曾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及第二国际的创立者；1923—1939年任社会党国际书记；物理学家。

在父亲的影响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从小就决心献身工人运动。学生时代先在维也纳大学攻读物理及数学，获学士学位。1897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继续攻读物理，获博士学位。阿德勒在努力攻读自然科学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897年旅居瑞士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协会建立，他成为该协会的一员积极分子。1905年该协会同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协会合并，成立了国际工人俱乐部，他当选为主席。他还积极参加了瑞士工人运动。从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民权报》创刊起，他就成为该报的撰稿人，1910年起更成为该报主编。1911年他当选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1913年与鲍威尔及卡尔·伦纳合作编辑出版了《斗争》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坚决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上层大多数领导人积极支持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认为奥地利政府对发动战争同样负有责任。为抗议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错误立场，他于1914年8月8日辞去了书记职务。1915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地利国际主义者告各国际主义者》宣言，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1916年他联合党内少数志同道合者组织了“卡尔·马克思俱乐部”，积极从事反战活动，并同德国斯巴达克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同年10月21日他冒险刺杀斯图克伯爵，企图借此唤醒处于昏睡状态的党。结果刺杀未遂，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17年11月2日被最高法院改判18年有期徒刑。革命解救了他，1918年11月2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第二天他就重新担任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书记，又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继续编辑出版了《斗争》杂志。1919年2月他当选为议员，致力于组织与创建工人苏维埃。同年5月奥地利工人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阿德勒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

席。在这段时间，他还企图调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矛盾，想使国际工人运动重新统一起来。1921年2月22日他组织的“工人联合会”（第二半国际）在维也纳召开了成立代表大会，他被推选为书记。为统一国际工人运动，他发起了1922年4月在柏林国会大厦召开三个国际统一的预备会。三个国际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决定由三个国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委员会，负责解决有关统一事项。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它的垮台。大统一已无可能，于是他又力促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并，1923年5月21日在汉堡召开了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阿德勒当选为书记。直至1939年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纳粹分子在德、奥上台后，他致力于地下活动。1939年由于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已瘫痪，他便于5月14日辞去了自己的职务，流亡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侨居在那里。1947年回欧洲，致力于写作他父亲的传记和有关文献、文件及资料的编辑与出版工作。1960年1月2日于苏黎世去世。享年81岁。

认为马赫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补充 弗·阿德勒同麦·阿德勒一样，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社会观，是一种经验科学，缺少自身的哲学基础应当予以“补充”和“修正”。不过他同麦·阿德勒又有所不同。他在大学攻读物理学时，就深受当时著名物理学家马赫的哲学思想影响。1903年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就更加专心致力于马赫主义研究。写了许多企图以马赫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著作。1909年10月29日弗朗茨·梅林在《新时代》1909—1910年第1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批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说这些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把“镰刀去收割波涛起伏的庄稼（即研究解决运动中的现实问题——作者注），却把大镰刀放在铁砧上去打出缺口来”。为此，弗·阿德勒写了《“马

赫主义”与唯物史观》一文作为回答。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为什么应当用马赫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

弗·阿德勒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改前人以“伟人”为中心的英雄史观的传统观念，而以“群众”为中心。看到了在阶级社会“群众”划分为阶级，阶级利益的对立和阶级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过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取决于生产方式内部变化。这样就使得人们可以更为准确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实情况，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毫无疑问，唯物史观的形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共性，对我们世界观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阿德勒认为，尽管如此，唯物史观仍需要“补充”。这首先是指马克思的阐述方式来说的。他认为，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主要是想把他自己与黑格尔区别开来，因此，马克思强调的总是自己与黑格尔不同的地方，而那些与黑格尔一致的地方和与其他流派相区别的地方则是次要的了。因此，人们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只有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与对立中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阐述的有关细节。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也有必要不再通过钻研生僻的黑格尔体系迂回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如今已完全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从今天大众头脑中的世界观出发，直接表述马克思的思想；对某些世界观给予必要的批判；研究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都是极其必要和尚未完成的任务”^①。这当然要对马克思主义作许多必要的“补充”。

其次，对马克思“补充”的必要性还来自建立统一的总世界观的必要性。建立这样一种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统一的总世界观已经成为唯物史观本身存在的条件。因为随着

^① 弗·阿德勒：《“马赫主义”与唯物史观》，《新时代》杂志1909—1910年卷第2页。

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许多科学领域中一再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于那种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发展均是事先为了某种目的而安排的目的论的批判，也来自那些主张可以用进化代替革命、用个体竞争取代阶级斗争的达尔文主义者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新的知识彻底武装马克思主义，以便在激烈的斗争中，能在敌人的阵地内部有效地进行反击。弗·阿德勒在这篇文章中说，马克思逝世已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还多了，距他第一次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已有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来，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难道这些进步真的丝毫无助于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吗？弗·阿德勒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表示，就他所涉及的自然科学领域而言，自然科学至今还无法在科学内容上向马克思主义，向唯物史观提供什么新东西。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却为改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提供了可能。

弗·阿德勒认为马赫主义正是“补充”唯物史观的合适的理论。因为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的理论，因而它又是一门关于个别学科的科学。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唯物史观是否“需要补充”，而是一个“如何补充”的问题；是用自然科学中的哪一种观点来“补充”唯物史观才能使其成为一个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完整的总世界观。阿德勒认为，能担当起这一任务的只有马赫的物理学发展史观。因为所谓用自然观“补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决不能形成自然观与历史观毫不相干地并列着的那种“君合国”^①状态。自然观与历史观绝不是毫不相干的。而是有密切联系的。阿德勒认为马赫提出的“经验”和“发展”两个概念便是这种联系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原理。阿德勒指出，马赫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有关历史观问题，但是，他却在自己研究的边缘上，在不熟悉马克思、恩格斯的情况下，独立地得出了与唯物主

^① “君合国”系指两个国家由一个君主统治而形成的联合。但两个国家各自独立。

义历史观相对应的结论。他坚持以经济关系作为历史地叙述力学、热学和数学发展的出发点，这一研究为唯物史观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证明。他在《文化与力学》一文中，追溯了原始民族力学的发展，为科学发展史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弗·阿德勒提出的以马赫对科学产生问题的研究“补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是一种骗人的折衷主义把戏。因为在马赫看来，科学的发展不是为了实践的目的，便是为了克服思维的不便，即实现“思维经济原则”。我们决不能把这种认为“思维经济原则”是科学产生和发展动力的理论看作是对唯物史观的“补充”。因为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按照费力最少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的翻版。为了“按照费力最少的原则对世界思维”，阿芬那留斯宣布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的；宣布“因果性”和“实体”都被废弃了。这就使得感觉成了没有物质的感觉；思想成了没有头脑的思想。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正是象阿芬那留斯一样，把世界归结为感觉。因此，如果真的要“思维经济原则”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那就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而决不会是什么其他什么东西。因为在认识中，设想存在着的事物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其他都是不可知的、虚幻的才是最省力，最“经济”的。其实抽象地提出“思维经济原则”本身就是荒谬的。是“设想”原子是不可分的更“经济”些，还是“设想”原子是由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的更经济些呢？可见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只有当人的思维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才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标准。只有在否认客观实在，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情况下，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专门批判了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指出运用这一原则暴露了“马赫的可笑的哲学动摇的一个例子。马赫在《热学》中再次谈到他的“思维经

济”原则，但是，他接着补充说，我们并不是为经济而经济，“科学经济的目的是提供一幅尽可能全面的、静止的世界图景。”列宁说：“说科学的目的是提供一幅正确的（这同静止毫无关系）世界图景，这就是重复唯物主义的论点。这样就是承认世界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是客观实在，模特儿对于画像来说是客观实在。就此看来，思维的经济性只不过是一个用来代替正确性的笨拙的极其可笑的字眼。马赫在这里，像平常一样，又弄糊涂了，而马赫主义者模仿并推崇糊涂思想”^①。当然从本质来说，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则。因为马赫不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这样“思维经济原则”就只能从主体中得出，而感觉中不会包含任何“经济”。这就是说思维提供了一种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思维经济原则”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是先于一切经验的，也就是说它仅是构成经验的逻辑条件和认识形式。正是这个原因，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才被英国的唯灵论哲学家詹姆斯·华德用来反对唯物主义。英国唯灵论者这样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像弗·阿德勒等这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使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赫的认识论经济学靠拢起来，这纯粹是滑稽的事情”^②，如果进而把这样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看成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并认为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补充，那就更加滑稽可笑了。

弗·阿德勒认为，马赫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补充”的另一思想因素是他对事物间因果性关系的理解与表达。马赫认为，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表达事物的因果性关系方面一般不再使用“自然必然性”意义上的“原因”和“结果”等概念，而应当用“引致”、“作用”和“明确性”三个能更准确表达事物间因果关系的概念取代这些陈旧的、原始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和僵化的概念。阿德勒按照马赫的这些意见提出，按照目前科学发展情况来看，唯物史观为了自身的更加科学化和赢得更多的群众，也应当吸收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新概念于自身。具体说来就是以生物学中的“适应”概念代替“决定”概念。他强调说：“如果用生物学‘适应’概念取代物理学的‘决定’概念，就可以避免唯物史观所遭到的大部分误解。”^①阿德勒对此解释说，马克思曾阐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后来，我们发现这一原理不断地被人们错误地理解和运用，而且这种“误解”的造成多半是同“决定”一词联系在一起。因为马克思要说的不是物理意义的“决定”，不是这种明确性的决定，思想不能说成是生产关系的明确作用的结果。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说，头脑中的变化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是第二性。物理学的“反映”这个概念也具有这种明确性。因此它便被频繁地用来说明生产关系与大脑思维之间的关系。这里也常常容易被误解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概念的形成就如同镜子中的映像一样，是被明确决定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用“适应”取代“决定”就可以避免这种误解。因为我们从“适应”这个概念出发，首先便可明确地指出，即使在生产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思想也可以变化。也就是说，即使生产关系不起作用，思想本身也在发展。因为我们所说的作用不过是指一种变化决定另一种变化。我们可整个地概括为，存在着思想对事实的适应，就是说思维相对于事实说是第二性的，而这样一来才从根本上说明了所有经验科学的一个原理。当我们把这一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断言经济关系是思想所适应的一切事实的中心时，那我们就得出了马克思的特殊认识。整个自然界都是思想适应的对象，但经济关系是中心；适应会随着对象的每次变化

^① 弗·阿德勒：《马赫主义与唯物史观》，《新时代》杂志1909—1910年卷第2页。

而获得新的出发点，而且对象不变，适应也在进行，思维也在发展。这样就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表达马克思对思维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认识，因而就可以免遭误解。因为科学直到现在还不能清楚地说明思维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作用。经济关系对思维的决定并不是明确的。只要缺乏这种明确的说明，也就是缺乏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人的中枢神经的各种变化的，用适应代替决定概念就更有利于避免误解。在这里阿德勒预先澄清两点可能引起的误解。第一，对一种生产关系可以同时展开不同层次的适应。也就是说，范围可以只限于认识经济关系这个基础上，并不一定非由此而推导出一个一定的思想体系。第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思维，它适应的对象在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相当小的变化，甚至根本未发生过什么变化。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所适应的事实就是这种情况。阿德勒认为，在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中，尤其是在认识论研究的领域，思维适应与思维对象的变化从来就不存在作用，决定的关系。适应对象的任一层次的思想总有其自己存在的前提，并非只出现于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因为认识并非在经济关系明确作用的结果。虽然可以有許多关于哲学是对经济关系的思维适应的阐述，但自然科学本身的认识论问题却与此无关。自然科学认识论的进步多半是对基本自然联系的实证认识。可见“适应”概念比“决定”概念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

如何认识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的能力等等。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是哲学根本问题在认识论方面的表现。承认我们意识以外的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承认我们的主观意识是由这些客观事物决定的，是它们的反映，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否认我们意识之外的世界和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否认这些事物之

间的因果联系和客观规律的存在甚至否认这种客观存在自身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因果关系上的这种主观主义路线，不是从外部的宏观世界及其规律引出人们的意识、理性及逻辑的发展等，而是从意识、理性及逻辑的展开引出世界的秩序及必然性。这样的因果观不仅把人类理性与自然界完全隔离开来和对立起来，认为彼岸是不可知的，而且把自然世界作为理性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是自然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恰恰相反，这种认识论绝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不过，按照恩格斯的意见，一定要用辩证观点来看待原因与结果和决定与被决定。当我们考察某一事物的原因与结果时，那是为了认识这一事物的某些细节而把它从世界总画面中，从自然的和历史的联系中抽取出来，从它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加以考察。显然，客观事物之间的这种因果联系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不过，“原因与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的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①。

弗·阿德勒要求人们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放弃表达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传统观念，放弃“原因”、“结果”、“自然必然性”以及“决定”等概念，而以“引致”、“作用”、“明确性”以及“适应”等概念代替。显然是在调和认识论方面的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因为认识论上哲学派别的划分，并不在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而在于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源泉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页。

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的能力。马赫在他的《力学》中曾说过，“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我不止一次说过：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对自然界说来，并没有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必然性。”^①以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标榜的弗·阿德勒提出以“适应”代替“决定”并不是为了更准确地表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这种因果关系的相对性和相互转化的可能，他的目的是用比马赫更为隐晦的言词否定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马赫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弗·阿德勒认为，在本体论方面，马赫对“物质”概念的阐释可以对唯物史观作重要补充。他批评在马赫以前的“物质”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我们既不知道这一概念是如何得出的，也无法凭直觉认识它。可是有不少科学家却把它当作一切知识的出发点。他强调，马赫则不同，马赫说明了我們沿着什么样的道路由经验、由直接的事实上升到物质概念。同时他又指出，物质这个概念在物理学概念的自然发展史上是作为终极概念而提出的，在科学实际上所经历的道路全部走完之前，人们是无法把握它的。这种发展仍将继续下去，现在还无法认为物质概念是确定的。从前的物理学都是从物质这个假定出发，认为物质是由绝对不变的物体构成。马赫则不同，他不是从某种未曾发现过的、纯粹假定的、绝对不变的物体出发，而是重现科学本身无意识地、事实上走过的道路，也就是由已知的物体出发的道路。作为马赫研究的出发点的物体，是我们经验中已知的、不断变化着的物体，科学的基础不应当是关于绝对不变的物体假设。阿德勒强调：“科学要想使自己成为自觉的、能展现出自身道路的话，它必须从实际的、已知的、变化着的经验物体出发。”^②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162页。

^② 弗·阿德勒：《马赫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新时代》杂志第35卷第1册第112页。

那么，这种实际的、已知的、变化着的经验物体是什么呢？这就是“感觉的复合”。马赫认为，像“物质”和“精神”这类东西是不能依靠经验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哲学家却把这一原则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作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提出了一元论的“要素”说。在马赫看来，人类对世界的任何认识、我们所知道任何东西，都必须由感觉表现出来。感觉是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马赫还进一步将这各种各样的要素分为构成“物理世界”的要素，“构成人体”的要素和“构成心理的要素”。马赫反对把感觉看作纯主观的东西，他反复强调感觉的客观性，强调要素的复合体根本只有一个，整个世界，包括物理世界、人体自身和心理世界都是由少数同类要素构成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不同。他认为，不是自我，而是要素（感觉）是第一性的。他认为，“叶子是绿的”和“我感觉到是绿的”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人们由于实际目的，对原来“绿的”这个事实所采取的两重陈述。元素同时有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原素本身既非精神现象，亦非物理现象，但却又是这两者，是通过这两种联系而体现出来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表现为这种直接存在的原素的巨大运动，我们无须寻找这些原素背后的自在之物，因为一切定在的事物、所有的经验都处于这些原素的运动范围内，而科学所研究的一切都是对于原素彼此相互依赖性的研究。

另外，马赫强调原素不是象扬尘的颗粒那样彼此无关的，而是按一定秩序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的。物质正是这种原素运动的结构，这种经验的结构。也就是说，物质并非什么另外的存在物，并非什么在经验之前形成的，并非什么先验的东西，而是这些原素的构成、构造。另外，马赫认为原素只有一种，但却有两种联系方式。一种是精神上的联系，另一种是物理上的联系。这些联系使一切运动彼此相关，或者讲，这些联系的枢纽使经验世界各

个部分彼此直接或间接地相互衔接起来。在原素的进一步形成和消亡中得以循序而进。对于马赫来说，“物体”和“自我”都是事实。但它们不是自在的事实，不是处于经验彼岸的事实。它们是直接存在物的真实联系，是原素运动的真实联系，并且经验世界的结构在本质上同样如此。

弗·阿德勒不仅对马赫的“要素一元论”的本体论深表赞同，而且在马赫逝世以后，他主动为马赫的学说辩护。他批判传统的唯物主义观并未真正解决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他说：“传统观点认为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下述关系：一个物体（例如树）作用于媒介物（空气，以太），后者又作用于感官，感官再传导到中枢神经系统，随后便在神经中形成感觉。物体、媒介物、感官、中枢神经系统构成一个自在客体的系列；它独立地存在于一切主体之外。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被作用物的感觉和感情，这是客体的纯精神的東西。”^①他认为这种传统观点并没有真正解决它着重解决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問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证明“自在的客体”如何作用于主体，并最后又是如何在纯心理的作用下“形成纯粹的精神现象”。阿德勒认为，传统观点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虛假問題”。只要人们从原素学说的角度来看，便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象“自在客体”以及这种“自在客体”的“作用”都是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必须抛弃。并非“自在客体”的“相互作用”，而是原素产生的“人化客体”表现为彼此相互依存，或者更确切说，一定客体所具有的原素是依赖于其他客体所具有的原素。如树的叶子，我们除了叶子这个客体外，它还具有“绿色”的性状。“绿色”只是在人体的一定性状下才能出现，在其他光源或另一种人体性状下，则会表现为另一种颜色要素。

^① 弗·阿德勒：《马赫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新时代》杂志第35卷第1册第115页。

因此，叶子的“绿色”除取决于自身的要素以外，还取决于光源要素和人体构成的要素。因此，原素一方面在客体和主体中相互具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彼此相依存的。不仅客体中有原素，而且主体中也有。但原素本身则是一个统一体。不是主体依赖于他们各自附属的那个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同时存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人体（中枢神经、感官）和其他客体（媒介物、光源等）都是由原素一手再造的。它们都是原素“绿色”产生的条件。中枢神经只是原素“绿色”产生的条件，因此才说感觉“绿色”。“绿色”不是从中枢神经产生的，它不是中枢神经的产物。同样，“绿色”也不是上述一系列客体的后果。客体并不“作用于主体，主体并不是依赖于客体的，而是主客体同时存在。一个客体所具有的原素，也总是包含在主体之中。“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主客体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或者更精确更概括地说，原素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不是科学研究的使命，也不是科学的目的，这种由原素直接产生的关系是科学的出发点。”^①阿德勒正是根据马赫的这种观点强调：从物质推导出感觉这一唯物主义原则是机械唯物论，并说这种机械唯物论企图证明，科学是对“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的真实“映象”，并企图从物理学世界中寻找“感觉”和“感情”。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虚假问题，就如同企图从一幅油画中剖析所画肖像的心一样荒唐。机械唯物论是毫无出路的，因为它是从映象中寻找感觉而不是到唯一可以找到它的地方，到原素的运动中去寻找。阿德勒甚至认为，“如果有一天物理学真正找到了绝对不变的物体，那么这或许是对物理学世界观的进一步简化，但这不可能成为另一种原则性的倾向，不会

^① 阿德勒：《马赫克服了机械唯物论》，《新时代》杂志第35卷第1册第113页。

使机械唯物论提高为一种基本的世界观。从经验性的物体到物质的道路、从原素到物理学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会永远排除掉一切虚假的问题，建立起精密科学的可靠基础。只有这条道路才是研究所真正经历的道路，也是帮助我们认识恩斯特·马赫毕生事业的道路。”^①

弗·阿德勒在这里所说的，所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普遍原则，他所推崇的马赫的创造不是别的，而是阿芬那留斯和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因而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以专门章节批判了阿德勒。

列宁指出，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前者是唯物主义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路线。阿德勒推崇的马赫把科学的任务规定为：1.研究表象之间联系的规律（心理学）；2.揭示感觉之间联系的规律（物理学）；3.阐明感觉和表象之间联系的规律（心理物理学）。把物理学定义研究感觉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物体之间联系的规律，显然是遵循的哲学的唯心主义路线。1883年马赫在《力学》中又说：“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物是‘感觉的复合’显然是同认为感觉是物的映象或反映的唯物主义路线完全对立的。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最终只能导致‘唯我主义’，导致世界仅仅由我的感觉构成的结论。因此，当马赫说：“我们感觉到仅仅是自己的感觉”时，列宁立即讥讽地驳斥说，马赫使用“我们”这个字眼是不合理的。在这个字眼上完全暴露了马赫的不彻底性。“因为，如果关于外部世

^① 阿德勒：《马赫克服了机械唯物论》，《新时代》杂志第35卷第1册第118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3—34页。

界的‘假定’，关于对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以及我的身体和针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有这些假定的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那么关于别人是存在着的这一‘假定’就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存在的只是自我，而其余的一切人，也和整个外部世界一样，都属于没有意义的‘核心’之列。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能说‘我们的’感觉了，可是马赫却这样说了，这只能表明他的惊人的不彻底性。这只是证明：他的哲学是连他本人也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空话。”^①

列宁指出，马赫思想的不彻底性或自相矛盾还表现在，他一方面认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另一方面又认为感觉同有机物体的某些过程有关。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说：“假使正当我感觉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用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头脑，那就可以确定一定种类的感觉和有机体中所发生的哪些过程有联系”^②。按照马赫的观点，人的头脑也是物体，因而也是“感觉的复合”。结果是，我依靠“感觉的复合”去感觉“感觉的复合”，这是一个真正的“恶的循环”。首先宣布感觉是“世界的真正的要素”从而加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阵营。与此同时，他又偷运相反的哲学观点，说感觉是和有机体中的一些过程有联系。这种矛盾实质上是作为科学家的马赫同作为哲学家的马赫的矛盾。因为作为科学家他必须把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客观实在对待；可是作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又背离了自己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只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东西的唯物主义者才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感觉是高级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性，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的转化。唯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37页。

^② 同上。

心主义的哲学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存在的东西”。

列宁指出，马赫哲学思想的混乱和自相矛盾还表现在他的关于“世界要素”的学说中。列宁把马赫的“世界要素”说归结为以下六点：

(1) 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说成是感觉；

(2) 把感觉叫成要素；

(3) 把要素分成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后者依赖于人的神经，一般说依赖于人的机体，而前者不依赖于它们；

(4) 把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说成不是彼此单独存在的；它们只是一起存在的；

(5) 只能把这种或那种联系暂时撇开；

(6) 把新理论说成是没有片面性的。^①

列宁认为，这种所谓没有片面性的理论，实际上是彼此对立的哲学观点的杂乱的混合。你的哲学既然是从感觉出发，一切物体都被说成是“感觉的复合”，那么，你又想用“要素”这个字眼来消除你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片面性”，是根本不行的。这只是胆怯地回避自己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而不是消除它。这只能把问题弄得更糊涂。你口头上宣称要消除物理的东西同心理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消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但是，你却暗地里偷偷地恢复了这种对立。因为如果要素是感觉，那么你连一秒钟也没有权利认为“要素”不依赖于我们神经、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既然你承认这种有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感觉的物理对象，这种只是通过对我的视网膜的作用而产生感觉的物理对象，那么，你就又转到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48页。

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织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①这就是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与此相反，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马赫的观点以及他的一切追随者，其中当然也包括弗·阿德勒的哲学观点则是摇摆于两者之间的，折衷主义哲学观点。

哲学的党性原则 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最后，列宁进一步从打着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冒牌学者的无党派哲学的背后，揭示出了哲学的党性。列宁指出，“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在致力于发展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他们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宗旨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企图在模糊的言词、观念掩饰下向唯心主义投降、退却的折衷主义。他们认为，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一般说来是同社会中的阶级对立相联系的。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要利用唯心主义及其各种变种来麻痹人民；而各革命阶级则往往利用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列宁非常称赞的瑟夫·狄慈根对哲学中间派的批判，他特别引证了狄慈根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比作固体和液体，而哲学的中间派就是一摊糊状东西的比喻，说：“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351页。

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不过是玩弄‘调和骗人的把戏’而已”^①。

列宁对马赫主义的这些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批判。

折衷主义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麦·阿德勒信奉的是新康德主义；而弗·阿德勒则把马赫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因此，从表面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统一的哲学观点。这是由于：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差异是同他们的所谓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是属于私人的事情，社会民主党并不要求它的党员具有同一哲学观点相吻合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差异仅仅是表面上的，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一致的。这首先表现在不论是马赫主义也好，新康德主义也好，都是一种企图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折衷主义哲学。麦·阿德勒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提出了先验的“社会化意识论”，企图以此来综合康德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弗·阿德勒则极力强调马赫的基本哲学观点物质是“感觉的复合”，认为科学不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是为了克服思维的不便，即实现“思维经济原则”。显然这也是企图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先验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之间走出一条中间路线。应当指出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折衷主义路线是同他们在政治路线的折衷主义，同他们的中派立场相适应的。其次，新康德主义与马赫主义虽然都标榜自己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但因为它们都否认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在之物”的存在，都把感觉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它们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正是由于它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的共同性，所以使它们可以同时作为奥地利马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356页。

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不相悖。

实际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成员普遍都是以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作为他们的哲学基础的。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就是从马赫主义出发来研究货币的。他在该书第13页上说：根据恩·马赫的观点，“‘自我’仅仅是无穷的感觉线比较密集的焦点……同样地，货币也是社会联系网的枢纽……”。对此列宁在自己的笔记中评论说：“乱七八糟……”“不对”，“不是‘同样地’”^①。也是在研究货币问题时，他说：“只有我们的直观使物体具有空间形式。”这就否定了货币的客观存在，因此，列宁批判说：“不对”^②，并指出这是康德主义。

作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鲍威尔对自身的世界观问题给予了更大的注意。1916年他被囚禁在俄国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题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观》的论文，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了系统地阐述。他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混淆在一起，并把唯物主义的胜利看作是1848年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唯心主义哲学破产及自然科学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然唯物主义发展的结果。而1866年和1871年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和俾斯麦专制政权的建立，唯物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动摇。他认为，这表明“时代为获得一种新的世界观而斗争，这个世界观应克服唯物主义”^③。他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加强起来。如果说唯物主义是自由竞争时代的世界观的话，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则是有组织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观。

在鲍威尔看来，我们的认识是生存斗争的一种工具，是达到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4卷第370页。

② 同上。

③ 鲍威尔：《资本主义的世界观》，《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6页。

一定实际目的的手段。认识不能去探讨事物的本质，它只能为达到实际目的去收集和整理经验。这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只是我们劳动的一种手段。我们力求使这种手段最合乎目的、最简单、最经济。为此我们就要尽可能把许多个别的认识概括成为一种规律。这种规律不是上帝给予世界的，不是自然的永远不变的认识能力强加的一种规律。它是利用来为自己服务，以使用最简单、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整理他的经验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手段。这些规律不是向我们揭示世界的本质，只是使我们的劳动合乎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中，因果性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也消失了。“因果性的自然规律只是用以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因果性本身只是以目的论为论据的。因果律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对事物本质的说明，而只是对我们的经验的经济的表述；它不能向我们指明，一个原因怎样产生一个现象，它只是向我们指明，一个现象怎样继另一个现象之后发生，一个现象怎样伴随着另一个现象发生。……当按照手段和目的来整理能够比按照原因和效果来整理更加简单地表述过程的时候，就宁可采取前者而不采取后者”^①。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鲍威尔再次强调了以马赫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他论证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发展出来的。当它成熟并同母体分离之后，便同唯物主义发生了联系。而当唯物主义随着机械论的自然观的解体而解体的时候，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便企图使它同晚近的认识理论联系起来，即同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当我们完成了这种结合的时候，我们就超越了现代人，也超越了马赫。他说：“马赫认为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思想相互之间的不断前进的适应和思想对自然事实的不断前进的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把它看成思

^① 鲍威尔：《资本主义的世界观》，《鲍威尔言论》第41页。

想对社会状况和对由这些状况决定的精神需要的不断前进的适应。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是马赫和阿万那留斯、彭加勒和詹姆斯都不能企及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必须详尽地指明那种方法，即那种精神过程，人们通过这种精神过程，按照他们自己劳动的样式，按照他们要争取的社会制度的样式，按照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斗争的需要创立他们的世界观。”^① 鲍威尔认为将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认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就会是一种马克思的认识论”^②。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往后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政治观点。正是这样一批浑身充满折衷主义气息的“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奥地利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生平简介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1877年8月10日生于维也纳。青年时学医，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07年参加柏林《前进报》的工作。1914年他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可是他并没能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很快便滑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接受了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的观点。在整个大战期间，他始终同考茨基站在一起，同社会帝国主义者保持着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入德国国籍，1917年起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1922年主编该党机关报《自由报》，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他曾两度出任财政部长，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逃往法国。1940年德国侵占法国后，他

^① 鲍威尔，《资本主义的世界观》，《鲍威尔言论》第46页。

^② 同上。

被捕，1941年死于集中营。

驳斥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攻击 希法亭的成名之作是《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这是一篇批判主观价值论和捍卫劳动价值论的文章。写成于1902年，1904年发表于维也纳出版的《马克思研究》第1卷。这篇文章使他博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称号。

庞-巴维克在一篇题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中断言，马克思并没有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任何经验上的或心理上的证明，他只是以一种纯逻辑的方法，依靠辩证的演绎来证明价值的本质乃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他说，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以下一种观念：没有等同性交换就不可能进行，而没有通约性，等同性也不能成立。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演绎出两个商品之所以可以相互交换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的产品，在它们的物的躯体内部凝结着一般的人类劳动。正是这种一般的人类劳动的耗费，使商品具有了质的等同性，从而才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较。在这里庞-巴维克指责马克思对“商品”这个概念作了不应有的限制。他认为不应当把商品仅仅看作是同自然界的馈赠相对立的劳动产品。合乎情理的应该是，如果交换确实意味着均等，意味着共同的可以通约的东西的存在，那么，这种共同的东西就应当不仅仅在劳动产品中去寻找它，而且还应当到既已投入交换，但又不是劳动产品的自然界的馈赠物品中去寻找，即也应当到诸如耕地、木材、水力等等中去寻找和发现。排除这些可交换的物品在方法论上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这些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交换对象。他讽刺马克思用鳗鱼一样的辩证技术滑过他论述中的困难之处，小心地避免提到被他排除在研究之外的那部分商品，有意地不让读者注意到他的“商品”概念比用于交换的全部物品狭小，并极力抹杀这种差别。他认为，马克思如果真的要探寻用于交换的所有物品的

“共同的东西”，那就不应把自然界的礼物排除在外，这样他的严重错误就会暴露无遗。庞-巴维克还指责马克思，为了证明商品的共同属性是劳动，错误地把商品的自然属性及由这些自然属性决定的使用价值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庞-巴维克问道，即便不考察商品的自然属性和它的使用价值，存在于商品之中的共性也不只是劳动。同需求相比，商品的稀少性就是较劳动更为普遍的共性。不管商品是劳动产品，还是自然物，它们都是需求和供给的对象，都是被占有的对象，所有这一切也是它们的共性。为什么不能像把劳动归结为价值的本质一样，也把所有这些属性归结为价值的本质呢？他攻击马克思对此没有提出丝毫肯定的论据，而是只提出了一个否定的命题——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的本质。

庞-巴维克还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把使用价值排除在价值决定因素之外的理由，同样适用于排除劳动本身。因为劳动和使用价值一样，都具有质的和量的规定性。正像使用价值表现为桌子和谷物时是完全不同质的一样，劳动在表现为锯和纺时也同样是不同的质。如果不同质的劳动可以比较的话，那么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也应当是可以比较的。庞-巴维克断言，马克思没能为他的论点提出任何有根据的理由，哪怕是最微小的理由也没能提出来，只是由于他固执地撇开其他一些属性，只是由于他完全漠视使用价值，才得出他本人所要求的那个结论。

希法亭在批判庞-巴维克时，首先证明了商品是劳动的产品，它体现了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他说，对大部分物品来说，为了使它们有用，就必须耗费劳动。但是，一个物品仅仅是劳动产品还不能成为商品。一个物品只有通过同其他物品发生关系才能成为商品。这种关系表现为交换行为，从量上来考察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物品的交换价值。作为物的商品本身不可能主动同其他商品发生关系，商品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商品

所有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这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的独立的一种关系。这些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首先是一种私人劳动，不过他们完成这些劳动并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可见，私有制和劳动分工把整个社会割裂为孤立的原子，而产品的交换则恢复了社会的相互联系。因此，商品一词是经济学名词，而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表现为商品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统一。因此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作为自然物，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社会物，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过希法亭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着重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只是说政治经济学不去研究使用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但是，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价值不是别的，只是使用价值在经济学上的“变体”，在这个范围内，政治经济学还须要研究它。

从社会角度来考察，生产商品的劳动就不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的产品，它获得了社会必要劳动的特殊性质，私人劳动转化为它的对立面，成了社会劳动。赋予劳动以创造价值的特殊性质的正是劳动的这种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仅仅是物和私人之间的一种个别关系，它只能是个人评价某一物品价值的尺度。生产者之所以会把某种物品交换出去，是因为该物对他来说已没有使用价值了。所以使用价值不能成为评价商品价值的普遍尺度。只有抽象的普遍的人类的一般劳动才能为价值的评价提供一个客观的量的尺度，这个客观的量就是劳动所持续的时间。

希法亭指出，马克思不是仅仅描述经济过程的表面现象，而是努力揭示孤立的生产者之间的背后的社会联系。在以财产分离和分工为特征的社会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是通过交换和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联系，加之，各孤立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只有在社会必要劳动耗费

之内，才会被社会所承认，才能获得有效性，从而使全部问题带上了神秘的性质。只有马克思才揭露了这种神秘外衣掩盖下的商品价值的本质，指出了作为价值，商品是由社会决定的，是一种社会的物。作为价值，作为社会物的商品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希法亭针对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指出，每一种从使用价值出发，也就是从物的自然属性出发的价值理论，都是从物同个人关系出发，而不是从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这样就必然要陷入试图从主观的个人同物的关系推断出客观的社会尺度的错误。个人和物的关系，在所有社会条件下都会同样出现，其中不包含任何变化的历史的原则，这是一种非历史的非社会的观点，它所采用的一切范畴也必然是自然的和永恒的范畴。按照这样的理论观点，我们就不可能发现社会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相反，马克思是从劳动出发的，劳动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因素，它的发展最终决定了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抓住了劳动，也就抓住了价值的质的决定和量的决定。从而也就抓住了社会生活中的本质的因果联系。这一点是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相一致的。

希法亭正确地指出，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才建立了科学的经济学。这是一门社会的和历史的科学，它的一切范畴都被限定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即被限定在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它被限定在劳动和支配劳动的力量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的社会地位。这时，私人劳动只有在社会劳动范围内才能获得其有效性。社会仿佛已把社会必要劳动的份额分配给它的每一个成员；仿佛已经指定每个人必须耗费多少劳动。而这些个人则已经忘记他们各自的份额是多少，只有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才能重新发现。

劳动成为价值的本质。并不是由于某种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劳动是把被分工和私有制分割成一个个孤立原子的社会得到

统一的一种社会契约，马克思正是从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这一点出发，才真正发现了以私有制和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的内在运动规律。对于马克思来说，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前提，他在交换中看到的不是个人对某物评价上的差别，而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关系上的一致性，只有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作为人们间的相互关系的物质承担者的物才能成为商品，也只是在这种关系之中，某些不是劳动产品的物，作为派生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具有某些商品的特征。

针对着庞-巴维克攻击马克思的“商品”概念比用于交换的物品狭小。希法亭指出，对于社会来说，劳动的自然条件总是一定的，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它不可能是经常变化的社会关系的原因。唯一变化的是运用这些自然条件的劳动方式，运用这些自然条件成功的程度决定了劳动生产率，而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则是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在自然力亦由个人处置的范围内，个人有可能运用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生产率进行劳动，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种超额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表现为自然力的价格。这样才使像土地这样的自然界的恩赐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某些商品的特征。它有价格，可以买卖。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转化为剩余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土地所有权只能使这部分剩余利润从企业家腰包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的腰包里。庞-巴维克把自然界馈赠的礼物归结为一种特有的价值，这样，他就作了重农学派的俘虏。

庞-巴维克攻击马克思说熟练劳动可以还原为一定数量的非熟练劳动，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在熟练劳动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非熟练劳动存在。例如，在雕塑家的作品中，就根本不会体现什么倍加的敲砖等非熟练劳动。庞-巴维克认为，雕塑家的劳动同敲砖的劳动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劳动，既不同种，也不同量，这是基本的现实，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应承认。马克思说，各种

复杂劳动化为不同数量简单劳动的过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竞争决定的。庞-巴维克则认为，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是在作循环论证。因为所提问题是，为什么雕塑家的劳动会等于五倍的敲砖劳动，而马克思的回答等于说，现实的交换关系就是这样的——雕塑家一天的劳动可以化为五天敲砖的劳动，可是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点。因此，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在这决定的一点上失败了。

希法亭认为，庞-巴维克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留下的一个“空白点”，而且，不仅庞-巴维克注意到这一点，伯恩斯坦、施米特和考茨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希法亭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明确地指出了所谓简单劳动就是每个没有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而熟练劳动就是这种简单劳动的倍乘。但是怎样倍乘呢？马克思则认为是在生产者背后发生的一个社会过程决定的。所以他对熟练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率决定的过程并未作出说明。希法亭认为，庞-巴维克抓住这一点作出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结论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首先不是把价值理论看作是搞清价格的手段，而是把它看作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手段。经验告诉我们，价格的绝对高度是这个运动的出发点，此外，对我们的研究说，价格的绝对高度是次要的事情。价格的绝对高度是由经验给定的，而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是这些价格变动的规律。因此，缺少对熟练劳动如何还原为倍加的简单劳动过程的说明，并不能否定价值规律。不过，缺少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也是严重的。因为对价值概念的理解本身就要求对影响价值量的各种因素的详细说明，熟练劳动还原为非熟练劳动的过程便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

希法亭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决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较高推导出它创造的价值也较高。如果这样，那就是从“劳动的价值”推导出商品的价值。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应当是到熟练劳动的形成过程去寻找。实际上，平均的非熟练劳动是非熟练劳动力的耗费；复杂劳动或熟练劳动则是熟练劳动力的耗费。对于熟练劳动力来说，它的形成需要许多非熟练劳动力的耗费。在熟练劳动力形成过程中所耗费的非熟练劳动，被贮存在熟练劳动力之内，直到这些熟练的劳动力被投入生产过程，这些被贮存其中的非熟练劳动才形成流动的劳动，参与了新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所以技术教育者的劳动不仅传导知识，而且传导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对社会而言，熟练劳动力中潜在地包含着许多非熟练劳动，直到熟练劳动力开始劳动，这些潜在的劳动才通过熟练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会比非熟练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表现出来。熟练劳动的耗费标志着凝聚在其中的各种不同的全部非熟练劳动的耗费，因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可见，非熟练劳动如果运用于生产复杂的或熟练的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就一方面参与了新劳动力，即这个更为熟练的劳动力价值的创造，使它具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参与了一个新的使用价值的创造，这一新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能够用在它形成过程中所使用的全部非熟练劳动所具有的潜在能力来创造价值。这也就是说，在单一的熟练劳动的耗费中，耗费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因此用这种熟练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形成这一熟练劳动力过程中所耗费的全部非熟练劳动分别创造的价值总和一样多。只要非熟练劳动的耗费对形成熟练劳动力及其职能是必需的，它就会形成潜藏在新的熟练劳动力之内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从社会的观点和从经济上加以考察，熟练劳动便表现为倍乘的非熟练劳动。熟练劳动所体现的非熟练劳动越多，单位时间内，熟练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多。

一个熟练劳动力的形成过程往往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而且还会耗费许多其他种类的熟练劳动。不过，这些耗费的熟练劳动，也会象新的熟练劳动力形成过程中所耗费的非熟练劳动一样贮存在新的熟练劳动力中，形成一种潜在的创造价值的潜力。这些被贮存起来的熟练劳动同样也可以还原为简单劳动。

希法亭指出，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可以科学地说明熟练劳动是如何简化为非熟练劳动的过程，从而使得价值量成为在理论上可以度量的。当庞-巴维克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的关于熟练劳动等于倍加的非熟练劳动提出经验证明的时候，他恰好是把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可度量性混为一谈了。通过经验我们仅仅能测定生产一个特定物品所必须的具体的劳动耗费。至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则只能由社会过程来完成。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竞争。因为在市场上，社会把生产同一种物品的所有生产者所耗费的具体劳动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只在必要的范围内支付劳动，只有社会才能决定各个独立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各不相同的具体劳动，同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相协调的程度。关于“劳动券”及构成价值的幻想便是建立在把理论上的度量标准同实际上的度量混为一谈的基础上的。

庞-巴维克不仅攻击马克思没有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任何经验的证明，而且还攻击他的价值理论同企图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作出说明的《资本论》第3卷处于完全矛盾的状况中。他认为，按照《资本论》第1卷的论述，两个商品之所以可以相互交换是因为双方存在着一种等量的东西，存在着可以通约的东西。除了暂时的和偶然的因素以外，交换都应该是等量劳动的交换。但在第3卷中却不再是这样了，现在商品交换并不是按同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相一致的比例进行的，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暂时的、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和永久的。庞-巴维克说，这表明价值

理论之船撞在现实的礁石上沉没了，价值规律对于说明现实的交换过程是没用的，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在现实中，商品的交换是永远同价值相背离的。《资本论》第3卷说明，为了解释现实的交换过程，马克思只好“放弃了”或“收回”了劳动价值论。针对庞-巴维克的攻击，希法亭证明，劳动价值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和理论基础。《资本论》第3卷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以完美的严密的逻辑，说明了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这便是为劳动价值论所提供的最好的最精确的经验证明。

希法亭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不同生产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所以即使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也会形成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这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情况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等量资本，不管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会带来相同的利润。“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① 庞-巴维克正是抓住了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现实的这种形式上的矛盾来否定劳动价值论。

希法亭认为，在《资本论》第3卷写作时，马克思不仅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这个重要矛盾，而且也十分科学地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它。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学说的制定；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及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必然要不断提高的学说；以及关于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必然会由于部门间的竞争而趋于平均化的学说，为上述矛盾的解决打下了基础。希法亭引述了以下两段话来说明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的：“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93页。

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果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各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就利润来说，不同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他们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他们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为他们持有的股票数不等。”^①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为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为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同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每个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7—178页。

产部门……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①。

希法亭认为，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完全坚持了《资本论》第1卷中的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像庞-巴维克所认为的那样，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在第1卷中，马克思只是讨论了商品按价值交换时所表现的交换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按价值交换就是交换的一般条件，决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也不是这样简单。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就已经谈到了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指出了平均价格并不像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同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价值仅仅是价格波动的中心，只有从较长一段时期内价格波动的总趋势来看才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因为在价格高于价值的情况和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况抵销之后，商品的总价格仍等于总价值，而且，价值规律仍然是这种运动的调节者。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发挥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也不是对第1卷中的价值理论的否定，而仅仅是对它作了某些修正。因为马克思同样证明了生产价格总量同价值总量是一致的，由于价值形成过程仅仅是在生产过程内部完成的，因此利润也是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也不是由资本家所获得的追加的制成品中产生的。其次，既然总价格等于总价值，那么总利润也不是别的，而只能是总剩余价值，这是利润总量确定的基础。庞-巴维克漠视生产价格总量同价值总量相等的这一基本事实，因为他和马克思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客观的，在数量上是已经确定了的，因而不论是单个商品的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8—219页。

值还是社会全部商品的总价值都是可以计量的。可是按照庞-巴维克信奉的价值理论——边际效用论，价值本身就缺乏这种量上的规定性，全部商品的总价值量就更无法计量。

希法亭还指出，马克思所阐明的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分配并不是以个别生产者在生产剩余价值中所耗费的劳动为标准，而是以推动这些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所必需的预付资本的量为标准来分配的。显然，分配的这种变化同用于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没有关系。社会关系没有变化，分配的这种变化只是对个别商品的价格作了一种修正。如果我们要确切知道这种偏离的量，我们就不仅必须知道剩余价值量，而且还必须知道预付资本的量。价值规律使我们能知道这些量，因而也就使我们能够确定个别商品的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的程度。可见，价值是必要的理论上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我们才可以阐明由于竞争所造成的各种特殊现象，而对这些特殊现象的科学的说明，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精确的经验证明。

为了进一步驳斥庞-巴维克指责马克思没有为价值理论提供任何经济论据的谬论，希法亭详细地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实际上反映了由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转化现实的历史过程的思想。

希法亭指出，马克思对商品按价值交换的条件曾作过详细的论述，这就是：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条件，工人本身占有各自进行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以平均相等的劳动时间和相同的劳动强度进行生产，那么，他们就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出等量的新价值。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同，因而在他们各自的产品价值中所包含的由于生产资料的耗费而转移到新产品中的价值也不一样，因而会有一个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由于他们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都已经得到了补偿，在扣除了投入的“不变资本”的因素以后，他

们都得到了等量的价值。因而“利润率”的不同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何况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各个不同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所使用的生产工具都是非常简陋的，资本有机构成及资本周转时间长短的差别远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大，因此，决不会有利润率相差悬殊的情况出现。第二，由于中世纪的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劳动和资本不能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不同，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一般比较狭小，在这种局部的狭小的市场中，竞争使不同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从而形成单一的市场价值。只有当形成了广大的统一市场；妨碍自由投资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扫除以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才可能由于部门间的竞争而形成。

庞-巴维克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也都占有他们各自生产所必须的土地、工具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产品就应当按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所生产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出卖。他认为，这显然是同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相矛盾的。希法亭指出，庞-巴维克的这一反驳，显然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基础上的。因为马克思明确地说明了，商品按价值交换只能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于中世纪。在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商品是按生产价格交换的，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上，同一种商品只能有一个统一的价格，而不管它是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还是个体的小生产者生产的。

为了证明马克思关于利润平均化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庞-巴维克还援引了威纳尔·桑巴特对《资本论》第3卷的攻击。希法亭指出，援引桑巴特也不能给庞-巴维克多少帮助。事实上，桑巴特并没有提出价值规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否有效的问题。他所反对的仅仅是认为利润率的平均化是在封建经济转化为资

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由原初的各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拉平而造成的。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竞争的起点是早已存在着的商业利润率。正是由于对早已存在于商业中的“习惯利润”的追求，资本才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中去。显然，正是桑巴特的看法缺乏历史的依据。因为不同剩余价值率的平均化为一个单一的利润率，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只有当着封建行会的垄断废除，当资本自由转移的限制已经消除，对劳动力的束缚不复存在的时候，一句话讲，只有当资本主义关系取代了封建关系的时候，最初极不相同的利润率，才会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马克思的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的理论也正是这一客观转化的反映。

庞-巴维克认为，即使站在马克思学说的立场上来看，马克思的下述说法也是不完善的：在复杂的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至少是间接地或“最终地”调节着生产价格，因为由价值决定了总剩余价值，因而最后调节平均利润量和——一般利润率。庞-巴维克对此补充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首先是由企业主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和他垫支资本的平均利润构成。生产资本的成本价格又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由垫支的可变资本和垫支的已消耗的不变资本、原料、机器等构成。如果把这种分析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会得出像亚·斯密分析“自然价格”时相同的结论，即商品的生产价格最终是由这样两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在各个阶段上所支付的工资总额；另一部分是按照已支付的工资总额和平均利润计算出来的利润总额。

希法亭指出，庞-巴维克的所谓根据马克思理论所作出的这些武断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他犯了双重错误，首先他的推论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意。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意见，不论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还是某一个部门生产的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以及某个商品的价值都完全一样，都由以下两部分价值构成的：一个部分是补偿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另一部分是新创造的价值，它

表现为工资、利润、地租等收入形式。第一部分同第二部分是对立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第一部分决不会采取收入的形式，它总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流回。第二部分自身内部又包含着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虽然都是收入形式，但它们有本质区别，利润和地租体现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工资则体现有酬劳动。可见庞-巴维克的所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商品价值构成二分析，完全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其次，庞-巴维克的推论还重复了斯密的错误。这一点表现在：第一，他像斯密一样忽略了不变资本，而这是在研究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化时最不容忽视的。因为这一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对资本有机构成的考察，不考察不变资本也就是不考察最本质之处，因而就根本无法理解生产价格的形成。第二，他像斯密一样，也把可变资本和利润当作了价值的“决定因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歪曲成他的对立的学说。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量是一定的，它由转移到新产品上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两部分构成的。新创造的价值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两部分，但它并不是由它们产生的或决定的。它是由劳动力创造的，它以什么样的比例分摊到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两部上，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庞-巴维克实际上陷入了资本家的幻想之中，在他看来资本家投到不变资本同投到可转资本上去的资本都完全一样，它们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投入到资本的循环过程之中，并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带来利润。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被完全抹杀了，价值的形成过程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劳动不再表现为商品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似乎是由成本价格加利润构成的。这样便陷入了以价格解释价格的恶性循环之中了。

希法亭不仅就某些具体观点对庞-巴维克进行了批驳，而且还从世界观方面揭示了他方法论方面的错误。他指出，从方法论方面看，庞-巴维克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孤

立地片面地来考察诸如商品、资本等这样一些社会经济现象。可是商品、资本等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个别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它的运动是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制约的。看不到这种联系，不是从社会，而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出发，就必然要曲解以社会为出发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社会决定论。在庞-巴维克的全部论述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这种曲解，甚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劳动创造价值”也不例外，也被他作了纯粹主观主义的解释。

庞-巴维克认为，劳动是和“麻烦”、“辛劳”相一致的。他从纯粹心理学的现象，从个人对“麻烦”和“辛劳”厌恶的感觉来解释价值形成。这实际上是发展了亚当·斯密价值理论中的错误方面。斯密曾经说过：“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末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①其实，马克思早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就已经强调指出他的劳动价值论同斯密的主观主义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说斯密实际上是“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②。事实上商品价值的大小根本不涉及当事者的个人评价。在资本主义社会把生产为个人造成的“麻烦”和“辛劳”作为价值尺度是绝顶荒谬的。因为，对商品所有者来说，生产商品根本不会为他带来任何“麻烦”和“辛劳”。相反，遭受“烦扰”和“辛劳”的生产者却不拥有商品。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人关系实际上同创造价值的劳动概念毫无关系，劳动不是被看作可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9页。

以引起某个人高兴或厌恶的东西，而是被看作某种客观的量，它是商品所固有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庞-巴维克认为，劳动只是个人价值评价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社会联系的细胞，正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劳动组织的形式决定了社会生活的特征。经济现象从属于同个人主观愿望完全无关的客观规律。

因为庞-巴维克是从个人关系、从个人的“安逸”与“麻烦”来说明价值，他就必然像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价值看作是永恒的、非历史的范畴。希法亭指出，同庞-巴维克的这种观点完全相反，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相互对立的观点，由此而产生的对价值的看法也是绝然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产物并不是从来就是商品。生产物内包含有劳动仅仅是物品的内在属性之一，但产品决不是因为它是劳动产品便会获得可交换性，从而成为商品的。产品的可交换性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它仅仅依靠所有者的愿望，以它们被占有和可让渡为前提。只有当产品从一开始便是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时候，即专门作为交换对象生产出来的时候，才对劳动量同交换过程的关系加以考察。这种关系只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才出现。一旦产品被作为交换对象生产出来的时候，它们之间交换的量的比例便以劳动时间为转移，这一生产时间又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这样，交换关系便失去了庞-巴维克等主观学派所赋予它的那种偶然性，它们之间的交换及其比例并不是以它们的占有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的占有者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影响劳动的社会条件成为对个人的客观的限制，社会关系的总和制约着个人的行为。

价值规律以商品按价值交换为出发点，这就意味着商品只有体现等量劳动时才能相互交换。不过等量劳动交换只是商品交换

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唯一的条件。商品按价值交换一方面构成了以后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又直接支配着商品生产发展的某一个历史阶段。

商品交换关系只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它所实现的是商品代理人之间的平等。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由于相互对立的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各自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所以这时他们之间的交换是按同价值趋于一致的价格进行的，这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间的平等地位的表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单位之间的平等再次得到反映。不过这种平等不再是独立的劳动者之间的平等，而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只有在利润平等，即双方都得到平均利润的正常交换中，才能得到表现。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前者是劳动者之间的平等，后者是剥削者——资本家之间的平等。这两种平等又是有联系的。由于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都是以财产的分离和分工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商品生产的更高级的形式，因此价值规律并没有被取消，只是在它的实现中作了某些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特殊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竞争实现了资本家都有权获得同所拥有的资本成比例的利润的平等权利。这种平等在生产价格等于成本加平均利润（ $\text{生产价格} = K + P$ ）中得到表现，而劳动者则表现为资本的附属物，因为在这里，可变资本仅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机器、润滑油并列在一个项目之中。

庞-巴维克认为，竞争只是受市场上各当事人心理刺激和动机影响的一种集合的名称，因此它影响价格的形成。马克思求助于竞争，求助于供给和需求这些受人们主观条件左右的因素说明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摧毁了他一再强调的价值规律的客观性。希法亭针对他的这一论点指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是一种真真实实的客观经济关系并决定着价格的形成。如果需求增加，价格就

上升，反之，如果价格上升，需求就减少；如果价格下降，需求就增加，进而，如果需求增加，价格就上升，供给也就因为生产更有利而得到增加。因此价格决定供给和需求，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另外，供给也决定需求，需求也决定供给。最后，所有这些波动都有一个相互抵销的趋势。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创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资本家为了能继续生产必然按等于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如果他不能获得这一价格，再生产过程就要受到阻碍。供给就会减少，致使价格重新上升到可以实现这一价格。因此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心理因素，相反，它是决定商品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客观力量，正是依靠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或者说，依靠着资本家间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间的竞争，价值规律才能得到实现。

另外，竞争和供给、需求等决不是什么心理因素，还可以从它们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来说明。这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的水平首先是由工资和全部剩余价值的比率决定的，其次，它们也是由利润、地租、利息、赋税等部分占总剩余价值的不同比率决定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需求这种心理上的感觉并不包含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人们心理上的需求的满足并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这种满足的实现要依靠他的经济力量，依靠他能分得的社会产品的份额，依靠他能给占有他所需要的产品的所有者的等价物的数量。

希法亭最后指出，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了，经济现象和这些现象发展所依据的规律，均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这里历史和逻辑是完全一致的。概念的发展完全同历史的发展相平行。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现实，一方面在概念的发展上也得到了相应的反映。正是在这里，历史为理论提供了最严格的经验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性的证明，成了资产阶级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此

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要么象德国的历史学派那样，采用毫无批判的折衷主义手法，来为资产阶级辩护。要么像心理学派这样，不把经济的或社会的客观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个人关系，对经济关系的研究让位给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分析，这也表明，资产阶级已完全抛弃了科学的经济学。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新阶段 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创作并发表了《金融资本》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分析，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最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由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溶和而成的金融资本代替产业资本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帝国主义就是这种金融资本必然要采取的一种对外扩张侵略政策。《金融资本》一书于1910年出版。作者在序言中对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方法曾作过一个简短介绍。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经济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和生产的集中。这一方面表现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出现“扬弃了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发展过程中，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联系更加密切，形成了金融资本。这是资本的一种最高的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这种关系使本来就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十分神秘的资本关系更加难以看透。金融资本的固有运动，这种运动所采取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及这种运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离独立化，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加以分析。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对这许多新的经济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作者认为，分析这些新的经济现象，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因为不了解金融资本的本质、机能与发展规律，就不能了解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因而也就无法制定科学的经济政策。

希法亭认为，要了解金融资本就必须分析银行资本同其他资本的关系，特别是要分析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关系，可是工业

资本同银行资本的关系又渊源于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的联系，这又涉及到信用及其本质。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同对货币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只有正确地解决了货币问题，才能了解信用的本质及其作用，才能正确认识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关系，才有可能正确解决金融资本的问题。因此他为自己规定的研究顺序是，由分析货币问题入手，进而研究信用、股份公司、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关系，证券交易所以及工业资本的集中，垄断的形成、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密切结合、金融资本的形成等等，最后研究经济危机。可见，希法亭研究之初就犯了方法论的错误。他没能正确地理解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关系，他不了解流通对生产虽然有极大的影响，但资本的生产毕竟是第一性的；资本的流通是第二性的，是生产领域中的变化决定了资本流通的形式和规模的变化，而不是相反。因此有人批评他犯了流通决定论的错误是有一定道理的。应当指出的是，希法亭的流通决定论的错误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方法论及他对价值问题和货币问题的看法上。而且更严重地表现在《金融资本》一书的结构，特别是表现在他从流通领域出发研究金融资本问题上。

在希法亭看来，金融资本的最终根源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在于资本主义信用的作用的日益增长。因而他在对货币作了简单的考察之后，便转入了对信用的考察。用他自己的话说，“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途径，探索资本主义信用如何由流通本身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统治社会进程的一种力量的秘密。”^①在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中，信用是在《资本论》之外的单独一册书的研究对象，因此在《资本论》中只是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即在研究“资本一般”所不可缺少的范围内才涉及到信用问题。许多重要思想都没有展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以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指导，对资本主义信用的产生与扩展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俄文版第9页。

影响信用扩展与收缩的诸原因；信用的作用与分类；流通信用与资本信用；银行的两种不同的性质的贷款和银行资本参与产业资本；银行的集中趋势等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信用扩展的可能与必要都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中。正是在反复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也就是在资本周转过程中，货币资本必然要周期性地被游离出来和闲置起来，从而为信用的扩展提供了前提条件。闲置资本的量是经常变动的，周转时间的长短是造成这种变动的最主要因素。资本周转速度越短，为维持生产连续性所必须的追加资本越少，在货币储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货币资本的供应就会增加。相反，如果周转时间延长，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就必须有更多的追加资本，从而造成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当然，货币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情况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存在。但是，现在不同。因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是一种扩大再生产，因而这种游离和闲置是经常的和必然的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本是以不断吮食剩余价值为生存前提的，闲置资本要尽快地转化为职能资本，这就会给货币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加速信用的扩展。因此，一切导致资本闲置的原因也同样是信用关系扩展的原因，一切影响闲置资本量的因素，也同样决定着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如果在某个资本周转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以致资本被固定在货币形式上，那么这些货币就成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就可以通过信用提供给其他资本家使用。相反，如果周转不是在资本采取货币形式时中断，而是在采取实物形式时中断，资本家手中又无现成的准备金的话，为了维持周转的连续性，资本家就需要利用信用，获得维持周转连续性所必需的货币。因此，希法亭得出结论，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本身一方面必然会使部分资本游离出来，从而提供了资本信用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脱离运动过程的货币始终是一种无意义的流

通费用，因此产业资本家必然会努力挖掘自己的潜力，尽力不增加自己手中的货币资本，这就形成了越来越广泛地利用信用的必然性。

希法亭进而探讨了信用的各种形式及其作用。他把信用划分为流通信用（或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他首先研究了流通信用。这是一种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卖方向买方提供的信用，它使买方可以延期支付货款。随着流通信用的扩大，资本家需要彼此抵销的票据越来越多，涉及的企业分布得越来越广，因而也就越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把分散的票据收集起来，加以抵销；或确认执行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票据的信誉。所有这一切便都落到了银行的身上。银行以自己发行的信用货币——银行券代替票据，银行券是建立在票据流通基础上的，它是以票据，也就是以参与交换的人全部财产作担保的。因此银行券的发行要受票据数量的限制。信用的第二形式是资本信用。这是银行向产业资本提供的一种信用。这种信用，既可被要求转化为流动资本，也可被要求转化为固定资本。由于这两种资本的回流方式不同，资本信用的这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流动资本的货币资本，经过一次循环之后便可全部回收，作为固定资本的预付货币资本，经过一系列的周转之后才能全部回流，因而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被约束在生产领域之内，希法亭认为，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的信用的出现和扩展是造成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由于这种信用的出现，使银行同产业资本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银行决不会再仅仅关心企业的暂时状况和市场的暂时状况，而是更关心企业的长远命运和市场的未来状况。银行同企业的关系成了更为长远的利害与共的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的信用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深越久。同时银行对企业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企业也必然会在这样一种更长的时期内受银行的约束。造成企业对银行依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信用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将迫使企业必须利用信用。因为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利用信用就等于他自有资本的利润率的提高。在市场有利的情况下，贷入资本意味着他可以得到更高的利润率。如果市场情况不利，利用信用可以增强资本的竞争能力，使他可以把自己的产品降低到生产价格以下出售，这样仍可保证他获得平均利润。企业对银行和信用的依赖性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它对银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某种优越性。每个商人和产业资本家都有到一定时候必须履行的信用债务。但是，现有这种履行却要听凭银行家的摆布。有时银行可以通过限制他的信用，使其不能履行自己的许诺而破产。当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银行严重地受到某一企业的约束，以致它的命运同企业的前途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得不顺应企业的一切要求。一般来说债务关系内部的依赖性始终是由资本力量的大小，特别是由可供自己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产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溶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种变化。正是在这种溶合过程中，形成了控制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万能的垄断者——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希法亭通过对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信用关系的不同作用的分析，具体而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溶合过程。从而扫除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希法亭是以德国为背景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在德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银行起的作用十分突出，工业对银行的依赖性特别大。在希法亭理论中突出地强调银行的作用正是德国垄断资本的这种民族特性的反映。这一点就需要用对其他国家金融资本形成的研究来补充。不过这一缺欠并未使希法亭的理论逊色，因为它毕竟揭示了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金融资本形成的必然性，至于他对这一过程中银行

主导作用的更多强调，不过是反映了这一普遍规律发生作用时所带有的民族特点。

信用扩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在这种扩展基础上出现了股份公司，这是垄断企业的一种现成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希法亭看来，股份公司的建立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却形成了一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新特点。股份公司的建立使资本家从企业家的职能中解放出来，并使他投入企业的资本采取了货币资本的形式。现在他作为货币资本家，作为债权人，同他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完全无关，他“献出”了货币，从而获得了收取股息的权利。不过股份资本同借贷资本又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带来收益的方式或数量的差别上，也就是表现在股息同利息的不同上。以股份资本形式提供给企业的资本的股息，不像借贷资本所获得的利息那样是事先确定的。但股息的量也不是完全不确定。股东把自有的货币资本投入企业，股息至少应等于同量货币作为借贷资本贷出所获得的利息。不过股东同借贷资本家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因而股东还要获得一定的风险酬金，只是这种酬金的量不可能事先确定下来。在相同条件下，用于股份投资的货币资本比以借贷资本形式出现于货币市场上的资本要少，因为后者更为安全。在这里，安全程度成了供给多少的原因。只是由于这种区别才造成了股息同利息的差别。因此，希法亭认为，股息的下限是借贷资本的利息。在一般情况下，股息应高于利息。另一方面，股份资本同借贷资本又有许多相同之处。从表面现象来看，股东的资本像产业资本家的资本那样，变成了机器、原料、劳动力等生产资本，因此似乎一旦让出便须经历若干次周转才能收回，而不像借贷资本那样可以随时收回。其实不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每一种可以转移的有规律地不断重复获得的收入，都可以比例于一般利息率而资本化为能带来相等收入的货币额，即这种收入的价格。因此，股东通过出卖他的股

份，即他对股息的要求权，便能随时收回他的资本。证券交易所便为股东提供了这样的市场。从这一点讲，股份资本不同于产业资本，而同借贷资本十分相似。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游离的社会资本往往作为生息资本投入买卖股票的竞争，正像这些游离的货币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在争取投入具有固定利息的贷款而展开的竞争一样。正是这种竞争使股息率趋向于利息率。把股息归结为利息的过程，是同股份制度及交易所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历史过程。

由于股票作为收益证书的资本化以及由于这种资本化而造成的独立的股票价格的存在，似乎在产业资本之外存在着第二种资本，不过这纯粹是虚拟的，实际存在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是产业资本及其利润。虚拟的资本只是在计算上才存在。它实际上并不是资本，而仅仅是一种收入的价格。所谓虚拟资本就是股票收益的资本化，是按平均利率计算的同股息相应的一个货币额。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现实的情况，同时又是实际关系的颠倒。现在，在虚拟资本形式上，资本已不再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它也不再是利润的决定性因素，就像我们在考察平均利润时所看到的那样。现在利润是固定的量，资本量是被利润率的高低决定的，正是这样一种颠倒了的关系的存在，才使创建股份公司谋取创业利润成为可能并决定着它的高低。因此现在一切资本的均等不再表现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而是表现在他们的资本量都是按其带来的收益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企业的股票价格总额即资本化的收益证书的价格总额，无须同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额相一致。两者之间的差额是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股息）的资本转化而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差额即“创业利润”。可见“创业利润”即不是“欺诈”的结果，也不是某种“报酬”，它仅仅是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转化而产生的一种收益，它所反映的不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而

仅仅是资本家之间对利润源泉的争夺。可见“创业利润”是一个特殊的经济范畴，它有着自己的特殊的量的规定性：如果创业利润为Gg，平均利润率为p，股息为d，企业利润为E那么

$$Gg = \frac{100E}{d} - \frac{100E}{p}$$

希法亭认为，股份公司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产业资本的活动方式，而且对银行的职能及银行同产业资本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初，银行作为票据交易的中介以银行信用代替了商业信用；作为闲置货币向货币资本转化的中介，银行向企业提供了新的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兴起，银行又发展了它的第三种职能，这也是向产业资本家提供资本的职能，但却不是将资本贷给资本家，而是通过股票的发行把货币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或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家通过借出资本而获得利息，代企业发行股票的银行什么也没贷出，因此不会获得利息，相反是股票的购买者获得股息。留归银行所有的是由股息资本化所产生的创业利润。这是一次性的收入。银行力量越强大，创业利润也就越归银行所有。同时一些强大而稳定的企业在增资的时候也有可能占有有一部分创业利润。争夺创业利润是银行与企业之间斗争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银行代公司发行股票，甚至直接购买股票，都加强了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相互渗透。

资本流通领域中的变化，银行资本作用的增长与向产业资本的渗透，在促进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溶合中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发展变化的基础却深深埋藏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单纯研究流通领域的变化，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希法亭写《金融资本》一书时，虽然已暴露出有同机会主义调和的倾向，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堕入修正主义的泥坑中，他还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只要他认真地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发展

过程中的现实的经济材料，就会发现单纯从流通领域的变化。从货币、信贷和银行的发展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金融资本问题。诚实地研究必然会把他带入对产业资本发展新现象的研究之中。看来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希法亭从该书的第3篇开始转入了对产业垄断组织的研究。希法亭对垄断组织的研究同列宁不同，他不是从生产的集中着手，而是从利润率下降规律及对妨碍利润平均化的诸因素的克服来说明垄断组织形成的必然性的。他认为资本家一切活动的基本动机和行为准则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这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性贪婪，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只有在他不是简单地跟上竞争对手，而是获得远远超过对手的高额利润时，才能战胜对方，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单个资本家对最大利润追求的愿望和行动，一方面在客观上造成了使所有资本家都获得统一的平均利润的趋势。这是由于资本在不同投资领域中的竞争或不断流动造成的；另一方面这种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又造成了利润率趋向于下降。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资本较流动资本增长得更快，每个活劳动推动的生产资料在不断增加，有机构成在提高，这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一旦投入某一生产部门，若再想向另一部门转移就非常困难了。固定资本越大，它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越高，也就越需要更长的周转时间来逐步转化为货币，从而使得它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也就越困难。构成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二个障碍是，技术进步扩大了生产规模，特别是固定资本的数量急剧增大，因而不管是在自身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建立新企业，都需要数量更多的资本，单纯依靠个别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积累已很难在较短时间内筹集到足够量的资本。毫无疑问，这也妨碍了资本自由流动，从而妨碍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妨碍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三个更加重大障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领域，一个新建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必须有相当大的规模，这是由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

决定的，很少受市场状况的影响。因此当一个规模巨大的新企业建成投产的时候，会迅速地大量地增加该部门的商品供应量，从而对该部门的利润率发生巨大影响，使其迅速降到平均利润率以下。要想从这样一些部门撤回资本转移到其他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些部门中的小企业会迅速地被淘汰，剩下的是少数势均力敌的大企业，他们之间竞争的胜负很难在短期内见分晓，而且会给双方都造成巨大损失。这种对峙局面无疑会给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造成严重障碍。

希法亭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新建企业的最低资本投入量提高而造成的资本转移和利润率平均化的困难，可以通过资本股份化得到克服。股票的发行和股份公司的创立可以很容易地将在资本周转过程中游离出来的资本和闲散在社会上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其达到适合于进行新投资的程度。不过通过股票交易实现的资本转移仅仅是资本所有权的转移，它不会对原先早已存在着的企业和生产过程产生影响。但是它仍然可以对资本在各部门的分布产生影响，因为资本家关心的仅仅是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高低。他对利润的来源毫不感兴趣。因此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股息较低的股票卖掉，换回股息较高的股票。因此股票交易和它的价格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的转移，保证了每个资本家获得的股息大致相等。不过绝对的相等是永远不会有的。事实上这种不均等同均等一样都会作为一种趋势永远存在下去，个别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动力也永远存在。某个部门的更高股息指示了新的投资方向和地点。同时，股份制度又推动资本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这不仅仅是因为股份制度排除了集资的困难，而且还因为这些部门的超额利润会造成巨大的“创业利润”，这种状况又会促使银行资本积极参加进来。由于新积累的剩余价值涌向这些具有极高“创业利润”的部门，因而使利润率变得较为平均了。不过希法亭认为上述方法还不是克服阻碍利润率平均化诸因素的最重要

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是资本的联合，即实行联合制和建立垄断企业。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生产部门内部各大企业的联合，即横向联合；一是邻近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联合，即纵向联合。前一种联合可以废除自由竞争，人为地保持高价，阻止由于有机构成提高而造成的利润率下降，以使企业至少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后一种联合不改变价格水平，但可拉平联合后的各类企业的利润水平，使各企业都可得到平均利润。不过，由于这种联合使流通费用减少，从而使企业可以获得更高利润。当然，联合企业并不就等于垄断企业，但联合却是走向垄断的一个必要中间环节。当联合起来的企业足以控制该部门的生产，从而可以控制市场和价格的时候，垄断也就形成了。希法亭说：“在资本非常强大的地方，为了克服利润率的这种下降倾向，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最终的结局就是废除自由竞争，并趋于保持利润率持续不均等的倾向，这种不均等倾向直到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区分被排除时才被消除”^①。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在产业资本中产生的这种实行联合废除自由竞争的趋势得到了银行的进一步推动。银行作为贷款的提供者和作为财务代理人更积极地参与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它比企业更关心消除竞争以保证有一个稳定的收益。因为一个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享有优势的大企业，在成功地进行了竞争并打败了对手之后，能够用以后较长时期内获得的超额利润补偿它在竞争中受到的损失。银行则不同，它一方面不会从得胜企业的日益增长的利润中得到更多的利息，另一方面它却会由于竞争中失败的企业的破产而蒙受损失。因为失败的企业也往往会动用大量贷款。这就是银行力促垄断建立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希法亭对垄断形成原因的分析，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他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来说明垄断形成的内在必然性，而是更深刻地从资本主义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54页。

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来说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垄断利润等与帝国主义经济本质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经济范畴。

希法亭在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引起了银行的发展，而发展了银行又成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产生的推动力之后，便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垄断组织的形成对银行制度有什么影响？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实质。希法亭认为，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相互关系中，起决定性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本量。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都是资本非常雄厚的企业。为了在往来中不被控制，银行在工业企业联合的同时，也进行了联合和扩大。这就是说，正像银行助长了工业垄断组织的形成一样，工业企业的联合反过来又促进了银行的联合。具体说来这种促进作用表现在：第一，两个工业企业联合的成立，可能使原先各自同这两个企业发生业务往来的相互竞争的银行产生一种共同利益；第二，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消灭或削弱了自由竞争，极大地提高了利润率，这便为银行参与增发股票或创办新企业以攫取高额的“创业利润”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加速了银行的集中，因为大银行在开展发行业务方面较小银行的优势比工业中垄断企业较独立的中、小企业的优势更加明显，攫取高额的创业利润是银行垄断化的重要动机。第三，卡特尔化意味着参与协定的各企业的收益有较大的可靠性，这就使得银行乐于进一步扩大资本信用，以便分得更多的产业利润。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一方面加强了产业同银行的联系，另外，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产业资本的支配权落放银行之手。

随着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些变化还都没能超出资本主义范围，但却给它加入了许多新的质的规定性。希法亭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初期阶段，银行的货币来自两个源泉：其一是来自社会上闲

散的非生产阶级的货币；其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准备金。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信用也日益发展起来。结果不仅资本家的全部准备金，而且非生产阶级的大部分货币都通过银行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了。这时产业资本家经营所运用的资本远远大于自身所有的资本。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这些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但它的所有权却属于银行。因此，随着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产业对银行的依赖加强了。希法亭说：“产业资本的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不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有通过同它们相对立的代表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的资本的一个不断扩大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们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途径实际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它总是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由所有者以货币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投放出去，并总能以货币形式收回。但是，这样投入银行的资本的最大部分被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在生产过程中固定下来。产业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是金融资本，即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①从我们引用的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希法亭虽然正确地、而且十分具体地说明了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明了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混合生长融为一体过程，但他为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却有着严重的缺点。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笔记》中指出金融资本有三个主要因素，即大资本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也就是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垄断资本的形成，由于某一生产部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生产被控制，致使竞争被垄断所代替；银行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希法亭定义的缺点和“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01页。

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①。希法亭为金融资本所下定义的缺欠同样反映了他过高估计了商品交换、货币及资本流通的作用，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可见方法论的错误对于希法亭来说具有多么致命的性质，在他的全书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表现。正像前面我们一再提到的那样，在写《金融资本》一书时，希法亭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他还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新经济现象的。因此，他虽然在为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忽视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但在论述银行巨头和垄断资本家的关系时，还是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所谓产业日益依赖于银行，根本不意味着工业巨头依赖于银行巨头。金融资本是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随着产业的垄断化而达到它的顶点。随着财产的日益集中，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工业垄断组织的产业资本家，越来越合而为一。这正像资本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变为金融资本那样，产业资本巨头和金融资本巨头也越来越合于一身。他们越来越以支配银行资本的形式，支配整个国家资本，人身的结合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

金融资本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造成的各种影响是希法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论点还曾受到列宁称赞。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形成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影响在于它本身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的统治力量。商业地位的沦落是金融资本统治形成的一个重要结果。商业由于它所处的优越地位，使它可以为了自己利益而利用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当工业生产分散，商业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初，商业实际上是工业的统治者。随着工业资本的集中发展，特别是由于垄断的形成，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企业的局部性的联合就直接缩减了商业，而垄断的形成则有完全消灭商业的趋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68页。

势。因为垄断联合建立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市场。只有在商品通过一个中心机构销售时，对市场的控制才能够牢固。为了能够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中心机构必须能够直接确定流通的最后价格。因此，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展，大垄断集团必然要利用它的雄厚资本和它的金融势力削弱商业的独立性，剥夺商人确定价格的权力，直到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代理商，成为按垄断组织严格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以领取佣金的推销员。商业活动的被取消，仅仅意味着产业资本家不再把利润的一部分让给商人。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品价格并未降低。流通费用是利润的扣除，这些费用的节约意味着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利润的增加。希法亭说：

“产业利润合并了商业利润，自身又被资本化为创业利润，即达到了金融资本的最高资本形式的三位一体的赃物。因为产业资本是圣父，它生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作为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它们是三位一体，只有在金融资本中才是一体。”^①在金融资本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货币经营资本的命运根本不同于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作为高利贷资本的货币资本，对资本积累和促进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发生过重大作用。后来作为生产利润的产业资本开始反抗，并使高利贷资本从属于自己，使它作为货币经营资本为商品形态变化服务。随着信用的扩大，经营货币资本的银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它的权力增大，成为工业企业的创业者，并统治了工业。它们作为金融资本掠夺产业利润，就像当年高利贷资本以利息掠夺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这是否定之否定。

基于以上情况希法亭认为，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形成的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表现出了使不同资本统一的趋向。原来处于不同经济领域中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现在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形成了工业巨头和银行巨头之间的紧密的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96页。

个人联盟。这种联盟的建立根源于大垄断资本的联合，并因此而导致小资本之间自由竞争的消失。这种联盟同时又包含着资产阶级同国家权力机关关系的变化，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金融寡头的工具、成为为他们的利益而极力推行对外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希法亭认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为了金融资本巨头的利益而推行保护关税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一些工业发展较晚因而也较为落后的国家曾经采取过保护关税政策，用这种办法对抗英国在自由贸易旗帜下侵占别国市场的企图，以保护国内市场，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一种“培育性”的关税政策。一旦民族工业发展起来，这些国家就会取消这种政策，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建立，促使这些国家重新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不过这时的保护政策与早期的保护政策不同了，这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保证垄断组织可以在国内市场攫取高额利润，以增加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受本国关税保护的区域越大，销售量越多，所得利润也就越多，这就增加了这些垄断组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种状况必然要引起追逐殖民地的狂热和使各国政府都极力扩大在本国关税保护下的经济区域。可见，现代的保护关税政策加剧了资本不断扩张自己领地的冲动。第二，努力推进向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扩大经济区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这种手段失灵，垄断资本家就要努力在外国建立工厂，以便绕过外国的关税壁垒，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势力。输出资本在外国建立工厂不仅受到了本国保护关税的有力促进，它同时也受到了输入国家保护关税的维护。货币资本在银行手中的集中，也为大规模输出资本创造了条件。资本输出的必然性同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联系在一起，把资本输出看作金融资本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希法亭的一个贡献。他在论述中为资本输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资本输出是指用来在外国生产剩余价值的输出。这里重要的是，剩

余价值仍然留归国内资本支配。”^① 第三，努力推行殖民政策。资本输出加剧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引起了消除竞争的努力。推行殖民政策，把外国的一些地区合并入本国版图就可以简单地作到这一点。希法亭认为，争取扩大经济区的斗争在欧洲引起了尖锐的矛盾。各国金融资本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加强国家机器。金融资本越发展，垄断世界市场的努力越强，为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越残酷。金融资本高度发达的德国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殖民地，这种状况大大加剧了德国同英国的对立。希法亭预言：两国之间的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后必然要诉诸暴力解决”^②。希法亭的这一预言，在当时曾受到某些修正主义者的讥笑，但历史却证明了它的正确。第四，金融资本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轨道，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受到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希法亭正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所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对个别资本家的独立性毫无兴趣，而是要求对后者的束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希求组织，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开展竞争。”^③ 与此相适应，金融资本追求的国家也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而是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它需要这样的国家以关税政策保护其国内市场；需要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强大的国家来保证把自身的利益延伸到国外；它需要这样的国家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把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协定强加给弱小国家；它需要这样的国家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把整个世界变成自己的投资场所，最后，它需要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和吞并殖民地。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便成了金融资本的要求。总之，金融资本扩张主义的要求改变了资产阶级整个世界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04页。

② 同上书第429页。

③ 同上书第432页。

观。它不仅不再是自由的。而且也不再是和平的和人道的。希法亭指出，昔日的自由贸易论者信仰自由贸易，认为它不仅是最正确的商业政策，而且也是和平时代的开端。金融资本早已丧失了这一信念。它不相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清楚地知道，竞争日益成为政治的权力斗争，和平理想失去了光辉，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国家的强大和权力的理念。金融寡头统治的政治理想代替了平民的平等思想。如果说在对外政策范围内，金融资本还打着代表整个民族利益的旗帜，那么，在对内政策方面，则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立场。这样，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便产生了。希法亭嘲笑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说：“在武器优势是最终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相信利益的和谐，是多么可笑的幻想。”^①

希法亭在对金融资本作了基本正确地分析之后，得出了金融资本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家寡头手中集中的最高阶段，从而从物质上及阶级力量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了准备的结论。希法亭认为，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都是对立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使之尖锐化到极点，它定会导致战争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以库诺为代表的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宣称，既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希法亭针对这种荒谬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虽然认为帝国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虽然无产阶级认为金融资本所采取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必将导致战争及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暴，它也不能放弃同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政策相对立的立场，也不能通过任何途径支持它在大陆上的扩张主义政策。“相反，只有对帝国主义政策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才会取得胜利，因为只有到那时，即这种政策必然要导致的资本主义灭亡实现之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73页。

后，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主人。”^① 不过希法亭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金融资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时，不能主张实行那种过时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即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回答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社会主义”^②。列宁非常称赞希法亭的这个论断，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批判考茨基时，曾一再引证希法亭的这个论断。

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社会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用来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宣传口号，而且已具有了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首先表现在金融资本已使生产社会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已为“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其次，金融资本除了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以外，还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培植了阶级力量。帝国主义政策驱使无产阶级走上政治独立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有赖于他们了解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特别是认识到夺取政权的必要。当国家还不直接干预经济事物，当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还被假象掩盖着的时候，无产阶级还很难通过切身的感受认识到这一点。金融资本所推行的内外政策，赤裸裸地暴露了金融资本对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这就等于告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结束自己受剥削地位的唯一手段。希法亭说：“金融资本就其成熟程度而言，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家寡头手里集中的最高阶段，资本家巨头在一国的专制统治越来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在国内则越来越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人民群众要受金融资本的剥削，同时他们又被召唤起来进行反对金融资本的斗争。在这些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利益之间的暴力冲突中，资本巨头的独裁将最终被无产阶级专政所取代。”^③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473页。

② 同上书第474页。

③ 同上书第478页。

金融资本与周期性经济危机 在对金融资本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希法亭又对金融资本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毫无疑问这是针对伯恩斯坦否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谬论而进行的。

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必定要经过周期性经济危机是为经验所证实了的。问题在于到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去揭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是同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一起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就已经产生了把货币储藏起来从而造成买卖脱节的可能性。但只要货币仅仅作为流通手段，那么这种脱节就只能是个别的现象。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出现，就有可能使在一个环节上的买卖的脱节波及其他一些环节。支付信用发展了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因而产生了使局部的脱节演变为普遍脱节的可能性。但是，以上两点仅仅是危机的第一个一般条件，它还远远不能造成现实的危机。

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早已存在于简单商品生产之中的私人生产的独立性和不规则性发展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危机的第二个一般条件。

危机的第三个一般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使生产者与他的产品相分离，把直接生产者的消费仅仅归结为商品价值中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等价物。因此整个生产者阶级的消费并不直接同总产品发生关系，而是仅仅同总产品中相当于工资的那部分产品发生关系。而生产也不是服从于消费，而是为了利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是由生产规模决定的，而生产又受资本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和增殖的程度的限制。希法亭说：“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来自无法调解的生产，从而来自一般商品生产，但它的现实却仅仅来自这种无法调解的生产，这种生产同时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他社会形态的特征），并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插入资本按

当时的一定比率进行增殖的条件。”^①

资本主义消费关系所提供的狭隘基础之所以会构成危机的一般条件，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这一基础是不可能的。如果消费能够任意扩大，那就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但是消费的扩大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和利润率的降低。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积累要求工人消费增加，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至使增加的资本不能按原有的比率生产出相应的利润，那么积累必然要停顿下来。正是在这里，积累的一个先决条件：消费的扩大，便与它的另一个条件：资本的增殖发生了矛盾。增殖的条件反对消费的扩大。由于前者是决定性的，于是矛盾便升级为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希法亭一再声称不能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但他还是犯了同卢森堡同样的错误，即把消费仅仅归结为生活资料的消费，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积累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

希法亭认为以上三点仅仅是危机的一般条件，还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因此，它只能由生产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来说明。一般说来，危机是流通过程的干扰。它表现为大量商品没有销路，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为货币。因此，它只能从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条件来说明，而不能由简单商品的流通条件来说明。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商品必须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产品，即作为商品来生产，并作为商品资本来实现。因此这种实现包含着资本本身所特有的条件，即资本增殖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研究的正是这种条件，“从所谓纯粹经济的理性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在这里所作出的研究成果，“是这部令人惊叹的著作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②。希法亭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提出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17页。

^② 同上书第320页。

并详细论证过的关于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及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清楚地说明了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同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着必要的比例关系，只有继续保持这种比例关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才能顺利地地进行。如果比例遭到破坏，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危机也可能出现。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中，谁可以承担保持这些复杂的比例关系的责任，显然价值规律在执行这种职能。因为价格的变化对生产的扩大和缩小，对新企业的建立和原有企业的破产倒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唯一可能的调节者，对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正常比例的破坏，必然是来自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对价格形成的干扰。因为危机是周期性的，因此这各种干扰也必然是周期性的。

每个产业周期都是从生产的扩大开始的。不同时期生产扩大的具体原因可以不同，但一般说来不外乎：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部门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和人口增长引起的需求的增加。对某一部份商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生产这些商品生产部门利润提高和生产的扩大，而也意味着向这些生产部门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的那些部门的发展，并最终带来全面的高涨。可见产业循环的周期都是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开始的，固定资本的全面更新和增加是繁荣到来的主要动因。

除需求提高之外，在繁荣时期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会促使利润率提高。第一个因素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由于需求的增加、商品实现加快而缩短了。劳动时间由于新技术的采用、机器运转的加快、加班加点等原因缩短了。货物畅销，流通时间往往由于按订货生产而等于零，这样必然会提高年利润率。第二个因素是，周转时间缩短的同时，产业资本家垫付的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比缩小了。机器运转的加速、劳动时间的缩短，使现有的生产因素得

到了更为密集、更为有效的利用。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货币流通的加快，资本家为实现商品的流通所必须握有的货币量也减少了。所有这一切就使得只是为了流通目的非生产性使用的资本量同直接为了创造利润而使用的货币量相对减少了。流通时间的缩短和周转的加快同时也减少了作为商品储备闲置起来的，只能造成非生产费用的那部分资本。所有这一切，都会提高年利润率。

但是，在繁荣时期促成资本增殖加快的这些因素，同时也是造成投资减少和商品滞销的潜在因素。这首先表现在，繁荣时期涌现出大量新的投资。这些新建企业必然要采用当时的最新技术，以便获得超额利润，但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当新技术推广开来，资本有机构成普遍提高之后，就必然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和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因为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使同样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一个较小的利润率；另一方面，有机构成的提高也意味着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增加，周转时间必然会延长，从而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其次，在繁荣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工资上涨，这又意味着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的下降。繁荣时期在投资增加的同时，投机也最为盛行，对信用的要求显著增加，利息率提高，银行利润增加，产业利润减少，资本增殖的条件恶化。

希法亭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上述这些趋势是怎样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危机的；这种趋势为什么会采取突然爆发的形式实现，而不是逐渐地尖锐化。他是从各生产部门有机构成不同价格变化规律也不同来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希法亭认为，影响资本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分布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是价格和利润的变化。在繁荣时期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如果这种上涨是均衡的，那么这种上涨纯粹是名义上的。价格的这种变化对生产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可是，如果各种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均衡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价格不均

衡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的变化，引起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化。

如果撇开技术革命不论，经常的技术改革正是在那些使用机器最多有机构成最高的地方最频繁。机械化程度越高，设备的合理化、技术改进的可能性越大，因而有机构成会更快提高。较高的有机构成，只不过是较高生产率的经济表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超额利润的产生。这一点又会促使资本继续流向这一领域，直到新企业建立起来，大量新产品投入市场，把价格压下来的时候，纠正资本大量流入这些部门的因素才会出现。但是，往往为时已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机构成在提高，固定资本在增加。但是技术越发展，固定资本越增加，制造这些固定资本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各个生产部门生产扩大的时间上的差别也就越大。制造新设备所需的时间越长，供给也就越落后于需求，该部门所生产的商品越难适应消费需要，因而在这里价格上涨就越猛，向这些部门投资的冲动也就越激烈普遍。所以正是在繁荣开始的时候，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商品价格提高的最厉害，所以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较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具有过度积累和过度投资的倾向。这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首先在棉纺织工业中危机最严重，而后来，重工业中的危机更为严重。

此外，对于那些有机构成高，新建企业所需投资大的部门，生产的增长很难完全适合需求的增长。在这里技术独断专行地决定企业的规模，企业规模过小从技术上看可能是极不经济的，因而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在这里新企业的建立主要应考虑技术上的合理性，而不可能关心扩大的程度是否符合消费的增加，所以重工业的扩大只能是大规模的跳跃式的。以上这些情况当然都会对再生产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严重干扰。

此外，固定资本再生产的特点也会对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各

产业部门的正常比例关系构成干扰。我们知道，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被消耗的固定资本必须等于新投入的固定资本；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后者要大于前者。但在生产发展的实际进程中，这些条件很难严格实现。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企业必须有一定的商品储备和货币储备。否则生产就会不断陷入停顿。在繁荣时期对商品储备和货币储备的滥用，减弱了企业的抗干扰的能力。特别是在危机前夕，各种储备的减少是绝对的。一旦由于某些原因资本信用和流通信用回流开始迟滞，就会造成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大量需要，就会出现破产因而酿成大规模的危机。

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对各产业部门间的正常比例造成干扰。在繁荣时期，价格提高，利润增加，但价格的提高必定超过工资的提高，否则利润将不会增加。这就是说，资本家的所得的增加必然超过工人所得的增加。消费绝对地增长了，因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的消费都增加了。但是，积累增加得必定快，因为高额的利润给积累以强烈地刺激。结果消费与生产的增长不会是同步，这就会造成它们之间的比例失调。所以繁荣时期的比例失调是由于价格构成变动的干扰产生的。

以上的各种干扰必然要导致销售的停滞和危机。

繁荣的初期，生产在扩张，流通增加，因此而增加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不过当时满足这种需求还是较为容易的。这是因为：萧条时期闲置的大量资本可以利用；随着商品流通的增加信用货币的发行量也在增加；商品流通加快，周转时间短，节约了流通中的货币。

随着繁荣的向前推进，矛盾在积累，在一步步地走向尖锐化。

在繁荣的初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利率在缓慢地上升，资本周转时间延长，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现象。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商品的销路已不是那样通畅。结果就会使得一部

份商业票据无法按时兑现，因而不得不求助于银行信用。产业资本家相互之间提供的信用已不够用，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增加。这又引起对现金需求的增加和利率的提高。不过这时商品的价格依然很高，利润丰厚。因此资本家们都在极力借助各种信用使生产仍能在原有规模，甚至在更大规模上继续进行。他们全然不知他所利用的货币资本不再是自己的商品的转化形式，事实上他们的商品根本没有卖掉。商品储备在增加。只是由于货币资本的投放才阻止了商品对市场的压力和价格的下跌。这种假象掩盖了供求的矛盾和各生产部门间的不平衡。在生产者看来一切正常。

繁荣的初期，利率处于低水平，若其他情况不变，这种现象会引起虚拟资本价格上涨。与此同时人们利用有价证券行市上涨以谋利的投机活动猖獗起来，由于需求剧增，股票的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高额利润导致了频繁地创业活动，现有企业增资。银行积极地参与了股票的发行活动。由于行情看涨，购买大于销售，于是结算时差额扩大，因而对货币及信用的需求必然增加，这又直接影响到利率的提高。在对商品的投机活动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当繁荣步入鼎盛时期，商品价格和利润均达到最高水平。较高的收益使股票价格高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的普通公民日益增多，结果给投机商提供了一个牺牲公众的利益增加投机收益的良好机会。不过这时往往会暴露出不祥之兆。在工业中，利润尽管还很高，但高价出售已无法维持。一旦银行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借入资金就更加困难。结果利率上升，股票行市下跌，最终当投机者感觉到哄抬物价将毫无结果，尽快抛出手中存货还可收回原先投入的资本时，那就接近崩溃了。

在金融资本势力日益扩张，工业所需资金一部分由银行提供的条件下，利率的提高压低了产业利润。另外，流通减缓，银根紧缩，而工业对信用的需求反而增加，银行向工业提供的信用越多，

用于投机的贷款越少，这又意味着对**有价证券**的需求下降和**证券行市**下跌，接踵而来的将是**股票的大拍卖**。当**职业投机家**意识到危险时，会迅速采取**跌价抛售**的政策，结果将会导致一场灾难。可见，货币市场的变化和信用关系的变化是导致**证券交易所危机**的直接原因。由于**证券交易所危机**与**利息率**有直接关系，所以它会先于一般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爆发，并成为后者的前兆。货币市场的变化实际上取决于生产的变化，故生产导致危机。

在商品投机中同样也会存在上述情况。商品投机同生产领域的变动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利息率上升和信贷紧缩限制了商品囤积，不过最初商品价格只是停止了上升，价格仍保持在高水平。生产继续扩展，进口货依旧增加。高价抑制了消费。一旦大投机商意识到继续囤积将是十分危险的时候，商品会一齐涌向市场，从而造成市场的瓦解。

交易所及商品市场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银行。繁荣初期利息率低，发行股票的利润大。在周期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呈相反方向的变化。随着利率的上升，银行资本以更多地牺牲企业家的利益提高了自己的利润。随着繁荣的继续，银行占有产业利润的份额就越大。另一方面，生产的扩张引起了流通的扩大，从而需要增加流通手段。银行储备被大量消耗，最终只能求助于中央银行。致使银行动用过多的储备增发银行信用。当银行信用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时，便转向了对现金的需求。流通中现金增加，储备再度减少，迫使银行再紧缩信用。这种状况意味着工业无力调整不平衡所导致的混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补充的货币来源。市场上的商品被迫倾销，商品价格开始暴跌，工业资本家偿还贷款的能力受到怀疑。如果银行把资金贷放给了无力清偿的资本家，那么后者的破产也会牵连到银行。人们会纷纷向银行挤兑，并因此而导致银行业的危机。

信用崩溃，银行倒闭，现金成了唯一可以接受的支付手段。

现有流通手段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由于动乱大量现金被贮藏起来。结果出现了现金贴水，货币的内在价值消失了（即使在金本位制度下也是如此，正像美国近期危机所表明的那样），货币的价值由流通中所需要的社会必要价值来决定”^①。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希法亭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中的作用所作的分析是十分细致和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对孕育在商品经济中的危机的可能性如何发展为现实性，以及危机为什么会采取突然爆发的形式所作的分析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这种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还是第一次。但是在这里再次暴露出他的价值理论方面的错误，即认为，危机时期“货币的内在价值消失了”，货币的价值改由“流通所需要的社会必要价值来决定”。这是二元论的价值理论，即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货币价值由自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决定，在危机时，则是由流通中所需要的社会必要价值来决定。同时，这种观点又混淆了价值与价格。

希法亭在考察了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之后，进而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问题，特别是货币资本在复苏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过后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我们将会看到它是在缩小规模上进行的，生产性的资本积累完全停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个别资本家及某些生产部门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生产规模已缩小，但生产仍在继续。这些企业或者是那些技术装备水平较先进，或者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前者由于技术先进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得以维持；后者则因消费品不能过多地减少，它们的生产仍可以带来一些利润。这两种企业仍然可以有一部分利润用于积累，虽然由于利润率很低，因而积累率不可能很高。但是，这种积累只能是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不可能用于扩大再生产。萧条时期整个社会生产的规模在缩小，至多是维持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54页。

不变，因此，此时决不会发生社会规模的积累，可能发生的只能是个别资本家的积累。一个生产者出售成功并使积累成为可能，只是由于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无法销售的结果。所以这种积累并不表明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它只是改变了货币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状况。所以从全社会的观点看，这只是由于生产的紧缩使一部分货币从资本周转过程中游离出来，成为过剩资本。货币资本的闲置意味着生产资本的闲置。由于生产紧缩，开工不足，所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被搁置起来，不能投入生产使用。货币资本和信用制度的潜力由于流通的缩小而日益扩大，货币闲置在银行里等待着被利用。所以，把萧条时期闲置的资本说成是货币资本的积累是错误的。

那种认为大量闲置的货币资本的存在是促使生产重新复苏的动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直接违反了马克思的关于生产决定流通的理论。事实上，在危机时期，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闲置的生产资本，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闲置的货币资本，两者都是由同一原因引起的。货币资本之所以中止流通，不再发挥货币资本的职能，在于生产呆滞，在于工业不景气。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展的现实完全证明了马克思的关于生产状况决定货币流通的理论。繁荣时期，生产扩大，货币资本需求增加，利率随之而上升。直到最后，出现货币资本不足，高利率吞噬了生产利润，新的投资中止，危机爆发。萧条时期货币资本被积累起来，而不再用于新的投资。那种认为没有黄金就不能生产机器、船坞、铁路的见解是毫无道理的。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货币资本家开始不满足于低微的利息，于是，重新将货币资本投入生产。但是，投资的活跃必须是以利润率的提高，经济繁荣开始恢复为条件，也就是以生产情况的好转为条件，没有这一点，闲置的货币资本仍然会继续呆在银行金库之中，而不会被重新用于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定会使危机的形式发生变化。

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同大量的手工生产同时并存。这时发生的危机必定是局部的，一般说来，它只会冲击资本主义企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大批手工业生产及家庭工业被淘汰。此时危机必定会冲击整个生产体系。不过，这时生产的紧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要在更大规模上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限制。随着生产的增长，社会必需的生产也在扩大，这部分生产的顺利进行阻止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完全中断，这时减轻危机的冲击有重要意义。在危机中，越是生产人们日常生活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工业受到的冲击越小就证明了这一点。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集中也在向前发展，这会使危机的某些特征发生变化。首先，一般来说，单个企业的生存能力依其规模大小而不同。危机中，小企业很快会因产品无销路、信用中断、清偿无力而倒闭。而大企业在危机时期则可能维持部分生产，从而使整个企业得以维持。企业越集中这种能力也就越大。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股份公司这样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对防止危机的爆发具有巨大意义。股份公司在利润很低的情况下也能使生产维持下去，因为它对股东承担的责任仅仅是付给相当利息的股息。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股份公司也能存在下去，它筹资较为容易，可以吸引更多资本。股份公司有条件利用丰年积累财物以备灾年。股份公司组织形式便于银行实行监督，因而可以避免因参与投机失败而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

其次，银行资本集中的影响更大。银行资本的增加，使银行更有可能以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从而避免因支付手段短缺所造成的危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银行要严格地把信用货币的发行限制在实际流通所需要的范围以内，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以防止对银行信用的过分需求。为此要实行只有持有十分可靠的抵押品才能兑换银行券的政策。货币危机的避免可防止信用的全面崩

溃，因而就可以有效地防止银行危机的爆发。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减轻危机的影响。银行和大垄断组织在抑制危机方面的作用还表现在，它使商品和有价证券的投机额大幅度地减少。这是因为大垄断组织的发展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增加，大量商人实际上转变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代理人，他们为佣金而工作，从而防止了囤积商品和哄抬物价，避免了在有效需求下降时，仍然保持一种繁荣的假象。当然，批发贸易仍未丧失其传统的地位。不过即使在这一领域中的投机也日益受到银行的支配，因为信用的发展赋予了银行控制全部货币资本的权力。另外，运输工具的发展也使商品投机减轻。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缩短了商品与市场的距离；通讯的发展使市场信息可迅速传播开来。所有这一切都可极大的抑制投机活动，削弱危机的影响。

最后，股票交易所中的投机活动是引起危机，特别是引起银行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银行资本的集中和金融势力的扩大，交易所的地位在下降，银行支配投机的能力在增加，这也削弱了加剧危机的因素。

但是，以上诸因素只能延缓危机的爆发，抑制它的影响，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危机。那种认为垄断组织既然可以调节生产和供求，因而就能够彻底消除危机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希法亭认为，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危机的内在本质。因为危机决不简单是由于对市场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因而使商品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危机是商品生产过剩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不仅是普通的商品，而且是资本的产品；危机期间的生产过剩不仅仅是商品生产的过剩，而且是资本的生产过剩，这就是说，这里的所谓过剩仅仅在于产品的销售后不再能为资本家带来足够的利润。卡特尔对价格的调节更加剧了混乱。因为卡特尔的作用在于消除特定生产部门内部的竞争，防止该部门商品价格的下降，使卡特尔化的企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非卡特尔化的部门，因

此它不能消除部门之间的竞争，无法改变积累对价格结构带来的影响，相反它也只能循着价格结构的变动决定自己的经营活动，因而它无法杜绝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本不能通过减少单个企业的数量同时增强它们的实力的办法来消除。计划生产和无政府生产并不是量上的对立面。自觉的经济体制不会因越来越多的单个计划而从无政府状态中脱颖而出。只有使整个生产服从于自觉的调节这种转变才会发生。在这里希法亭实际上批判了那种“超帝国主义”的幻想，他说：“从根本上讲，一个领导全部生产并以此而消除危机的总卡特尔，本身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虽然这种状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然由于发展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利益对立而毁灭。”^①

卡特尔既不能消灭危机，也不能逃脱危机对它的影响。只有把危机同商品生产过剩混同在一起才能认为卡特尔可以通过压缩生产的十分简单的办法，迅速解决危机问题。经济的回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比例关系的协调，这是结束萧条的必要条件；第二，生产的扩张。没有生产的扩张就没有繁荣。卡特尔在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紧缩生产和维持高物价水平的政策都无法达到目的。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那些非卡特尔化企业身上，缓解危机对自己的影响。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已经流露出有关有组织资本主义思想的因素。如在该书中他就认为，垄断组织发展的最终结果将会产生一个总卡特尔，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将由一个主管机构有意识地加以调整，从而结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战后的一些年代，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地提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观点。随后又在1927年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383页。

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做的《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的报告中对“有组织资本主义”理论作了系统地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1924年希法亭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时代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该刊物的发刊词。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战争和战后时代意味着资本积聚的趋势的大大增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得到有力促进。自由竞争的时代行将告终。大垄断企业成为经济的主宰者，愈来愈紧密地与银行结合在一起。银行积聚着社会资本，并且支配着整个经济。从前独立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形式日益统一为金融资本形式。这意味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有组织资本主义。大企业内部的劳动社会化已发展成为整个工业部门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和工业化部门之间的相互联合。与此同时，形成了自觉地经济秩序和操作系统，试图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克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政府状态。如果这一趋势可以毫无阻挡地发展下去，那么将会形成一个尽管是有组织的、但却具有对抗形式的等级森严的有组织的经济。”^①从希法亭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劳动社会化进一步扩展为整个工业部门，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认为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渡纯粹是个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与社会经济性质无关。实际上他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曾明确地宣布，“这是一种有利于生产资料占有阶层的调节和组织社会生产力的尝试。以维持他们对生产领导和社会产品分配的决定性影响。使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得以延伸，减缓危机或至少是抑制危机

^① 《社会》第1册，德文1924年版第1—2页。

对工人的消极影响。”^①

资产阶级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化的呢？希法亭认为，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是：通过大托拉斯来有计划地分配新的投资；繁荣时适当压缩固定资本的新投资，营业呆滞时增放新投资；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由大银行来实施相应的信用调节。为了调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普遍实行了劳动保险制度。这就减轻了失业的威胁和失业造成的后果；适应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科学”的企业组织法和操作方法得到推广，从而提高了劳动强度。但由于养老金制度和伤残保险制度的推行及限制劳动时间，使得工人能够胜任工作和由于“科学的”劳动方法推行所造成的紧张的劳动。

1927年5月希法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地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纯粹由盲目的市场规律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基本上被克服了，我们达到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组织化，也就是从各种力量的自由比赛的经济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②他认为这种变化首先是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除了蒸气和电力的广泛应用于生产之外，更重要的是合成化学的发展已经成熟到可以直接应用于工厂生产。从原则上说，这种化学的应用意味着某种新的东西。由于科技的这种进步可以从大量的到处存在着的无机物中人工制造出重要原料，使资本主义经济不依赖于某些重要原料的出产，从而可以使我们避免为争夺这些原料而造成的大战。同时由于科技的这种进步使我们可以从极为廉价的无机物中制造出昂贵的有机物，这就必然会以巨大的爆炸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其次，在这种崭新的

^① 《社会》第1册第3页。

^②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第221页。

技术基础上，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工业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按技术的要求以巨大的规模建立起来，而且是按极有组织的方式建立起来。希法亭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正是新兴工业带来的第一个巨大成就。最后，这种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把卡特尔·托拉斯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意向。他举人造丝工业为例说，人造丝工业不仅对于德国来说是一个垄断工业，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国际垄断康采恩。德国的人造丝托拉斯同英国的人造丝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什么关系呢？后者是否已被前者所取代从而不复存在呢？对这个问题希法亭没有作明确回答，不过从他含糊的倾向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有可能被和平政策所代替。他在“时代问题”一文中提出，如果把帝国主义理解为由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历史条件制约的一种扩张政策；理解为大国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垄断统治而力求向世界市场输出资本，并为此而强化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强化国家的权力，从而导致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冲突和武力决战。如果这样，那末摆脱帝国主义，避免世界大战那将是很困难的。这只能靠一种“希望不大的侥幸”实现。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总是以一定的力量均势为前提的。均衡使各方都觉得有胜利的希望。战后，实力上的巨大变化，与战争结果造成的各国经济实力上的悬殊，使战败国很难反攻倒算。而战胜国的兴趣，与其说是扩张版图，不如说是巩固和组织已有的版图。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趋势在形式上已由武力侵占个别地区转为共同保证和利用世界市场呢？这能否削弱战争倾向和导致一种所谓的真正和平主义政策？资本主义真的意味着战争从而注定与和平无缘？难道不会为了一种跨国组织的利益，实行一种限制个别国家的霸主地位的全球政策建

立世界政治秩序的新形式？难道渐进的发展在这里不会支配比以往更广泛多的范围？”^①希法亭的这段论述表明它已经放弃了他战前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已经转到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以德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失败和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是否就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到来呢？不是的。这不仅已为历史所证实，而理论上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因此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解决了各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世界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但是，随着战败国经济、政治实力的恢复，重新瓜分世界领土的问题会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战败国的反攻倒算”不仅不是可以阻止的，简直可以说是必然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粉碎希法亭对和平的幻想，他自己本人最后也成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中的一个冤魂。

希法亭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之所以仍然是资本主义是因为这种有组织的经济依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的，其中依然包含着矛盾和斗争。原因是这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化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经济的有组织性愈高，调节经济的意识愈强，广大劳动者就愈难以容忍占据大量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经济权力和社会产品的篡夺。由人们自觉调节的经济与资本主义对抗性所有制所造成的无组织性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把这种等级森严的有组织的经济改造为民主的有组织的经济，把少数人为了个人的权力与目的对社会生产实施的有意识调节变成广大劳动者的调节才可能。

希法亭认为这样就提出了一个经济民主的问题。所谓实现劳动群众对经济的调节也就是实现经济民主。他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认为这种转变与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社会主义由

^① 希法亭：《时代问题》，《社会》第1册第14—15页。

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说：“如果说，恩格斯把他与马克思的毕生事业称作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进步，那么，现在要做的是将社会科学应用到社会组织方面。这或许是科学社会主义向结构社会主义的转变。”^①

在希法亭看来，建设经济民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而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劳动阶级才能获得积极参与生产管理的能力和心理准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教育又是关键，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改造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不平等下的政治平等”，这是一个巨大矛盾。所谓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仅是占有上的不平等，也包括教育、知识和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在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实现经济的民主虽然并不要求消除个人天赋的不同，也不能消除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差别和职务高低。但它却要求每个人的起点是平等的，都能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担当各种职能。这就要求大家都有同等机会受教育。掌握社会上的教育、知识和文化是政治民主的必要补充，是运用和掌握政治权力的条件和保证。因此希法亭认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就必须将自己教育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统治者。为此就要争取受教育机会的平等。

希法亭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实现提出了经济民主问题，因而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与此同时，它也对工人的组织工会提出了许多新的工作内容。因为要争取经济民主工会就要努力影响经济组织本身，使其民主化。实行企业民主，加强企业委员会的地位，从而实现对生产的控制，以便最终获得经济民主，获得影响可调节的有组织的经济的权力，便成为工人阶级一切组织特别是工会工作的政治内容。

为了实现经济民主，把建立在阶级对立上的有组织的资本主

^① 希法亭，《时代问题》，《社会》第1册第7页。

义经济改造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经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工会还应努力增强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希法亭认为战时工人和工会影响力的增长十分有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战时和战后工人阶级组织的成员显著增加，工会的影响力迅速提高。绝大多数雇员、技术人员、公职人员和私人职员都参加了工会。战时没有工会的合作就无法进行战争。这就是说，战争在把工人阶级投入彼此敌对的战壕同时，也提高了工人阶级在国内的物质和精神地位。如果说国家权力在战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同样在战时国家对经济更加全面依赖。战争的胜负完全取决于生产的调整与干劲。无论国家以往对工人组织的态度如何，如今它都不得不与工人阶级协商。国家需要劳动者组织的自愿协作，尤其是从前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中与国家关系疏远的工会的协作更为必要。工会的势力和威望得到了提高。这样就唤起了一种使国家在战时如此无限的经济权力在战后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愿望。而且，在希法亭看来工人阶级这一愿望的实现也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战后，德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经历了广泛的民主，其声势极为浩大，工人阶级已把共和国看作是自己的创造物，自己则是国家的主人。没有他的支持和捍卫，共和国便无法存在。随着工人阶级政权意识的增强，他们有能力运用这一政权。这样就出现了和平地变国家为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工具的可能。他说：“社会方面的变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国家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分散的居民的唯一自觉的社会机构，而成为现存经济和利益组织的联合代表；国家不再独立存在，而是依附各种组织。国家的法律形式与组织的实际权力彼此对立。国家的权力中心受到积聚起来的经济权力的限制和威胁。民主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①如果说在这里希法亭对他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表述得还比较隐晦的话，到1927年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

^① 希法亭：《时代问题》，《社会》第1册第13页。

上的报告则对此作了更为明确地阐述。在这个报告中他宣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这种有计划的、自觉地管理的经济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自觉影响，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的唯一自觉的、具有强制力量的组织的影响，即国家的影响。……要依靠国家的帮助，依靠社会自觉调节的帮助，把这个由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的经济转变为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经济。由此可见，向我们这一代提出的问题不可能是别的，只可能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们作为社会民主党过去曾为争取政治权利，争取开始和扩大社会政策而进行了斗争，那末社会主义问题是通过经济发展本身提出来的。”^①希法亭在这里提出的这些理论成了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源渊。

第五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民族纲领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鲍威尔 奥托·鲍威尔（1881—1938年）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1881年9月5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厂主。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使其受到了很大震动，促使他阅读钻研有关问题。其中以阅读《资本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他在回忆中谈到，《资本论》使他明白了为什么一部分人会遭受剥削与痛苦，另一部分人则增加财富和享受幸福。1902年进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1906年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在大学学习期间

^①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第225页。

他结识了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麦克斯·阿德勒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等人，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鲍威尔在大学学习期间对马克思的有关经济危机和价值理论很感兴趣，23岁时他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发表在《新时代》上。从此与考茨基建立了通讯关系，并成为《新时代》的经常撰稿人。大学毕业后便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职业活动家。1907年开始担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秘书，同伦纳、阿道夫·布劳恩一起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同年，他接受维克多·阿德勒的委托写成《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作为《马克思研究》第2辑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这部著作使他成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曾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1912年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工人报》的编辑，负责与工会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已成为奥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知名领袖。1913年与海伦·龚普洛维奇结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鲍威尔被征入伍，任少尉军官。不久便在俄国前线被俘，被送往西伯利亚特罗伊茨科拉斯克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除了学习了俄语、哲学、经济学、法学和数学外，还写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一文，公开宣布要以马赫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以超越马赫，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他于7月被释放。起初到彼得堡，住在孟什维克分子唐恩家中，9月返回维也纳。同月28日写信给考茨基，表示自己拥护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派”的主张。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崩溃，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选出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联合组成的执行机关国务委员会。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布成立。11月21日他接替刚去世的维克多·阿德勒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15日又兼任

了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联合政府的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长期间，竭力推行德奥合并和亲英美政策，后由于法国反对德奥合并而于同年7月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在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虽然提出一些社会化的措施和法律草案，但是，基本上都是空谈，并未采取实际步骤加以实施。10月17日他又辞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职务，最后完全退出政府。1920年10月，当选为奥地利立宪国民议会的议员，直到社会民主党退出政府一直是议员。

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起力图恢复早已破产的第二国际。1921年2月他与弗·阿德勒纠集了一些中派组织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即第二半国际。1922年4月2—5日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共产国际在柏林召开代表会议，商讨联合事项。鲍威尔作为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谈失败后，他又参与了策划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的合并。1923年5月21—25日，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在汉堡召开联合大会，决定二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鲍威尔被大会选为主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8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法国马赛召开代表大会，27日鲍威尔作关于《东方问题》的报告。1926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林茨召开代表大会，鲍威尔参与了起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政党纲的报告。在报告中再次宣扬通过议会取得政权的道路和御防性暴力的理论。1927年以后奥地利法西斯势力逐渐猖獗起来。奥地利工人阶级在法西斯势力不断挑衅面前虽多次罢工、游行以示抗议，但都由于鲍威尔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的错误领导，而遭到失败。1933年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多尔福斯建立了独裁政权，取消了议会，解散了工人武装，禁止社会民主党活动。至1934年2月12日，奥地利法西斯势力蓄谋已久的向工人阶级的全面反攻开始。反动武装在全国范围内搜查，

逮捕和枪杀了革命群众。鲍威尔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借口避免挑起内战，仍一味妥协投降，不去组织工人武装进行反击。最后不得不举行起义反击时，已为时过晚，很快被镇压下去。起义失败后，社会民主党被查禁，鲍威尔也不得不流亡国外。2月13日到捷克。1938年5月迁居法国巴黎。7月4—5日夜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鲍威尔的民族理论 鲍威尔首先是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问题专家而闻名的。19世纪末的奥匈帝国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监狱。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矛盾也更加尖锐了。民族问题成为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一个尖锐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还在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现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就着重讨论了民族问题。这次大会否决了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并得到克里斯坦和埃伦博根支持的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纲领，通过了一个承认在奥地利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决的妥协方案。矛盾仍未解决。1905年维克多·阿德勒委托鲍威尔写一部研究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统一党解决民族问题时的基本观点。在短短数月中，鲍威尔便完成了一部长达500多页的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这部著作中，鲍威尔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特别是“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鲍威尔首先研究了“民族是什么？”他为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我们起先把民族理解为相对的性格共同体。”^①这里的“性格”乃是指“民族性格”，也就是，“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复合体”^②。对此他解释说，所有的民族当然都具有作为人类的共有的某些特征；另外他们也必然会有使他们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那些属性与特点。这些特

① 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鲍威尔言论》第8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点是由各民族的命运、各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各民族的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民族性格又是可变的。性格的共同性可以把某一个时代中的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联系起来，但决不能把我们这一时代的民族同2 000年或3 000年以前的祖先联系起来。民族之所以是性格共同体是因为，在某一时代的广大民族同胞身上能够观察到一系列一致的特征，它不仅具有一系列各个民族都同样具有的作为人类的共同特征，而且还有使其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一系列的独特性格。不过鲍威尔认为，对民族的这种说明还过于抽象，因此他对此作了进一步地说明。他指出，所谓民族性格首先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意志确定性各不相同”^①。意志表现为注意力，即在大量的经验现象中只选择某些现象，只是有意识地感觉这些现象。但是更为直接地表现在各种决策上。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的行动会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对同一项工作的处理是不同的；如果他们想娱乐一下，他们选择的娱乐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他们同样富裕，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民族性格的实质。

其次，民族性格还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表象群”^②。对正义和非正义的理解不同，对道德和非道德、对体面和非体面、对美和不美的观点不同，宗教不同、科学不同。

最后是身体特征的相似也是民族性格的构成部分。鲍威尔认为，不同的颅骨结构可能使人类学家感兴趣，但使我们感兴趣却不是这些，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伴随着人类学上的这些差别而出现的人们心理特征的差别和直接间接表现出来的意志趋向的差别。

“这样，我们便得出比较确切的民族性格的概念。这就是

① 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鲍威尔言论》第8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说，民族性格首先不是指的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身体特征的精神特征的总和，而是指意志趋向的差别、也就是指同样的刺激引起的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决策这一事实。但是，意志趋向的这种差别是由一个民族所获得的表象的差别或者一个民族在生存斗争中所形成的特点的差别决定的。”^①这样鲍威尔就给民族下了进一步的定义：“因此我们把民族确定为命运共同体。”^②

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 正是基于对民族的这种理解，并根据奥地利民族压迫的现实情况，鲍威尔提出了为扩大民族文化共同体而斗争的“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纲领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被排除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外。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独自地把民族文化财富据为己有。因此社会民主党要力求使民族文化，即全民族的劳动成果也成为全民族的财产，从而把所有民族同胞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因此，工人阶级为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使学校向工人阶级打开大门，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也都是为扩大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当然，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能充分享受民族文化，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只有在以社会财产和合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全体人民才有资格分享民族的文化财富，并卓有成效地对民族文化作出贡献。这就是说，民族只有先成为劳动共同体，它才能成为完全的、真正的和自主的文化共同体。工人阶级只有在反对一切民族的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并且同各民族工人阶级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工人阶级才能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才能加入本民族的文化共同体。

鲍威尔认为，奥地利现行的国家制度，迫使各民族都为国家

^① 鲍威尔：《民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鲍威尔言论》第10页。

^② 同上。

中的权力而斗争。这对各民族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它掩盖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使广大劳动阶级的斗争为其各民族内的统治阶级服务。工人阶级应当要求结束这一促使各民族争夺权力的制度。为此各民族工人阶级给每个民族确定一个有法律保障的权力范围，确立一种制度，使每个民族有可能自由地进一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使工人阶级能够争取到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份额。为此鲍威尔提出了以下四点：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具体的民族纲领。

1. 奥地利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2. 应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来的邦，每个团体的立法和行政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的民族议院管理。

3. 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4. 每个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应组成为公法团体，这些团体完全按自治原则来管理少数民族的学校事业，并且在官厅和法院之前给其民族同胞以法律方面的帮助。^①

鲍威尔认为这个纲领的彻底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将彻底改变建立和划分共同体的原则，它将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掌握着他们各自的劳动资料，自由地和自觉地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国际分工，它将把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联结成许多国际性的管理共同体，以作为管理各独立民族权利共同体的机关。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文明人类联合起来去共同征服自然，并把人类分成享有本民族文化财富和自觉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民族自治共同体，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民族方

^① 参见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鲍威尔言论》第31页。

面的最终目的”^①。

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 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及其“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在第二国际内部影响颇大，几乎为“中派”各党普遍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崩得”派便是这一理论的积极拥护者并力图在俄国贯彻这一纲领。因此，这一理论和纲领受到了列宁斯大林的批判。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鲍威尔把民族定义为，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民族性格的人类共同体，是不对的。它完全割裂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生活条件的联系，把它们彼此完全隔离开来。然而如果不把民族性格作为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条件的反映，就只能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就象唯灵论者所谓的神秘的“民族精神”一样。不错，民族当然首先是一个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但是，民族同自然形成的种族共同体、部落共同体不同，它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稳定的共同体。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要成为民族首先必须有共同的语言。不过也不是说所有操着同一语言的人都是一个民族。像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有共同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生活在同一地域。因此，共同的地域是构成民族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但是，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的第三个必要的特征是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因为只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才能把本民族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没有这种联系就不能成为民族。仅仅具备以上三个特征还不够。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还必须在民族文化和精神形态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和由于不同的生存条件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因此，具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总之，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

^① 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鲍威尔言论》第31—32页。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说明作为一个民族的人们为什么会有共同的民族性格，而不致于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至于鲍威尔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完全是维护奥匈帝国的统一，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实质就在于它是按民族分学校。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当这样做。列宁在：《论“民族文化”自治》一文中指出，只要不同民族生活在共同的国家内，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上就必然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如此，企图在文化问题上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把这些民族一劳永逸地分开的做法就是荒谬的，反动的。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努力使各民族在学校教育中联合起来，以便把在实际生活中要做的事在学校中先准备起来。在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及由此造成各民族发展水平十分不齐的情况下，如果按民族分校，必然会使那些原本较为落后的民族更加落后。

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就应当更加坚决地反对按民族分校。一个国家的各民族资本家都在各种股份公司、卡特尔、托拉斯、工业家协会等组织中最紧密、不可分地结合起来反对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即使在一个企业中，工人的民族成份也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他们都在遭受着同一个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因此，他们理应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按民族划分学校则是要把工人割裂开，削弱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无法与共同敌人斗争。因此，“按民族分学校不仅是害人的花招，而且简直是资本家行骗蒙人的花招。鼓吹这种思想，尤其是按民族划分国民学校，就会分裂、瓦解和削弱工人的队伍”^①。列宁又说：“无论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高喊‘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在分裂工人，削弱民主派，同农奴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81—182页。

大做出卖人民权利和人民自由的交易。”^①

人民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争取人民主权和争取民族主权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重视这一斗争，完全承认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从各个方面坚决维护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民族生活的建立和民族运动的觉醒以及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仅仅是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历史趋势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另一历史趋势则是，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的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时应同时考虑到这两种趋势。一方面要坚决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要明确而坚定地提出“民族自决”的纲领，承认各民族都有权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直至有权分离出去。“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背叛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那他们就必须坚持民族问题上的一项特别要求，即民族自决权（……），也就是政治分离权。”^②尤其是在像奥地利和俄国这样一些存在着最野蛮最反动的民族压迫的多民族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更应当坚决维护民族自决权，这不仅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符合统治民族无产阶级自身利益的，因为这是建立真正民主国家所必须的。

每个民族都应当享有自决权，甚至享有分离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这样做，也就是说分离权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23页。

^② 同上书第233—237页。

的使用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有利于该民族，特别是并不是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利于该民族的大多数，有利于无产阶级。这就是说不应当“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即受国家宪法保障用完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者，社会民主党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①。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在解决每个具体的民族分离问题时，还应当考虑资本主义社会中民族问题发展的第二方面的趋势，考虑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和他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在这两方面恰恰都是错误的。这个纲领既不会使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真正摆脱民族压迫；又不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第六节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 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力量因素”与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 1913年11月，鲍威尔在《我们的策略的基本问题》中曾把无产阶级革命说成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流血的阶级斗争时代”，“在这一时代里，老的国家将消失，新的国家将产生，所有的国家体制都将发生变化。它的结果将是完全民主，资产阶级的垮台，无产阶级的专政，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一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②。可是鲍威尔并不是一个坚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好龙”的“叶公”。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已经到来的时候，却又制造各种理论借口，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42页。

② 鲍威尔：《我们的策略的基本问题》，《鲍威尔言论》第3页。

回避暴力革命，强调奥地利的特殊性，认为在奥地利只有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结果坐视革命良机丧失，断送了革命。他于1920年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中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些机会主义观点。

鲍威尔认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能否胜利及革命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是由该国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的。一个阶级力量的大小首先决定于“社会力量因素”；其次决定于这个阶级所掌握的暴力手段。按照鲍威尔的意见，决定一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主要包括：第一，阶级成员的数量；第二，它的组织的性质、规模、效能；第三，它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着它所掌握的经济的实力手段；第四，它的政治兴趣，它的灵活性，积极性和牺牲能力的大小；第五，它的教育水平，它用精神手段影响本阶级成员和其他阶级的能力的大小，它的思想体系的吸引力。一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是，它所指挥的武装部队的数量，它可以用来装备这些军队的武器的数量和完善程度，它能够给予它的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组织的质量。

鲍威尔完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国家乃是阶级压迫工具；而是认为，在民主制的国家形式下，国家权力分配的唯一决定性力量是“社会力量因素”，国家的权力不会因运用物质暴力手段而作有利于某一阶级的分配。在民主制的国家，政权的“共同意志”仅仅是各种社会力量因素的合力。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不仅数量增加，而且组织程度和阶级意识也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力量就会增强，从而使其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增大。凡是工人数量过少或者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过弱，致使有产阶级在选举中占了多数选票，那么，这里的国家就会成为有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领导权通常就会落入资产阶级手中，民主制这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一定情况下，农民的阶级利益往往会给民主

制国家的立法和管理打上自己的烙印，从而使这个国家成为农民共和国。如果工人阶级已经构成选民的大多数，城乡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此强烈，致使资产阶级的报刊和选举骗局已无法影响他们，这时工人阶级就将夺取民主国家的权力，民主国家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工具，民主制将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民主制只不过是形式；这种形式是具有资本主义的、农民的内容，还是具有无产阶级的内容，这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民主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过这一工具按照社会力量因素的发展程度，可以落入不同的阶级之手。如果现在民主制通常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在社会力量因素一定发展阶段将成为“无产阶级统治形式”。在鲍威尔看来，现代化的工业国都可以通过议会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说：“任何一个现代工业国无产阶级都占人口多数。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和俄国不同，它可以在民主制基础上采用民主手段取得国家政权。它目前所以没有取得这种政权，仅仅是因为它思想上还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因为广大的工人阶层还没有摆脱资本主义报刊、资本主义选举骗局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①无产阶级一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识破了资产阶级的骗局，摆脱掉它们的影响，就会赢得选举的胜利，政权就会转为无产阶级的政权。

“御防性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鲍威尔同考茨基等有所不同，这就是他承认“御防性暴力”的必要性。他认为，即使无产阶级采用民主手段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也将反对它的统治。一旦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制，资产阶级就会反对这种民主国家，拒绝服从它的法律，对它的管理实行抵制。一旦一个民议会成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个议会也必将采取专政的实力手段，它将采取专政手段，或许是采取恐怖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怠工行为和资产阶级的积极反抗。这也可以叫作无产阶级专

^①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鲍威尔言论》第177页。

政。不过这不是反对民主制的专政，而是民主制的专政。因为在这里暴力并不企图强迫实行与社会的权力分配相矛盾的法律，而仅仅是保障由社会力量因素本身决定的权力分配，反对少数人的反抗。鲍威尔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暴力并不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而是针对少数人反抗社会力量因素的暴力而发挥它的作用。

另外，鲍威尔并不认为民主的途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途径。他说：“当然，决不能肯定地说，历史只许可无产阶级在用民主手段即以民主制议会和地方民主自治机构专政的形式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自己的专政。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还不能够用民主手段进行统治的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就迫使无产阶级实行暂时的专政。”^①因为在与资产阶级决战时期，极度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可能摧毁民主制。这时，资产阶级已无力通过民主制来统治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民主办法统治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由于尖锐的阶级对立而垮台，民主制的机构已不再能发挥作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必然要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成为阻止建立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形式同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民主制立法机关的地方必然不同。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采用民主制专政的形式，而只能采取无产阶级组织专政的形式。或者像巴黎公社时法国的地方自治团体，或者像俄国的工人苏维埃。鲍威尔认为，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在于它的社会内容。如果无产阶级宣布专政为自己实行阶级统治的长期形式，宣布为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工具，那么专政就会破坏经济过程和社会管理的连续性，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巨大的

^①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鲍威尔言论》第178页。

社会动荡和经济动荡。相反，如果无产阶级把专政仅仅看作和宣布为从反民主的反革命的直接危险中拯救民主制或解决破坏民主制的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在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使国家恢复民主制的形式，那么这种危险在一定情况下就可以避免，由此鲍威尔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无产阶级似乎并不是始终和到处都把专政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而只不过是应该和必须在历史本身迫使它这样做的地方决心实行专政；第二，无产阶级只有在历史条件迫使它实行专政的情况下才必须坚持专政。”^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他反对把迫使俄国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特殊历史条件看作是一般无产阶级斗争的普遍条件，认为这仅仅是流行的共产主义的错误的结论。

鲍威尔的这些理论虽然与考茨基等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有所不同，但也暴露了他的不坚定性，和妄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观点。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十分高涨，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间进行着生死攸关的决战时刻，这种模棱两可的理论必然会给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奥地利革命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出版就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认为这是一本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诋毁布尔什维主义的典型著作，他认为“把鲍威尔的书用作共产主义教科书的特种补充读物，是很有益处的。如果要‘测验’是否领会共产主义，出下面这样的试题是最好不过的：试分析奥托·鲍威尔书中的任何一节或任何一个论点，指出其中的孟什维主义，指出他叛变社会主义以及与克伦斯基、谢德曼等等同流合污的思想根源”^②。列宁认为，世界在经受了第一次世

^①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鲍威尔言论》第18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27页。

界大战的浩劫之后，特别是在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以及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那种具体情况下，“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破坏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监视他们，粉碎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尝试，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真正使整个剥削阶级屈服”^①。

鲍威尔与十月革命 鲍威尔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对待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暴露得就更为明显了。在俄国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即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段时间，鲍威尔恰好在俄国。亲眼看到了俄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当时他把自己的同情完全寄托在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1917年9月28日他在一封给考茨基的信中表示：“我站在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立场上。真正的孟什维克制订了一个我认为行不通的政策。……布尔什维克推行了一种最危险的冒险政策。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忠实地表现了由于三月事件必定会在俄国无产阶级中出现的对自己力量的过高估计。雅各宾派对断头台万能的迷信的形式在彼得堡复活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马尔托夫领导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保持了真正的中间道路。‘马克思主义中派’在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4页。

那里也是正确的。”^①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鲍威尔对俄国革命的态度有些转变，他反对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他在1918年1月4日的一封致考茨基的信中说：“《莱比锡人民报》对布尔什维克攻击之猛使我非常吃惊。我认为这种攻击既不公平，也不恰当。不公平，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显然只能像他们所做过的那样去做，而且既然欧洲无产阶级本身未能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支援俄国人，他们就没有多少权利要求俄国人为他人的利益牺牲革命。不恰当，是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引起德国工人对革命的反感来使德国工人的思想革命化。”^②鲍威尔认为，孟什维克责骂苏维埃政权是个人专政、士兵阴谋、专制政府等等，纯粹是幼稚。他说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言去骂任何一种革命专政。因为托洛茨基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出立宪会议，只不过在重复英国独立党领袖克伦威尔于1653年解散长期议会并赶走议员和法国雅宾派做过的事情。不过，在这封信中他还是表示，他从来没有同情过布尔什维克，而是同情马尔托夫国际派。并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会采取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起义的形式，是因为孟什维克没有接受马尔托夫的建议所致。在俄国工人阶级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时期，鲍威尔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同情有所加强。他在《布尔什维克和我们》中说：“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一个胜利。布尔什维克今天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发言人。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我们理应给予他们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像他们理应给予全世界正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同情帮助一样。恰巧在现在，即在德国帝国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制度对布尔什维克进行征讨的时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如不久前德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奥托·布劳恩对他们进行的那种恶毒攻击，是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团

^① 鲍威尔：《给考茨基的信（1917年9月28日）》，《鲍威尔论言论》第48—49页。

^② 同上书第52页。

结而产生的义务的粗暴践踏。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报纸的诽谤、用他们的士兵的刺刀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斗争，我们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去反对资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国际共同性、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是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① 虽然如此，鲍威尔依然没有放弃他同布尔什维克对立的立场。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表示，即使当时他住在俄国也不会同布尔什维克一起走。

1920年末俄国内战基本结束，开始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为了尽快地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过渡办法。鲍威尔根本不懂得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相反，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证实了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俄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少数，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必将转瞬即逝，它只能是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1921年11月，他在一本题为《苏俄的“方针”》的小册子中，一再强调，他早在1917年10月出版的小册子《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中就已说过的话：“我深信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由资产阶级建立，只能由工人和农民建立，而工农为了打退反革命和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只有在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巩固了它的成果之后，农民群众才会重新推戴资产阶级，从而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那时候我已把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暂时统治，看作是俄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在这本

^① 鲍威尔：《布尔什维克和我们》，《鲍威尔言论》第66页。

小册子，我也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本身必然会通过土地革命创造前提，使农民阶级上升，从而使俄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制”^①。他强调俄国革命之所以必然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训练、成熟起来的那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那种无产阶级能够进行现实的斗争，来实行产品生产和产品交换的社会化，而这一社会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早已预示的，是客观上有可能实现的。俄国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刚刚摆脱封建制度桎梏的国家的平民大众的幻想，他们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暂时推上执政地位之后，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最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过低而遭到失败。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统治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只是一个历史工具，借此可以消除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在新的广泛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因此，他针对列宁在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这是一个自供：俄国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前提，发展出一个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自供：俄国革命的客观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它只能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民基础上的发展，这是由于革命而扩大的、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基础。……俄国革命的真实本质在其‘新方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新方针’的现实的实践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②。不过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企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依然是不可能的，它仍然是幻想，是空想。他认为，在1917年秋，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实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打碎束缚俄国农民的封建枷锁；在1918年至1920年间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集中俄国人民的力量同反革命作斗争，

^① 施威尔：《苏俄的“新方针”》，《施威尔言论》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217页。

只有它才能胜利地将内战进行到底，保卫土地革命的一切成果。但是现在俄国面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任务。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在共产党专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国民经济中的“新方针”要求政治上的“新方针”。现在俄国农民需要工具，俄国工业需要机器，俄国铁路需要机车。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现在是极其迫切的需要。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资本的输入为条件的，资本输入又是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而专政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这个专政在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了发展俄国劳动生产力和土地生产力的障碍，取消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可以设想，布尔什维克由于认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性，而逐步地和平地废除它的专政。如果它死死抱住自身的独占统治不放，重建就会失败，“俄国就会走向经济灾难，在这种灾难中饥饿的、失望的人民群众就会推翻专政”。他公开号召：“用我们掌握的一切精神武器去支持俄国革命内部的那些迫使苏维埃政府及时地自愿地取消专政的力量，唯有这样地取消专政，才能防止政府被暴力所推翻。”^①这样他就完全脱掉了同情俄国革命，同情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伪装，把其反革命的机会主义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鲍威尔“在战后和考茨基一样，成为可怜的市侩”，“无论是奥托·鲍威尔、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导者们的说教，还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教，都表现了他们的本意：‘革命跑得太远了。我们一向这么说，现在你也这样说了’。”列宁愤怒地指出，这些人在苏俄处于比内战时期还困难的时刻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只能把他们“当作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②。

奥地利社会化实现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先后爆发了无产阶级革

^① 鲍威尔：《苏俄的“新方针”》，《鲍威尔言论》第22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0—631页。

命，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先后宣布独立。哈布斯堡王室退位，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奥地利也于1918年11月12日由临时国民议会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1919年2月18日立宪国民议会选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获极大胜利，它与基督教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鲍威尔在这届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长及社会化委员会主席。他关于奥地利如何实现社会化的设想正是在这时提出的。起先这些设想以一组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工人报》上。后编成一本小册子——《到社会主义之路》出版。鲍威尔错误地认为，奥地利共和国的成立已经为社会化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完全用不着彻底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提出的奥地利实现社会化的道路必然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奥地利广大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日益高涨。在这样一种革命的形势下，鲍威尔不得不承认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他在上述那本小册子中说道：“政治革命没有消除经济剥削，毋宁说倒使经济剥削更加露骨了。我们推翻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难道是为了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无上权威吗？我们粉碎了将军们、官僚、封建主的统治，难道是为了继续充当银行经理、卡特尔巨头、交易所投机家的奴役吗？工人群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半的革命事业唤醒了完成整个革命的意愿。政治革命唤醒了走向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意愿。民主主义的胜利揭开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序幕。”^①他又说：“战争粉碎了作为整个军国主义专制政权权力手段的军队，剥夺了专制国家的强制手段，因而导致了民主主义的胜利。但是这次战争也招致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这种变化使社会主义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71页。

性。”^① 鲍威尔认为，除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使社会主义成为奥地利不可避免的前途外，客观经济环境也使奥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奥地利作为战败国必须以战争赔款的方式向外国资本家纳贡，这已是人们无法负担的重赋了。如果再向本国资本家进贡，那就更无法负担了。人民摆脱经济困难的唯一出路是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战争不仅导致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迫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虽然如此，鲍威尔依然反对以暴力手段实现这种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不能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迅速地一下子完成，不要以为只要几千勇敢的有作为的人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就够了，他们就可以命令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社会主义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少数人通过无情的胁迫手段来剥夺资本家，由一个革命中心来管理全国生产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由全体人民自己掌握经济，人民应该通过一系列民主机构自己管理自己的经济生活。这种人民自己掌握经济的制度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参加和热情协助为前提。极少数人对人民使用胁迫手段是办不成事的，只有出自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意愿才行。因此，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人民的大多数必须深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因此，我们不能想象，有那么一天，工人会一下占有了所有工厂、矿场、企业、银行的农场，并把资本家和他们的经理们赶走。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为了使人民群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使他们的生活通过改革有所改善。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第一，至少不使生产减少；第二，改变有利于资本家的分配制度。“假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所生产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71页。

的财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一半，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绝不会好转，也许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更坏得多，这就是说，如果分配的财富少了，即便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必须在不使财富生产受到影响情况下进行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①如果我们用暴力手段实行社会化，也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工人们用暴力占有了所有企业，直截了当地将资本家及其管理人员统统轰走，自己掌管了企业的领导权，这只有在流血的内战中才能实现；但是，内战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大量的生产资料、机器、铁路等等。这时，资本主义的外国必将拒绝向我们提供原料和用来购买原料的贷款，不仅如此，它们还将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的企业将因缺少原料而关闭；具有组织领导生产知识的大多数经理、工程师和经济师等将拒绝同我们合作。可是现代化大企业中的工人原先所承担的仅仅是全部生产的一小部分，他们还无法立即担当组织领导全部生产的责任。这样生产就会陷入混乱，劳动生产率将大幅度下降，生产的财富减少，工人所得不仅不会增加，可能还要减少。这时，希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改善处境的人民，面对这一现实必将感到极大失望，进而投向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怀抱。鲍威尔因此认为不能通过这条途径使奥地利走上社会主义。必须开辟另外的途径，必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有目的地、稳步地、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每一个措施，都必须经过再三思考；这种措施不只是注意财富的合理分配，而且还要照顾到财富的生产；除非能同时建立起其完善程度不亚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就不要去破坏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鲍威尔强调，“政治革命是暴力所能完成的事业；社会革命只能通过建设和组织工作才能完成。政治革命是几小时中所能完成的工作，社会革命却是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73页。

大胆而细心地进行多年工作的成果。”^① 鲍威尔大概已经感到自己的上述观点已经很难同修正主义区分开了，因此赶紧声明自己的这种见解是和昨天或前天的肤浅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妄想绝不相干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认为，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社会即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十分错的。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是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前是、今天仍然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如果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无产阶级所负的使命就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完成这个新任务就不是革命手段所能胜任的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革命永远只能是“为未来社会基本要素扫清道路”。在这种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是这样一种任务，它不能通过巷战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内战的方式，而只能通过创造性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来完成。在这里鲍威尔完全回避了奥地利无产阶级是否已经完全夺取了政权。由社会民主党及基督教社会党共享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吗？由旧军官指挥的旧军队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革命人民仅仅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能算是已完成了夺取政权的任务吗？鲍威尔完全不顾这种现实，一再强调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革命，这说明尽管他因为修正主义的名声不好而力图与其划清界线，但他还是滚到这个泥坑去了。

按照鲍威尔的设想，奥地利国民经济的社会化首先应从煤矿、金属矿和钢铁工业部门开始。因为这些部门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最高；资本集中最厉害，不多的几家大企业即控制了整个部门的生产。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宣布这些部门的企业主对企业的所有权无效，用这样的剥夺方式实现社会化。不过这种剥夺方式不应当是无偿的。因为在其他企业主仍然保持对原企业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唯独无偿地剥夺了他们，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应给予补偿。不过补偿费用可以用向所有资本家和地主征收累进财产税的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75页。

办法筹集。这样既可以使重工业企业的资本家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交出企业，又可以使劳动人民毫无损失地获得企业所有权。

这些社会化的企业如何管理呢？鲍威尔坚决反对由政府直接管理。他认为，“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业，它的权力势必超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代表机构的权力；政府权力的这样增长，对民主制度可能是一种危险。另外，政府也不会管好公有化企业；最坏的企业管理者莫过于国家本身。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要求企业国有化，而只要求企业公有化。”^①他主张每个工业化部门都应有一个管理委员来管理。这种委员会应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第一，已实现社会化工业部门的工人、职员和公务人员；第二，消费该工业部门产品的消费者代表；第三，代表全民的国家的代表。三者各占三分之一。企业职工代表的一方与消费者代表的另一方，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因为前者希望有较高的工资，后者希望有廉价的商品。国家代表可作为居间人，在双方发挥仲裁作用。为了避免管理委员会在领导人员的任用、售价的规定、盈余分配及重大投资的决定方面舞弊，可由高等科技院校的教员和所有工业方面的技术领导人共同组成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对公有化工厂领导人的任用事前提出建议，管理委员会从中选择任用企业领导人。总之，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化。

另外还有些企业不宜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有化，这种企业如电车、轻便铁路、运输车辆、发电厂、面粉厂、牛奶场等等。这类企业可由普选产生的权力机关——专区、市政府实行公化。不过对这类企业的业主的补偿不能采取补偿在国家范围内公有化的那些企业的业主的办法，因为地方政府不能征收累进财产税。对这类企业的补偿应采用定息的形式，即“国家指令这类原业主必须接受作为补偿损失的业主证书，用以证明业主有从公有化企业的收益中支取定息的权利。专区和市政府有权决定偿付这种债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73页。

务的年限，在20年内或30年内付清。这种限期届满之后，划归地方政府公有的企业就不再对私人资本承担任何付给定息的义务了”^①。

当然会有许多企业部门实行社会化的条件根本还不成熟。因此他认为对于这类企业就可以暂时先不实行社会化，而是先进行组织工作，以便为将来实行公有化做好准备。但对另外一些商业倒可以考虑实行公有化，如经营咖啡、可可、茶、棉花、煤炭进口及大百货商场等。

鲍威尔认为，在奥地利只有那些生产集中于少数大股份公司的工业部门，立即实行社会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对于大多数工业部门来说，还不能立即实行社会化。对于这些部门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组织工作，为未来实行社会化做好准备。为此，应规定所有工业部门的企业都应隶属于各自所属部门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组织是由该部门的企业联合组成的，它不应受企业主控制，也不应听从没有管理经济事务能力和经验的官僚领导。工业联合组织应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领导。按照鲍威尔的构想，管理委员会应由四部分人构成。四分之一为国家代表，其中工商部委任一人，其余由国民议会选举；四分之一为消费者代表，即该部门产品的消费者的代表；四分之一由该部门的员工代表组成；最后四分之一由该部门的原企业主的代表组成。组织起来的各工业部门的管理机构应该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服务。工业联合组织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使生产逐步集中于技术最先进最完善的企业。为此它要有权勒令那些技术不完善的企业停工，并将其任务转交给技术先进管理完善的企业。当然后者要对前者的损失给以补偿。当通过这种方式使生产逐渐集中于少数几个技术完善的企业的时候，对这些部门实行社会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可见对工业企业进行组织工作和创立工业联合组织都是走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79页。

向工业完全公有化的过渡阶段。

鲍威尔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不仅应体现在最高立法权应归平等普选的议会；专区市等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民主的代表机构手里；也不仅仅体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中要贯彻民主原则；而且它还要求单个企业的管理也必须民主化。他说：“经济民主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它要求各个工业企业本身的管理也必须民主化。就像自由的国家以自由市为它的基础一样，民主的企业体制就是整个工业民主组织的基础。”^① 国家应通过法律保障凡20人以上的工厂都应有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干预工厂管理方面一切有关职工福利的事务；调解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但是，企业的经济领导权不能交给工人委员会，其原因就在于，对每个企业进行管理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在该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正如铁路不是为铁路工作人员修建的，而是为全民修建的；对家具工业企业实行管理，也不是专为木匠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上述原因，不能把工业的技术和经济领导权委托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而是要把企业的技术经济领导权委托给企业管理委员会，正如前面所说管理委员会除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外，还要有国家、消费者等方面的代表组成。“我们不想让企业工团化，而是要让企业社会化，这就是说，不能让一个企业部门归该企业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而是要让所有企业部门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②

鲍威尔认为，大地产的公有化，是奥地利社会主义革命最大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土地的公有化首先是对森林所有权的公有化。森林是奥地利的最重要的资源，掌握了森林才能算是掌握了国民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其次是对世袭领地和其他大地产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6页。

实行公有化。等到取得经营大地产的经验之后，再对一百公顷以下的地产实行公有。至于个体农民的土地当然不在剥夺之例。因为剥夺这些小农既不合理、技术上又行不通。

在地产的公有化时也可像剥夺大企业那样，用征取财产累进税的办法给予补偿。对剥夺的大地产可根据生产特点实行不同的经营方法。森林只适合大生产，葡萄园则只能小生产经营。大农庄的管理可仿照大工业组织管理机构组成管理委员会。

对于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体农民所有权，鲍威尔不主张没收。但是，他认为，也应设法使小农经济适应社会要求，服从有计划的社会措施，以利于全民。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农民自身的利益，不只是为了使农民有可能尽量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成果以增加生产，提高他们的生活，而且也关系到城市和工业区域居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获得丰富的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应该通过法律促进耕地的集中经营和减轻耕地集中的困难。每个专区都应该设立农业局负责领导农民合理化地经营他们的土地。设立国营粮运公司把粮食贩卖业务组织起来，消除私人买卖和投机行为，废除抬高物价的中间商。

鲍威尔认为，银行的公有化是整个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战前银行就已使全部大工业服从于它的统治，金融资本家已经成为骑在工业资本头上的太上皇。当初如果有人考虑从何处着手实现社会化，定会认为从银行的社会化着手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因为社会如果成了银行的主人，它也会因此而成为工业的主人。但是，战争已使银行这方面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期间银行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的借款工具了，相比之下，银行的其他作用已大大落后。因此，现在银行的公有化已不能起到战前银行公有化所能起到的那种作用了。另外，还由于国家需要来自国外的大量贷款以恢复国民经济，因而银行的公有化也就不那么容易进行了。这就是社会化为什么不能先从银行的社

会化做起的原因。国家的任务首先是清算银行战时的业务，重新开展和平时期的业务，然后才能谈到银行的社会化问题。所以，“银行的社会化虽然不是伟大的社会化事业的起点，但是，银行的社会化将是这一伟大运动的最后阶段和完成。”^①

银行的社会化同大工业、大地产的社会化不同，它不是剥夺金融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是要剥夺金融资本由于支配银行中别人的存款而获得的经济权力，使它变成社会的权力。因此不需要使用剥夺的办法，只要通过法律决定，大银行的管理委员会不再由银行的股东大会产生；而由法律指定的团体选举产生即可。如法律可规定，大银行管理委员会的三分之一由国民议会选出，其他三分之二应由工业联合组织、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职工会等团体委任。仅这样的规定就足以使银行社会化。

当大银行摆脱大股东的控制，改由全民的代表来管理时，便可以十分顺利地将全国所有大银行归并为一个中央银行，该银行的领导也就成了全国信贷事业的领导人。人们当然应当选择最优秀的专家担任这个职务。为此应成立一个由主要工业联合组织和商业联合组织的理事以及高等商业学校的教员和银行工作人员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推荐国家中央银行的主要经理人选。

国家的中央银行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最高领导机构，它将负责把资金和工作任务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的调节机构。由此可见，银行社会化的结果，是它将成为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关。按照鲍威尔的设想，“国家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就是最高经济机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最高领导机构。通过银行的公有化，社会才获得权力来有计划地领导自己的工作，对各生产部门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对人民有计划地满足他们的需要。”^②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99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从以上可以看出，鲍威尔的有关社会化的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征税的办法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自己就讲过：“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对剥夺者实行剥夺，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对他们实行剥夺。粗暴地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私产的方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这种没收方式只能使生产资料遭受破坏，人民群众反而要受到损失，甚至丧失了国民收入的源泉。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秩序、有条理的方式。这样，实行时才不至于让社会的生产机构受到破坏，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才不致受到阻碍。有步骤地剥夺剥夺者的最主要办法莫过于收税的手段了。”^①其实这是幼稚的幻想。因为使“剥夺者”和平地接受剥夺的前提必须是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特别是军队要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为此旧的国家机器要彻底被打碎。而当时奥地利的政权还远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旧军队也依然保留着并由旧军官在指挥。在这种情况下要和平地实现奥地利国民经济的社会化当然只能是幻想。历史对此也已经作了结论。

^① 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鲍威尔言论》第103页。